湖湘文化要略

杜纯梓◎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邮编：100871
编辑部：（010）62754934
发行部：（010）62750672
出版部：（010）62754962
E-mail：zyjy@pup.cn
http://www.pup.cn



定价：38.00元

湖湘文化要略

主　编　杜纯梓

副主编　彭思毛　刘演林

参　编　周　宇　刘建军

高　宁　唐旭君

曾永胜　帅建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湘文化要略/杜纯梓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301－19030－2

Ⅰ.①湖… Ⅱ.①杜… Ⅲ.①文化史—湖南省 Ⅳ.①K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5509 号

书　　名：湖湘文化要略
著作责任者：杜纯梓　主编
策 划 编 辑：邱　懿
责 任 编 辑：邱　懿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9030－2/G·3144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934　出版部 62754962
电 子 信 箱：zyjy@pup.cn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8.25** 印张　319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序

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所采取的活动方式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本质之所在，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源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可见，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精神动力，就必须有强大的民族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文化中与欧洲文化、印度文化鼎足而立的三大体系之一，而且是世界四个古老文明摇篮里孕育产生的文化体系中唯一延续至今、未出现过断层的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革故鼎新、因势而变的创新精神，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扶正扬善、恪守信义的社会美德等中华文化精华，是人类文明与世界文化中光芒四射的瑰宝。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的优良的文化传统，不仅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而且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不仅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泱泱大国。由于历史渊源、地理环境、经济状况、风俗习惯以及语言诸方面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也蓄积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这些区域文化相互影响又各具特征，而且都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系统。它们共同形成了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灿烂夺目的多元化格局。在我国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化中，诞生于三湘四水的湖湘文化以其悠久



的历史、鲜明的特点和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湖湘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从古至今就被称为“古道圣土”、“屈贾之乡”、“潇湘洙泗”。永州玉蟾岩遗址的稻谷遗存，记录着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明；炎舜远古传说，标记着中华农业文明和道德文化的渊源；屈原开创的楚辞，成为与《诗经》并提的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岳麓书院汇聚着当时中华文化和教育的精华；宋代的湖湘学派引领着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湖湘士人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创立理学开创了中华文化新格局。尤其是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空前繁荣，正如杨昌济先生所说：“湘省士风，云兴雷震，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进入清道光以后，湖湘连连携手走出一批又一批政治精英人物，以曾国藩、陶澍、魏源、左宗棠、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中兴志士，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以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为代表的辛亥革命领袖与功臣，引领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潮流。特别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投身这场伟大革命的最大的精英群体非湖南人莫属，领导这场伟大革命的领袖和主将也是湖南人比例最大。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邓中夏、向警予、何叔衡、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王震、谭震林、罗荣桓，这些优秀的湖湘儿女，像一颗颗耀眼的星星，装点着现代中国美丽的星空，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英雄的湖湘儿女创造了灿烂的湖湘文化，形成了湖南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它主要包括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兼收并蓄的博采精神，百折不挠的霸蛮精神，慷慨赴义的牺牲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湖湘人的精神特质是湖湘文化的思想内核，这一思想内核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湖湘文化突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文化的缩影，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先声，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湖湘文化孕育的湖湘杰出人士曾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湖南奇迹、中国奇迹乃至世界奇迹。作为新时代的湖湘人，应当是湖湘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优秀传承者，应当是湖湘文化和中华文化创新的推进者。仰望岳



麓书院大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名联，体验“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的豪情，感悟“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气概，新时代的湖湘人应当谨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学风，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杜纯梓教授主编《湖湘文化要略》，嘱我为序，读完书稿，感触良多。我觉得，编写这样一个讲述湖湘文化的读本，对于宣传、普及湖湘文化，对于激励人们认识湖湘文化、创新湖湘文化，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同时，《湖湘文化要略》也是一个颇有特色的读本。它吸收了前人和同行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又有创新，注入了编写者的最新研究所得，使读本呈现出新的气象。它打破了以史为纲依次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或按内容分类分别介绍各类型文化现象的常见表述模式，建立了多视角认识湖湘文化的综合式表述范式，显得整体感强而又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它改变了教材编写通行的阐述式话语方式，将一腔激情融入述说之中，使读本焕发出一种特有的亲切而清新的气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相信阅读者会喜欢上这个读本，会在阅读中获得思想启迪、知识积累的同时得到一种审美享受。

是为序。

唐之享

2011 年 3 月 10 日于长沙

目 录





绪论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推而言之，一方特定区域的人群创造一方文化，即所谓“天开人文出庶物”。在湖湘这块热土上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湖湘文化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影响深远。特别是近现代湖南异军突起，浩然特立，“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①]，为之驱动、相与发明的湖湘文化更加焕发出动人而夺目的光彩，受到国内外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追捧。

① 谭其骧. 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何谓文化？对它的诠释与阐述多种多样。英国学者泰勒说：“文化是个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习惯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一些其他的能力和习惯。”迈克·克朗说：“文化就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事物。”我国大学问家胡适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梁漱溟说：“（文化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这些解释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审视、立论，都有一些道理。不管持何种观点，“文化”总是与特定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相联系的。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发现、创造的价值，以及在发现、创造价值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相通、生命律动相偕、前进脚步相随、创造发明相辉映。作为区域文化，它自有许多卓异之处，并带有一些神秘色彩。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湖湘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文化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深深扎根于湖湘大地，由居住和来到这山国泽乡的人们所创造、所发展。她发轫于斯，陶铸于斯，融汇于斯，成熟于斯。在传世文献记载中，古代湖南是“蛮荒”之地，未开化不发达，原住湘人被蔑称为“荆蛮”、“蛮虏”。而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揭示：早在远古时期，湖湘地区就有了

较高的文明，在诸多方面都能与中原文化争妍斗艳，不少成就独步领先。临澧县竹马村出土了18 000年前的高台式木楼，道县玉蟾洞出土了12 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和圆形陶器。这里还陆续发现了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一块水田、一座城池、一条街巷。在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沿岸和洞庭湖周边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及商代遗址有一千余处，出土的青铜器居南方各省之首，代表了商周手工业技术的最高成就。特别是长沙马王堆汉墓数千件随葬品、湘西里耶三万余枚秦简和道县鬼崽岭数以万计祭坛石像的出土，举世惊叹。

越来越充足的事实毋庸置疑地说明：长江流域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之源。湖湘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楚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在阻山隔水的环境中，湖湘文化独辟蹊径，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

这里陆续出土的大量商周鼎彝、秦汉简帛与绘画大都表现出鲜明的湘楚特色，反映出湖湘先民丰富卓越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这里"好巫重淫祀"。建立在想象与虚拟超自然力量之上的巫风巫术特别盛行，不受礼制和祀典束缚的泛神祭祀风靡民间，体现农耕社会原始信仰和行为特征的傩文化延续至今。

这里崇拜凤，以凤为祥瑞的征兆、至德的象征、美好情感的寄托。湖南人是实实在在的"凤的传人"。

这里深受道家思想的浸润。上古时期道家的率性任实在整个精神文化领域起着主导和主控作用。面对社会纷争和困难的条件，人们超然自适，追求心灵的独立与宁静，探究和接近宇宙的本原和人生的真谛。

这里山水奇丽，钟灵毓秀。造物主特别垂青斯土斯人，让他们在这满目葱茏、如诗如画的活动场景中感受灵气、涵养性情、激发灵感，得到"江山之助"。

这里在封建时代一直远离中央王朝和方国的统治中心，德泽寡被，条件艰苦。朝廷与牧守总对包括湖南在内的荆楚加以排斥，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①]、"蛮虫难化，执心违邪"[②]，侵夺无时，征伐不断。《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史记》等史籍多有记载。《诗经》中露骨地写道："蠢尔蛮荆，大邦为雠"[③]、"挞彼殷武，奋伐荆楚"[④]。四千多年的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⑤]在长期威压重逼的生存环境中，湖南人养成了剽疾顽悍、任侠尚气的性格，

① 《左传·成公四年》。

② 班固《白虎通·礼乐》。

③ 《诗经·小雅·采芑》。

④ 《诗经·小雅·采芑》。

⑤ 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



形成了疾恶如仇、勇于反抗的民风。其“民气之勇、士节之威，实甲于天下”[①]。

凡此种种，积聚为湖湘文化的独立根性。这种特定的文化根性自有由来，历久未泯。它对湖南人的心理结构、性情禀赋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又影响、催生湖湘文化的其他因素。

① 清代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设湖南时务学堂折》。

（二）湖湘文化是一种有思想深度的文化

湖湘文化以深刻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创见为灵魂、为指引。湖南人有很强的原道精神，许多仁人志士以“虽九死其犹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著态度，探索宇宙、社会、人生的大本大原。从屈原的《天问》到毛泽东的《中国应当向何处去》，从周敦颐深奥的“太极”探索到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古典哲学体系，都充满了求真的勇气与睿智。湖南人爱“打破沙锅璺（问）到底”，不得真经不罢休。岳麓书院的院规要求士子们“通晓时事物理”,“疑误定要力争”。毛泽东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途，博览中外经典，躬身调查研究。他在为《湘江评论》所写的《创刊宣言》中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曾国藩多次强调“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指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这反映了湖湘文化的极可贵之处，凡要做一番大事者，一定要把握本原，立定根本，审时度势，找准方向，绝不盲动。

正因如此，湖南历来是出思想、出人才的地方，而且很多人都能在极不利的条件下建功立业。周敦颐与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孔孟伦理道德为核心，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养料和思辨方法，与本土文化和新的时代因素相融合，深入探索宇宙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和知行观等范畴，阐发心性义理，创立了理学。后众多学者相与传习，形成了湖湘学派。坚实的理学体系的建立与实行，标志着湖湘文化的成熟与兴盛。后世很多湖湘俊杰无不深受理学影响。极有影响力的湖湘四典——《怀沙》、《岳阳楼记》、《桃花源记》、《爱莲说》，从世界与自我、社会与人生、向内与向外、大我与小我、执著与超脱等多个维度，抒兼济之志，述独善之怀，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已经具有的深度和高度以及普世价值。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大批湘籍革命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与深厚的国学根底相熔铸，与生动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术文化和经世致用传统向更新、更高层次发展，创立并发表了很多

富于远见卓识的重要思想，以此指导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为重要的行动指南。其理论建树和实践功绩震古烁今，名闻寰宇。刘少奇的党建与经济工作理论，彭德怀的军事思想，徐特立的平民教育思想，蔡仪的美学理论等，都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编纂的《湖湘文库》，汇集湖湘文化成果尤其是思想理论方面的杰出成果，卷帙浩繁、光彩熠熠。它揭示出了一个规律，湖南人爱动脑筋想问题，尤其对时代大潮流、大事业、大变革感兴趣。在经世致用的目标指引下，推本溯源，把握枢机，用先进理论指导实践，通常都是先有思想后有事功，“其功业皆本源学术。”[1]特别是近现代，组织领导和积极投入社会运动的湖南人，大都是学识渊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型人才。他们以实学勤实事，以实事程实功。这就使得湖湘文化在观念、精神方面显得特别突出。亦如朱汉民先生所说：湖湘文化首先是一种观念文化、精神传统。

①叶德辉《郎园书札》.

（三）湖湘文化是一种崇尚道义的文化

湖南人由来就有“踔厉敢死，”“铁肩担道义”的禀性。人们常用“霸蛮”、“剽悍”、“任侠”、“其俗好勇”、“劲直任气”评说湖南人，其实这只是外在表现，而真正的内在驱动力和意志力来源于血诚道义。服膺真理，崇尚道义，疾恶向善，忧国忧民，是众多湖南俊杰的共性。他们“义不负心，忠不顾死”[2]，行事处世顾大义、重气节，刚强正直，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他们恪守儒家礼教，向往仁政德治，反抗暴政压迫，追求社会公平；他们见贤思齐，见恶务除，不平则鸣，不公则争。在新的历史机遇来临之时，湖南人总是走在前面；在大是大非之前，湖南人从不含糊。唐朝政治家和诗人吕温在《题阳入城》诗中写道：“忠驱义感即风雷，谁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日据时期一汉奸向齐白石索画，齐白石在所画《不倒翁》上题诗：“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这充分体现了湖南人的忠义血性和道义原则。为了捍卫真理，匡扶正义，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们忍辱负重，勇于担当，不避风险，慷慨赴义。长沙太守李芾抗元殉节，全家就戮；记者沈荩将丧权辱国的《中俄

②《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



密约》昭示天下，惨遭杖毙；维新变法骁将谭嗣同反抗君主专制，不避斧钺，发出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浩歌；民主革命先驱陈天华为祖国积弱积贫、受人欺凌而痛彻心骨，蹈海明志，唤醒国魂。这一切都是道义使然。杨昌济说：“近夕革命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①]这里的学风主要指崇尚道义的士气民风。

① 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四）湖湘文化是一种经世济时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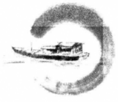
湖南人特别关心世事国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很多杰出人物都“留心经济之学”，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治国安邦的抱负。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就以“康济时艰”作为治学宗旨。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曾国藩“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常告诫后辈：“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这就比传统文化中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更进了一步。即使身居下层，也要承担“排一方之难”的责任。湘学士风历来以经世致用为尚，鄙弃皓首穷经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的学究腐儒。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沉潜宋儒程朱诸书”，精研心学，同时对“经史及宋、元、明、清、当代儒生之书，悉究其源流，而务适其用，”他以强烈的经世精神写下了《筹漕篇》、《筹鹾篇》、《筹河篇》等一系列针对时政急务补阙救弊的策文。为了“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撰成《海国图志》一百二十卷。他还博采自清以来“切于事”、“合于今”的文章，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该书“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尤其是“三湘学人，诵之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湖南一师《教养学生之要旨》也着重强调：“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在此就读的毛泽东时刻关注世界大势，心系国祚民瘼，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在听课笔记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组建新民学会，就是毛泽东“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浩大志趣的具体体现。受经世致用之学的培育与浸润，湖湘学人大多热衷投身社会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作为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现代最有朝气、最有影响力的省份之一。

（五）湖湘文化是一种求变趋新的文化

从湖湘文化的基本倾向和主要施为看，求变趋新是其重要精神特质和价值追求。湖南人“敢为天下先”，就植根于不断的变易求新。湖湘学术中《易》学兴盛发达，周敦颐、王夫之、张栻、王闿运等理学大师都深谙《易经》阴阳奇偶交互变易之精微，努力阐发变则通、变则兴之义理。相与鼓吹，学泽广被，蔚为风气。受此影响，湖南士民无论是治学还是用世，都有一种浩然独立、不囿成见、戛戛独造、自辟蹊径、敢于突破各种藩篱的变革气魄和创新精神。对此，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有一段精辟的概括：“（湖湘文化）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二百年来，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而邵阳魏默深治今文《尚书》、三家诗，门庭敞然。及今人湘潭王氏之于《公羊》，类能蹂躏数千载大儒之堂牖而建立一帜。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①]这种风气的形成与湖湘士民的原道穷理和通达时务直接相关。为了掌握宇宙、社会、人生的真谛，上下求索，九死未悔，故能开悟解蔽，不断有新的发现和创获。认清历史潮流，通晓时务物理，故能会适变通，“不凝滞于物而能与时推移。”[②]另外，湖南地处偏隅，远离中央王朝，思想较为自由，少门阀观念，无门户自限。成功的湖南人大多都没有背景，依靠个人的奋斗，凭硬本事吃饭。因而他们没有多少顾忌，敢说敢闯敢干，充当改革创新的急先锋。王船山信守“道随器变”，“天地之化日新”的理念，自立宗主，大胆提出“六经责我开生面”，“道莫盛于趋时”。魏源说：“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毛泽东诗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都充分表达了湖南人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强烈愿望和卓绝胆识。近现代多次社会变革，湘人往往首举大旗、首开风气、砥柱中流、引领潮流，就是这种求变趋新湖湘文化的典型体现。

① 杨毓麟《新湖南》。

② 屈原《渔父》。



（六）湖湘文化是坚忍刚健的文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刚健不拔的乾道精神在湖南人身上体现得很突出。万难不辞、百折不挠、乐观进取、永不放弃。章士钊在一篇文章中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①]不管面临多么复杂的环境，多么艰苦的条件，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与风险，湖湘俊杰都勇往直前，坚忍顽强，能够“扎硬寨，打死仗”，“砍掉脑壳碗大疤”，“打脱牙和血吞”。因而事功卓著，超拔群彦。孙中山先生在评述湖南革命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曾国藩以坚忍强毅著称。他牢记祖父“以懦弱无刚两字为大耻”的教诲，屡败屡战，不屈不挠，咬定牙根，徐图自强。清王朝给了他“勇毅侯”的封号。有人评价曾国藩“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②]这也是很多湖南人的共同性格。惟其如此，湖南才出现“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① 章士钊《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

② 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七）湖湘文化是一种崇学践履的文化

湖南人由来就有爱读书、善读书的传统。耕读相承，孝友传家，为众多宗族士子追慕景从。唐宋以还，这里官学发达、私学盛行，崇学勤学蔚成风尚。南宋时期，书院就达51所，几乎遍布全境州县。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崇学之风尤盛于民间。“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三代不读书，关倒一屋猪”，“秀才不要种，只把书来统”，“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知天下”，这类劝学民谚在乡间陇亩广为传播。受世风环境所染，无论荒僻村落、寒素家庭都以耕读为尚，苦修为乐，培育了许多才俊豪杰，以致“蓬蒿之下或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公王”。[③]另外湖南读书人好深钻覃思，穷理追本，不囿旧闻陈说。他们的博学强识，主要得力于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而非仰赖于学校教育。诚如《一法通》所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进得去，出得来，化得开。穷搜遍览，力学无遗。毛泽东青年时期就立下宏愿：“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

③ 吴獬《一法通》。

足以为学，"[1]一辈子嗜书如命，勤学不倦。他很早就对学校教育有所反思和叛逆，指出学校里"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哀以逝，心中实大悲伤。"[2]他怀抱"幽谷乔木之训"，刻苦自修。在长沙求学时，他利用一切机会寻书借书，只要是"印刷物"都向人索求，采用"辐射线"办法广为涉猎，从而获得了丰富深湛的真知实学。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我们见到很多借书还书、求教问难的信笺。如1915年2月24日《致文咏昌信》："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一本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把书都读烂了，可见用功之勤。1916年2月19日《致萧子升信》："《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同年《致萧子升信》："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希先生遇有关于语言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印刷物，并请赐寄。"求书若渴，几近乞讨。毛泽东不但对传统文化特别钟爱，而且阅读了大量近现代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学、博物学、物理学等书籍，可谓古今群籍，无不博览精研。在这些早期文稿中，毛泽东发表了很多新颖独到的读书感慨和见解，富于启迪，发人深省。他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了一万三千余字的批注，而且还划了很多标记性符号。学而思之，思而审之，审而辨之，辨而化之，"庀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3]，故而造就了文韬武略、经天纬地的"伟大之器"。

曾国藩说："要成大事先读书。"[4]他多次在家书中告诫诸弟和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曾国藩本人就是"能通经以致用"的硕学通儒。他自称"血诚儒者"，学宗程朱，博古通今，编撰了《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刻印了《船山遗书》。即便在军旅征战的间隙仍手不释卷，要求士兵们也读四书五经，第一个把读书之风带进军营。周敦颐、王船山、左宗棠、王闿运、贺长龄、陶澍、谭嗣同、魏源、杨树达、金岳霖、翦伯赞、沈从文、李泽厚等一大批湖湘名人无不饱读诗书，博通经史，高文雄笔，满腹经纶。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著作中评价推崇十七位近代湖南历史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讲堂录》。

②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5年11月9日）。

③ 毛泽东《一切入一》序。

④ 王禹偁《潭州岳麓书院记》。



人物时说："其人为天下士，为事亦天下事——同归于好学深思。"湖南学风之炽，从学之众，自古以来，相沿成俗。"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1]由此看来，湖南成为理学发祥地，绝非偶然。无怪乎北宋文学家王禹偁在《潭州岳麓书院记》中发出感叹："谁为潇湘，兹为洙泗；谁为荆蛮，兹为邹鲁"。

[1] 王禹偁《潭州岳麓书院记》。

湖南士民信奉理学，又笃实践履。凡成大功业者，都谨遵名教，持直守正，崇尚节操，厌弃浮靡，不辞艰难，勇于任事，"以忠诚为天下倡。"他们以儒家的道德准则和人文精神为规范，严格厉己淑群，勤谨治事接物，即所谓"以醇儒笃躬行"。即便是从湖南走出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思想和行为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理学印记。

（八）湖湘文化是一种影响深远、功业卓著的文化

湖湘文化昌明发达，具有许多"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的"岸异之处"，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近代以来，许多惊天动地的壮举勋业发轫于湖南，许多震古烁今的创新变革由湖南人引领统率。谭嗣同诗云"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并非虚夸。有人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梁启超在《南学会叙》中写道："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侍读学士潘祖荫在推荐左宗棠的奏折中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杨度持论更坚定直接："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卓绝不凡的精神品格和责任承担世所公认，人所共仰。

因受湖湘文化"明体适用"的务实特性所影响，三湘才俊"读书穷理，有稽古之功；存心济世，有爱民之具，"在社会舞台上踔厉风发，事功卓著。"无湘不成军"，就是这一情况的典型反映。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御侮、共和国创建，湖南人都奋然领先，砥柱中流，作出了卓越贡献。这种卓绝事功，也是文化的效绩。湖南人深受湖湘文化的浸润激励，而湖湘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内核为旗帜，堪称道南正脉、理学渊薮。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传统文化弥足珍贵，力量无穷。连近代西方思想家、政治家都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人文精神资源，以救弊补阙。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说："很好地继承发扬这些优秀思想成果，我们将会在世界文化价值观的交锋中占据优势。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首先还是应该找回自

我。”[1]湖湘文化的功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湖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等分不开。韩愈早有所察觉，他说：“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岭者，中州清淑之气于是乎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嬗诀兴，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2]钱基博说得更为透彻：“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3]湖南人自己也有感悟，曾国藩联语：“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毛泽东《送纵宇一郎东行》诗句：“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韶山《毛氏族谱》：“一沟流水一拳出，虎踞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钟人未识，石桥如锁几重天。”这种特定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湖湘文化的习得、化成密切相关。正因如此，湖湘文化风骚独领，卓然特立，引人注目。

任何文化都是以人文为核心。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传承和实践者。今天我们讲湖湘文化，更多的是指生活在湖南地域中的人所秉持的思想品格与精神特质。一些研究者将湖南人最为突出的精神与性格概括为：质朴忠诚，厌奢华，忌虚浮；倔强贞固，头撞南墙而不回，不到长城非好汉；坚忍顽强，好汉流血不流泪；勇于任事，敢于负责，不避斧钺，不顾毁誉；仁善任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锄强扶弱，负气好胜；能耐艰苦，嚼得菜根，受得磨难；不受羁束，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笃学覃思，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特立独行，抗节守志，浩然独往，不与流俗相侔；厉己持本，恭行仁德，刻苦廉正，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一籽落地，万谷归仓”；刚健进取，自强不息，一日不为，三日不安。很多湖南人都具有这些精神基因，因而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危难时候，湖南人往往能够做出“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来。

我们还要看到，在特定的历史、地域条件下形成的湖湘文

① 胡达源《胡达源集·弟子箴言卷十六·裕经济》。

② 韩愈《送廖道士序》。

③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化既有独特优势和卓越品格，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较为明显且常为人所诟病的问题和不良现象有：热衷于政治和改造社会，不太重视经济与建设；由信奉理学、恪守道统滋生了较强的文化守成性，新生事物的成长往往遇到巨大阻力；蛮习未化，急于求成，有时轻忽客观规律，霸蛮行事；傲慢自负，“为学则以圣贤自期，为政则以宰相自任”，瞧不起别人；事功至上，忽略对人的终极关怀；逞强好斗，带有江湖侠义色彩，遇事易走极端。湖湘文化这些缺陷往往都是与它的优势相对而存在，相比较而彰显。正如蔡元培所说：“湖南人性质沈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①] 其他方面也与此相类。不少湖南名人性格鲜明，敢作敢为，功过是非后人颇多评说。最有争议的曾国藩，当时就有人评议“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②] 无论曾国藩理学造诣多深，对文化传承的贡献多大，厉己多严，他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罪责是不容抹杀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论定湖湘文化具有二重性，不加区分地认定湖湘文化阻碍了近代社会发展。总的来说，是美中不足，瑕不掩瑜。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主次两个方面的矛盾，各种文化都具有趋美向善、荡污汰劣的功能与机制。湖湘文化同样在不断地扬弃消极落后因素中创新发展。

综上所述，湖湘文化是湖南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精神生活中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在中华文化的星空熠熠闪光。它既典型而集中体现了湖湘精神、湖湘作风和气派，又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掘湖湘文化的厚重底蕴，传承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践行湖湘文化的核心理念，弘扬湖湘文化的优良品格，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热爱乡梓、振兴中华的豪情壮志，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巨大作用。大学开设湖湘文化课程，旨在以践薪传之义，以效励志之用，以襄兴湘之业，以酬强国之志。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青年画家李煌先生创作的大型壁画《三湘铸英才》上有一首题画诗，表达了这种继往开来的豪情壮志：“湖湘文明苑，自古多英豪。经世筹良策，吊民赋楚骚。格物能为则，致知竞登高。彪炳著青史，踵前看吾曹。”

① 蔡元培《评湖南的人才》。

② 章太炎《检论》。





第一章

湖南这块神奇的土地

湖南山水秀美，人文荟萃，俊杰辈出，功业卓异。曾有人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湖南的魅力和影响力为何如此之大？湖南人为何如此“可侠可仁”，执著坚毅？让我们一同走进湖南这块神奇而令人神往的土地，深刻领悟湖湘大地的神韵风情和湖湘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一节 天下奥区

一、湖南的地域特点

湖南地灵人杰，钟灵毓秀，是天下闻名的灵境奥域。在祖国的版图上，湖南省居南部中央，位于长江中游南面。因大部分区域在洞庭湖以南，所以称湖南。又因湖南最大的河流湘江自西南向东北流贯全境，简称“湘”。汉唐以来湘江流域遍植水芙蓉（荷花）和木芙蓉（木莲），唐代诗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诗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的名句，后人便以“芙蓉国”借指湖南。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七律·答友人》中用“芙蓉国里尽朝晖”赞美家乡，“芙蓉国”的美称便闻名天下。

湖南地处西部内陆省连接东部沿海省的桥梁地带，位于东经108°47′—114°15′，北纬24°38′—30°08′之间，毗邻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北以滨湖平原与湖北接壤，西北以武陵山脉毗邻重庆与鄂西，西南以雪峰山脉连接贵州，南枕南岭（五岭）山脉与广东、广西为邻，东面以幕阜山脉、罗霄山脉交界江西。有一种说法，北纬30度，是一个神秘的、令人惊异的地理概念，地球的北纬30度区域，布满了众多怪异的山川，如美国第一大河密西西比河，世界第二长河埃及尼罗河，中国第一长河长江，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世界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存在着各种神秘的超自然现象以及难以破解的人类文明之谜——无法破解的埃及金字塔的法老魔咒、玛雅文明的突然消失、百慕大三角离奇的飞机轮船失踪之谜……中国文化沉积带的巴人、巴文化、桃花源、洞庭湖也出现在神秘莫测的北纬30度上。[①]这种神秘的自然地理，也许是湖湘文化形成和湖湘人向上的冲动和忧患意识养成的一种特殊基因。

① 方吉杰，刘绪义．湖湘文化讲演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1.



湖南土地资源丰富，全省土地面积21.18万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为323万公顷。其土地特点，一是山多平原少，林业用地广，垦殖指数低，为发展农牧渔业、开展多种经营提供了多种土地资源。二是岭谷相间，丘陵盆地交错，湘、资、沅、澧四水分别贯穿众多盆地。尤以湘江流域盆地最多，规模也较大，重要的有零陵——祁阳盆地、衡阳盆地、株洲盆地、湘潭——湘乡盆地、长沙盆地、醴陵盆地、茶陵——永兴盆地等。资水流域则有邵阳——隆回盆地。沅水流域有溆浦丘陵盆地、黔阳盆地。澧水流域以大庸盆地较大。这些盆地多数耕地较为集中，利于农业发展。

湖南居亚欧大陆东南部，东南边境距海400千米，受东亚季风环流的影响大，属大陆型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1月份平均温度最低，最低温度可达－8℃；7月份平均温度最高，最高温度可达40℃以上，年平均气温16—18℃。降雨十分丰富，年均降水量1200—1500毫米，雨季主要在5—7月间。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光、热资源丰富。气候年内与年际的变化较大，冬季寒冷而夏季酷热，春温多变，秋温陡降，春夏多雨，秋冬干旱。气候垂直变化明显，昼夜温差较大，尤以湘西与湘南山地更为显著。一方面，湖南的灵山秀水养育着一代一代的湖湘儿女，孕育着湖湘人永不枯竭的思维启迪与创新灵感。另一方面，湖南的严冬寒冷与盛夏酷暑以及骤冷骤热、气候多变的恶劣环境，又成就了湖湘人的坚强勇毅。三湘四水赐予它的儿女以不随人俯仰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湖南是我国人口众多的省份之一，全省现有常住人口6568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9%。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仅低于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排名第7位。湖南这块仅占全国2.2%的地域，养育着占全国4.9%的人口，是全国人口聚居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平均每平方千米310人，比全国平均人口密度高1倍多。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有汉族、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白族、回族、维吾尔族等41个民族。自古以来，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交融、相互依存，共同生活在美丽的三湘大地。各民族中，汉族约占全省总人口的91%，少数民族人口约占9%，其中土家、苗、侗、瑶、白、回、壮、维吾尔8个世居少数民族有一定的人口规模。现在有土家族260万人，苗族190万人，侗族80万人，瑶族70万人。世居少数民



族大多数居住在湘西、湘南和湘东山区。

二、区划沿革

我国行政区划的形成及管理体制的确立与演变，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发展并日趋完善的。湖南现在的疆域系经过多次演变而成。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大致经过了先秦萌芽时期，秦、汉郡县制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州制时期，唐、宋道（路）制时期和元、明、清行省制时期五个时期，湖南同样经历了这样五个时期。

（一）行政区划制度萌芽时期

这个时期约从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即从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郡县制为止。夏、商两代和西周尚无完善的地方行政制度，当时也不可能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的行政区划，当时的所谓“方国”、“诸侯国”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与夏、商、周王朝之间都只是松散的臣属关系。传说中的大禹时代的“九州”之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学者对当时所知周朝领土所做的地理区域的划分，而不是行政区划制度。《尚书》、《吕氏春秋》、《周礼》、《尔雅》中都有“九州”之说，所指不一但都有荆州。春秋以后县、郡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的肇始。春秋时期，周室衰微，一些诸侯国逐渐强大，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制度。他们在新开拓的疆土上不再进行分封，而由君主直接统治。为了便于统治，萌生了县、郡等行政区划的单位。县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行政区划单位名称，最早设县的是秦国。《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年（前 688）“伐邽、冀戎，初县之”。不久楚、晋等国亦置县。《左传》载，哀公十七年（前 478）楚文王“实县申、息”。

湖南省现行行政区域在周朝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期湖南纳入楚国版图，当系湖南行政区划制度萌芽。可知，湖南是最早实行行政区划制度的地区之一。

（二）郡县制时期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正式确立郡县制为全国统一的行政区

划，到魏晋时期实施州制行政区划制度，郡县制经历了秦、汉四百多年。秦时设郡四十余个，郡辖县，置县一千个左右。汉承秦制，基本上实行郡县制，郡下辖县，但有所发展。一是汉代实行郡、国并存制度。汉初实行郡——县二级制和国——郡——县三级制并行的行政区划制度；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之后实行郡或国辖县的二级制。二是汉代的县级区划单位的形式多样化，除县以外，还有邑、道、侯国。三是汉代的行政区划单位中出现了“州”。东汉末年开始出现州——郡——县的三级行政区划制度，表明中国的行政区划演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秦朝湖南地区设置有黔中郡、长沙郡。西汉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与封国并行，湖南境内设有武陵郡、桂阳郡、零陵郡和长沙国。王莽新朝曾废长沙国改立长沙郡，桂阳郡改南平郡，武陵郡改建平郡，零陵郡改九嶷郡。东汉时恢复原郡名，但长沙不再立国而保留长沙郡。三国时期，湖南为蜀汉和东吴角逐之地，零陵、武陵郡属蜀，长沙、桂阳郡属吴。后零陵、武陵郡归入东吴版图，并增置南郡、临贺郡、衡阳郡、湘东郡、天门郡、昭陵郡 6 郡。

（三）州制时期

在中国行政区划中出现“州”一级，始于西汉武帝。《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前 106）“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但当时的州刺史仅代表汉王朝监察所辖的郡、国，并无固定驻所，还没有形成一级行政区划。至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改刺史为州牧，命朝中九卿任州牧，执掌一州军政大权，州逐渐成为郡、县以上的一级机构。于是，全国的行政区划由虚的三级制演变为实的三级制，由郡县制演变为州郡县制。东汉中平五年，“州”开始成为一级行政区实体。自此，中国的行政区划进入州制新时期，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隋代，延续了四百年，一直成为中国最高的行政区划单位。

西晋时湖南分属荆州、广州。东晋时湖南分属荆州、湘州和江州。南朝宋、齐和梁前期，湖南分属湘州、郢州和荆州。陈朝时湖南分属荆州、沅州、湘州。隋朝裁并州、县，改州、郡、县三级制为郡县二级制，湖南省境设长沙郡、武陵郡、沅陵郡、澧阳郡、巴陵郡、衡山郡、桂阳郡、零陵郡 8 郡。



（四）道（路）制时期

自隋至唐初，州、郡两名曾经迭相改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始设道；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始设府；景云二年（711），唐睿宗把节度使变成正式建制。唐代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成为三级制，主要是道——府（州）——县。后期的道——节度使——府（州）——县制，由于道已为虚设，实际上还是三级制。宋初因袭唐朝旧制，淳化五年（994）改道制为路制。有宋一代基本上实行的是路——州——县三级制，但州级单位有府、州、军、监，县级单位有县，也有军、监。唐宋王朝道（路）制时期达六百多年。

唐初改郡为州，武德四年在湖南地域置潭州总管府，管辖潭州、衡州、永州、郴州、连州、南梁州、南云州、南营州8州。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统辖潭州、衡州、永州、郴州、连州、邵州和道州。太宗朝设道，湖南分属山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和黔中道黔州都督府。广德二年置湖南观察使，湖南之名自此始。五代十国时期，马殷据湖南，立楚国，都长沙。楚分其所辖地为28州1监，湖南境为13州1监，即潭州、岳州、郴州、朗州、辰州、溪州、邵州、锦州、澧州、叙州、衡州、永州、道州和桂阳监。宋朝改道为路，湖南分属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

（五）行省制时期

元代始实行行省制度，其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为行中书省，简称“省”。从13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行省制度历经元、明、清三代700余年。元英宗至治时（1321—1322），全国划分为12个一级行政区，包括1个中书省和11个行中书省。11个行中书省为岭北、辽阳、陕西、河南、江浙、江西、湖广、云南、四川、甘肃、征东。元代行政区划基本上是行省下辖路，路领府、州，府、州辖县。明代基本上保留了元代的行省制。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改革元代行省制度，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由其总揽一省行政大权，其性质仍同行省，习惯上也称“省”。宣德三年（1428）以后，全国统分为两京、13布政使司。两京即北直隶京师和南直隶南京，13布政使司简称13司，俗称13省，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明代行政区划基本上

是布政使司（省）下辖府，府下领州，州下领县。清代大体沿用明代体制，只是改布政使司为省。清初将北直隶改为直隶省，将南直隶改为江南省。之后划小部分省制，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两省，分陕西为陕西、甘肃两省，全国内地为 18 省。此外先后在东北、新疆、西藏、台湾设省，全国共设 23 省。清朝的省制为我国近现代省的政区划分奠定了基础。

在元代，湖南属湖广行省，分 14 路 3 州，即岳州路、常德路、澧州路、辰州路、沅州路、靖州路、天临路、衡州路、道州路、永州路、郴州路、宝庆路、武冈路、桂阳路、茶陵州、耒阳州、常宁州。元朝政府还在今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实行土司制度，置有 10 多个长官司或蛮夷长官司，分别隶属思州军民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和四川行省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管辖。

在明朝，湖南属湖广布政使司，辖地在今湖南境内有 7 府、2 州、2 司，即岳州府、长沙府、常德府、衡州府、永州府、宝庆府、辰州府和郴州、靖州以及永顺、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

在清朝，康熙三年置湖广按察使司，湖广右布政使、偏沅巡抚均移驻长沙。湖广行省南北分治后，湖南独立建省。湖南置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 7 府，郴、靖 2 州由偏沅巡抚直接管辖。雍正二年，偏沅巡抚易名湖南巡抚。至此，现行的湖南省行政区域作为独立的地方一级政权组织基本确立下来。

中华民国成立后，湖南的行政设置几经变化。至 1949 年 8 月 5 日湖南和平解放前，全省共有 2 个直辖市、10 个行政督察区，77 个县。其 2 个直辖市是长沙市和衡阳市。10 个行政督察区是：第一行政督察区，治岳阳，辖岳阳县、长沙县、湘阴县、临湘县、浏阳县、平江县、湘潭县、醴陵县 8 县。第二行政督察区，治耒阳，辖耒阳县、衡阳县、衡山县、攸县、茶陵县、常宁县、安仁县、酃县 8 县。第三行政督察区，治郴县，辖郴县、桂阳县、永兴县、宜章县、资兴县、临武县、汝城县、桂东县、蓝山县、嘉禾县 10 县。第四行政督察区，治常德，辖常德县、澧县、桃源县、石门县、华容县、南县、慈利县、安乡县、临澧县 9 县。第五行政督察区，治益阳，辖益阳县、湘乡县、安化县、汉寿县、宁乡县、沅江县 6 县。第六行政督察区，治邵阳，辖邵阳县、新化县、武冈县、新宁县、城步县、隆回县 6 县。第七行政督察区，治零陵，辖零陵县、祁阳县、宁远县、道县、



东安县、永明县、江华县、新田县8县。第八行政督察区，治永顺，辖永顺县、龙山县、大庸县、保靖县、桑植县、古丈县6县。第九行政督察区，治沅陵，辖沅陵县、溆浦县、辰溪县、凤凰县、乾城县、永绥县、泸溪县、麻阳县8县。第十行政督察区，治洪江，辖会同县、芷江县、绥宁县、黔阳县、晃县、靖县、通道县、怀化县8县。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省、地（市）、县行政区划制度。湖南行政区划几经调整，现辖14个地级行政区，即13个市，1个自治州。设122个县级行政区，即16个县级市，72个县（其中7个自治县），34个市辖区。

三、交通状况

湖南地处祖国内陆，自古交通闭塞，交往不便，被称之为“四塞之省”。湖南北有洞庭湖、长江与湖北相阻，在古代，洞庭湖、长江都是难以逾越的天堑。湖南东有幕阜、罗霄山脉与江西相隔，南有五岭环纡千余里，翻山越岭，阻隔重重，难为交通。西有武陵、雪峰山脉与云贵高原连在一起，难以与云贵交通。直到明代，才开始打通与云贵的交通，但仍有相当大的困难。明人何乔新有诗曰：“潭阳远在夜郎西，石径萦纡路转迷。俗犷犹存盘瓠旧，树深唯听鹧鸪啼。”可见道路之艰难。湖湘境内山岭纵横，同样交通不易。钱基博曾说，湖南其地水少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急，而舟车不易为交通。这大体上是古代湖湘交通的真实状况。

至近代，湖湘交通逐步发展，1913年长（长沙）潭（湘潭）公路破土动工，开了湖南公路建设的先河。但湖南交通的大发展和大改观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在的湖湘，已经形成了铁路、公路、航空、水路结合、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

现在的湖湘铁路交通较为发达。境内铁路呈“田”字形网络，南北有京广线、焦柳线、洛湛线和武广高速铁路纵贯，东西有石长线、沪昆线和湘桂线连接。铁路连通全省各个市府州府。

现在的湖湘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形成了以省会长沙为中心、以高速公路为主骨架、以国省干线公路为依托、以县乡公路为脉络，覆盖全省、辐射全国的公路交通网络。目前湖

湘境内有京港澳高速、二广高速、杭瑞高速、沪昆高速、泉南高速和长张高速 6 条国道主干线和 7 条国道纵贯南北，横穿东西。还有 64 条省道连接到各县，由县乡公路连接到全省所有乡村。湖湘的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数位居全国前列，省会长沙与全省 13 个市州全部实现高速公路相连，距省会长沙最远的市州都可以实现 4 小时抵达。

现在的湖湘航空发达，拥有长沙黄花机场、张家界荷花机场 2 个国际机场和常德桃花源、永州零陵、怀化芷江 3 个国内机场。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已开通定期航线 80 条，可通往全国 56 个大中城市和日本、泰国、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多个国家，成为全国民用航空干线的重要枢纽，旅客吞吐量居全国机场第 11 位。

现在的湖湘内河航道条件优越，形成了以洞庭湖为中心、以湘资沅澧四大干流为主干、沟通全省、通达长江的航道网络。湖南水运通航总里程已达 12000 千米，约占全国内河通航里程的十分之一。全省共有吞吐量 1 万吨以上的港口 63 个，岳阳、长沙、湘潭、株洲、衡阳、常德、益阳等港口年通过能力均在 100 万吨以上。



第二节 山水神韵

一、湘山之奇

湖南东、西、南三面峰峦起伏，西部为武陵——雪峰山脉，南部为五岭（统称为“南岭”）山脉，东部为幕阜——罗霄山脉，山岭相连，地势高峻，中部多为丘陵和盆地，起伏和缓，只有北部为洞庭湖平原，地势低平。总体上看，湖南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它占了全省总面积的 80%。在这广袤的山地和



连绵的山脉中，显露出奇伟的风貌，蕴涵着深邃幽眇的神韵。因此，要了解湖湘山水风光，先得看山。

让我们先看湖南西北部的武陵山脉。提到武陵山脉，人们便会首先想到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武陵源”一词最初见于盛唐诗人王维《桃源行》中的诗句“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此后“武陵源”一词便常用来指代美好的生活境地。现在我们把这个美好的名字献给了湖湘西北部这个最美丽的地方。武陵源自然风景区包括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天子山自然保护区和杨家界自然保护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是1982年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武陵源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无疑集中了武陵源自然风景区最精华的风光，以至于人们常常以“张家界”统称武陵源景区。亲近张家界，当我们俯视着这片20万亩的峰林，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盆景，集中展览出三千多座石英砂岩山峰，美不胜收。当我们走进景区，又可以看到它们或列长队，或三五成群，或群英聚会，或一枝独秀，各显容姿。仰观则铺天盖地，俯视则呼啸奔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它无可匹敌的崛立和举世无双的壮景。湖湘诗人彭浩荡曾这样讴歌它：“十万山国的巨灵聚会在这里／每只手里攥着一个／斯芬克斯的谜。”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东北面便是索溪峪自然保护区。这里洞穴奇异，峡湖倚天，景中有景，园外有园，五千座岩峰千姿百态，八百条溪流蜿蜒曲折，如诗如画，美不胜收。经过索溪峪便到了天子山。这里以峰高、峰大、峰多著称天下，石峰林立，沟壑纵横；雄壮的石林或如刀枪剑戟直刺云天，或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或如蓬莱仙境若隐若现，蔚为壮观。

武陵山脉北向支脉有一座称为“东半球物种的诺亚方舟”的壶瓶山。壶瓶山位于湖南西北部，主峰在石门县与湖北省鹤峰县、五峰县交界的地带，海拔2098.7米，为湖南省第二高峰。壶瓶山群山起伏，苍翠连绵，有壮观的图画，有优美的传说，有奇特的石头和溶洞，还有瀑布峡谷，但它最显著的特点是有着众多的古老的孑遗物种。这里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银杏、江豆杉、南方红豆杉、钟萼木、珙桐、光叶珙桐，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21种，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南虎、金钱豹、云豹、林麝、金雕5种，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48种，无愧于“天然动物园”和“植物王国”。

在武陵山脉北向支脉还有一座五雷山，位于慈利县东部。其山不高，最高峰仅海拔976米，但它是道教名胜，其道教“始于唐，盛于明”。现存道观建筑群始建于元代，竣工于明代，至今已有六七百年历史。这里共建有大小寺庙100多座，计36殿、72宫、48寨，全部依山势而建，聚集在一条山脊之上，长达两里多路远。它浮现在浮云淡雾和苍林翠竹之间，给人以仙台琼阁的美感和道教真谛的冥想。

当我们的视线移到湖南南部的南岭山脉，在其中部有著名的九嶷山。九嶷山群峰挺拔，疏密得当，起伏自然，俊俏而秀美，其风光自有迷人之处。但九嶷山引人朝圣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祭拜中华民族始祖舜帝。《史记》中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九嶷山本名苍梧，传说人们祭奠舜帝时看到的竟然是九座一模一样的陵墓，后来又化成九座一模一样的山峰，“九峰相似，望而疑之，谓之九疑”。《水经注》则称：“蟠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九疑”又写作“九嶷”,“疑”字上面加一“山”字，平添了九嶷山的韵味与神奇，也成了九嶷山不可替代的商标。九嶷山是一个地域，它拥有数十座山峰，其中有一座气势不凡的山峰叫舜源峰，山下是气势恢宏的舜庙。舜源峰附近还有娥皇峰、女英峰、美女峰、梳子峰、舜峰、萧韶峰、斑竹岩、玉琯岩等。想一想这些或史书记载或百姓流传的山名，我们就可以想象舜帝在人们心中的分量。20世纪60年代，一代伟人毛泽东写下《七律·答友人》的壮丽诗篇，九嶷山为之壮色。

南岭山脉有数不胜数的奇山。在宜章县境内有南楚奇峰莽山，在传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大败清兵的鬼子寨，那鬼斧神工的奇峰奇石和从叠石岩上飞泻而下的溪泉令人惊叹。在新宁县境内有崀山。崀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那由不同阶梯的红色夹杂着的山头，构成馒头般的优美弧线，格外圆润而柔美。登上云台山看八角寨景区“鲸鱼闹海”的壮景，我们会产生一种异常的感受。在双牌县境内有阳明山，它东西纵横75千米，南北蜿蜒60余千米，主峰高耸，沟壑纵横，峰峦重叠，显得巍峨而险峻。名山诱人啊！唐代柳宗元来到阳明山写下《游黄溪记》，宋代佛僧来到阳明山建筑佛殿庙寺。到明代，人们在这里建立了万寿寺，敬奉着高僧秀峰。

在横亘千里的南岭山脉，在郴州境内有一座山不高却颇有



名气的苏仙岭。苏仙岭的知名因了苏仙。传说西汉惠帝时代，郴州城东一位潘姓姑娘到郴江浣洗衣裳吞萍成孕，生下苏耽。苏耽长大后孝敬母亲，聪颖勤奋，得异人授仙术，为民治病，造福乡里。苏耽十三岁时跨鹤升仙，辞别母亲时，将老仙翁授给的石匣捧送到母亲手中，嘱曰：有需必得，慎勿发也。明年郡有疫，可取庭前井水桔叶救之。第二年，郴州果然暴发瘟疫，苏母按照儿子的嘱咐，凡来求医者，汲取庭前井水泡桔叶救之，使人们幸免于难。自此，人们敬祀苏仙香火不断，“桔井泉香”这一典故也因此流传下来，传遍全国及日本与东南亚等国。唐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令桂阳郡太守在马岭修建了苏仙观。此后，道教徒们又在半山腰兴建一座苏仙中观，在岭下的白鹿洞兴建了一座苏仙下观，这样整座山全被苏仙占了。宋大中祥符元年（1081），宋真宗赐名“集灵观”、“桔井观”。这样，马岭山名渐渐被人遗忘了，而苏仙岭的名字倒越传越远，历代文人墨客也在这里留下诗文与故事，晋人葛洪的《神仙传》和清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记载了苏仙的传说，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这里写下名篇《送廖道士序》。宋代词人秦观在这里写下名词《踏莎行·郴州旅舍》，后来苏轼为秦观词作跋，米芾为之作书。南宋度宗咸淳二年，任郴州知军的邹恭请石匠将米芾书写的秦观词苏轼跋刻于白鹿洞旁的崖壁上，是为“三绝碑”，至今尚存。1960年毛泽东到湖南视察接见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和各地、市、自治州委书记时，特地向当时的郴州地委书记问起三绝碑，还饶有兴致地背诵了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并作了精辟的讲解。

当我们的视线从湖南南部向东移去，可以看到与江西接壤、逶迤起伏的罗霄山脉。罗霄山脉自南向北，莽莽苍苍，气势非凡。在罗霄山脉与南岭山脉相接处有一南向分支，叫八面山。八面山连绵80千米，雄踞湖南东南端桂东县与资兴市境内。因其高大，“登之，可见郴、衡、吉、赣诸郡”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故名“八面山”。八面山主峰海拔2041.2米，为湖南第五高峰。

八面山北面有著名的酃峰，海拔2115.4米，为湖南第一高峰。酃峰地域有一个桃源洞。面对桃源洞仰望洞的上方，眼前便是气势磅礴的珠帘瀑布。这瀑布从50多米高的山垭里跌扑下来，在洞口处流出，每逢春季，水面漂浮着一层桃花瓣，这溪便成了桃花溪，洞也称作桃花洞。桃花洞其实只是这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一个门厅，其中有许许多多的溪流、幽谷、水潭，有云豹、金钱豹、穿山甲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有银杉、大院冷杉、铁杉、福建柏、红豆杉等珍稀植物两百多种。更吸引人的还有桃源洞那些神奇优美的传说。桃源洞不远处就是炎帝陵园，桃源洞原本就是当年炎帝采药的地方，所以这里有炎帝的脚痕，有炎帝的洗药潭，有炎帝的晒药台，有炎帝的捣药臼，有炎帝的藏药洞。又传说唐代的骆宾王为避武则天的发难，曾在此居住，并在瓜寮婆婆崖留下寄情的石刻。又有铁头太子的传说，不知他是哪朝人物，至今仍存铁头太子之墓。还有桃源仙寺等庙观不绝于耳的钟声。

罗霄山脉中段有武功山，它地处攸县境内。武功山西南端有酒埠江风景名胜区，这里有国家水利风景区，有国家地质公园。罗霄山脉连绵北伸，至浏阳市、平江县境内有连云山。连云山除同名主峰以外，还有福寿山、甑盖山、石柱峰、道吾山等峰。群峰绵亘，常有云气覆其上，连云山因此而得名。罗霄山脉北面的最高峰，是雄踞平江县境内的幕阜山。幕阜山又名天岳山、天柱山，岳阳郡府在天岳山南面，因此叫“岳阳”。

湖南地势东南西三面环山，逐渐过渡到中部的丘陵地带和北部平地和湖区。高耸在这广袤中部丘陵台地之上的衡山为湖湘名山，同时也是华夏名山、天下名山。衡山又名南岳，是我国五岳之一。它雄踞湖南腹地，气候条件优越，以至是处茂林修竹，终年飘香滴翠，景色秀丽迷人，故有“南岳独秀”的美称。清人魏源《衡岳吟》中说：“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唯有南岳独如飞”。可见衡山独具的秀丽与灵动。衡山号称以回雁峰为首，以岳麓山为足，逶迤七十二峰，周回八百里，其中心景区占了43峰。衡山有祝融峰之高，有藏经殿之秀，有水帘洞之奇，有方广寺之深。这里春观花，夏看云，秋望日，冬赏雪，婀娜多姿，美不胜收。衡山又是人文奥区，《诗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诗句中的“南山”即指“南岳衡山”，因而衡山又有“中华寿岳”之称。衡山又是中国南禅、天台宗、曹洞宗和禅宗南岳、青原两派的发源地，因而又称为“宗教圣地”，道教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衡山便有朱陵洞天和青玉坛、光天坛、洞灵源三处福地。南宋理学大师胡安国曾在山麓结庐治学设教，“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诐行、正人心为本。”（真德秀语）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创始人。



南岳衡山逶迤400里，连绵72峰，最后一峰在长沙，它是南岳的山麓，故名岳麓山。岳麓山海拔仅300.8米，连峦叠峰仅数十里，但厚重的文化使它名扬天下。在这里，你可以游览白鹤泉、云麓宫、爱晚亭、穿石坡，你可以观赏晋朝罗汉、唐代银杏、宋代香樟、明清枫栗。你可以看到“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你可以读到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邕撰文并题的“麓山寺碑”，你可以读到宋代摹刻的全国最古老的“禹王碑”。你可以聆听到骆宾王、杜甫、李白、李商隐等著名诗人的往来吟咏，你可以聆听到宋代全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你可以感受到黄兴、蔡锷、陈天华、姚宏业等民主革命党人的凛然浩气，你还可以感受到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青春风采。

二、湘水之秀

如果说罗霄山脉、南岭山脉、武夷山脉构筑起湖湘大地东南西北面的天然屏障，显示着湖湘大地的雄奇与壮美，那么，从这东南西北面的山脉中流出的大小五千余条河川，大都汇经湘、资、沅、澧四水而注入洞庭湖，在湖湘大地上织成宏阔大气的水网，便显示出湖湘大地的灵动与秀逸。

三湘四水，首推湘江。湘江为湖南第一大江，它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海洋坪龙门界，自西南向东北蜿蜒而下，斜贯湖南省境，跨永州、郴州、衡阳、娄底、株洲、湘潭、长沙、岳阳8市，从湘阴县濠河口注入洞庭湖。湘江在湖南境内全长670千米，沿途接纳大小支流2157条，流域面积85383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40%，流域内人口407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0%。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是孕育湖湘文明的生命之河，湖南因有湘江而简称“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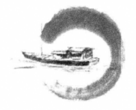
湘江从东安县进入湖南境内，与发源于宁远九嶷山的潇水在永州蘋岛交汇，合流北去。潇湘二水相汇，荟萃了永州美景之精华。朝阳旭日、迴龙夕照、蘋洲春涨、香零烟雨、恩院风荷、愚溪眺雪、绿天蕉影、山寺晚钟组成的永州八景，是景致美向意境美的升华。如此美景，致使历代诗画层歌迭唱，五代南唐画家董源最早创作了《潇湘图》，后来又有宋迪作《潇湘八景图》。画之不足又诗文之，唐代诗人杜荀鹤咏叹“残腊泛舟何处

好，最多吟兴是潇湘”。宋代文豪欧阳修惊叹“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潇湘二水相汇，不仅使湘江有了更为宏润的气势，更重要的是为湖湘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和无尽的诗意。舜帝南巡潇湘大地，他那以人为本、施政以德、勤政爱民、让贤荐能、谦恭尚礼、诚实守信、至孝笃亲的深广情怀和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道德文化，伴随着潇湘滔滔江流，穿越几千年的时空流淌至今，滋润着一代代华夏子孙。舜帝二妃千里寻夫、泪洒斑竹的感人传说，为潇湘的历史文化增添了丰富的情感内容，使其更加哀婉动人。在这条河流里，还流淌着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稻作文化和后来的周敦颐理学文化，它们如此深远的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潇湘二水相汇，归纳、积淀和滋生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使“潇湘”不只是一个地理意义的名词而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于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这里留下“怀沙去潇湘，挂席泛溟海”的诗句，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这里写下名篇《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宋代书法家、文学家米芾在这里写下名诗《潇湘夜雨》，陆游写下了“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的千古绝唱，“潇湘”因此而成为湖南又一个全新的代名词。

湘江自永州流经祁阳，接纳了一条涓涓小溪名叫浯溪。浯溪溪口的右侧，耸立着一座屏风似的小山，峻峭盘曲，秀木环生，亭台间杂，若隐若现，宛如一座山水盆景。唐大历年间，大诗人元结来此筑庐，大历六年请大书法家颜真卿将他的名作《大唐中兴颂》镌刻在浯溪摩崖之上，于是便有了古今中外碑文奇观。尔后，唐代刘长卿、宋代黄庭坚、米芾、秦观、李清照、范成大、明代解缙、董其昌、清代袁牧、何绍基、吴大雨等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留下摩崖诗文书法作品506方之众，形成全国罕见的保存完好的露天碑林。湘江流经耒阳，接纳了耒水。耒水流芳是因为她孕育了蔡伦这位划时代的人物，蔡伦发明的“蔡侯纸”取代笨重的简牍和昂贵的缣帛，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湘江流经衡阳与蒸水汇合，是为蒸湘，自蒸湘以下为湘江下游。接纳了众多支流的湘江下游，烟波浩渺，阔大壮观。湘江流经株洲、湘潭、长沙三个重镇，这里文明堆叠，风景如画。湘江奔腾不息，浩浩荡荡，自湘阴注人洞庭湖，汇入长江。

湘资沅澧四水，按方位排序，资江排第二，按河长排序，资江是湖南省的第三大河流。资江又称资水，它有两源，西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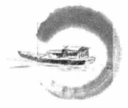


赧水源出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青界山，是其主源。南源夫夷水源出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越城岭。两水在邵阳县双江口汇合，始称资江，流经邵阳、娄底、益阳三市。至益阳赫山区甘溪港后分为两支，北支于杨柳潭注入南洞庭湖，南支于湘阴县临资口注入湘江。资江自源头至甘溪港长653千米，其中湖南境内长630千米，流域面积28142平方千米，其中湖南境内26738平方千米。资江至新邵县小庙头为上游，小庙头至桃江县马迹塘为中游，马迹塘以下为下游。资江中上游穿行于山区，巉岩簇拥，河道狭窄，水流湍急。它流淌着奇险的风光，也流淌着厚积的人文，流淌着"五溪蛮"、"梅山蛮"等"蛮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流淌着资江两岸沧海桑田的变化。在资江之源赧水上游有历史文化名城武冈，这里流传着后汉伐五溪蛮的传说，留下了南宋诗人陈与义的诗作石刻，留下了明代朱元璋之子岷王等14代立王都272年的古城。顺赧水而下至隆回，这里是近代经世学派代表人物魏源的故乡，他提出"师夷长技，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资水与邵水汇合处便是邵阳市。邵阳古称宝庆，自西汉置县，历代繁华。这里是民主革命党人蔡锷的故乡。沿资江而下便是娄底市的新化县和益阳市的安化县，新化旧称"上梅山"，安化则称"下梅山"，两地的土著则是所谓的"梅山蛮"了。因此就有了宋神宗的"开梅山"之举，始有新化、安化置县。人到安化便会想起小淹，因为小淹出了陶澍，这位清嘉庆道光年间大员，曾任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以勤政爱民著称，其治理江淮、兴水利、昌海运、革除盐政弊端等政绩有口皆碑。资江过安乡滚滚东去，两百里水路到益阳。在这个"背靠雪峰观湖浩，半成山色半成湖"的城镇，有绿波浩荡的竹海，有渔歌唱晚的湖乡，有唐元和年间高僧广慧主修的白鹿寺，还有著名的裴公亭。裴公即唐代名相裴休。唐大中年间，裴休潜心佛学，曾在资江边结庐读书诵经。

湘资沅澧四水，沅江排第三，实际上是湖南第二大河流。沅江又称沅水，它有南北两源，南源龙头江，发源于贵州省都匀县云雾山。北源重安江，发源于贵州省麻江县平越大山，两江于河汉口汇合后称清水江，由銮山入湘，至洪江市与渠水汇合后始称沅江。沅江流经怀化市、湘西自治州和常德市，在常德汉寿县注入洞庭湖，全长1033千米，湖南境内长568千米，流域面积89 163平方千米，湖南境内51 066平方千米。沅江从

江源到洪江为上游，从洪江到沅陵为中游，沅陵以下为下游。沅江是需要用心去读的，因为她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进入沅江中游，首站是湘黔边境上的大墟场洪江古商城，它地处沅水与巫水交汇处，是古黔、汉之间水运必经之地。洪江古称雄溪，早在春秋时期就是楚国的桐油基地，西汉时是中原与大西南的物资交换枢纽，唐代形成了“草市”，宋代成为了商业重镇。从沈从文《常德的船》一文描写的沅江上白帆点点、船桅如林的壮观场面，可以想见当年洪江商埠的繁华。沅江北下，接纳了一条美丽的沱江，沱江边有一座美丽的小城叫凤凰。来到凤凰，当你步行在古城紫砂石板路上，目睹那蜿蜒起伏的老城墙，亲近那清澈秀丽的沱江，不时地听到那从隐在薄薄雾纱的吊脚楼上传出的婴儿的啼哭声和江边浣衣女子的捣衣声，你才会真切地体会到沈从文《边城》那美丽得令人心痛的文字中描写的“梦里的故乡，远去的家园”。沅江流经沅陵，接纳了西面而来的酉水。酉水与酉溪河汇合处有两峰并立的二酉山，这两座山峰分别叫大酉和小酉，小酉山上有一个天然岩洞。传说秦时儒生伏胜因不满秦始皇焚火坑儒，冒着诛灭九族的危险，偷偷地将千卷书简运出咸阳，择地而藏。船经沅水来到二酉山下，便选中二酉洞作为藏书之所，直到秦灭后才将全部藏书献汉。所谓“学富五车，书通二酉”典源于此。溯酉水而上，在湘渝交界处有一个叫里耶的古镇，考古专家从古井中发掘出的万枚秦代简牍，足以证明它的古老文明。说不尽的沅陵还有神秘久远的盘瓠洞、夸父遗址“夸父山”、屈原遗迹“望屈亭”，江南第一古刹“龙兴寺”。

沅江经沅陵而下，波涛滚滚，直抵常德，自此缓缓流入洞庭。常德因德山而得名。德山古称枉人山，隋嵩州刺史樊子盖以尧时隐者善卷尝居于此，改名善德山，转音为“常德”。善卷因其贤善之德与教化之功，被誉为中华民族“善”和“德”的化身，有“帝者师”的美称。传说尧舜南巡都曾慕名到枉人山拜访善卷；尧帝感其“德行达智”，行参拜大礼，讨教国策，舜帝则愿以天下相让。宋代朱熹游常德曾极力推崇善卷，谓“先生之道不可一日无。苟得之以致君，可使君为尧舜之君；得之以泽民，可使是民为尧舜之民”。一则形成时间无考的联语“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流传至今，“善德积彰”精神随沅水流淌数千年，浸润着一代代沅湘儿女乃至湖湘和中华儿女。



澧水是湖南的第四大河流，它有北、中、南三源，北源在桑植县斗篷山纸砂坪，中原在桑植县八大公山，南源在永顺县步塔。三源在桑植县南岔汇合后往南经桑植、永顺再向东流，沿途接纳溇水、渫水、道水和涔水等主要支流，经张家界市、慈利县、石门县、澧县，在津市小渡口分数支注入洞庭湖。全长388千米，流域面积18496平方千米，湖南境内15505平方千米。澧水自河源至桑植为上游，桑植至石门为中游，中上游溶洞暗河遍布，岩险石怪，潭多流急，峰回水转，气象万千。石门以下为下游，河道平缓。阅读澧水，在中上游也许会更多地被其青山秀水所吸引，而顾不上去看看茅岗土司世袭领地的苦竹河古镇和曾是九溪卫治所的江垭，顾不上去听听覃后投射的传说和明朝廷卫屯兵卫城的往事。但当顺江而下之后，进入澧水下游，面对"稻油丰稔甲湖广，棉桑夙著震九州"的澧阳平原，你却无暇去欣赏那一望无际的稻田或油菜花，尽管漫溢着稻香或油菜花清香的空气足以令人陶醉。因为澧阳平原的远古文明会令你惊诧不已，激动不已。这里的彭头山遗址、城头山古城址、八十垱遗址、十里岗遗址、鸡叫城遗址、丁家岗遗址会唤起你对远古文明的遐想，一万多年前居住在这里的我们的祖先已经学会种植水稻，建筑城市，制作陶器，而此时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先民还没有水稻、城市、陶器的概念。

三、洞庭之美

湖湘大地湘资沅澧四水，无论它发源何处，无论它历经多少曲折与颠簸，最后一齐奔向洞庭湖。洞庭之名，最早见于《战国策》："昔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屈原《离骚》中亦有"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句，可见早有"洞庭"之名。在湖区内陆续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证明，洞庭湖在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活动。现今在湖区中心大通湖农场发现的遗址埋藏于地表下7米左右。这7米厚度的沉积物是新石器时代以来沉降、堆积的产物。

洞庭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洞庭湖古称云梦泽，4世纪以后洞庭湖逐步扩展，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称洞庭湖"湖水广圆五百里，日月者出没其中"。至唐宋时代洞庭湖进一步扩大，东部洞庭湖主体已西吞赤沙，南连青草，周围七八



百里。故有“八百里洞庭”之称。元明以后，荆江统一河床形成，迅速淤高。明中叶以后，北岸穴口尽塞，南岸调弦、虎渡两口的大量水沙排入洞庭湖区，湖域扩大至周围八九百里。清道光年间洞庭湖扩展至顶点，跨四府一州九邑之境，达6000平方千米，为今湖面积两倍以上。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藕池、松滋两口的形成和荆江四口分流，大量泥沙排入洞庭地区，致使洞庭湖迅速萎缩。今日洞庭湖，总面积为2625平方千米。“洞庭湖”是个总称，它又包括了东洞庭、南洞庭和可以称作西洞庭的目平湖和中心地域的大通湖。洞庭湖区，包括湖南省岳阳、汨罗、湘阴、沅江、汉寿、常德、安乡、南县、华容等市县，还包括湖北省石首、公安、松滋、枝江等市县部分地域，但是主体在湖南。

洞庭湖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家园，城头山古城遗址和八十垱古栽培稻证明洞庭是人类最早生息地之一。从这些遗址和石器可知，生活在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前的湖湘先民便会选择靠近水源居住，会从溪河砾石中寻找石器以便于采集食物。湖湘先民以惊人的智慧，在顽强的生存斗争中创造着绚丽壮观的原始文化，叙写出湖湘文化美丽的序言，贡献了中华原始文化的湖湘元素。正如考古学家袁家荣评价，“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湖南旧石器文化对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起着独特的作用。”[①]

洞庭是湖南的宝地，是千百万湖湘人美丽的家园。八百里洞庭物产丰富，鱼米飘香，充足的水和光造就了洞庭湖区农业的富足，适宜的气候赋予了洞庭湖区万物生机。它像一个巨大的聚宝盆，装着湖南三分之一以上的粮食、二分之一的芦苇和油料、八分之七的棉花、十分之九的麻类。洞庭湖是鸟类、水禽、鱼类的王国，这里有三百余种鸟类，包括雁、鹤、野鸭等数十种水禽种群，还有中华鲟、白鲟等珍稀鱼种。东洞庭湖作为我国加入国际湿地保护公约的6个重要保护区之一，已记录到的鸟类有16目41科216种，年栖鸟量达1590万只，万只以上的集群栖息觅食地37处，是国家一、二级保护的水禽和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洞庭湖是丽质天成的景区，古湖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远浦归帆”、“渔村夕照”尽在洞庭一湖。洞庭湖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代马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曾屯兵于益阳马良湖；三国刘备与孙权分荆州以湘水为界，屯田防守；钟相、杨幺在此揭竿起义；吴三桂据岳阳金鹗山与清军抗衡达6年之久。洞庭湖是文人墨客歌咏不尽的天堂，最早有屈原为它写下

① 童潜明. 从地学谈湖湘文化的起源[J]. 国土资源导刊. 2010(5).



了《云中君》、《湘君》、《湘夫人》等传世名篇。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在洞庭湖之西、巴陵古城西门城头，耸立着一座千古名胜——岳阳楼。它擅洞庭之胜，揽湖湘之气，壮阔吞云梦，气象甲寰区。相传最初为鲁肃操练水军的阅兵楼，后为城楼。几兴几废，经过了多次修整。其壮美景观吸引不少文人墨客登楼观瞻，饮酒赋诗，遣兴抒情。李白、张说、杜甫、元稹、白居易、李商隐、颜延之、吕蒙正、欧阳修、陆游、赵翼、袁枚等都有吟唱。特别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极巴陵胜状，述忧乐情怀，境界阔大，寓意深远。斯文一出，岳阳楼更加名重天下，备受世人青睐。

说洞庭就不能不说君山，这颗洞庭湖的明眸，水生莹莹，顾盼生辉。君山又名湘山、洞庭山，在岳阳市城西的洞庭湖中，与岳阳楼隔水相望，面积 0.96 平方千米。据《巴陵县志》载，山上有古迹 4 台、5 井、36 亭、48 庙，为道家第十一福地。相传舜帝南巡，娥皇、女英二妃追踪至洞庭，闻舜已死于苍梧之野，南望痛哭，终因悲痛过度而亡，遂葬于此。后人为纪念二妃，将“洞庭山”改名为“君山”，在山上筑二妃墓，奉二妃为“湘水之神”，建湘妃祠以祀。二妃墓前斑竹数丛，传为二妃血泪滴洒而成。历代诗人为之感动，写下一篇篇凄美的诗章。这里有杨幺寨旧址，传为南宋农民起义领袖杨幺起兵之处。湖边悬崖最高处有铸鼎台，相传轩辕帝曾在此铸鼎，奏“天钧之乐”。台东为酒香山，传说八仙中的吕洞宾“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后人凭此建朗吟亭。离亭不远处有柳毅井，传说落第书生柳毅从京返乡，经泾河北岸，遇落难的洞庭龙女，受其所托，从此井而下为其传书报信，龙女得救。后人为彰其义勇忠直，奉柳毅为巡湖神，建洞庭庙以祀。君山，承载着如此众多的神奇传说和凄美情思，千年万年漂泊在浩瀚无涯的洞庭湖，为美丽的洞庭湖平添十分灵动与神奇。





第三节 物产殷阜

造物主赐予湖南以奇特的山川，秀美的风光，同时又赋予它肥沃的土地，丰饶的物产，使它成为享誉天下的“鱼米之乡”、“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

一、鱼米之乡

湖南属于中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境域内东、南、西三面山地丘陵环绕，中部岗丘起伏，层峦叠翠，北部为平原湖泊；全省大小 5000 余条河川，大都汇经湘、资、沅、澧四水而注入洞庭湖。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使湖南物产极为丰富。山区盛产竹笋、蕈、蕨等山珍和动物野味，江河湖泊盛产鱼、虾、龟、鳖、螺、蚌等水产和野鸭等水禽，平原盛产稻粱菜蔬等丰富的食用植物，星罗棋布的大小塘坝大都种有湘莲湖藕，真可谓“物华天宝”。

湖南被誉为“鱼米之乡”，首先是这里盛产稻谷。湖南是天然的水稻生产地，有耕地 391.26 万公顷，产量高，是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之一。2010 年全国粮食产量为 10928 亿斤，湖南近 600 亿斤，占全国粮食产量的 5.4%。湖南以占全国 3%的耕地面积，保障了全国 4.9%人口的用粮。称湖南为“鱼米之乡”当之无愧，还因为这里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的栽培稻谷实物，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最早的实例，距今为 12 000 年至 14 000 年，这说明湖南先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实现了由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转变。在洞庭湖平原的一些地区如澧县的彭头山、城头山等处，也陆续发现了距今 9 000年和 6 000 年以前的大量稻谷及稻田遗址。传说中华民族始



祖之一炎帝南徙，居于湖南，发明耒、耜等农具，传播农耕技术，被奉为农业创始者，所以湖南郴州有嘉禾县，衡阳有耒山、耒水，耒水之阳则有耒阳市。史书载，远在周代，湖南就以“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周礼·职方氏》）著称于世。齐国使者游说越王攻占楚国，理由就是“长沙，楚之粟也。”《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地饭稻羹鱼，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民食鱼稻，果蔬蠃蛤，食物常足。”唐代“赋出于天下，江南居什九。”而湖南所辖“诸郡出米至多”。明代“湖广熟，天下足”之美誉天下知晓，清代则进一步称“湖南熟，天下足”。近现代长沙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湖南稻谷产量高而且品质佳，自古就是贡米的出产地，江永“三香”之一的香稻有煮之“香闻十里”的美誉。今天，湖湘农业文化孕育的袁隆平，运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培育高产稻种，让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免受饥饿之苦。从湖南玉蟾岩遗址发现的栽培稻谷实物，到炎帝在湖南始创农业的传说，再到袁隆平在湖南培育高产稻种，这不能说只是一种巧合。

湖南有数以千万公顷计的丘陵和可利用的山地，这是天然的牧场和经济作物种植地。湖南的畜牧养殖业历史悠久、十分发达。在发现古栽培稻的玉蟾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动植物化石。这些动物化石大致可以分为哺乳类、鸟类、鱼类、爬行类（龟鳖等）、贝类、昆虫等。经鉴定，其中哺乳动物有28个种属；鸟类有27个种属，其中水栖禽类有18种；鱼类有鲤鱼、草鱼、青鱼、鲢鱼等，今天四大家鱼中的三种已经位列其中；爬行类有鳖、隐颈龟等；贝的种类为数众多，蚌类有7种，螺类有26种以上。可以鉴定的植物有17种。由此可见湖南食用物产资源之丰富，并表明湖湘的先民已经在充分地利用这些物产资源。今天的湖南更是我国的畜牧养殖大省，猪、牛、羊肉产量均居全国前列。著名的传统养殖禽畜武陵马头羊、武雪山羊、浏阳黑山羊、涟源黑山羊、湘潭沙子岭猪、宜章猪、桃源黑猪、浦源坪猪、黔邵花猪、长沙大围子猪、宁乡流沙河花猪、溆浦龙潭猪、东安猪、新晃凉伞猪、绥宁东山猪、泸溪浦市猪、湘西黄牛、滨湖水牛、雪峰乌骨鸡、湘黄鸡、桃源鸡、新邵小塘驼鸭、攸县麻鸭、临武鸭、鼎城湖鸭、宁乡灰汤鸭、道州灰鹅、武冈铜鹅、溆浦鹅、酃县白鹅等，无不历史悠久，品质优良。湖南地处江南，水产资源丰富，渔业历史悠久，是我国淡水渔业重点省份之一。现在全省放养面积达800

万亩，水产品总产量达200万吨。湖南水产丰富，特产有黑鱼、中华鲟、乌龟、芙蓉鲤、祁阳竹鱼、沅江银鱼、君山金龟、岳鲤、岳阳吞花鱼、河蟹、细鳞斜颌鲴鱼、洞庭鳖、洞庭鲤、洞庭河蚌、娃娃鱼、资江鱼、银鲴、湘鲫、湖南鳖、鲥鱼、鳙鱼、鳅鱼、鳜鱼、鳝鱼等。湖南地处中亚热带，气候温和，植被繁茂，为野生动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场所，所以湖南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湖南的野生动物中属国家级保护的珍稀动物有44种，其中一类保护动物有白鳍豚、华南虎等18种，二类保护动物有猕猴、短尾猴等19种，三类保护动物有黑熊等7种。湖南的家禽家畜品种齐全，分布广泛，禽鸟种类繁多，共有五百多种，占全国禽鸟种数的45%。湖南有国家级保护的一、二、三类珍禽共22种，占全国鸟类保护数的44%，其中一类珍禽有白头鹤、白枕鹤、红腹角雉、白鹤、黑鹤、白冠长尾雉、中华秋沙鸭，二类珍禽有红腹锦鸡、白腹锦鸡、大天鹅、小天鹅、鸳鸯等。

湖南种植有经济植物一千多种，有药用植物八百多种。湖南主要农副产品棉花、油料、苎麻、烤烟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湖南农林特产丰富，盛产湘莲、湘茶、油茶、辣椒、苎麻、柑橘、湖粉等。湘莲是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著名特产，产量历来居全国首位。特产蔬菜大松菌、湖南香菇、湖南麻菌、湘西枞菌、罐罐菌、溆浦莲藕、汉寿玉臂藕、西岭无渣生姜、福洞生姜、宝庆生姜、安乡香芋、桃川香芋、邵东黄花菜、邵阳黄芽白、茶陵大蒜、南县辣椒、临澧大红袍辣椒、陶岭三味辣椒、皇图玻璃椒、嘉禾辣椒、醴陵辣椒、桃源七星椒、邵阳朝天椒、黄花菜、玉兰片、湘安仙笋、零陵红衣葱、安化山野菜、红薇菜、岩耳等。特产的果品有九溪橘红、中华猕猴桃、安化山匿、攸县西瓜、沅江太平果、祁东荸荠、枇杷、春华李、爵山白糖李、金香柚、大庸菊花心香柚、安江香柚、江永香柚、黔阳冰糖橙、黔阳大红甜橙、浦市甜橙、永州夏橙、新宁脐橙、靖州血橙、邵阳蜜橘、雪峰蜜橘、麓山南橘、雁池红橘、浏阳金橘、蓝山金柑、安化柑橘、宫川蜜柑、甜香梨、脆皮香李、湘莲、台源乌莲、宝庆它栗、永顺板栗、湘西油板栗、溆浦红枣、溆浦朱红橘、道州红瓜子、炎陵柰李、道县桐籽李、永顺红柿、祁东藕柿、隆回腰带柿、靖县木洞杨梅、长沙北山梅、铁山杨梅、鸡蛋枣、桂阳红枣，无不风味独具。特产药材山苍子、木瓜、五倍子、玉竹、白芷、白术、玄参、永州薄荷、芍药、杜仲、



金樱子、金银花、宝庆薏米、城步薏米、宝庆龙牙百合、栀子、厚朴、枳壳、绞股蓝、黄檗、黄精、葛根、茯苓、澧县天山蜈蚣等，以历史悠久的地道药材而闻名遐迩。

湖南自古是中国重要的茶叶产地，为中国四大产茶省份之一。名茶众多，如月岩茶、太青云峰茶、五盖山米茶、长沙毛尖茉莉花茶、北港毛尖、古丈毛尖、天崇毛尖、江华毛尖、茅坪毛尖、沩山毛尖、安化湘尖茶、甑山毛尖、乌云毛尖茶、塔山毛尖、临湘白石毛尖、索溪毛尖、龙虾花茶、龙阳白鹤茶、东峰绿茶、石门湘红功夫红茶、江华苦茶、汝城白毛茶、安化松针、安化红茶、安化黑茶、益阳特制茯砖茶、君山银针、青山银毫、青岩茗翠、茅岩莓茶、城步虫茶、城步峒茶红碎茶、岳山茶、金井红碎茶、狗脑苒贡茶、南岳云雾茶、临湘茯砖茶、狮口银牙、洞庭春茶、桃溪贡茶、桂东玲珑茶、高桥银峰茶、碣滩茶、新化月芽茶、衡山岳北大白茶、藤茶等，不但为湖南民众提供了优良的饮品，与湖湘各民族民俗文化一道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茶文化，并且自古便远销漠北及欧亚各地，有些还成为贡品。洞庭湖君山盛产的“君山银针”在唐代就作为贡品，1982 年列为我国 10 大名茶之一。

湖南有林地 11 302 万亩，占湖南总面积的 35.7%。森林覆盖率为 34.3%，大大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湖南为我国植物区系丰富复杂的地区之一，全省已知植物种类 4 859 种，位居全国第七位。其中有木本植物 2 470 种。全省活立木蓄积量 1.84 亿立方米，其中用材林 1.84 亿立方米，年生长量 1100 余万立方米。“广木之乡”的雪峰山区、“江华木”的产地湘南南岭等，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用材林基地之一。还有竹林面积 847 万多亩，毛竹蓄积量 89 亿根，居全国第三位。湖南特产的竹木有九嶷斑竹、子母竹、丹竹、水杉、水竹、龙鳞竹、龙孙竹、白竹、毛竹、观音竹、寿竹、赤竹、桂东方竹、篁竹、紫竹、满心竹、合欢竹、孟姜竹、山棉皮、山核桃、马尾松、五爪桐、云山白兰花、乌桕、化香树、华东黄杉、红木、泸溪葡萄桐、香榧、珙桐、栓皮栎、雪花树、梓木、棕榈、银杉、大米桐、漆树、楠木、樟树等。其中许多植物载诸文献，不只是与民生休戚相关的经济作物，还是名贵的观赏植物，甚至被赋予浓郁的文化色彩。湖南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七十多种，特别是尚存世界罕见的植物“活化石”——银杉、水杉、水松、银杏和珙桐，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其中产于武陵山区和南岳衡山

的世界珍稀树木珙桐，其花片洁白，形如飞鸽，美丽奇特，有“中国鸽子花”之称，为世界著名观赏树种；其树干挺拔，木质坚硬，纹理美观，色白如玉，切削胶结性能好，为高级家具用材；其果实富含油脂，可供工业用，外果皮酸甜，味美可食。云山白兰花则早在唐代即被武冈人作为名花植于家园以供观赏。九嶷斑竹因舜帝二妃挥泪成斑的凄美传说为人们所熟知，成为历代文人骚客歌咏的对象，唐代诗人刘禹锡写下著名的《清湘词》“斑竹枝、斑竹枝，痕泪点点寄相思。楚客欲闻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唐代诗人杜甫留下“苍梧恨不尽，泪染在丛筠”的诗句，引起历代人们无尽的流连与遐想。

二、地下宝藏

湖南矿产资源丰富，矿业发达，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矿之乡”。这里地质构造独特、复杂，火成岩、沉积岩、变质岩系发育，地层出露齐全，三大岩系多期次侵入，形成了特殊的成矿条件，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并具有“矿种多、分布面广”的特点，是全国矿产品种较多的省份之一。世界已发现的一百六十多种矿藏中，湖南有一百四十多种。钨、锑、铋、独居石、萤石、重晶石、长石、铅、锌、钼、锡、铍、雄黄、铀、锰、锂、钽、硫铁、磷、砷、汞、高岭土、石墨矿、金刚石的储量在全国均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锑的储量居世界首位，钨、铋、海泡石黏土、陶粒页岩、普通萤石、隐晶质石墨、玻璃用白云岩、石榴子石、铌（褐钇铌矿）、钽（细晶石矿物）、轻稀土矿（独居石矿物）11 个矿种的保有储量居全国首位；石煤、锰、钒、锑、铷、碲、重晶石、玻璃用砂岩 8 种矿产居全国第二位；铯、锂、铌（铌钶铁矿矿物）、钽（Ta_2O_5）、冶金砂岩、砷、金刚石、芒硝、水泥配料用泥岩等十种矿产列全国第三位；锡、锌、钛（金红石矿物）、铼、磷、石膏、铸石辉绿岩、蚀面用辉长岩 8 种矿产列全国第四位；汞、重稀土（磷钇矿矿物）、硼、长石 4 种矿产列全国第五位。居全国前五位的矿产共 41 种，居全国前十位的矿产有 66 种。此外，煤炭储量达 34 亿吨，在江南 9 省（区）中名列榜首。大理石、花岗石、芒硝、硅灰石、石膏、膨润土等储量大，均有开采价值。全省共发现各类矿床、矿点六千余处，一批矿山和采矿企业享誉全国甚至



蜚声国外。冷水江锡矿山一直保持着“世界锑都”的地位。郴州市竹园矿区是世界罕见的特大型多金属钨矿床，被誉为“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其钨、钼、铋、萤石总储量分别占全省的46.19％、53.23％、89.83％、79.85％。浏阳市境内海泡石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矿产资源的一项空白。郴州市北湖区鲁塘石墨矿是我国最大的无定型石墨生产出口基地，辰溪莫来石厂是我国第一家全天然烧结莫来石生产企业，石门海泡石矿为中国大型的珍贵粘土矿，永兴县被誉为“中国银都”，衡山钠长石矿是亚洲最大的钠长石矿企业，石门矽砂矿是亚洲八大矽砂矿之一，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国内外闻名，桂阳黄沙坪铅锌矿是我国重点铅锌原料生产基地之一，石门雄黄矿是世界最大雄黄矿，是中国药用雄黄的唯一产地，浏阳菊花石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产品。此外，石门石膏矿、常宁硼锡矿、泸溪李家田铝土矿、石门东山峰磷矿、临武香花岭锡矿、常宁龙王山金矿、新晃重晶石矿、临武县锡矿、张家界市镍钼矿、花垣县锰矿、澧县芒硝矿、凤凰县汞矿、宜章瑶岗仙钨矿在全省饶有名气。据国家统计，2010年全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为3153万吨，湖南占261万吨，占全国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的7.4％，位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湖南非金属矿是仅次于有色金属矿的第二大矿产资源。丰富的矿产资源，使湖南成为国家发展有色冶金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的重要基地和江南黑色能源的产地之一。

湖南矿藏丰富，而且矿业历史悠久。湖南自1922年在桃源发现的商周皿天全青铜方彝美艳绝伦，1959年在宁乡出土的商代青铜大铙制作精美。1983年在宁乡出土的一件高103.5厘米、重221.5公斤的象纹青铜大铙，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大的商代铜铙，1938年在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精美绝伦，被誉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精美的代表，是国内乃至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珍品。相比中原出土的青铜器，湖南出土的器物样式更为精美，形制更为庞大。它足以说明，在商周时代，湖南的青铜冶炼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处于技术高峰。自商周以来，湖南矿业日益发展，北魏有江华锡矿，宋代有益阳金矿，明代有新晃酒店塘汞矿，新化锡矿山锑矿，清代有桃江板硒锑矿，常宁水口山铅锌矿，资兴钨矿，平江黄金洞金矿。1896年，清政府批准巡抚陈宝箴的奏请，湖南设立矿务总局，自此，湖南的矿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特别是铅锌矿、锑矿在中国占有显著地位。《中国官办矿业史略》评述：中国“官矿机构之最重要者，莫如湖南，其始为湖南官矿局”。

第四节 旅游胜境

绮丽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使湖南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旅游资源，素有“旅游胜地”之称。全省现有世界自然遗产1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3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1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9个，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4个，国家级森林公园28个，国家级湿地公园9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9个，国家级地质公园8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6个，还有众多的省级风景名胜。湖南的旅游资源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自然旅游资源，一类是人文旅游资源，还有一类是湖南特色突出的红色旅游资源。湖湘奇特的风光和厚重的文化交相辉映，构成中华大地上不可多得的观光胜境。

一、自然旅游资源

湖南地形多样，千峰林立，层峦叠嶂，江河纵横，湖泊水库星罗棋布，山水相映，自然景观资源十分丰富。湖南的山，千姿百态，有以衡山为代表的花岗岩地貌景观，有以九嶷山为代表的喀斯特地貌景观，有以崀山为代表的丹霞地貌景观，有以武陵源为代表的石英砂岩地貌景观，有以岳麓山为代表的丘陵山地景观。湖南的水，景致多样。湘资沅澧四水连接大小支流，沿河峡谷和水景奇观层出不穷，飞瀑流泉比比皆是。境内自然景观自东南至西北，有郴州市宜章县的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有邵阳市新宁县的崀山风景名胜区，有娄底市新化县的紫鹊界梯田，有湘潭市湘乡市的水府庙国家湿地公园，有益阳市赫山区的鱼形山水利风景区，有常德市石门县的夹山国家森林公园，



有怀化市通道县的万佛山风景区，有湘西自治州永顺县的猛洞河风景名胜区，有张家界市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等，数不胜数。湖湘最集中的自然景观当数湘西北武陵山地区，尤其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汇黄石寨之雄、金鞭溪之幽、袁家界之奇、腰子寨之险、琵琶溪之秀、砂刀沟之野，极具奇山异水特征。

当我们走进湘西的古镇山寨，我们在欣赏奇特的自然风光的同时，还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感受。这里有凤凰古城的旖旎风光和民族风情，这里有德夯苗寨的独特风俗。这里的民族传统习俗保存完好，其独特的风物风情闻名遐迩。当你陶醉在这奇异的山水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和古朴的生存状态之中，你会从这崇山峻岭中找到活着的湖湘文化。也只有在这个神奇的地方，当你亲眼看到这里的人们“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茝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你才会更真切更深刻地体会到远古湖湘文化的那种神秘、绮丽、狂放、孤愤的境界。[①]

① 韩少功. 文学的根[J]. 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4.

二、人文旅游资源

湖湘名山、名城、名楼、名人数不胜数，文物古迹众多，饱含着数千年湖湘文化的迷人风韵。人文景观自南至北，有株洲市炎陵县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陵寝所在地，永州市宁远县九嶷山舜帝有虞氏陵寝所在地，永州市柳子庙，有永州市祁阳县中国四大碑林之一的浯溪碑林，郴州市苏仙岭，有中国五岳之一、著名的佛教圣地和避暑胜地南岳衡山，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省会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岳阳市，岳阳市汨罗县有世界古代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屈原怀沙沉江和墓葬之地，有常德市桃源县的桃花源，常德市石门县夹山寺传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闯王的陵墓所在地等。

省会长沙无疑是湖南集古扬今首屈一指的历史文化名城，南岳衡山逶迤七十二峰，潇湘之水流淌六百里，都把灿烂的湖湘文化汇聚到了长沙这座古老而又永远充满生机的城市。长沙有三千多年文字可考的历史，几乎与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同步。早在西汉时代，长沙就是著名的楚汉古都。汉文帝时贾谊贬居长沙，致使长沙被历代士人视为伤心之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珍贵文物和走马楼孙吴简牍的惊天发现，让人饱领中华古代文

明的灿烂光华。岳麓山上建于晋朝的麓山寺、刻于南宋的禹王碑、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的爱晚亭和众多的仁人志士墓，都在无声地述说着湖湘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赋予岳麓山以不朽灵魂的更有那坐落在岳麓山东麓被誉为“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两千余年间书院学人一万七千余名，其中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人成为经世之学的杰出代表。创建于北宋太祖开宝九年（976）的岳麓书院时为全国四大书院之首，其显赫地位历久不衰，至今仍然是学人的精神家园。书院大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睥睨时空的对联，永远让人只能仰视。书院讲堂之中那两把并不起眼的坐椅，似乎仍然保留着朱熹、张栻两位巨儒的气息，让后来者不由自主地心生敬畏。[①]

① 朱汉民.惟楚有才，于斯为盛[N].光明日报，2010.5.15(4).

湖湘的又一所历史文化名城岳阳市，地处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这座精巧的城市，汇聚了众多风光美丽而又富含中华文化精华的山水胜景，又以其悠久的历史、美妙的传说和雄伟的气势蜚声中外。中国四大淡水湖泊之一的洞庭湖碧波万顷，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精巧玲珑，君山柔美的景致与凄美的传说引人入胜。尤其是面对浩瀚的洞庭，吟诵那四海传扬、无人不晓的《岳阳楼记》，眼前佳景与胸中浩气完美交织，足可使每一位游客怦然心动，回肠荡气。

三、红色旅游资源

湖南还是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求解放、争自由的革命圣地，既是一片红色的热土，也是享誉全国的红色旅游胜地。近代自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至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至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湖湘大地的每一寸土地都饱经鲜血的侵染和烈火的洗礼，“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儿女“靡役不从，舍身殉国”，涌现出谭嗣同、黄兴、宋教仁、蔡锷等革命先驱，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胡耀邦等革命领袖，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黄克诚等革命将领，向警予、蔡畅、杨开慧等女中豪杰。红色湖湘英雄辈出，灿若群星，辉映神州。革命志士和领袖人物革命胜迹遍布湖湘大地，全省现有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纪念地88处，已建各种纪念馆三十多个。著名的有湖南中部湘潭韶



山冲毛泽东故居、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故居、湘潭乌石彭德怀故居等，南部衡东县罗荣桓故居、衡阳县夏明翰故居、郴州市湘南起义旧址等，东部浏阳文家市会师旧址、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等，北部汨罗市任弼时故里、平江县平江起义旧址等，西部桑植县贺龙故居、张家界市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等。这些革命圣地为我们留存了珍贵的红色记忆，珍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第二章

湖湘文化的源流与发展

作为中华文化中一种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背景、渊源和发展过程。它决定了湖湘文化的独特内涵与特质。







第一节

湖湘文化的渊源

湖湘大地，从古至今就被称为“古道圣土”、“屈贾之乡”、“潇湘洙泗”。所谓“古道圣土”，是因为这里是炎帝、舜帝传播中华道德古训、培育中华伦理文明的主要地方。所谓“屈贾之乡”，是因为这里是屈原、贾谊忧国忧民的地方，是他们心系天下万民、求索国家前途之方的地方，同时更是他们精神得以安顿、人格臻于完善的地方。所谓“潇湘洙泗”，是因为湖湘大地是光大儒家伦理精义、传承孔孟儒家学脉的地方[①]。湖湘文化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是经多元文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它有三个重要的渊源：上古本土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文化。

① 洙泗是山东境内的两条河流，洙水在曲阜之北，泗水在曲阜之南，洙泗之间，是孔子聚徒讲学之所，后世因以洙泗代称孔孟儒家文化。

一、上古本土文化与湖湘文化

（一）石器时代湖湘地区的人类活动

湖南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湖南的旧石器时代呈现出“澧水文化类群”和“舞水文化类群”并存的特点。“澧水文化类群”就是澧水流域和洞庭湖西岸的平原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典型的有常德虎爪山、鸡公垱、乌鸦山等遗址，其石器都是利用遗址附近的砾石简单加工而成，打片与加工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偶尔采用碰砧法，石器形体粗大，绝大部分石制品保留着砾石面，典型器物有大石片、各种形式的大尖状器、似手斧石器和石球等。“舞水文化类群”就是在舞水、渠水和沅水河谷地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古时的舞水为沅水的主要支流，因此也有人称之为沅水文化类群。其打片和加工方法以锤击法为主，有时用锐棱砸击法，间或使用碰砧法，还有一

些诸如尖刃、长身侧刃、双边刃和端刃砍砸器等有特点的器物。[①]

考古发掘表明，湖南各地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器，不仅在整体上具有旧石器文化的普遍特点，而且也表现出了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的某些个性特征，这种石器特征与北方地区的石片石器工业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

从目前已发现的文化遗址和遗物来看，湖南境内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在生产和生活状况方面与其他地方的古人类大致相同。粗糙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以及木棒工具，只能适用于采集和狩猎等最原始方式的生产与生活。古湖南的人类当时也是过着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

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形成较早。迄今为止湖南境内已发现不少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如澧县彭头山、李家岗、黄家岗遗址，石门县皂市下层文化遗址，临澧县沙堤荷家台、余家铺、金鸡岗、胡家屋场、王家祠堂等遗址，长沙县大塘遗址等。这些遗址中时代最早的是澧县彭头山遗址，但最具代表性的为石门皂市下层遗址，因此我国考古界多将湖南早期的新石器文化称为“皂市下层文化”。从分布地域看，湖南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大多集中于澧水中下游沿岸至洞庭湖滨的台地和丘陵上，还有一些分布在湘中地区和湘、资流域。

距今约6500年前，湖南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大溪文化阶段。大溪文化是以最先在四川巫山县大溪发掘的文化遗址命名的一种新石器文化，分布范围由川东、鄂西三峡地区、江汉平原，往东延伸至湖北中部、东部，向南扩展到湖南。大溪文化遗址在湖南最集中的地区是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西北边缘地带。近几年来，在沅水流域的常德、桃源、辰溪、麻阳，湘江中下游的汨罗、平江、长沙、株洲以及湘南，都发现有属于大溪文化范畴和相当或相近于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区大溪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有澧县梦溪三元宫、安乡汤家岗等遗址。此外，晚期还有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等。[②]

（二）关于湖湘的上古传说

在古代典籍中记载着许多关于上古湖湘的传说。最早见诸史籍的有炎帝在湘行迹。炎帝，又称神农氏，为远古传说中一个强大氏族部落的首领。炎帝氏族部落与黄帝氏族部落，原来

① 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区域性类型及其地位[C]．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

②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



都出自我国甘肃一带，后沿黄河东下，发展为中原的华夏部落集团。炎帝、黄帝也因此一同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共祖。据传炎帝部落东下后，同蚩尤九黎集团发生冲突。最初炎帝败于蚩尤，后来炎帝与黄帝联合起来，擒杀蚩尤。战胜蚩尤九黎以后，黄帝部落又反过来攻打炎帝部落。经过这场战争，黄帝部落势力迅速扩张，取代炎帝，成为华夏部落联盟之首和黄河中下游的主宰。据《新书·益壤》载：黄帝“伐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由于黄帝部落的征伐，炎帝部落往南流亡迁徙，从洞庭之野直达九嶷苍梧。湖南许多地方留下了炎帝神农氏的传说与遗迹。据传炎帝神农氏曾在湖湘土地上播种华夏文明的火种，教民稼穑，为解除疾病对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谱写了一曲中华道德精神的颂歌，今炎陵县保存有炎帝陵，一直禋祀不断。

传说中华道德的远古典范舜帝也曾南巡来到这块土地，将“五伦之教”传授湖湘大地的黎民百姓，使自己的孝行德义播撒在湖湘文化的源头。《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即舜帝不仅力行孝悌之道，而且“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此“五伦之教”在湖湘大地上传播，道德文明薪火相传，化育万代。

（三）上古时期湖湘地区的苗蛮古越文化

史前时期湖南主要是三苗、南蛮人活动的区域，盛行作为部族文化的苗蛮文化。距今四五千年左右，与传说中的尧、舜、禹三代同时，在洞庭、鄱阳之间和江淮、江汉平原出现了一个名为“三苗”的新的氏族部落集团。传说中一般认为它原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在与炎黄部落的战争中失败后流亡迁徙到南方发展而成。蚩尤“九黎”部落集团被炎黄打败后，一部分蚩尤族人臣服于炎黄部落集团，留居黄河中下游，融合到炎黄华夏集团；而大部分成员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向南流徙，形成新的部落集团，成为南方“苗蛮”民族最初的先民之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①]《国语·楚语》有“三苗复九黎之德”。苗蛮文化是湖湘文化的土壤和根基。

《史记》记载三苗之国在“洞庭、彭蠡之间”，即现在的湖南、江西一带。《韩诗外传》则说“衡山在南、岐山在北”，表明分布范围到达湘江中游。《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宋山

①《淮南子·修务训》。

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1]湖南以及贵州等地的苗族一直崇尚祭“枫神”，崇拜枫木树。湖南湘西北的苗族古歌中有很多内容是叙述其祖先在洞庭彭蠡之间斗鳄鱼、开水田的史迹。在各地苗族中，至今还保持了不少有关蚩尤的古歌、传说和习俗。在湘西地区苗族传说的“剖尤”是远古苗族一位勇敢善战的首领，祭祖时必须杀猪供奉“剖尤”。按苗族东部方言，“剖”是公公的意思，“尤”为名字，“剖尤即尤公”，就是“蚩尤”。也有学者认为三苗只是一个国名，并不一定是苗族，但说明古代湖湘地区曾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汉代，汉初分封的长沙王吴苗就是一个番君。现在湖南少数民族分布之广，还是这种历史文化的遗存。

① 游俊，李汉林. 湖南少数民族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古籍记载“潭州古三苗之地”、“三苗建国在长沙”，所以三苗活动的中心应当是在长沙一带。明周祁《名义考》：“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其文化特征可以在文化遗址和文物上得以大致反映，如湘乡岱子坪、长沙腰塘与团里山、浏阳樟树潭等文化遗址。按考古学界的分类，前期相当于屈家岭文化范畴，后期为龙山文化范畴。除生产工具有显著的进步外，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也大有发展，种类多样，有甑、鼎、盆、罐等，少量已有镂孔、卷沿、折沿造型。除了粗糙厚重的炊、容器外，还出现了小型、精致的薄胎食器，色彩多样，印纹形式丰富。这说明当时的陶器除作生活实用外，已开始艺术化。特别是在遗址中发现了陶鸟、陶环和玉器等纯粹的玩具和装饰品，表现出了湖湘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对美的追求，被学者誉为质朴的原始艺术之花。

经过与北方华夏部落长期激烈的战争，三苗集团的势力日益削弱，一部分退避山林溪峒，成为以后湖南境内和西南苗、瑶、侗诸民族的先民，还有一部分衍化成古越民族集团中的一支。

古越，是商周时期分布于江南的一个庞大的古民族集团，根据所处地位又分为扬越、于越、闽越等，统称为“百越”。湖南境内三苗衍化而来的古越人属于“扬越”，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如宁乡炭河里、长沙杨家山与接驾岭遗址及其大量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和玉器，是其主要体现。在这些器具中可以发现，其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和以前相比，出现了许多诸如马鞍形石刀、穿孔宽刃石锄等新器型，而且磨制十分精巧；



生活陶器出现了圈足黑皮陶碗、敞口折唇皮陶盆等器形和S型纹、米字纹、器形纹饰，特别是捺印粗点组成的人字形纹及瓦纹为以前所未见，充分反映了湖湘苗蛮古越文化的特征。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湖湘地区的古越文化遗址中出现了鬲、大口尊、粗细绳纹等陶器器形及纹饰，而这些本是中原黄河流域新石器晚期的陶器特征。由此说明，当时湖湘地区文化和中原文化已有所交流和融合。商代起湖湘地区的古越人已大量使用青铜器，体现了成熟的青铜文化。另外，考古还发掘出大量玉器，有玉管、玉珠、玉虎、玉鱼等，其中玉珠以白玉居多，次为碧绿玉，中间均有穿孔，制作精细，是商代玉器中的罕见之物，表明当时湖湘地区古越人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鉴赏水平。[1]

① 周秋光．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历史演变［J］．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

二、楚文化与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的渊源除上古本土文化外，楚文化也是源头之一。

楚文化是周代至春秋时期在长江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国和大国，在八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无比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如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精彩绝艳的辞赋、汪洋恣肆的散文、义理精深的哲学、诙诡谲怪的美术、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等等。“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的汉赋有直接的影响，更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随着楚国征湘，楚人、巴人等楚国境内的民族相继进入湖南并逐渐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史书《左传》记载，“文公十一年，楚子伐麇。”这里的“麇”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临湘之地。战国时，楚悼王以吴起为相，向南征伐，合并东部的湘水和资水地区，其后又并沅水和澧水流域，称为“巫中”。因此，楚国最初移入湖湘大地的多是军人。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楚人入湘后，一方面征服和统治了原住民，另一方面也推广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得湖湘大地的农业、牧副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等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从湖

南各地挖掘的楚墓看，用来祭祀有牛、羊和鸡、凫等家禽，有鹄、鸿等猎物，有鳖、龟等水产；铁制农具包括锄、锸、铲、斧、锛、刀等已普遍使用；粮食生产除种粟之外，还广种稻米、麦子、豆类等，此外还种有甘蔗、椒、姜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在这一时期湖南地区已成为楚国重要的铜矿采炼和铜器铸造基地。手工制造品有各种各样的铜镜、漆木器、竹器、琉璃器以及丝织品。商业流通领域不仅出现了货币蚁鼻钱，即铜贝，还有黄金货币，表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并促使了湖南各地城市的兴起，如湘水流域的长沙城，澧水流域的鸡叫城，沅水流域的黄楚城等等。发掘材料表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沙城。战国时期的长沙已是楚人聚居、人口稠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市。到目前为止，仅长沙地区所发掘的春秋战国楚墓已达三千余座。

楚人不仅与湖南的原住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同时也创造了新兴的封建制度文化和充满着神奇色彩的精神文化。楚国在春秋时代已是较早实行封建郡县制的国家，征服湖南的原住民后，即在湖南设县任尹，封君封邑，无论郡县或者封邑，都必须向楚王室缴纳贡赋。对原居住湖南各地或新迁入的楚人或巴人，都一律按土地征收实物地租与田赋。

春秋以前，湖南的原住民还不曾掌握和使用文字。随着楚人的入湘，湖南原居民开始普遍学习由楚国输入的中原文字，并传播了较为先进的礼仪习尚，刻在青铜器上和书写在简牍与帛书上的文献典籍在湖南广为流传。楚人礼仪习尚主要是长江以北的生活习惯与民俗风情，其文化思想表现为五行学说、阴阳术数学说与老庄的消极避世观念。

长江文化作为古代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呈现出与中原文化明显不同的特点。从学术文化来说，这里是道家老庄思想的发源地。《史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庄子是蒙人，后来也属于楚国。在中国文化中道家思想可以与儒家分庭抗礼，儒道互补，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两翼。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反者道之动”的思想与方法，庄子返璞归真、淡泊名利的人生哲学，都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国至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仍然是继承道家的基本传统，同时吸取了百家内容，“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提名、法之妥”，成为当时的社会政治的主导思想。李学勤认为：汉代的长沙原为楚文化的中心，马王堆帛书凡能推定作者的，大都是楚人的



著作。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黄帝书”，就是这一时期黄老派道家的著作。“‘黄帝书’的文字多类于《越语》和《淮南子》，也与《鹖冠子》相似，显然是长江流域文化的结晶。”[①]

春秋战国时，湖南的原住民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呈现出多神崇拜的特点，楚人的入湘带来了楚人的宗教信仰与神话传说。湖南原住民的宗教与楚人带入的宗教、神话相互影响、融合，构成了春秋战国时独具湖南特色的宗教与神话。此外，由楚人与湖南原住民共同创造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散文、绘画、音乐、工艺美术等，在春秋战国时都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

① 湖北社科院历史所．楚文化新探［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三、中原文化与湖湘文化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发祥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两种文化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中原文化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这一支配地位，使得中原文化对各地域的文化产生了宰制性影响。中原文化主要通过以下方面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产生和形成：王朝的统治与教化、贬官和流寓文人、移民和战争等。

（一）王朝的统治与教化

自秦统一中国，湖南就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治理之中。秦朝行郡县、修驰道、统一币制与度量衡等举措都在湖南得到施行。秦朝时，湖南地区分属于黔中郡和长沙郡。汉代时湖南属于荆州刺史统摄。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中央在衡州设立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这就是“湖南”之名的由来。此后，尽管中央王朝对湖南的辖制也有些许变化，但湖南的行政区域至唐代以后开始了相对稳定，湖湘文化产生和形成有了较为稳定的区域环境。

另一方面，湖南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不仅使中原文化的制度、礼仪、风俗、习惯等直接影响着湖南的本土居民，也为湖南本土的文化保留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等地域文化特色创造了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使之成为中华文化中一支富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



（二）贬官和流寓文人与湖湘文化

贬官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曾间断的政治现象。古之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贬谪。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历史仿佛赋予了贬官们特殊的重任——文化的传承、人性的思考、对制度的反思等，他们也从另一个角度为地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湖南地区远离中原，河湖纵横，生活条件艰苦，古人视之为南蛮之地、荒凉之地、烟瘴之地，因而常常成为贬官的流放之所。由于贬官都是从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而来，并且都是有学识有文化的文人官宦阶层，被贬湖南，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却是湖湘之福。中国历代被贬到湖南地区的官员不计其数，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有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此外还有李白、杜甫、韩愈、秦观、辛弃疾、范仲淹、朱熹、王明阳等文人曾流寓湖南，他们也促进了中原文化和湖南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屈原是楚国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其爱国主义思想和斗争精神是他的性格特点。被流放后，他仍然热爱祖国和人民，寄希望于楚国的强盛，从而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形象、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天才创作的诗歌和文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无穷力量，同时也展示着湖湘文化的精髓。屈原开创的楚辞，不仅打破了《诗经》的诗歌体例，对后来的汉赋以及五言诗、七言诗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奠定了湖湘文学的基础。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曾被贬居长沙 4 年。贾谊在长沙王太傅任内的活动和著述，政治见解及其代表作《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辞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等，对于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辞赋在文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鹏鸟赋》是汉代第一篇散体赋，对后来散体大赋的兴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柳宗元是唐代文学家和政治家，是贬官文化典型代表人物。他被贬湖南永州后写下的“永州八记”，不仅描绘了永州优美的山水，还把自己的忧愤心情寄情于景，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在永州 10 年间，柳宗元创造了辉煌的文学业绩，在散文、诗歌、寓言、游记、杂文、小说、辞赋以及文学理论等方面，都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共留下六百多篇作品，使之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刘禹锡与柳宗元并称“刘柳”，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在唐德宗时期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他的代表作有《乌衣巷》、《西塞山怀古》、《秋词》、《浪淘沙》、《竹枝》、《杨柳枝》等。刘禹锡性格刚毅，但始终不曾绝望，被贬后仍以积极乐观的精神进行创作，其所创作的《秋词》等仿民歌体诗歌说明了他积极向民歌学习的态度。刘禹锡在湖南期间所写的《天对》中，明确提出了“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命题，不仅在天人关系观中独树一帜，也对湖湘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移民和战争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移民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传播载体。纵观中国历史，移民主要是因战争或国家行为产生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以中原汉族南迁最具规模，影响最大，对其他区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其中也包含着对湖湘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中原移民早在炎帝战败时就开始了。在商朝盘庚迁殷后，商王朝逐步加大对“荆蛮”的征伐，军事、经济、政治势力的南下，加上商人某些氏族支系的迁入，进一步促进了中原文化对湖南本土文化的影响。秦汉时期，户口消长呈现一种循环状态，总数并没有什么增加。但是，北方和中原人口因兵祸和天灾大规模地向南迁徙，导致湖南境内的人口成倍地增长，人口的民族成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湖南境内原有的大部分原住民在中原和北方征服者逼迫下，逐步向西部、西南部以至湖南境外的西南山区退徙。这些中原人和楚人再同那些没有退徙的湖南原住民融合，便构成了湖南境内新的主体民族——汉族。[①]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但在国家和民族不断动荡、变迁中，周边民族同中原民族、北方民族与南方各族相互间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却得到进一步加强。隋唐五代时期，湖南虽与全国一样历经农民大起义和王朝的更替，但所受战乱的波及和直接影响较小，社会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土地得到进一步开拓，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商业、交通扩展，同全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① 周秋光．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历史演变[J]．湖南社院学报，20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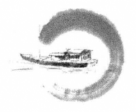


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和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骚扰，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文化也随之南移。于是，一直居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了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已经十分发达，超过了北方。尤其是靖康之乱后，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湖南等地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从而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这也是湖湘文化成熟于两宋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之后的元明也有大规模的战争和移民，其大迁徙加快了中原文化和湖湘文化的进一步互相影响和融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湖湘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融汇过程中发生的，是一个多源性的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的渊源，湖湘文化也不例外。《三国志·管宁传》："测其渊源，览其清浊，未有厉俗独行若宁者也。"我们在面对湖湘文化的时候，要认真了解这些渊源对湖湘文化形成的影响。通过对湖湘文化渊源的了解，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湖湘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精髓，也能更加明白湖湘文化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二节 秦汉隋唐时期湖湘文化的初步形成

湖南本土文化与楚文化、中原文化的浸润和交流，为湖湘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秦汉隋唐时期，湖湘文化有了基本的轮廓和雏形。秦汉隋唐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使得湖湘文化初步形成。



一、秦汉时期的湖湘文化

秦统一六国后，湖南成为中央王朝统治下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的民族文化开始逐步形成。

这一时期，湖湘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在当时全国统一的背景下，北方、中原及各个地域的大量移民涌入湖湘，带来了包括生产技术在内的不同的地域文化。

秦朝统一后，在湖南地区有着大量的驻军，带来了随军人员的南移，据史实记载，秦始皇曾遣发50万人“戍五岭”，其中就有五分之二驻扎湖南。随着秦朝短暂政权的瓦解，由于北方中原地区的兵祸，加之天灾，由官府组织进行，造成北方和中原地区人口开始大量向南迁徙，使得湖南地区人口大规模增加，人口数从西汉元始元年的 71 万人增加到东汉永和五年的 281 万人，增长近三倍。从秦始皇开始，到东汉时期，中原人口的南徙使湖南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先民逐步向西部、西南部，以至向湖南境外西南山区迁移，而广大江湖平原地区则成为中原人和楚人聚居地，他们又同部分土著居民日益融合，构成湖湘地区的汉民族的主体。

这种由移民而形成的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为湖湘文化的初步形成注入了新的文化思想。此外，秦朝统一后实行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体制，使共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体系取代了各个地域文化的原有的自然发展，逐步形成中国文化的共有的价值系统，使得湖南不仅融入中央王朝统治体系中，也融入中华文化的体系中，成为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方面，牛耕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水平，使得秦汉时期湖南在当时的粮食不仅能够满足内需，而且还大量外调。手工业技术已达到全国领先的水平。如马王堆出土的轻薄素纱禅衣重 49 克，其经纬丝纤度已达到与近代缫出的最精细的纤度相当的程度。[①] 东汉时湖南耒阳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文化方面，黄老之学在当时的湖南已十分流行，长沙马

① 伍新福. 湖南通史（古代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



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就有关于黄老道的著作，说明了道家在秦汉时期就已对湖南地区的文化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以后道教在湖湘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古地图，说明当时湖南天文学与地理学已发展到较高水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的帛画与古乐器，集中反映了当时湖南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湖湘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于中原而言，湖湘地区社会仍然较为稳定，这种稳定为湖湘文化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北方及中原的移民继续不断迁入较为稳定的南方地区，由此开始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这一时期，湖南先属孙吴西晋，后依次归于东晋和宋、齐、梁、陈四王朝。数百年间，战争使得全国的人口大幅度减少，湖南地处江南，相对而言受战祸兵灾较小，社会比较安定，加之北方人口的南迁，湖湘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文化都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也使得湖南地区成为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刀耕火种”的湖南粗放农业开始向精耕农业转变，再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湖南开始成为全国大米的重要产地和供应地，三国时，“长沙好米”之名已流传于北方和中原地区。湖南除盛产大米外，还大量种植粟等粮食作物。粮食产量的丰足，也促进了牲畜饲养业的发展，更带动了工商业的繁荣，以粮食为原料的酿酒业、农副产品加工、陶瓷、纺织、金属冶炼及金属器、玉器制作等技术在湖南特别发达和兴盛。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船舶交通的发达，各地产品交易增多，从魏晋到南朝，湖南的商业也获得了发展。作为早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湖南以世家豪族为代表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庄园经济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同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突出的社会思潮，反映世家豪族意识形态的清谈和玄学在湖南也盛极一时。玄学是清谈的主要依据和内容，清谈是对玄学的阐述和表现形式。湖南当时颇有名气的清谈家和玄学家有刘先、虞授等，他们都崇尚“老庄”。由于崇尚“老庄”和清谈玄学之风的盛行，以道家经



典为其理论依据的道教在湖湘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道教的主要据点在南岳衡山。衡山的祝融峰有南岳观，其他地方的著名道观有巴陵的青霞观，醴陵的登真观等。

佛教传入湖南也在魏晋之际。湖南最早的一座佛教寺庙为长沙麓山寺，建于西晋初年。稍后又有巴陵君山寺、圆通寺、桃源净照寺、衡阳上圆清寺、衡山衡岳寺、攸县证果寺等一批佛教寺庙的出现。[1]

魏晋南北朝时期，湖湘地区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一批人才，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三国时湖南著名文士刘巴、南朝的阴铿，还有蒋琬、桓阶、车胤等。东晋罗含所著《更生论》是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同时湖湘地区也产生了一批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们在历史和地理方面的撰著，为我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史学家邓粲所撰的《晋纪》和一些关于湖南地理的著作就是典型代表。[2]

①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

② 张伟然.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J].中国史研究.1996(2).

三、隋唐时期的湖湘文化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由分裂重新走上统一，湖南与中原的联系比过去加强了，中央也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湖南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重要政治战略意义的行政地域概念及人文地理概念正式形成，在此基础上，湖湘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也有了长足发展。

隋唐时期，湖南多数地区农业得以发展，水稻已实行一年二熟制，还种了小麦与粟、黍等，以及经济作物茶叶、桑、苎麻和棉花等。安史之乱后，北方农业凋敝，粮食问题十分突出，湖南地区的粮食开始大规模北运。隋唐时期在农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各种手工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这在湖南地区最突出的是瓷器业，以前的青瓷烧制工艺已发展到釉下彩烧制工艺，如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代表了当时国内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湖南传统的有色金属矿，如朱砂、水银、金、银矿的开采和冶炼，隋唐时期也在继续发展。湖南地区商业的发展，在唐代主要反映在瓷器方面，而五代马楚时期则以茶叶贸易最为突出。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还远销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甚至远达非洲。

隋唐时期湖南文学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中唐以后，

产生了诸如刘蜕、李群玉、胡曾、曹松、僧齐己等在全国颇有名气的诗文作家。五代时马殷据湖南为国，使得湖湘文化有了更大发展，特别是在长沙聚集了一批文人，如邓洵美、韦鼎、廖昌图等人，对湖南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因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到湖湘地区，如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先后贬谪到湖南。湖湘大地各族居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和山川风物为这些外籍文人提供了创作的土壤和条件，同时他们又促进了湖南诗歌的兴盛和文学的发展，对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隋唐时期，湖南还先后出现了石鼓、岳麓两书院，是见诸记载的中国书院之始，开创了湖湘以重教育著称的先河。此外，湖南在唐代出现了全国一流的大书法家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及怀素，他们三人都是湖南长沙人。在这一时期，湖湘文化开始以地域思想文化特色而崭露头角了。

由此可见，在秦汉隋唐时期受大一统政治、道教、佛教等因素影响，湖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地域文化初步形成，初具雏形的湖湘文化开始步入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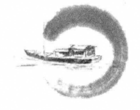


两宋时期湖湘文化的成熟

两宋时期，以湖湘学派的崛起为标志，湖湘文化走向成熟，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与湖湘文化的发展

湖南在唐末五代时曾由马殷建立楚国割据五十余年，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国家政权，为湖南的区域



性开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北宋建立后不久，即逐步消灭了南方包括湖南“马楚”在内的地方割据政权，并着力经营南方。

在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亦产生于北方，但是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由于北方党项、辽、金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南侵，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经济破坏严重，迫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将重心移向南方。南宋时期，北方的广大疆域沦入金人之手，一直居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此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方，湖南更是成为南宋王朝所倚重的重要地区。

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湖南的手工业、商业及交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都来过湖南，并为湖湘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是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那些有名的学者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北宋形成的“四大书院”在南方和北方各两所，到南宋时期，四大书院已全部移到南方，而北方的文化则大大衰落。这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局面的出现，无疑促进了湖南社会经济文化飞跃发展，为湖湘文化走向成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湖湘学派的兴起

两宋时期是湖湘文化在全国形成自己特色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其标志是湖湘学派的崛起。

与先秦儒学和汉唐儒学相比，湖湘学者们不仅是从社会政治或者生活实践的角度大量地讨论儒家伦理问题，而且是把这一切置于“性与天道”的宇宙论、世界观的哲学角度来考虑，使先秦以来的儒学发展成一种更为精深、具有系统性的学说，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先秦孔孟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原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通过“百家争鸣”，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主流学术思想。自从汉代起，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核心学说。由于先秦儒家只讲其然，不讲其所以然，以致儒者们常常沉浸于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皓首穷经”的学问中，不能够对儒学的理论思想和伦理价值作出新的阐发。道释两家兴起，也使得儒家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湖湘学者们在吸收和批判佛、道的宇宙论及思辨方法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重建儒学体系，重振儒家信仰，创立理学，形成湖湘学派，为中华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体系。《太极图说》将儒家的仁义道德跟道教的宇宙图式结合起来，建立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化生”的宇宙论哲学，将儒家伦理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之上。《通书》则提出了一个以“诚”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心性论。书中写到“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其中，“诚”既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又是“圣人之本”道德人格本体。从而把“天人合一”奠定在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为儒家伦理建立起一个终极存在的本体依据。

周敦颐为理学的兴起起到了奠基作用，他的思想也备受湖湘学派推崇。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在《通书序略》中确定了周敦颐在“道统”中的地位。胡宏的弟子张栻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周子的学术地位与成就，并亲自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譬如《太极图解序》、《太极图解后序》、《通书后跋》等，肯定周敦颐是孔孟道统的继承人。湖湘学派的哲学体系和概念范畴也深受周敦颐的影响。胡宏将“性”看作既是宇宙本体，又是人格本体，从而建立起“性为大体”的“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这与周敦颐《通书》中的理论模式十分相似。张栻不仅重视周敦颐的《通书》，还十分重视《太极图说》，他将周敦颐的太极论与胡宏的性论统一起来，提出了“太极即性”的本体论学说。正是由于周敦颐对理学的重大贡献，后来的湖湘学人王闿运才发出了“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的感叹，这种感叹虽有夸张，但也反映出了周敦颐对理学的贡献和影响。

流寓而定居湖南成为“湖南人”（原籍福建）的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创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念、以理学为学术特征、内圣外王并重并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的湖湘学统，成为



"湖湘学派"的奠基者。胡安国的传世著作有《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其中《春秋传》是他以毕生精力纂修而成，成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义定本，也是湖湘文化的经典著作。他的儿子胡宏曾"优游于衡山脚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创立了"性本论"的新理论，作为对其父理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性本论"理论将"性"作为连接天、人的中介，人性是联结、沟通"天"、"人"的枢纽，是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关键，人性论才是宋明理学的体系核心。[①] 胡宏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也实现了他复兴儒学的夙愿。胡宏的主要著作有《知言》、《皇王大纪》等。其中，《知言》内容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是传授师说的重要范本。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

①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张栻为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张栻年轻时奉父亲之命到衡山拜胡宏为师学习理学，经潜心苦读和四方讲学交友，学业日进。胡宏曾称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栻注重"力行"，反对空言，强调道德践履，行至言随。此外，在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张栻的议论也有其特点。因而，他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之一。1165 年，张栻在长沙城南书院授徒传业，后又主讲岳麓书院，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名声远播，湖湘学派规模得到很大扩展，湖湘学派倡导的儒家思想也得到迅速的传播，而岳麓书院则是新儒家思想传播的主要阵地。此外，张栻与朱熹的探讨，成为当时学术思想界最大的盛举，被称之为"朱张会讲"，这也使得湖南成为全国重要的学术思想地域和理学学术中心。

三、书院教育和学术的一体化发展

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的持续发展无疑对宋代及以后湖湘文化和湖南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名列天下四大书院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在宋代引领着全国书院的发展，使湖湘士人获得了文化的自信，为湖湘文化和湖湘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时期，湖南至少有 12 所书院，大多起着替代官学培养人才的作用。人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文化积累、创造的

主体。人才的兴盛，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与强劲动力。历代湖南书院卓有成效的人才培养工作，在湖湘文化的传承、发展、更新、创造的过程中发挥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它们以其规制完备而备受世人瞩目，成为各地书院的榜样，引领着全国书院的发展。马端临所谓"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欲仿四书院云"，[①]讲的就是这种表率作用。书院的发展促成了湖湘坚持兴学的社会风气和与礼乐之邦洙泗、邹鲁一比高下的自信与自豪。这种社会风气和心理机制，正是湖湘文化得以于宋代趋于成熟，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① 谷嘉、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至南宋，湖湘书院总数已达 70 所，基本覆盖到了整个湖湘地区。书院的普遍设立，不仅有了人才培育之所，也有了学术研究之所。如胡安国的代表作《春秋传》完成于碧泉书院；胡宏则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完成其代表作《知言》，建构其理学思想体系。张栻的主要著作《论语解》、《孟子解》，也修订、完成于其主教城南、岳麓书院期间。宋代湖南书院的普及导致主流文化向边远地区不断推进，拓展了湖湘文化的空间分布。同时，宋代湖南书院的各种面向社会的会讲、讲学活动也促进了文化的社会传播。教育的兴盛使得湖南开始出现人才蔚起的现象，据《湖南通志》记载，两宋时期湖南县以上官吏三百九十余人，其中进士达 179 人。

可见，自宋代以后，历代湖湘士人不仅仅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与创造工作，而且以"教化"为己任，承担着教育的历史责任。这种教育与学术一体化的趋势，表现在湖南书院教育既注重先秦儒家道德，又注重把教育与个人修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传道求仁、经世致用、兼容并蓄的学风，并使之升华为湖湘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涵，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中的宝贵财富。

此外，两宋时期湖南除了湖湘学派兴起和书院教育蓬勃发展外，在经学、史学、地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也都有非凡的建树。宁乡的易祓，武陵的丁易东，永明的周尧卿等都是宋代湖南非常值得称道的经学家。宋代湖南也不乏才华卓越的史学家和具有较高价值的史学著作，如路振的《九国志》、陶岳的《五代史补》等。在地理学、地方志方面也有可观的成就，当时编撰的《南岳总胜记》、《岳阳风土记》、《辰州风土记》等著作对研究湖南历史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南宋时期湖



南出现了几位著名的诗人、词人，如潭州人刘翰、宁远人乐雷发、衡山人侯延庆等。宋代湖南书画界较为突出的有刘次庄、单炜、武洞清、释仲仁等。宋代湖南的医学也有很大发展，产生了很多医学典籍，当时著名的医学家有湘乡人朱佐与衡州热门宋永寿等。[①]

① 伍新福. 湖南通史（古代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



第四节　明清时期湖湘文化的蓬勃发展

明清之际，湖湘文化得以复兴和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使得湖南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域之一。

一、明朝时期的湖湘文化

元朝统一中国后实行行省制度，湖南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湖广行省，其余隶属于四川行省。元朝贵族的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使得湖南地区的发展表现出迟滞的态势，湖湘文化的发展也进入短暂的低迷时期。但是由于元朝政府的提倡，元代书院却兴盛一时，湖南地区的书院教育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除岳麓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岳邺侯书院等一批旧有书院外，湖南各地新建了一大批书院，如乔江书院、东岗书院、南台书院等。元朝湖南的科举入仕人数在全国比例很高，约占十三分之一，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居于前列。元朝湖南地区乡试中举者 271 人，成进士者 143 人，入选为官者 86 人，并且出现了众多的状元，如衡山何克明、兴宁曹一本等。[②]

② 张伟然. 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G]. 中国史研究. 1996(2).

经过元代的低迷之后，湖湘文化在明朝得以复兴和进一步

发展。明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恢复生产，湖湘的社会经济文化也与全国一样开始复苏并得以发展。

较之前代，明代湖南的社会经济重大发展首先体现为农业的发展。明代中期开始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表明其时湖广已取代了苏浙，在粮食生产方面已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次是手工业和商业也有较大发展，明代湖南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往昔，例如湖南地区各州县纺织业均出产绢、绫、丝和棉布，其中棉布尤多；制瓷业由岳阳、长沙、衡阳等湘中发达的地区向湖南的边远地带扩展。其他如造纸业，也出现了诸如长沙府的浏阳纸，衡州府的耒阳纸等一些名优产品。并且湖南地区已出现了一些商业重镇与贸易中心，如岳州府的巴陵、湘江之滨的长沙府城等。

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代的教育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元末被兵燹损坏的学宫和书院在明代都陆续得到恢复，并且还兴建了不少新的学宫和书院。特别是书院，在嘉靖年间兴建最多，湖南书院总数达到一百二十余所。书院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湖湘人才的兴盛，明代举行的会试 82 场，湖南进士题名者计 541 人，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各 1 人，分别为华容的黎淳、安仁的邓伟奇、临武的曾朝节。这些进士中官至显位的有在正统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宜章人邝埜，天顺年间担任两广总督的汝城人朱英，担任礼部尚书的华容人黎淳等。[①]

与前代相比，明代湖南的人才格局已有新的突破，用晚清湖南经学家皮锡瑞的话说是“骎骎始盛”。当时可称道的文学人物，在明前期有文学家、诗人茶陵人刘三吾，湘阴人夏原吉，攸县人王伟；在明中后期有茶陵人李东阳、郴州人何孟春、巴陵人杨一清、宜章人邓庠、善化人黄学谦、益阳人郭都贤等。可称道的经学家有益阳人罗敦仁、罗喻义父子，有衡阳人王介之（王夫之长兄）、临武人曾朝节等；史学家有湘潭人周圣楷、茶陵人谭希恩、醴陵人唐寅、华容人严首升、孙宜等；地学家有华容人黎淳、攸县人陈论、长沙人魏焕、衡州人杨佩、善化人吴道行等。值得一提的还有明正德二年（1507），对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的“阳明学”创始人王守仁贬谪贵阳时途经湖南，曾应邀在湖南醴陵的靖兴寺、泗州寺和岳麓书院讲过学。其后，王派弟子季本、罗洪先、张元忭、邹元标亦在湖南大倡其师门

① 伍新福. 湖南通史（古代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



之说，有力地推动了王学在湖南的传播。王学在湖南传播的结果是与湖湘学融合，最终使得湖湘学和王学都得到了改造，同时，王学在湖南的传播对于后来王夫之学术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1]

① 周秋光．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历史演变［J］．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

二、清前期的湖湘文化

清代湖南的单独建省，是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先决条件。今天湖南省区的范围，早在清康熙三年就已经基本确定了，略有不同的只是建省时靖州领有天柱县（即今镇远地区），在雍正四年（1726）划归了贵州。与过去相比，它不再依附于湖北了，这就使它有可能形成自己的重心和规模，从而为湖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另外，清代湖南人口大幅度增长，是清代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基本动力。至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前，湖南人口增长为1989万人。[2]人口的增长，自然要促进经济的建设与开发。大批移民的进入，实际上最大限度地开垦了湖南的荒地，使耕地面积显著扩大。耕地面积的扩大，加上注重兴修水利，注重耕作方法的改进，推广双季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各种经济作物的普及，使得清代湖南的农业生产发展超过了前此任何一个朝代。明中期民间流行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便一改而为“湖南熟，天下足”。

② 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

教育的兴盛与两湖乡试的“南北分闱”，是清代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重要因素。清代比明代更重教育，除恢复清初被兵燹损毁的各地学宫和书院外，在康熙至嘉庆年间，又在全省各地新建了71所书院。并且湖南在各府州县还广设义学，作为初级教育的场所。这些义学，每州每县少则一所，多则十余所。同时遍及到少数民族地区，使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教育的兴盛与南北分闱，导致了湖南人才群体的蔚起。大约从嘉庆朝开始，湖南参加乡、会试的中试人数，便较之前代有明显的增加。据载清朝自顺治九年开科至道光二十年（1804）共75榜（不包括咸丰至光绪朝），湖南成进士者计441人，中举者达数千人。[3]

③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



三、湖湘学人王夫之与中国早期启蒙思想

明清之际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产生的阶段，湖湘学人王夫之是这个阶段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是湖湘理学的继承者，他承传了两宋形成的理学型文化，并对理学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批判；另一方面，他又是促进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先行者。

王夫之一生著述众多，体系浩大，内容广博，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历史评价他既是充满爱国热忱的志士，又是有着强烈文化关怀和抱负的哲学家。他的著述存世的有 73 种，401 卷，散佚的约有二十种，主要有《读通鉴论》、《宋论》、《周易外传》、《周易内传》、《诗广传》、《思问录》、《尚书引义》、《黄书》、《张子正蒙注》、《噩梦》、《庄子通》、《老子衍》、《读四书大全说》、《相宗络索》、《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等。他死后一百五十多年时期内，他的著作流传甚少，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情况才发生变化，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此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它的学说为人们所知悉，并立即受到全国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

王夫之一生以“六经责我开生面”文化使命感自期自许，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贡献，在哲学观念、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人格精神等各个领域均有新的开拓，尤其是在古代哲学领域，王夫之更是开创了新纪元。他的“天下非一姓之私”的君主政治批判，“天下惟器”的哲学思考，以利为义的伦理观念、“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学思想以及对豪杰人格的推崇等，均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具有浓厚的启蒙色彩。

王夫之的政治观点接受了程朱理学中关于“礼”的思想，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同时他又反对绝对君权，认为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也就是“天下非一姓之私”。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将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高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是中国“启蒙运动”



的先声。此外，他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史、百家之学以及释、道之学，进行研究并吸取。他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巨人，湖湘文化因王夫之而发扬光大。王夫之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华文明史上居有崇高地位。当代学术大师侯外庐先生也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蕴涵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王夫之不止是将湖湘文化，而且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早期湖湘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近代湖湘文化的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贺长龄、魏源、邓显鹤等人最先接受王夫之思想，并极力宣传船山学说。除邓显鹤刻《船山遗书》外，贺长龄也在贵阳刻有船山著作，魏源还专门研究过王夫之的著作，其《诗古徽》即附了船山的《诗广传》。以曾国藩、曾国荃、彭玉麟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其学术思想同样受到王夫之的影响，如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思想就是来源于船山理学思潮中的儒家伦理内核“内仁外礼”以及“明体达用”的学术思想。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也接受了船山学说的影响，故而极端推崇王夫之，谭嗣同甚至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1]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士钊、杨毓麟、易白沙、禹之谟等，对船山学说的推崇不亚于维新派，如杨毓麟于 1902 年发表《新湖南》一文，提出“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辛亥革命的宣传家大多爱看《船山遗书》，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

此外，一些现代湖湘人物也受到了王夫之思想的影响，如杨昌济及其学生毛泽东、蔡和森均接受过船山学说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到青年毛泽东。

直到今天，坐落于长沙闹市区的船山学社旧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读过的岳麓书院，仍吸引着人们去追怀这位杰出的人物。这不由使人想起梁启超所说的一段话：“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由上可见，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湖湘文化，随

①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着中国文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明清时期不断地发展与重构，显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文化特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同时这种发展又有着明显的传承性，表现出固有的地域性的文化特质遗传，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五节 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

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着亡种、亡教、亡国的危局。在这种情形下，湖湘士人再次站在文化变革的前沿，以其独特的思想与行为推动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同时，近代也是湖湘文化开始转型的关键时期，近代湖湘文化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散发出耀眼的光彩。

一、湖湘经世派与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塑造了湖南士人外倾感应型的性格，当面临着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时，经世致用的思想使一部分湖湘知识分子得以率先从忧国忧民的角度去认识西方文明，形成了湖湘经世派。

经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魏源、贺长龄等。其中魏源最具典型性。早在1842年，湖南邵阳人魏源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详细介绍了5大洲九十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知识，为国人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崭新概念，并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这一时期清朝由盛而衰，西方势力东来，使得当时的湖湘学者们不得不从汉宋之学的繁琐与空疏中摆脱出来，探求能挽救危机的经世之学，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改革方案，如改革漕政、盐政，抑制兼并、流民，乃至杜绝白银外流、西力东



渐的种种方法。因此，这是一批学术旨趣相同、政治倾向较为一致，同时又互为师友、互为乡籍、互为同事的湖湘学人，也可以将他们视为一个学术群体。他们共同的学术特征和群体联系，对湖湘士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湖南学术产生深远的影响，实则是湖湘学风形成的标志。

二、湘军之兴和洋务运动与湖湘文化

湘军的兴起出现在清朝咸丰年间，这既是该时期重大的历史现象，也是主要文化现象，对湖南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构成湖南近代史重要的一页。湘军的兴起曾被人称为晚清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以为"书生用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①]。湘军对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无可比拟的，以致时人发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的感叹。"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将领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15人位至总督，14人位至巡抚。位至总督的湘军将领有湘乡人曾国荃，长沙人杨岳斌，湘阴人左宗棠，衡阳人彭玉麟，新宁人刘坤一、刘长佑等；位至巡抚的湘军将领有益阳人胡林翼，湘阴人郭嵩焘，新宁人江忠义、江忠源，湘乡人刘锦棠、刘蓉、李续宾等。湘军之所以会在湖湘大地兴起，与湖南地区特有的社会经济、阶级状况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由湖南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土壤孕育出来的。

湘军的兴起乃是以曾国藩为中心的一批湖南洋务派士人为挽救封建末世、中兴王朝、实现经邦治国的宏愿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湘军人物的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改革政治的经世之志，正是嘉道之际以魏源、陶澍、贺长龄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思想的自然延续，也是他们开创的湖湘学风濡染的结果。就直接的学术渊源而论，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师承关系。湘军与湖湘文化又是相互联系和密不可分的。湘军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产物；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传统的弘扬与光大，堪称湖湘文化重要发展阶段；湘军深远的影响又成为弘扬湖湘文化的动力，构成推动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在机制。

湖南的洋务派实际上是湘军兴起的产物，曾国藩被当做洋务派最典型的代表。在魏源逝世十周年后，湖南人曾国藩、左

① 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M]．见：罗尔纲．湘军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

宗棠率先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付诸社会实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通过办军械所、制造局，翻译介绍西书，派遣留学生等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学为用”），同时保持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中学为体”），即所谓的“中体西用”。但是由于西方的强烈反对和干预，这时的主流想法已经不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是“师夷长技以自强”。1876 年，湖南人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一任驻英法公使，他利用出使英、法的机会，对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大力传播西方文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提倡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

三、维新派与湖湘文化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派逐步走上中国社会政治舞台。湖湘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谭嗣同、唐才常等。与经世派、洋务派相比，他们主张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的范围内向西方学习，在继续强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西方的政治体制。因此，他们更加注重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谭嗣同的维新思想就是这种新思潮的典型代表。

由湖南维新人士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创办和主持的时务学堂是湖南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标志着湖南的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转向新式学堂制度，它对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开端。时务学堂是由岳麓书院王先谦领衔呈报、巡抚陈宝箴批准、熊希龄等出面报请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拨款，建于长沙小东街的新式学堂。时务学堂先后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之后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这就是湖南大学的前身。时务学堂的创立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湖南成为当时中国最富朝气的省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使得湖南的维新运动成为后来戊戌变法的前奏和实践基础。因此，梁启超多次赞扬：“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

维新人士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平等”、“自由”思想，这种思想促使湖南维新人士对“人”的自身存在意义进行思考。



谭嗣同以赞美人的身躯为起点而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唤起人格的觉醒。他激昂陈词："宇宙造成人体，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隶，当牛马的。"谭嗣同对人的尊重，给予了封建伦理纲常最为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三纲五常蒙蔽人的理智，禁锢人的灵魂，否认人的"自主之权，是它数千年来惨祸酷毒，愈演愈烈，使中国成为一座'黑暗地狱'，必须完全否定和冲决。"可见，人格的觉醒，在谭嗣同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谭嗣同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他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谭嗣同由忧国救国而舍身变法，这是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为国献身精神的突出体现。面对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民族危亡形势，他奋起投身维新变法的救亡图存运动，主张激进的改革，坚信"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当维新改革遇到顽固守旧势力扼杀时，他常说："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在戊戌政变发生后的危难时刻，他坚决拒绝友人到日本避难的劝说，毅然用自己的鲜血铺通变法之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①]

① 清史编委会.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卷之谭嗣同[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作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唐才常积极参与湖南的维新活动。在戊戌政变、谭嗣同遇害后，唐才常悲愤不已："满朝旧党仇新党，几辈清流付浊流。千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臣头。"唐才常主张忠君思想，拥戴光绪皇帝，组织成立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号召人们抵御侵略，奋起救国。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虽然失败，但其申明要废除"所有清朝专制法律"，"变旧中国为新中国"，采取了武装起义的形式，带有新时代特征。自立军起义既是19世纪末改良运动的继续，又是20世纪革命运动行将高涨的征兆。

四、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与湖湘文化

孙中山曾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



是湖南人做出来的。”的确，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湖湘士人再一次充当了急先锋。近代湖湘革命派人物的杰出代表有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章士钊等。

黄兴是资产阶级革命实干家，在长沙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被公推为会长。之后与孙中山一起创办同盟会，并任庶务，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黄兴积极发展革命分子、参与策划和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如广州起义等，是辛亥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任陆军总长兼任参谋本部总长等重要职务。

蔡锷是湖南众多中华民国杰出军事领袖之一，曾经响应辛亥革命，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他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展示出了忧国忧民的湖湘精神和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为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等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天华是中国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先后撰写的《猛回头》和《警世钟》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朝廷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他参加了抗议日本政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斗争，并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以死为警世钟，来唤醒同胞，激励国人“共讲爱国”。

宋教仁先后翻译了《日本宪法》、《国际私法》等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

章士钊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所著《论中国政党内阁当应时发生》、《何为政党》等政治论文，对当时关心政治制度改革的人们以巨大的启迪，促进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由于这些湖湘先进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使湖南成为引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地区。

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湖湘文化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以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为核心的湖湘文化在近代转型的基础上，开始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融合。这是从思想层面上的中西文化冲突和交融的过程。这种思想层



面的文化包容熏陶并造就了许多湖南爱国志士，如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他们在湖南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这些湖湘文化传人以最大的能量影响并左右着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军事等领域，使湖湘文化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能。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已从制度层面进入精神层面，在这种冲突与融合进程中，湖湘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辛亥革命失败后，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认识到“皇权阴魂不散的原因是帝制与儒学相表里，尚未崩塌的旧文化轴心在起作用。”如果不摧毁旧文化轴心，它必然再次成为复辟活动的灵符，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于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传播新文化，在实践当中，他们选择西方的各种学说，把文化重建和社会改造密切结合起来。在先进知识分子中，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青年颇具湖湘文化的底蕴。他们创建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反映了湖南志士对振兴中华、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和自信心。他们还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开始接受和传播十月革命送来的新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

这一时期的湖湘文化以反孔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标记。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述墨》、《孔子评议》等多篇论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宣战，为新文化运动鸣锣开道。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从法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在留学生中广为散发。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与上海、北京、南京和省内各地建立联系，发行《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劳动界》、《新青年》等书刊，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湖南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是一次以中国传统儒学为核心的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融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成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在这块土地上，爆发过秋收起义、平江起义、湘西起义，创建过湘赣、湘鄂西和湘鄂川黔根据地。成千上万的英烈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直至生命。这一代又一代的湖湘文化传人“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文化和社会功用”，使湖湘文化发扬光大。江泽民在 1991 年 3 月来湖南考察时说：“近代以来，湖南出现了许多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成立又涌现了一大



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许多英雄人物，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革命战争为湖南造就了一批能文善武的人才，他们进一步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使之如日中天，在现代史上熠熠生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主张“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经世派、洋务派，到学习、宣传以至主张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再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湖湘文化完成了近代巅峰时期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湖湘文化自始至终贯穿一种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许多湖湘学人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地推动着中国文化的变革和转型，充分地展示出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三章

湖湘文化的卓越成就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无论是学术思想、教育、文学艺术，还是科技、政治、军事，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都独树一帜。









第一节 湖湘学术思想成就

湖湘学术思想是湖湘文化的灵魂，是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贡献最为突出的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湖南学人以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的精神，究天地本源，思人生真谛，探历史规律，形成了具有地域特性、传承有序的学术思想、学者群体和知识传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湖湘学术思想的地域文化基因

严格意义上的、体系性的湖湘学术思想是从宋代才开始形成的。古老的湘楚文化，是它孕育的温床。湘楚文化中对于宇宙天道的探索热情、崇巫习俗、勇武爱国、独立创新与兼收并蓄等特征，对湖湘学术思想的形成与特质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视为湖湘学术思想的文化基因。

产生于南方地区的楚文化，与以儒、墨为代表的北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首先表现为楚人对于天道宇宙问题有着极大的热情。王国维指出："古代北方之学派中非无深邃统一之哲学，然皆以实用为宗旨……惟老庄之徒生于南方……其言性与道颇有出于北方学者之外。"[①] 对于天道的喜爱与探索根源于楚地丰富的神话传说。现今所见的中国古代神话，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主要来源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楚人著作。这些神话传说是楚地先民探索和解释天道宇宙的最初思想成果，反过来又刺激了楚地思想家对天道宇宙的兴趣。楚文化中求索天道宇宙的传统对湖湘学术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从老子、庄子、屈原开始，中经周敦颐、胡宏、张栻、王夫之，

①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M]. 上海书店，1983：80.

到近现代的湖湘思想家一直保持着探讨宇宙大本大原的传统与热情。

楚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另一个不同是楚人崇巫，楚地巫风盛行，源远流长，这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汉代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①]有学者认为北方文化以龙为图腾，是一种日神文化；南方文化以凤为图腾，是一种酒神文化。巫术活动中强烈的情感宣泄以及对鬼神世界的大胆想象，具有自由浪漫的精神特质，较少循规蹈矩的拘束与自封，而多创造的激情和不拘礼法的独立精神，对湖湘学术思想特质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 王逸．楚辞章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17.

勇武爱国是楚文化的另一个古老的传统。林语堂在他的《吾国吾民》中认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湖南人'勇武耐劳苦"，具有"可喜之特性"。"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②]其实，楚人尚武，"劲悍决烈"并非天性使然，而是与楚民族在求生存和发展中的艰难历程分不开的。楚国偏处南方蛮荒之地，若不图强，势必为它国所灭。《左传》中记楚灵王时右尹子革的话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因此，楚人尚武，其精神内核是爱国。这种勇武爱国的精神在楚地深入人心，使楚人即使身处逆境也不至于一蹶不振。这种精神对湘人治学有一种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湖湘学术思想中始终绵延着一种勇武之气，一种爱国之情。

② 二十四史·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232.

楚国地处南方蛮荒之地，立国时是只有五十里弹丸之地的小国，受到周王朝及其中原各诸侯大国的轻视。在完全遵循丛林原则，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时期，如果不另辟蹊径，走出一条独特的强国之路，楚国被人吞并的结果是不难预料的。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楚人干脆以蛮夷自居，苦心经营，最终发展成为兵强势大而"凌轹中国"的泱泱大国。在这种自强不息的历程中，楚人一是靠具有相当民众基础的勇武爱国传统，二是靠独立创新和兼收并蓄的政治和文化策略。这对湖湘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敦颐之所以能成为"道学宗主"，王夫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魏源之所以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代表，无不与楚文化中的独立创新精神与兼收并蓄的传统有关。



二、贬逐官员和流寓学者的影响

湖南在历史上被称为蛮荒之地，交通不便，地瘠民贫，宋以前曾长期作为被逐官员的流放之地。这些因被贬而流寓湖南的官员，大多是人文学者。他们来到湖南大地，一方面深受湘楚地域文化的影响，用一种特殊的心情抒写探索宇宙天道与忠君爱国的篇章，成就了他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带来了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为主要内容的中原文化，成为湖湘文化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被贬官员大多怀抱高洁志操，恪守正道直行，因而不为流俗所容，屡受排斥打击。他们的忧乐情怀，对湖南人忧国忧民、嫉恶向善的性格心理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这些贬官和流寓学者中最著名的是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思想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39—263年。屈原一生历经磨难，但他有着杰出才华、品德高洁并极具政治才能。屈原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所开创的楚辞这种文学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贡献和影响巨大。在他为后世留下的大量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如《天问》、《招魂》、《离骚》、《九歌》等都是在流放湖南时所作，而且这些作品大多是屈原的代表作。屈原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恰如冯友兰所说："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要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立场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立场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①] 的确如此，比如屈原的《天问》既可视为一首想象奇特、气势恢弘的诗歌，又可视为一篇探讨宇宙天道问题的哲学奇文。这篇奇文一连串问了172个问题，从追问宇宙的起源到诘问传统的天命观，反映了屈原试图将人从天命神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尝试。屈原对宇宙天道、天人关系、人的主体精神的重视，对湖湘学术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屈原的一生，其结局是悲剧性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人生过程中对美好理想的向往与追求。这种美好的理想在屈原那里既表现为内美，也表现为外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所谓内美是指人格上的自我完善和道德上的修

①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35.

养，所谓外美是希望通过坚持不懈的上下求索而通达于外在之美，并进而通过实现美政来拯救实已岌岌可危的楚国。宋以后湖湘学术思想特别注重内圣外王的贯通，既有儒家思想的影响，又有屈原思想的浸润。正是屈原对美有着不懈的追求，有着超出常人的审美意识，才成就了他的爱国精神，自从屈原在湖南汨罗沉渊赴死之后，这种爱国精神就在湖湘大地上奔腾不息，成为湘人爱国的精神源泉。

贾谊是西汉初年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史记》中之所以将他与屈原合并立传，是因为在司马迁看来，贾谊与屈原有着相似的抱负、才华和遭遇。屈原和贾谊和湖湘大地的思想文化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故而湖南、长沙被称为“屈贾之乡”。公元前 177 年，年轻的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并在长沙度过了 4 年的时光，后人一般称他为“贾长沙”。来到长沙的贾谊深受屈原那种为理想而献身的执著精神和忠君爱国高尚情操的感染，虽身处逆境，仍然关心国事，积极进言献策。他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注重“势”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在湖南，贾谊受到楚地思想家喜言性与天道的影响，热衷于对宇宙本体作形而上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贾谊所言的“道”兼具了形上与形下的双重特点，而且，以“道”开其端，落脚点却是儒家的。不难看出，贾谊思想中有融合儒、道的努力。这一特点对湖湘学术特质的形成很有影响。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唐贞元年间，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湖南度过了十年的时光。柳宗元的《天说》、《天对》等主要著作是在湖南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根据屈原的《天问》专门作的《天对》，试图回答屈原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疑问，提出了宇宙是由运动着的元气构成的、“天人不相预”等一系列重要的观点。柳宗元对天人关系的追根溯源，包含着对天人之道的更加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对宋代思想家构建新的理性主义天人观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对湖湘思想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刘禹锡也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和柳宗元同时被贬为朗州司马，在湖南生活了十年左右。这期间他受柳宗元《天对》的启发完成了《天论》三篇。刘禹锡对宇宙天道的解释比柳宗元更为理性，更为深刻，也更具特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在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湖



湘学者。

三、湖湘学术思想的肇始

周敦颐的出现，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同时也标志着湖湘学术思想开始形成自己的传统和独特形态。《宋元学案》是这样评价他的："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倡。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规范，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①] 正因为如此，从《宋史》开始就肯定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到后来被推到"道学宗主"的地位。与此同时作为学术成就卓越、第一个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湖南人，周敦颐也象征着具有独特形态的湖湘学术思想的兴起。此后湖南一跃而为理学重镇，被学者们称为理学之邦、荆蛮邹鲁、潇湘洙泗。

① 《宋元学案》，卷一，《濂溪学案》。

周敦颐的著作不多，今见有《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以及少许诗文，篇幅都很小，但影响极大。周敦颐的思想学说是融合儒释道的结晶，但基调仍然是传统的儒学。周敦颐出入释老的目的，是丰富和发展儒学的思想体系，开拓儒学的新境界，最终促进儒学的全面复兴，回归到原有的正统地位，取得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具体来讲，周敦颐有三个方面的开拓性贡献：一是以太极立人极，建立了一个太极阴阳化生人与万物的宇宙本体论模式；二是乾元立诚，以诚论性的性命之学；三是提升了儒学的思辨水平。这三个方面在中国学术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为以后的宋明理学确定了论域，而且确定了论题。学界认为，宋明理学中的主要范畴都能在周敦颐的著作中找到源头，堪称宋明理学的"观念库"。

周敦颐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唐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思想文化的演变密切相关。两宋之时，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首先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深层融合、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有机结合提供新的契机。其次是儒学地域化的出现，为新的学术思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汉代儒学的鼎盛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刺激下出现的，而且它是通过国家控制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太学来研究和传播的，这就从



本质上决定了汉代儒学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到了宋代，一大批有志于重振儒家价值信仰、重建儒家知识谱系的学者或聚集于不同学院，授经讲学，或结庐钻研，潜心著述，形成了以书院为中心的、师承私淑相济的、具有各自学术传统和思想特色的地域化儒学派，周敦颐的濂学及其后出现的湖湘学派就是其中的代表，这是一种分散的儒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文化发展到两宋之时，面临着来自佛道两家的严峻挑战。自唐代韩愈到宋代的胡瑗、孙复、石介等一大批思想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他们一直未能形成新的哲学理论，一直未能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道德哲学的本体论依据问题。这一时代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宋代思想家身上，因缘际会，湖南人周敦颐成了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第一人。

周敦颐之后，湖湘地区涌现出许多文化名人，并迅速形成了理学上的重要流派——湖湘学派。对此，南宋后期的理学家真德秀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统，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诐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自熙宁后，此学废绝，公书一出，大义复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馨欬者甚众，故人才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1]

由此可见在宋代，理学已大盛于湖南，而且形成了有独特内涵的理学型学术文化。这一独特内涵与特质在湖湘学派那里得到了集中体现。“湖湘学派”是指南宋时期与朱熹的“闽学”，陆象山的“江西之学”，吕祖谦的“婺学”大致同时代的，以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为代表的，在湖南地区产生和传承的一个主张“体用合一”、内圣与外王并重的理学学派。湖湘学派以其博洽通变的学者群体、独具特色的学术主张、鲜明的精神人格而广受关注。

湖湘学派是一个由诸多学者组合的学者群体，《宋元学案》中有传的就有数十人之多。湖湘学派的开创者是胡安国。南宋

① 真德秀．真西山集（卷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06．



绍兴年间，他退出官场，隐居在湖南湘潭、衡山一带，创办书堂，授徒讲学，并完成了代表著作《春秋传》。湖湘学派中学术成就最高、并且完成了湖湘学派理论体系建构的是胡安国季子胡宏，其主要著作有《知言》、《五峰集》、《皇王大纪》等。把湖湘学派发扬光大的是胡宏的学生张栻。张栻确立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要求"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斯民"，使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大本营，成为全国理学思潮发展的重要基地。张栻的重要学术著作《论语解》、《孟子说》、《南轩易说》，丰富并发展了胡宏奠基的思想体系。一时间，"登门墙承謦欬者甚众"，著名学者吴猎、彭龟年、游九功、游九言、胡大时等纷纷求学于此。朱熹游宦湖南，与张栻等湖湘学者交流辩难，对湖湘学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批学者之所以被视为同一学派，除了地域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旨趣和学术追求。归纳起来，这种共同的学术旨趣与学术追求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性为宇宙本体，提出了性本论的理学体系。南宋理学阵营内部主要有朱熹的理本论一派和陆九渊的心本论一派，这两派以"理"或"心"作为宇宙本体。以"理"为宇宙本体，侧重从客体意义上解释儒家伦理，将儒家伦理上升为天理。以"心"为宇宙本体，则侧重从主体意义上解释儒家伦理，强调儒家伦理发自于主观内在的本心。湖湘学派的本体论与此不同，主张以性为宇宙本体。胡宏说："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1]在宋明理学的范畴中，"性"是连接天、人的中介，既有客体意义，又有主体意义。因此，湖湘学派主张性本论，实质上是从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或者说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来建立宇宙本体论。湖湘学派的这一本体论建构既是对湘楚文化古老观念的创新，又奠定了湖湘学术思想的本质特征。

第二，以形而上与形而下为一体的存在论。湖湘学派虽然也像理本论和心本论者那样，把世界作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区分，以形而上的性、太极、道作为宇宙本体。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是一体的，是不能分离的。胡宏说："性外无物，物外无性。"[2]张栻也说："道不离形，特形而上者也，器异于道，以形而下者也。"[3]湖湘学派坚持形而上和形而下一体不分的存在论，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特色。

第三，坚持"体用合一"、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内圣

① 胡宏．胡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328～333.

② 胡宏．胡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6.

③ 张栻《南轩易说》，卷10.

与外王并重的学风。湖湘学派虽然也是一个理学学派，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热心讨论性与天道而流于空谈，没有因为强调心性之学而弱化经世致用，没有因为追求内圣品格而忽视外王事功，也没有因为急于事功而放弃内圣修炼，而是注重体用合一，力倡有体有用之学，力求保持内圣与外王、道学与政治的统一。正因为如此，湖湘学者对割裂体用关系、不究实用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胡宏指出："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辩？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①] 又说："天理人欲一句，使人之所以保身、保家、保国、保天下之道。而后知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亹亹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者，多矣。"[②] 湖湘学派这种"体用合一"思想，要求把内圣追求与外王事功有机结合起来。这既是以性为宇宙的本体，坚持道器一体的理论主张的逻辑结果，又对湖湘士风与学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① 《宋史·胡安国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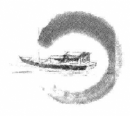
② 胡宏.胡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124.

四、王夫之在湖湘学术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王夫之是中国古代思想和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湖湘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古代湖湘学术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关键人物。他早年为抗清救亡而颠沛流离，"随地托迹"，中年以后隐居治学，潜心著述，留下了一百多种、四百余卷、八百多万字的著作。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广泛涉及哲学、史学、文学、政治、自然科学等多个方面。谭嗣同曾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③] 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悲愿与创新意识，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致力于对中国文化作一全面系统的反思。王夫之治学的初衷在于希望总结出明王朝灭亡的教训，继而进入到全面系统批判总结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他认为要总结教训，匡正时弊，最主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宋明以来思想文化界的崇无蹈虚倾向，使被宋明理学玄虚化的形而上之道重新回归到具体的真实的现实世界中来。由此可见，王夫之思想的最大特点在崇实黜虚。

③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

首先，王夫之批判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的思想，明确提出"道器一体"的宇宙本体论。一方面，强调器物世界、阴阳之气是构造宇宙天地的实体存在；另一方面又强调"道"作为中华



民族的精神依托的重要性。"乾坤并建而捷立"，宇宙虚实同构。由于王夫之的"道器一体"是建立在"诚"的基础之上，这就不仅使"道"具有"实有"即客观实在性的理论基础，同时亦使"天道"作为宇宙法则和人文法则，显示出客观必然性的特点。

其次，王夫之提出了人性"日生日成"的思想，并以此来建构他的人性论思想体系。王夫之认为，人是一种自然存在，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这一见解，突破了传统的片面以人的社会道德属性或是片面以人的自然物质属性为人性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将人性视为与"习"相结合的建构过程，把人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不会自动发生，必须依赖于主体的"存诚"功夫。王夫之说："诚以实心行实理之谓。"[1]由此，王夫之为了在知行观上突出人道之诚，又提出了"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等重要命题，强调了"行"在人性形成方面的重要作用和突出地位。王夫之以他的人性论为基础，又明确重倡了传统的"夷夏之辩"、"人禽之辩"、"君子小人之辩"等观念，使其学术思想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再次，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全新历史观。王夫之认识到"理"与"势"的统一是探索历史规律性的关键。他认为，"理"不是像有些宋明理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某种超越于历史进程之外的道德理念，而是在历史进程的趋势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规律和历史法则。因而，"势"与"理"是统一的。

最后，王夫之提出了"两端一致"的基本方法论原则。王夫之为学，出入于儒释道之间，但主要继承和发展了易学传统，能"守正道以屏邪说"。在王夫之看来，《易》之道真实地体现了宇宙本真的时间性和生命性。他将宇宙活动看成是循"乾坤并建而捷立"而展开的，阴阳变合，当下生成，适时呈现。由此，王夫之认为，乾坤本一体，分一为二，有一体之两用；合二为一，由二而见一，即两端而一致。世上事物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归根结底，其生存变化都根源于自身的矛盾。

作为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王夫之无疑也是湖湘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上承南宋湖湘学派，下启近代湖湘学术思想与士风，既传承了湖湘学术思想的诸多传统，又对近代湖湘学术思想的转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春

① 王船山《四书训义》卷4.

秋大义，严格夷夏、人禽之防和君子小人之辩，力主经世致用的政治社会思想，弘扬湖湘学术中深厚久远的民族主义精神；二是传承和弘扬以“体用一如”、“心性互释”为特点的湖湘学术精神；三是强调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与浩然独往、不囿于陈见的创新精神相结合的学风。可以说，王夫之使湖湘学术传统向着更有哲理深度和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对近代湖湘学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湖南近代出现的理学经世派、湘军儒将集团、维新派、革命派等人才群体，大都十分推崇王夫之，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从曾国藩、郭嵩焘、王闿运、杨昌济等人的日记中都可以看出，《船山遗书》是他们的案头必备之书，邓显鹤因搜集整理“船山遗书”而号称“湘学复兴导师”，谭嗣同则以“私淑船山”自称。

五、湖湘学术思想的近代转型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始，是中国文化从此走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调适、融合的艰难历程。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折中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综合创新等整合中西文化冲突的价值选择模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些模式中均可见到湖湘学人的身影。当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湖湘士人凭借一以贯之的道的关怀与经世致用贯通、内圣与外王并重的传统浸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独树一帜，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晚晴湖湘经世派与魏源的经世思想

在湖湘学人看来，清代由盛转衰是因空疏无用的学风造成的，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应当推行能经邦济世的实学，使研究学问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结合起来。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汤鹏、邓显鹤、唐鉴、刘蓉等是这批学人的先驱，被后人称为“晚晴湖湘经世派”，也是近代湖湘出现的第一个人才群体。

晚清湖湘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是魏源。魏源是近代最重要的今文经学大师之一，有《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老子本义》等大量著作传世。同时，魏源作为陶澍、贺长龄的幕僚，



长期参与二人的经世实践，成效卓著。这样，他一身兼二任，既是底蕴深厚的经世理论家，又是杰出的经世实践家。自他以后，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品格可以视为近现代湖湘士人的突出特征，曾国藩、毛泽东也是其中代表。魏源把立言和立功视为经世的两条基本途径。立言包括立他人之言，立自己之言及立人我结合之言三类。立他人之言指的是将他人蕴涵经世理论，总结历史教训的著述编辑成书，用以指导时人的经世实践，如《皇朝经世文编》、《元史新编》、《明代食兵二录》等。立人我结合之言是在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经世文论，如《海国图志》等。立己之言是指撰文著书阐明自己学术与治道一致的经世之学。作为一位对现实充满忧患意识的学者，魏源一直被认为是晚清时期“好作经济谈”、“喜以经术作政论”的经世之士。然而，魏源一切经世之学，治世之术，都建立在“天地万物自道出”的思想观念之上。而作为一位天道论的坚定信仰者，魏源又是一位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近代思想家。他批判了“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①]的状况，将学术思想界已分裂的道、学、术重新统一起来，从而使形上之道落到经世致用的现实历史活动中。他甚至认为：“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②]正因为如此，魏源才合乎逻辑地喊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时代最强音。

① 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23.

② 同上，第5页．

（二）湘军之兴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

湘军兴起，对晚清湖南社会乃至整个中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军之兴，乃是湖湘理学的产物。湖湘理学是一种经世理学，注重把理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把心性修养与躬行实践结合起来，故少有流于空疏无用或荒诞不经的流弊。咸丰年间，以曾国藩为中心的一批湖南理学经世派士人为维护纲常名教、挽救危局、中兴清王朝，实现经邦济世的宏愿而特起乡间，建立湘军，倡导洋务。湘军人物的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改革政治的经世之志，既是嘉道之际湖湘经世学风的自然延续，更是湖湘学术长期追求弘道与经世相统一的逻辑结果。这些人物除了曾国藩之外，还有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刘蓉、罗泽南、彭玉麟、江忠源等。

作为湘军首领和代表，曾国藩的经世理学，集中体现了湘军人物集团的学术旨趣。综观曾国藩的经世理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推崇义理之学。以卫道士的立场，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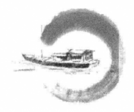
复儒家之道在思想文化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弘扬儒家之道的宋儒之学、义理之学作为一切学术、思想、文化的根本。他之所以被视为最后一个理学家，根据正在于此。第二，强调“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曾国藩有一个著名的学术主张：“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①] “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他强调儒家义理之学应该落实于形而下的器用之中，义理必须和考据、辞章、经济之学统一起来，才能使儒家之道不至于成为空疏无用的义理，而是成为现实世界的真正主宰。第三，调和宋汉之争。曾国藩反对将汉学和宋学对立起来，互相排斥，互相攻击。他主张辩证地对待汉宋的优长与不足，而不宜画地为牢，强调“礼不考据不明，学非心得不成”，对于身、家、国三者，都应详核而求其是，其意义在于以考据为方法，达到义理的境界，最后折中于礼，使汉宋矛盾得以消除。第四，礼学经世。曾国藩一贯重视研治礼学，认为礼为国家大政，礼俗教化之大本，主张实行礼治，推行礼教。他以“礼”合“理”，协调汉宋，把礼学与经世之学结合在一起，既维持和发展了理学讲求义理的传统，又发掘和拓展了理学经世、讲求事功的一面。这是曾国藩对理学和经世之学的一个重要贡献。第五，荷道以躬。曾国藩是一位“承朱子而务为实学”的理学家，他秉承理学的实学真精神，“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而是将毕生精力放在躬行实践上。他一生的功业都与这种务实力行的作风密切相关。

①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442.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对湖湘士子的心理与学风所产生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走出书斋，以乡贤前辈为榜样，去创造经邦济世的奇迹，以天下为己任，成为湖湘士人的一种标志。谭嗣同的“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黄兴的自小“便萌发力求新知与救亡图存之志趣”，毛泽东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无一不体现了湖南士子经邦治国的理想与信念。这无疑是湖湘学术传统和湘军以来的士林风气濡染和熏陶的结果。

（三）维新运动与谭嗣同的《仁学》

19世纪末叶，中华民族陷入深重危机之中，康有为等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湖南一改过去闭塞守旧的面目，成为维新运动时期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涌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易鼐、樊锥、毕永年等一大批朝气勃发的维新志士，他们一起



在三湘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兴办实业，创办报刊，建立新式学堂，设立政治团体，从而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①]尹飞舟指出：“如果说是康有为赋予了维新运动的理论设计的话，那么真正赋予维新运动以实践意义的则是湖南维新运动，它最具体地展示了维新派的思想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历史图景。”[②]之所以如此，与湖湘深厚而独特的学术传统是密不可分的。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促使湖南维新运动表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质，以政治伦理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旨趣促使湖南维新志士的思想表现出常以政治为中心的特点，强烈的民族主义传统促使湖湘维新思潮带有鲜明的激进色彩，“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传统使湖南维新人士更多独立创造性，谭嗣同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谭嗣同作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不仅积极参与变法维新实践，而且兼采中西，熔炼古今，大胆构想，综合创新，构造出较为系统的仁学哲学体系。尽管它带有不中不西或即中即西的色彩，并存在着杂芜、矛盾的现象，但他所采取的综合创新的思想方法至今仍不失借鉴意义。仁是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一个中心范畴，它主宰了中国人的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心理结构。谭嗣同的《仁学》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儒家仁学的优秀成分，一方面借用西方资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和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对它进行改造创新，使之具有近代内涵。这种内涵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宇宙本体论层面规定仁，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③]二是从人性论层面规定仁，认为人与人之间“本无对待”,“爱无差”等；三是从认识论层面规定仁，认为“仁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④]四是从政治伦理层面规定仁。谭嗣同在思想上的最大成就是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重新解释儒家“仁”，从而有力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一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313.

② 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9.

③《谭嗣同全集》，第292页．

④ 同上．



湖湘教育成就

湖南历来以尊师重教著称于世，崇尚“耕读为本，孝友传家”。湖湘教育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早期的申叔时。申叔时是楚庄王、楚共王时期的大夫，《国语》、《左传》均记载了他的教育思想。其中，《国语》中的《申叔时论傅太子》是一篇关于教育的专论，比我国的老子、孔子、屈原，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外著名教育家的论述分别早一到三个世纪。[①]

① 张学军. 湖南教育大事记[M]. 长沙：岳麓书社，2002：6.

一、古代湖湘官办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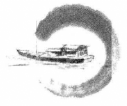
据资料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王室教育和贵族教育制度，庶民的“分业而教”也比较兴盛，并出现了申叔时、屈宜臼、屈固、屈原等教育家。《管子·大匡》论述春秋各国教育的特点时说：“楚国之教，巧文以利。”[②]但没有其他资料表明，这种教育延及了更大的范围。

② 同上.

到了汉代，官学已经开始出现。汉代的官学分中央和地方两种。东汉时期，桂阳郡（今郴州）是湖南地区教育最为发达之地，出了不少儒学人才。如桂阳人刘常，被称为“当世名儒”。临武人张熹，汉灵帝（168—189）时以甲科任平与令。三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没有留下有关学校教育的记载。进入两晋以后，相传西晋名将陶侃任武冈县令时曾建有学校，但由于荆湘地区相继发生了张昌、杜弢领导的流民起义，学校教育受到冲击。正如东晋湘州刺史甘卓所云：湘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③]

③ 同上.

南北朝时期，湖湘官办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有资料



记载，南朝齐梁时，文献王萧嶷、安成王萧秀先后在湖南任职。萧嶷曾为武陵内史、荆州刺史，为了改变当时局势萧条、民生“散亡”的局面，他下令立学校，设学官，置生员，大力发展教育。据《南齐书·豫章文献王》记载：“于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上表言状。置生员四十人，取旧族父祖位正佐台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补之，置儒林参军一人、文学祭酒一人、劝学从事二人，行释菜大礼。”萧秀都督荆湘等九州军事，下令立学校，招引文士，教授人才。

隋唐时期，湖南虽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历经了农民大起义和王朝的更替，但所受战乱的影响比较小，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建立，极大地刺激了士人求学的热情，因而也促进了各种形式教育的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湖南教育在旧有的基础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据嘉庆本《湖南通志·学宫》记载，唐代建有永州府学、道州府学、衡山县学、江华县学、宁远县学、耒阳县学等。同时，唐代湖南作为流放之地，大学者大诗人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李白、杜甫、韩愈、元结等人被贬或流寓至湘，文采风流，广为沾溉，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发展。

宋朝建立的最初八十余年里，官学没有多大发展。但从宋仁宗开始，朝廷诏令普遍设立各级地方官学，恢复和发展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学校教育体系。宋代的湖南教育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学校设立较为普遍。湖南 12 个州府中有 11 个建有学校，59 县中有 31 县建有县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地方官员十分重视教育，如周敦颐、吴中夏、朱熹、真德秀、汪之信、魏了翁等；三是教育与湖南学术研究相得益彰。元符二年(1099)，朝廷将王安石提倡的“三舍法”推行到各地。所谓“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学生通过考试可以逐舍上升。湖南由此形成了“潭州三学”的升级体制。所谓“潭州三学”，即州学生月试后分高者可升入长沙湘西学院，湘西学院生徒分高者可升入岳麓书院。

元世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他即帝位后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尊崇和提倡理学，采取了任命学官、设置学校、划拨学田、遴选教师等一系列措施。在重视中央官学的同时，还大力恢复和发展地方学校，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以儒学教育为主体的官学教育体系，它们分别为路学、州学和县学。到元天历年间，湖南共有天临（今长沙）、衡州、永州、道州、宝庆（今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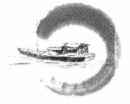
阳)、郴州、常德、桂阳、武冈等路学 9 所，达到了当时路治的 65%；有澧州、茶陵 2 所州学，且三分之二的直隶州办有学校，大多数县设有县学。

明代官学鼎盛，湖南各州、县无不设学。根据明朝地方府、州、县、司、卫的行政体例，明成化年间，湖南的各级学校分别为：所设长沙府、衡州府、永州府、宝庆府、岳州府、常德府、辰州府等 7 个府治，全部设立了府学；在所设立的澧州（属岳州府）、茶陵（属长沙府）、桂阳（属衡州府）、沅州（属辰州府）、武冈（属宝庆府）、道州（永州府）、靖州（直隶布政司）、郴州（直隶布政司）等全部 8 个州治中，也都开办了州学；还有长沙、善化、湘阴、浏阳等 59 所县学；以及 22 所司、卫学校。达到了“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1] 的局面，教育的普及程度超过历代。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通过科举考取进士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自洪武十八年（1385）到崇祯十六年（1643），湖南各地共有进士 564 人。明代官学的教学内容以理学为主，教材主要是传统儒家经典以及《御制大诰》以及《性理大全》等。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在湖南各学校得到传播。

社学作为对城镇官学的补充，是设在乡镇地区的一种最基本的地方官学。湖南各地举办了大量社学，如明嘉靖二年，宁乡知县胡明善分别在通济桥、白鹤观、道林、麻山、黄材、乾江洞建有社学 6 所。

清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使得清代官学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清朝的地方行政分为省、道、府（直隶州、厅)、县（散州、散厅）四级。到清朝末年，湖南置 9 府、4 直隶州、5 直隶厅、64 县、3 散州、1 散厅，共 86 个行政单位。学校的数量分别是：府学 9 所、州学 11 所、散州学 7 所、厅学 4 所、县学 62 所。计有各类学校 86 所，除个别地方的学校与治所不相对应外，官办学校基本覆盖了湖南全省。而且，各级学校的管理制度也比明代更为规范。此外，在清代，不仅历来文教发达的湘中地区，就连向来偏远落后的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也建立了社学，如靖州、龙阳县亦建有社学。清代湖南官吏非常重视教育，各级学校的管理更加规范，办学经费更有保障。教学内容以理学为主，注重德行修养和行为陶冶的结合。

[1]《明史·选举志》。



二、古代湖湘私立教育

从远古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时期，湖南教育都处于原始状态，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尚未从生产劳动和生活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分化出来，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施教人员和固定的施教场所。教育的内容虽非常广泛，但十分简单，凡是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经验、知识、技能、品德、习俗、信仰等都成为教育的内容。教育手段、方法则主要是口耳相传和行为示范，教育具有全民性和平等性，即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接受同等的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稳定社会和经济发展，实行分业施教的庶民教育制度。教育的目的是为使庶民“不败其业”、“不迁其业”。教育内容以职业技术为主，也包括专业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当时楚国的农业生产、铜铁冶铸和制造、漆器和竹木制造、琉璃制造等均已相当发达，其有关的技术、规程必然纳入教育范畴。此时的教育大多属于私人行为。《孟子》载：战国著名农学家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①]孔子则更是私立教育的先行与典范。但此时的这种教育形式规模小、影响也不大、受教育者也不多。

① 《孟子·滕文公上》。

秦统一天下后，禁止私学，要求以吏为师，规定民间所藏诗书及百家经书，都要送到官府烧掉，有敢谈论诗书者弃市。

到了汉代，学校已经有了官学和私学之分。中央政府在兴立官学时，也倡导和鼓励个人开办私学。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等条件局限，私学还很不发达。在其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各种形式的私立教育都受到抑制。

隋唐时期，私立教育得到发展。与官学相比，隋朝的私学具有形式多样灵活实用的特点，私学中有规模较大的学馆，学生人数可达数百。一般的则规模较小，学生人数几人乃至数十人不等。至于家中长老自授子弟的家学则更为普遍。而据《湖南通志·人物志》的记载，唐代湖南应该有大量私学存在。当时的不少文人骚客，或出自私学，或自学成才。

宋代的私学有小学、乡学、义学、武学等多种类型。如天禧年间（1017—1021），湘阴人邓咸创义学于邑南，训诲弟子；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临武县令胡纯在乡里兴办了义

学和乡学，并立规约、明教导，择有行艺者教其诗书礼乐；道州设有濂溪小学，专门用以教授周姓子弟；湖南有的州还设有武学，教授学生学习武艺，并学习文化知识。由于私学一般都设在乡间，便于贫民子弟求学问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不足，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元代私学发达，不仅乡儒、富绅及宗祠创办私学，连政府和许多地方官员也捐资兴办私学，特别是为一些无钱读书的穷苦百姓子弟提供义学教育。也正因如此，元代的私学一般层次较低，教学内容多以识字、学算及伦理道德为主。与官学相比，私学的办学经费主要依靠捐助。如史载：李璋，新宁人，元至元年间为平江州史，捐献15万贯并膏腴田四百余亩，“助赡学校”；陈经东，“邑中迁学，多所资助”；曾圭，衡山人，世业儒学，为零陵县尉。慕唐颜真卿、元结风节文采，命其子捐家资建浯溪书院祀之，又割私田三百余亩，以廪学者。[1]

① 张学军．湖南教育大事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2：41.

明代重视义学和私塾，明太祖朱元璋“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遵守”。私塾一般以宗族为单位，教授本族子弟；义学则以本地孤寒儿童为主。私学的教师主要为离官归乡或告老还乡者，以及博学多才、不愿进仕者。由于明代湖南官学比较兴盛，私学总体上相对较弱。教学的内容除按规定必修《御制大诰》外，以《易》学为主，还传授农业生产知识。

清代的湖南私学主要有民办义学和一般的私学。与明代不同的是，经费除主要由乡绅和宗族通过捐田、捐银、捐房、集资等方式募集外，经常性开支的费用由政府列项开支，许多学校还置有数量不等的学田。如柯弼，襄平人，康熙中知永州府，在修建学宫的同时建立义学；张信，浔阳人，康熙中知岳州府，设置义学；阎璋，广宁人，康熙中知靖州府，创设义学；刘荣，诸城人，康熙中知长沙县，暇即至义学，与诸生论文，严立课程，亲为甲乙；蒋擢，大兴人，康熙中知浏阳县，创修义学，置田以资膏火；王国梁，崦县人，康熙中知湘乡县，设置义学；赵尺壁，临县人，康熙中知安化县，建立义学，置田以资膏火；葛亮臣，商丘人，康熙中知衡山县，设义馆，二月两课，给饮食笔札，文风益振，增童子试至千余人；伊起莘，平阳人，康熙初知祁阳县，创义学；陈云种，锦县人，康熙中知东安县，建立义学；陈启元，汲县人，康熙中知邵阳县，创义学；万萧裕，汉军镶白旗人，康熙中知桃源县，设置义学，等等。清代



湖南的私学很普遍，有家塾、村馆、门馆三种。嘉庆以后，湖南显宦、富户无不设家塾以教授子弟；各村落市井，无不设馆育童；一般知识分子和丁忧、罢黜在乡的官吏，无不开设门馆。因此，受教育的对象很广泛，教学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这一现象对湖南近现代人才蔚起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古代湖湘书院教育

（一）湖湘书院概况

书院起源于隋唐时期，最早是朝廷收藏、校勘图书的地方。后来受到官宦、商贾的仿效，设立私人书院作为个人读书治学之地。唐代湖南有此类书院六所：衡州石鼓书院、衡山南岳书院、韦宙书院、卢藩书院、耒阳杜陵书院、澧州文山书院。[①]由于唐末五代的社会动荡，官学衰落，许多年轻学子求学无门，便纷纷聚集到书院求学问教，书院便逐渐成为教书育人的主要场所。到南宋时期，书院数量已达数百所之多，尤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为最多，分别为 223 所、63 所、125 所和 56 所。[②]湖南的书院广泛分布于长沙、湘潭、醴陵、宁乡、湘乡、茶陵、衡山、安仁、常宁、宁远、道州、平江、靖州、澧州、临武等地，而以长沙、衡山、醴陵、平江、茶陵等地最多。其中，最为著名的书院有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和衡阳石鼓书院。元代以后，湖湘书院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据史载，又有长沙乔江书院、长沙东冈书院、浏阳南台书院、湘潭碧泉书院、益阳庆洲书院、攸县凤山书院、茶陵紫微书院、茶陵东山书院、祁阳浯溪书院、武冈儒林书院、澧州学殖书院、澧州道溪书院、慈利聚奎书院、安福（今大庸市）道溪书院、永定天门书院（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南岳邺侯书院、湘乡涟滨书院、衡山南岳书院、安仁清溪书院、道州濂溪书院、常德沅阳书院、兴宁（今资兴市）观澜书院、龙阳（汉寿）龙津书院、宁乡莱山书院等得到新建和重修。按照《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的统计，从唐五代到宋、元、明、清，湖南书院的数量分别为 8、70、21、102、276 所，居全国前列。

①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57．

② 李国钧．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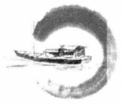
（二）有代表性的书院

1. 长沙岳麓书院

长沙岳麓书院因位于长沙城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岳麓山下而得名，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 976），时任潭州太守的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书院占地两万五千多平方米，初创时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布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住宿的地方。书院定制为六十余人，规模最多时达数百人；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先哲贤达周式、张栻、朱熹、陈傅良、王阳明、高世泰、王文清等先后在此讲学。书院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在教学方面，坚持“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上，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等精神，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青睐。宋代曾出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盛况，清代则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说法，并被誉为“潇湘洙泗”。公元 1015 年，宋真宗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亲书“岳麓书院”匾额；公元 1687 年清康熙皇帝御赐“学达性天”匾额；公元 1744 年清乾隆皇帝又赐“道南正脉”匾额。使得岳麓书院的声誉和影响不断提高，也造就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被《宋史》称为“一时之英才”的吴猎；抗金名将赵方；立志于“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夫之；被称之为“千国良臣”的两江总督陶澍；最早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被称为“中兴将相”并首倡洋务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长佑；中国近代第一任大使、著名外交家郭嵩焘；倡导维新变法的刚烈之士唐才常；北洋政府第一任总理熊希龄；以及杨昌济、范源濂、程潜、蔡锷、蔡和森、谢觉哉、邓中夏、黎锦熙、陈天华等，皆曾求学于岳麓书院。

2. 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衡阳市城北蒸、湘、耒三水汇聚的石鼓山上。迄今约有一千两百年的历史，原为唐代秀才李宽的读书之所，宋代李士真在此遗址上建立书院，并于 1035 年得宋仁宗赐“石鼓书院”匾额，是我国宋代四大书院之一。书院三面临水，四面凭虚，山上绿树成荫，亭台掩映，颇有宁静自我、独处闲适之趣，是读书休闲的好地方，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流连。朱熹、



张栻、蔡汝楠、胡宏等名流大家都曾在此讲学，也培育出了王居仁、龚梦锡、彭玉麟、王夫之、夏明翰等众多济世之材。

（三）湖湘书院教育的特色

湖湘书院教育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对湖南的教育发展和湖湘思想文化的发展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宋代以后，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和儒学地域化的出现，书院在地方教育和学术文化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作为地方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基地，形成了一种书院传承的模式。

一是倡导“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湖湘学派在形成之初，就强烈反对为学“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亹亹可听，临事茫然”的“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这一学风在书院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如果说湖湘文化有其独特的精神与魅力，或者说“湖湘人士”具有勤奋务实、敢为人先的优秀品质，也就在于秉承了经世致用与知行合一的文化气质与行为特征。因为，在湖湘文化凝练聚成的过程中，在学术领域和教育系统基本上以程朱理学为正宗，且绝大多数人都奉程朱理学为“心经”而“不敢改错”的背景下，唯有湖湘学人敢于“变通”，敢于求新。

二是主张自由开放，兼容并包。湖湘学派虽然独有建树，自成一体，但却从不囿于成见，排斥异己。相反，它采取全面的开放政策，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言论同时存在，并相互论争，从中吸取精华，抛弃陋见。湖湘书院教育亦秉持这一治学原则，重视取人之长。如湖湘学派先后同朱子学派、陆王学派及南宋浙东学派等进行学术交流与论争，著名的“朱张会讲”不仅为湖湘学派而且为整个的书院教育提供了先导与借鉴。

三是讲学结合，以学为主。书院教育的教学方法主要采取的是教师串讲、学生提问的课堂问辩形式，注重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因而，教育出来的学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都能独立行事。

四、近现代湖湘教育

进入近现代以后，湖湘人才辈出，出现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与

教育的兴盛密切相关。

（一）近现代中国学制变革与湖湘近现代教育体制的形成

1902年，清政府管学大臣、长沙人张百熙拟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统一的近代学制，史称“壬寅学制”。1903年，又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颁布了由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员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学务纲要》等组成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一系列章程的制定与颁布，不仅标志着中国教育正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

与此相适应，1902年，湖南省学务处正式成立，管辖省城大学堂、武备学堂、农务工艺学堂及各府厅州县之中、小、蒙学堂。学务处的成立，使全省有了统一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教育事业规划，促进了湖南新式教育事业的发展。1915年，全省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统一为劝学所；1921年湖南省政府公布了《湖南全省实施义务教育暂行章程》，规定6—10周岁实施四年义务教育；1922年，全国新学制——“壬戌”学制颁行；次年，湖南各学校渐次实施，使得湖南的教育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备；1928年，湖南省设立教育厅，其职能是管理全省各级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教育学术团体、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及其他教育行政事业，并设立督学视察各县学务。教育厅的设置，进一步提高了教育行政机关的职权和地位，有利于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近现代湖湘学堂教育的发展

1. 高等教育的兴办与发展

湖南的高等教育是从书院改革开始的。甲午战争后，湖南走在全国的前列，在书院增设新学。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它标志着湖南旧式书院向近代学堂的转变。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改为求是书院。1902年，随着清政府近代学制的推行，湖南书院开始全面改制，首先是求是书院改为大学堂，并在学堂中开设地理、中外政治、物理及数学等近代课程。1904年，岳麓书院也改为高等学堂。



两校旋即以岳麓书院为校址，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这就是湖南大学的前身。到辛亥革命时，在省城长沙先后又创设了湖南医学堂、法政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巡警学堂等官办学堂，一些会社、公司及个人也相继设立学堂。如粤汉铁路公司创办了高等铁路学堂；美国雅礼会创办了雅礼大学堂；等等。一时间，学堂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在湖南兴起。

2. 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崛起与兴盛

随着清末教育制度的改革，湖南各府厅州县陆续开办了中小学教育。湖南普通中学的设立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随后，湖南中学教育逐渐发展起来。“自光绪二十八年迄三十年，湖南所属各府，如长沙、宝庆、岳州、常德、衡州、永州、郴州、辰州、沅州、永顺及澧州、桂阳州，次第各设官立中学堂一所；其余各州县，如善化、宁乡、湘潭、新化，光绪二十八年各设立中学堂，是为府县立中学之始”。至宣统元年，全省中学堂已接近五十所，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

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公布了《学校系统令》，规定：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入高小或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入中学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中学四年，毕业后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毕业，预科三年；师范学校本科三年，预科一年；学校分甲乙两种，各三年；专门学校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一年。据统计，全省共有高等小学堂 328 所，学生 18972 人；初等高等合一小学堂 143 所，学生 8156 人；初等小学堂 2174 所，学生 6835 人；女子小学堂 59 所，学生 3607 人；普通中学 29 所，学生 4478 人。此外，全省还有简易识字学校 12 所，学生 200 人；半日学校 8 所，学生 835 人；夜校 6 所，学生 164 人；讲习所 14 所，学生 1489 人。

3. 职业教育的兴起与繁荣

湖南的职业教育发端于 1902 年创办的农务工艺学堂。此后，各种事务学堂先后在湖南兴起。1903 年，梁焕奎创办了路矿高等实业学堂；同年 2 月，禹之谟在长沙创办实业工厂，并附设工业学堂，是湖南技工学校之始；同年 8 月，周震麟、俞蕃同、许椎等在长沙创办修业学堂；熊希龄在芷江创办了务实学堂；是年底，湖南第一所比较正规的实业学堂——农务工艺学堂正式开学，招生 120 名；1905 年，湘乡人李笃真集资开办农学馆；同年，朱剑凡创办周氏家塾师范部，首次培养幼儿教育师资；1906 年熊希龄创办了醴陵瓷业学堂；同年，湖南官立中等农业

学堂在长沙北门外的原农事试验场成立；1908 年，高等实业学堂改为高、中等路矿本科，醴陵瓷业学堂并入，设立窑业科；1909 年，长沙留日学生龙汝翼等开办蚕业学社；等等。到 1912 年时，全省共有各种实业学校 74 所，在校学生 4807 人。实业教育涉及农业、蚕业、工业、商业、林业、矿业、瓷业、护士、工艺等种类。同时，一些非职业学校也相继开设了职业课程，如龙绂瑞设立的第一女学中就开设了裁缝、刺绣、家政等课程。到 1929 年时，湖南的职业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全省拥有职业学校 176 所。



第三节 湖湘文学艺术成就

湖湘文学艺术历史悠久，异彩纷呈。它的最初源头，是古代楚国湖南地区流传的神话传说和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歌舞。汉王逸《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湖湘文学艺术正是在这些"歌乐鼓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远古时代的这一习俗，对湖湘文学艺术的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湖湘诗歌

广义的诗歌包含古体诗、词、曲和白话诗。湖南诗歌史上的最灿烂的篇章是由流寓学者们带来的，包括屈原、贾谊、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柳宗元、李商隐、元结、刘长卿、黄庭坚、秦观、张孝祥、辛弃疾等大诗人。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被放逐湖南期间，"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他辗转于沅湘各地，察民情，睹风俗，结合自身遭遇，感时忧国，创作了大量彪炳千秋的诗篇，



被王国维称为“文学之鼻祖”。屈原的主要代表作《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湘君》、《湘夫人》等都是在流放湖南时期创作的。这些诗作“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表达出鲜明的爱国主义情绪，散发出浓郁的浪漫主义精神，传达出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屈原之所以能形成独特的风格，创设出楚辞这种文学样式，与湖南本土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密不可分。可以说，是湖湘文化催生了屈原的诗歌。

贾谊谪居长沙期间，写下了《吊屈原赋》和《鹏鸟赋》等名篇。前者借对屈原不幸遭遇的悲悼抒发个人郁积，颇有《离骚》的神韵；后者排遣作者心中忧愁，成为汉代散体赋的先声。屈辞贾赋的独特的悲情、悲悯与悲愿格调长时期影响了此后湖湘的诗歌创作。屈贾之后，湖湘诗歌史上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失意诗人。他们在屈贾伤心之地辗转流离，伤时悲己，或写景咏物，或吊古抒怀，或怀友惜别，或关注民瘼，留下了一段段诗坛佳话，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李白的《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五首》，杜甫的《登岳阳楼》、《江南逢李龟年》、《岁晏行》，韩愈的《湘中》、《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刘禹锡的《望洞庭》、《采菱行》，柳宗元的《江雪》，王昌龄的《送魏二》、《送柴侍御》，李商隐的《楚宫》，元结的《春陵行》，辛弃疾的《贺新郎·柳暗凌波路》，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等，都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唐以前湖南本土诗人寥若晨星，见之史籍的仅有西晋时罗含，魏时桓阶，东晋时车胤、谷俭，南朝时阴铿等十数人。这种状况到中晚唐开始有所改变，湖南本土陆续出现了一些在全国诗坛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如唐代的李群玉、胡曾、曹松、僧齐己和宋代的王以宁、乐雷发等人。李群玉有 263 首诗作、曹松有 138 首诗作、僧齐已有 810 首诗作被收入《全唐诗》。胡曾以咏史诗著称，现有诗作 174 首，多为《三国演义》等讲史小说所引用。进入明代，湖南诗坛出现了湖南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诗派——茶陵诗派。以湖湘著名诗人李东阳为领袖，杨一清、刘大厦、彭泽等为主要成员的茶陵诗派，反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台阁体”诗风，倡导真实自然的诗歌风格。明代后期，湖湘地区出现了几个著名的诗歌世家，如华容孙氏、邵阳车氏、辰溪来氏、长沙黄氏等。这些家族以诗名世，文采风流。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文学领域也卓有建树，有《姜斋诗



集》、《姜斋诗余》、《姜斋诗话》、《楚辞通释》等诗歌作品和诗论著作传世，在古代湖湘诗坛独树一帜。

清代中前期，湖湘诗坛空前活跃，涌现了陈鹏年、张九钺、孙起栋、欧阳辂、唐仲冕、严如熤、周有声、陶澍等一大批负有盛名的诗人。其中尤以陶澍成就最高，诗名最著，他的作品感情深挚，器识宏远，雄放豪迈，有《印心石屋诗文集》传世。清中期以后，湖湘诗坛先后出现过“宋诗派”、“汉魏六朝诗派”和“中晚唐诗派”等在全国有影响的诗派。文学史上常把这些诗派统称为“湖湘派”，列在江左、岭南等其他诗派之前而居首位，认为它“领袖诗坛，庶几无愧”。值得注意的是，湖湘近代诗坛不仅拟古思潮迭起，“大家”辈出，而且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学术主张的关联，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个性鲜明的诗人群体，有以魏源、汤鹏为代表的“经世派”诗人群体，有以何绍基、王闿运、王先谦为代表的学者型诗人群体，有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儒将诗人群体，有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派诗人群体，有以黄兴、宁调元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诗人群体，与近代湖湘学术人才群体、政治人才群体交相辉映。

湖南最早写新诗的是女作家陈衡哲。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于20世纪20年代初发表过《游工人之窟》、《过洞庭》等革命诗歌，并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中提出“做革命诗歌”的主张。在湖南新诗的拓荒者中，以田汉、刘梦苇、朱湘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田汉于1921年出版的《江户之春》，是湖南诗人的第一部新诗集。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刘梦苇与朱湘被誉为新格律诗的双子星座，朱湘还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之一。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湘籍诗人中影响最大的是萧三、吕亮耕、朱子奇和陈辉等人。萧三在留苏十年间，用俄文出版了《拥护苏维埃》、《湘笛集》等六部诗集，被译成多种外文，成为当时蜚声世界诗坛的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回国后，萧三在延安主编《新诗歌》，筹组新诗会，积极推动新诗运动。吕亮耕主持《诗歌周刊》，创办《中国诗艺》月刊，出版了《金筑集》。朱子奇在延安、陈辉在晋察冀创作了大量诗作，为革命圣地和解放区的诗歌园地写下了壮美篇章。

新诗出现后，湖湘诗坛的旧体诗词创作依然活跃。章士钊、程潜、何叔衡、熊瑾玎、刘善泽、刘永济、程千帆、齐白石等



人为现代湖湘的旧体诗词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现代诗坛，以旧诗词赢得崇高声誉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毛泽东酷爱古典诗词，从研习到创作有一个由古风而词，由词而律诗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毛泽东传世的诗词共90首，其中正式公开发表的67首。这些经他亲自审定发表的作品，无一不是精品力作，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把中华传统诗词推向了新的境界，不少作品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堪称湖湘文化中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学珍品。

二、湖湘散文

唐以前，湖南散文作家很少，见诸史籍的不过刘巴、罗含、桓阶、阴铿等几人。和诗歌一样，在湖湘散文史上最先留下传世作品的仍然是唐以后的流寓学者。首先是中唐两度任永州刺史、晚年又守制浯溪的元结，曾留下《右溪记》、《寒亭记》等许多优美的散文。著名的“摩崖三绝”就是摹刻的元结的《大唐中兴颂》一文。元结之后，大文豪柳宗元谪居永州，所作《永州八记》和《捕蛇者说》等散文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名篇。晚唐时，湖南“破天荒”出了第一个进士刘蜕。他能诗能文，尤以散文名于世，在晚唐以笔致古朴独具一格，与当时流行的夸饰造作华丽的文风大异其趣。

宋代是湖湘文化史上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湖湘地域文化，尤其是湖湘地域学术文化形成于这个时代。虽然这个时代的湖湘散文作品不多，但对湖湘文化品格有绝大影响的三篇雄文都出现在这个时代。一篇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篇是周敦颐的《爱莲说》，一篇是张栻的《重修岳麓书院记》。元代欧阳玄，以文名世，号称“一代宗师”，其文廉静深醇，如《墨梅赋》、《竹西亭记》等名篇佳构。

明初刘三吾善文，在洪武朝典司文章中自成一格，有《坦斋先生文集》传世。明代“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公安派”主将江盈科，除诗歌外，散文也很有影响。李东阳的论疏碑铭、书序记传真切自然而又文辞简洁，于平淡中见功力，典雅中见流畅。江盈科写过许多杰出的小品文，在湖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收在《谐史》、《雪涛谈丛》、《谈言》、《雪涛小说》等文集中，包括幽默小品、笔记小品、寓言等多种



文体。其中一些寓言故事，就是与世界寓言大师的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序记、尺牍之类的作品也颇有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姜斋诗话》，这部随笔式诗论著作，亦可作为美文来读。

清代陶澍有《陶文毅公集》，其文多为序记碑铭之作，行文疏朗畅达而有气势。邓显鹤在湖湘文化史上有着独特贡献。他致力于搜集湖湘文献，以搜集刊刻“船山遗书”而号称“湘学复兴导师”，编成《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等书，本人也有《南村草堂文集》传世。

近代湖湘散文，与近代湖湘诗歌的思潮流派大体一致。有以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散文，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派——湘乡派散文，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散文，以陈天华为代表的革命派散文。魏源与龚自珍一起开创了古文创作“以经世作政论”的文风。他的《古微堂集》中的许多篇章都写得慷慨激昂，气势磅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曾国藩是后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并成为桐城派的分支湘乡派的领袖；郭嵩焘、李元度、王闿运、吴敏树是这一派别中的重要人物。其中以王闿运吴敏树成就最高。王闿运是湖湘著名学者，其《湘绮楼诗文集》在湖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吴敏树的散文取多家之长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如《书谢御史》、《群中三诗人传》、《移兰记》等都是湖湘散文中不可多得的名篇。

维新志士谭嗣同著有《寥天一阁文集》。他先学桐城派古文，继学魏晋文章，后学梁启超的“新报章文体”。其文议论纵横，境界辽阔，对后世湖湘散文的创作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

毛泽东无疑是湖湘现代散文圣手，他也是湖南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写作的人。从《女子革命军》等大量杂文，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纪念白求恩》、《反对党八股》、《愚公移山》、《将革命进行到底》、《别了，司徒雷登》等政论文，既具有战斗的思想锋芒，雄辩的逻辑力量，又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文笔活泼，堪称现代中国议论散文的典范之作。

现代湖南散文作家辈出，廖沫沙、陈子展、魏猛克、严怪愚等的杂文，陈衡哲、田汉、易君左、向培良、胡之翼、叶紫、舒新城、黎烈文、沈从文、钱歌川、丁玲等的叙事、抒情散文，都独步一时。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社会变迁与风土人情，钱歌川笔下的大江南北，丁玲笔下的陕北风情与解放区的阳光，无不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谢冰莹出版于1927年的《从军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记述大革命的报告文学。此后，她还创作了《在火线上》、《新从军日记》等多部报告文学作品，与周立波的《战地日记》、《南下记》、丁玲的《一二九师与晋察冀边区》等一同成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作品的扛鼎之作。

三、湖湘小说

晚清以前的湖湘文学史上，小说创作寥若晨星。查《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中的湘人作品，仅有宋人戴植的《鼠璞》，明人邓球的《闲适剧谈》、江盈科的《雪涛四小书》、韩朝维的《晴窗缀语》，清人江有溶、邹统鲁的《明逸篇》、黎士宏的《仁恕堂笔记》等。

清末，湖湘小说创作日益多了起来。1903年出版了一部署"汉国厌世者"著的《洗耻记》，这本小说由日本印刷、湖南苦学社发行。随之出现了陈天华连载于《民报》的《狮子吼》。章士钊在辛亥革命前后创作了《双枰记》、《游侠外传》等文言小说。鸳鸯蝴蝶派成员何海鸣著有《十丈京城》等十余部长篇文言章回小说和多部短篇文言小说。南社成员张冥飞著有《剑客传》、《十五度春秋》等十几种长篇文言章回体小说。日本留学归来的向恺然（平江不肖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通俗小说作家。他创作的十多部长篇章回小说，主要有两个系列：一是写留学生的小说，如《留东外史》、《留东新史》等；二是武侠小说，有《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等。

湖湘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小说家陈衡哲，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小雨点》。继她之后，从"五四"到1949年，出现了三十多个湘籍小说家，出版作品两百种。

中国现代文坛思潮涌动，流派迭起，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翼作家联盟等等风起云涌，各领风骚，并形成了"问题小说"、"主观抒情小说"、"乡土小说"、"革命小说"等思潮流派。敏感的湖南作家拥抱现实，投入时代潮流，创作出了许多优秀小说作品。属于"问题小说"作家的孙俍工有《生命的伤痕》、《海的渴慕者》等作品；属于"人生派"作家的向培良有《缥缈的梦》等作品，黎烈文有《舟中》等作品；属于"乡土小说"

作家的彭家煌有《怂恿》、《平淡的事》等作品，黎锦明有《烈火》、《雹》等作品；属于“浪漫派”的作家刘梦苇有《青年的花》等作品，刘大杰有《黄鹤楼头》等作品，胡云翼有《西泠桥畔》等作品。

同样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作、后来赢得了国际声誉的湘籍小说家中，成就最大的应数沈从文和丁玲。沈从文素有“多产作家”、“文体作家”、“乡土作家”之称。在他的几十种小说中，有《萧萧》、《边城》、《长河》等取材于湘西现实生活的作品，有《龙朱》、《神巫之爱》等取材于湘西少数民族民俗的作品，有《顾问官》、《会明》等写湘西土著军队的作品。沈从文写湘西人文、风景、风俗和民性，感情深挚，笔触细腻，反映了湘西社会的历史和人心的变迁。

丁玲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以《孟轲》、《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文坛。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巨大变革，奠定了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张天翼的小说以描写市民生活见长，如《包氏父子》，《华威先生》。蒋牧良的小说多表现农民的苦难与抗争，如《高定祥》。叶紫的小说以描写大革命时期洞庭湖畔的生活见长，如《丰收》。周立波、康濯、柯蓝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作家，他们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力求通俗化。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等都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名作。

四、湖湘民间文学

壮丽的山川景物、悠久的历史文化、聚居的多民族、革命的发源地，这四个方面的特点使湖湘大地成为神话、故事、寓言、传统、笑话、歌谣的渊薮，民间文学丰富多彩，摇曳多姿。

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全省各地都有。我国古代的神话人物，如盘古、女娲、神农、黄帝、祝融、精卫、尧、舜和大禹等人物的事迹，在湖湘地区都有生动的传述。这些生动的传述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性。湘东一带多流传有关舜帝的传说，湘中一带多流传祝融的传说，湘北一带多流传湘妃、龙女、吕洞宾、屈原的传说，湘西一带多流传蚩尤的传说，等等。



除了这些关于神话人物的传说之外，三湘四水还广泛流传着丰富多彩的与湖湘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是人们的口头创作，是一种“口述的历史”。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往往经过人们的虚构、夸张、渲染、幻化等艺术加工，实际上已成为某种社会力量、人类理想以至宗教意识的投射，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民间意识，如广泛流传的关于孟姜女、柳毅、杨幺、杜甫、太平天国等人物与事件的传说。

湖湘地区山水奇特，民俗多样，有关湖湘风物的传说也就千姿百态，如关于洞庭、君山、南岳、九嶷山等山川名胜的传说，关于贴春联、燃爆竹、包粽子、划龙船、赏秋月、吃月饼等风俗民情的传说，关于长沙湘绣、浏阳菊花石、浏阳烟花、醴陵瓷器、益阳水竹凉席等的传说，是人们企图通过把自然物历史化、人格化，使它们成为寄托和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愿望的载体。湖湘地区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湖湘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多色彩的生活情趣。

湖南近现代社会人才辈出，事件迭起，成为人们创作民间故事传说的重要内容。人们围绕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谭嗣同、唐才常、黄兴、熊希龄、宋教仁、杨昌济、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物，湘军、秋收起义等事件创造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

湖南是我国聚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之一。流传于各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歌、民间故事和叙事体长诗，是湖湘民间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巴人发展而来的土家族是湖南境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土家族流传下来的古代神话谱系完整、想象奇特，独具魅力，内容包括人类起源、自然探索、洪水和射日，以及族源神话和民族生活神话等。土家族神话往往是神话、传说、故事融为一体，而且通常以歌谣的形式出现。因此，土家族文学的主体形式是歌谣。长篇叙事歌、短小抒情歌丰富多样。摆手歌、梯玛歌、锣鼓歌、哭嫁歌是其代表。

由“盘瓠蛮”发展演变而来的苗族，围绕“龙”的神话、传说、故事很多。苗族民间文学中，以歌谣最有特色，风俗歌、古歌、反歌、情歌、儿歌、史诗等应有尽有。最有代表性的长达五千多行的史诗《休巴休玛》和《女神金沙》，古歌《开天立地》和《果聂》，反歌《吴八月》等。

瑶族的长篇叙事古歌《盘王大歌》，共两千多行，内容包括

人类、民族的起源，天地万物的形成，民族始祖的艰辛创业等。歌中盘王“龙犬”有着斑斓的传奇色彩和深邃的寓意。此外，瑶族有“耍歌堂”和“坐歌堂”习俗，其歌谣内容极为丰富，分为序歌、情歌、对歌、赞歌、劝歌、排歌、谢歌和送歌。

由古百越发展而来的侗族，有“诗的家乡，歌的海洋”之称，口头文学十分丰富，有浩如烟海的侗歌“嘎”，古老的神话传说“暖”，想象丰富的创世史诗“垒”，古老的仪式舞蹈“耶词”，规范族人的侗理“款辞”，美丽的童话故事“君”，饱含哲理的谚语格言“垒必虽”等。朗诵体歌诗“款辞”和成套的情人歌也极具特色。情人歌是抒情长歌，计有《情人初》、《情人新》、《情人旧》、《情人浓》、《情人放》、《情人病》、《情人远》、《情人分》、《情人十八》等。

五、湖湘戏剧文学

相较于其他文学样式，湖南戏剧文学较为晚出。直到明朝时，湖南才出现了第一位杂剧作家许潮，他所创作的杂剧合集《泰和集》是湖南戏剧史上的第一部戏剧文学作品。随后，明代另一位湘籍传奇作家龙膺，创作了《蓝桥记》和《金门记》两种传奇。

清代，湖南的戏剧作家和作品逐渐多了起来，代表作家与作品有黄周星的传奇《人天乐》、杂剧《惜花报》和戏曲论著《制曲枝语》，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张九钺的杂剧《四弦词》、传奇《六如亭》，在湖南昆腔史上颇有影响；王夫之有著名杂剧《龙舟会》；张声阶有《琴别》、《画隐》等九种。

湖南近代戏剧史上最重要的戏剧作家是杨恩寿，他的戏剧理论与创作在我国古典戏曲发展后期有较大影响。他创作的《姽婳封》、《桂枝香》等传奇颇有影响。他的戏曲论著《词余丛话》及《续词余丛话》对戏曲的起源、地位、作用、创作规则提出了独到见解。清末，湖湘戏剧中比较重要的传奇作品还有曾广传的《惠兰芳》、黄其恕的《坤灵扇》、夏大观的《陆判记》、陈时泌的《非熊梦》和《武陵春》等。

湖南现代戏剧一方面承传明清以来戏曲创作传统，一方面开展以话剧为主的新剧创作。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是戏剧大师欧阳予倩和田汉。欧阳予倩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京剧改革的先行者。他创作的话剧《不要忘了》、《青纱帐里》、《桃花扇》等，京剧《孔雀东南飞》、《渔夫恨》等，桂剧《木兰从军》、《梁红玉》等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都很有影响。

田汉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传统戏曲改革的先驱。他创办了"南国社"和"南国艺术学院"，致力于戏剧创作和戏曲改革。他的代表作有话剧《咖啡店之一夜》、《月光曲》、《丽人行》等，歌剧《扬子江的风暴》、电影剧本《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等。湖湘现代戏剧文学的重要成果，还有白薇的诗剧《琳丽》、袁昌英的话剧《孔雀东南飞》、向培良的剧作集《沉闷的戏剧》等。

六、湖湘表演艺术

广义的表演艺术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木偶、皮影、杂技、曲艺、电影等多个门类。作为原始宗教乐舞盛行、多民族聚集的湖湘地区，表演艺术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

湖湘自古就有以"歌乐鼓舞"娱神的传统，这种既充满神秘色彩又颇具艺术意味的宗教乐舞，对湖湘文化心理和艺术风格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戏剧，包括传统戏曲和现代戏剧，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在艺术领域占有主要地位。湖湘戏剧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剧种多，声腔盛，有"戏剧大省"之称。湖湘传统戏曲，分为地方大戏和民间小戏两类，拥有众多的剧种。地方大戏主要有湘剧、祁剧、衡阳湘剧、辰河戏、武陵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等。湖南地方大戏受明以后逐渐传入湖南的弋阳腔、青阳腔、昆腔和弹腔的影响，融合湖南地方语言和音乐的特点，形成了湖南高、昆、弹相结合的基本声腔。湖南民间小戏大都是在民间歌舞、傩戏、百戏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有花鼓戏、花灯戏、阳戏、傩堂戏等。

湖南现代戏剧主要包括话剧和歌剧。话剧在湖南多称"文明戏"。欧阳予倩组织"春柳社"和"文社"，把话剧艺术带入湖南。"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时期是湖南话剧演出的两个最活跃的时期。著名音乐家黎锦晖是中国歌剧的创始人之一，并在20世纪30年代初将歌剧带入湖南。他的儿童歌剧代表作《麻雀

与小孩》、《小小画家》等一度风靡全国。

湖南的音乐舞蹈资源非常丰富繁多。湖南出土的楚、汉文物中，有许多惟妙惟肖的彩色乐俑和歌舞俑，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湖南“歌乐鼓舞”的记载。隋唐时的潭州是全国著名的乐舞之地，大型歌舞《拓枝舞》、《双妓舞》等风行一时，给人以湖南“俗尚弦歌”的印象。与此同时，湖南汉民族中的插秧歌、采茶歌、采莲曲、船歌、夜歌子等十分流行。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舞蹈则更为繁多，桑植民歌，嘉乐民歌，苗族猴儿鼓和吹木叶，瑶族盘王歌和长鼓舞，侗族琵琶歌和芦笙舞，土家族薅草锣鼓和摆手舞等，都是深受各族人民喜爱的艺术形式。

湖南俗称“木偶戏”为“木脑壳戏”。木偶是湖湘巫、傩举行宗教活动必不可少的道具，这决定了湖南民间对木偶戏的热情。“皮影戏”在湖南俗称“灯戏”或“影子戏”，辛亥革命以后独盛，长沙皮影艺人沈葆生还曾成立皮影改良研究社。

湖南曲艺品种繁多，特色鲜明，主要包括流行于长沙等地的弹词，流行于常德等地的丝弦，流行于祁阳等地的小调，流行于衡阳等地的渔鼓，等等。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曾作《愚鼓词》二十七首。

七、湖湘造型艺术

广义的造型艺术，涵盖书法、绘画、篆刻、雕刻、工艺美术等多个门类。湖湘造型艺术源远流长。论书法篆刻，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论绘画，可以追溯到漆器和帛画。论工艺美术，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的湘绣、陶器、石雕等。

湖湘书法在唐代即已出现了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和怀素等大家。欧氏父子的书法诸体皆精，尤擅楷书，书法史上合称“大小欧阳体”，欧阳询还与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合称中国古代“楷书四大家”。释怀素是继张旭之后又一位杰出的狂草书法家，二人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很大。

宋代湖南书法家有希白、刘次庄、易元吉、武洞清、何澄、释梦英、周敦颐等人。希白擅长写大型行草，临摹古帖也最能传神，他临摹的“淳化阁帖”和“潭帖”，成为后世诸多字帖的祖本。元代湖南书法家有欧阳玄、冯子振等人。明代是湖南书



法艺术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李冬阳、杨一清、刘三吾、刘大夏、夏元吉、何孟春、谢宇等一大批书法家。清代湖南书艺鼎盛，书家众多。据徐鑫龄《湖南书画篆刻家汇传》统计，有名的书法家近千人。清前期有王夫之、释法智、陶汝鼐、黄周星、王岱、陈鹏年、易祖栻、罗源汉、易文基、陶澍等大书法家。中后期则有何绍基、曾国藩、左宗棠、黄自元、徐树铭、李元度、郭嵩焘、罗饶典、王先谦、瞿鸿沄等大家。其中尤以何绍基堪称一代大师，诸体均工，尤以隶、行最为出色。黄自元擅长楷书，自成“黄体”，被誉为“字圣”，他所临写的《九成宫醴泉铭》、《间架结构帖》，至今仍是青少年临摹的范本。

湖南书法到民国时期，自由风气大开，创新意识日隆，各种流派日益活跃，出现了彭汉怀、郑家溉、谭延闿、谭泽闿、熊希龄、杨度、曾熙等书法大家。在现当代湖湘书坛上，毛泽东卓然成为一代大家。他在创造性地学习“二王”和怀素诸大家的基础上，形成峭拔遒劲、豪放矫健而又洒脱多姿、翩翩有神的“毛体”，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

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众多的帛画、漆棺画和各类器物纹饰，表明湖湘绘画艺术具有悠久的传统。湖南唐宋时期的大书法家，多能作画。其中宋代的易元吉、明代的车大聘、释石谿，清代僧寄尘，清代何绍业，现代齐白石等均可称为一代大师。领一代风骚的湖湘书画艺术大师齐白石，工花鸟鱼虫，笔酣墨饱，力健有锋，形成一种明快自然的独特风格。

湖南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久负盛名，是湖湘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湘绣、铜官陶器、桃源石雕，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岳州瓷器、界牌瓷器、临武龙须草席，有几百年历史的益阳竹器、邵阳翻簧竹刻、浏阳菊花石、岳州扇、望城剪纸、隆回滩头年画，土家、苗、侗、瑶等少数民族的织锦、蜡染等。





第四节 湖湘科技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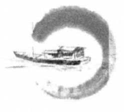
湖湘区域尽管地处内陆、久历蛮荒，但其文明的开发与发展，与中国其他区域相比，丝毫也不逊色。据可考的资料表明，天文学、医学、传统农业、采矿冶炼技术及其他科学技术，很早就在湖湘地区萌芽并得以发展。

一、湖湘天文学

根据长沙县南托乡三兴村、岳阳市君山古岩画等考古发现，在新石器以前，湖南就有了关于星相的知识和经验。到春秋战国时，屈原的《天问》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天文的问题。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五星占》与《天文气象杂占》则具体地描述了金星、木星和土星的位置、动态等情况，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但是，从汉到明的长时期内，湖湘的天文学成果除了在民间得到传播外，并无理论上的建树。直到清代，湖湘的天文学研究才得到彻底改观，先后有巴陵人许伯政的《全史日至源流》、长沙黄渌的《浑天仪象法》、湘阴蒋国的《天文约旨》、湘阴黎光秘的《星宗格要》、石门吴象庆的《天官书纂》、清泉（今衡南）谭学元的《推历指掌》和《星曜增考》等，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天文学研究的内容，对我国天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湖湘医学

湖湘历代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医学成果。在马王堆出土文物



中，有一件医学珍品，叫《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介绍了283个古医方和医疗方法，计有103个疾病名称、247种药物名称，内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等，其中将近半数药物名称不见于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还有若干药名为历代文献所未见，被著名的中医文献专家马继兴教授和著名的考古学家李学勤教授称为“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东汉后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湖湘医学有了标志性成就。《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叫张机，字仲景，南郡涅阳（今河南镇平县）人，早年随祖父学医，东汉灵帝时举孝廉，建安（196—220）年间任长沙太守。时值湖湘区域疫病横行，尤以伤寒为甚，张机于是一边治病救人，一边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行世，治疗效果显著，受到世人称颂。到了宋代，湖湘医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湘乡人朱佐的《类编集验医方》、衡阳人宋永寿的《产经》、南宋都梁（今武冈）人镏洪的《伤寒心要》。其中，《类编集验医方》共有15卷，收集了内、外、妇、儿、养生各科的处方近九百个，均为行之有效的方剂，具有非常实用的价值，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在元代，湖湘医学的成就主要是衡阳人曾世荣的《活幼心书》（3卷）、《活幼口议》（20卷）二书，不仅获得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而且还远播日本等国。明代的医学成就主要有道州人许希周的《药性粗评》（4卷）、邵阳人徐良的《济生产宝》（2卷）、邵阳人滕弘的《神农本草经会通》。其中，徐良的《济生产宝》为妇产科专著，被收入《湖湘名医典籍·妇科卷》；滕弘的《神农本草经会通》被收入《湖湘名医典籍精华》，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外，在明代医学成就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沅陵人易山。易山精于外科，医术高超，往往能做到手到病除，时人有再世华佗之称。清代是湖湘医学的盛极时期，名医名著不胜枚举，仅2003年出版的《湖南省志·著述志》列有作者和著述的就有数十人，其中不乏妙手神医，如邵阳人周学霆，因年弱多病，便放弃科举，一心一意攻医学，行医五十余年，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被誉为“今之扁鹊公”，并著有《三指禅》、《外科便览》、《医学百论》、《医学案》等专著；攸县人朱二，医术高超，善于望诊治病，传说其邻里有一女病人，病情严重，诊断为伤寒，但治疗效果总不见好。朱二从她窗外经过，遥望病人后，确诊为密痘症，对症服药，病很快就好了；武陵人丁用元，擅长治疗痘症，同乡何某的独子因痘“死亡”，棺木抬至途中，恰遇丁



用元。丁问明情况后，认为还有救治希望，便开棺为“死者”治疗。仅用艾三丸，灸百合穴，很快便使“死者”复活，世人“惊以为神”。

三、湖湘农耕

湖湘农耕历史悠久，早在一万两千年以前，湖南道县便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原始农业。从商代出土的器具来看，湖湘农业主要使用石制农具，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平原地区种植水稻，丘陵山地则种植小米（粟）。秦汉时期，铁制农具已开始广泛使用。隋唐时期，湖湘地区已经有了为农业生产而兴修的水利工程。两宋时期，湖湘地区的耕地面积得到极大拓展，新农具如曲辕犁、筒车（水车）已经推广使用，粮食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至明代，仅华容县一地，垦田即达数万顷，修筑堤垸一百余处，因此，当时流行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清以后，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种植水平的提高，以及水利灌溉条件的改善等，湖湘地区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和“天下粮仓”。今日湘人袁隆平更是苦心孤诣，历尽艰辛，培育出杂交水稻，被国际社会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泽被全球，享誉世界。

四、湖湘采矿和冶炼

湖南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金、银、铜、铁、铅、锌、锑、锰、水银、煤炭等矿产的藏量都很丰富，开采和冶炼的历史也很悠久。据考古发现，在湖南西部地区的沅麻盆地，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矿业的开采和冶炼，在辰溪、麻阳两县交界处的九曲湾发现了14处古矿井，并有大量木器、铁器和陶器出土。湖湘矿冶业在汉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据史籍记载，汉武帝时，在湖南的桂阳郡（治所在今郴县）设有铁官，不仅表明铁器已经取代青铜器，而且表明湖南已经有了专业的冶铁场所。魏晋南北朝时期，湖湘地区已开始采掘和冶炼金、银，据《水经注·资水》记载，益阳县“水南十里有井数百口，浅者四五尺，或三五丈，深者亦不测其深。古老相传，昔人以杖撞地辄便成



井。或支古人采金沙处”。两汉时期还未见以金、银器陪葬，但到魏晋南北朝时，以金、银器陪葬的现象已经出现，并逐渐多了起来。在长沙发掘的27座晋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耳环、金手镯、金花形饰等。至宋代，湖湘的矿冶业已相当发达，金、银、铜、铁、锡、铅等矿都已具规模，产量惊人，如浏阳的永兴场，1074年的产银量为1.6673万两，到1078年时，产量已经达到2.8757万两，总增长率为72.5%，年均增长18%。又如郴州的雷溪锡场，额定年产量为1389斤，但在1078年产量却达到1.0964万斤。到了元代，湖湘的矿业开采与冶炼全面展开，如湖湘地区的沅、潭、衡、武冈、宝庆、永、常宁、道州等都有铁矿场；而岳、澧、沅、靖、辰、潭、武冈、宝庆等都有金矿场；以及桂阳、潭州产铅，辰、沅、靖等地产锡等；从益阳八字哨乡关王村出土的元代金银器来看，造型优美，制作精细，是极好的艺术珍品。明代因为朝廷禁止采矿，矿业开采能力和冶炼技术都有很大降低。清代实行开放矿冶业的政策，允许民间开采冶炼，湖湘地区的矿冶业得以复苏并迅速发展。



第四章

湖南人的精神特质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一种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一定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发展和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形态所包含的独具个性的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方面的总和。湖湘文化作为一种获得广泛认可的地域文化，有其相对固定的地域文化形态和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而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又必然拥有中华文化的共同特征。总结湖南人的精神特征，关键在于分析、整理出最能反映其地域独有的东西，尤其是通过本区域人群中的精英所表现出来的带有共性的基本精神。我们认为，湖南人的精神特质主要包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兼收并蓄的博采精神，百折不挠的霸蛮精神，慷慨赴义的牺牲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第一节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在古代，湖南处于荒蛮之地，条件十分艰苦，养成了民众吃苦耐劳的性格。尧舜时代的三苗，在部族首领的带领下，不畏艰辛，不避苦难，经过数百年的迁徙流转，与各种自然灾害和艰苦环境进行顽强斗争，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正是这种艰苦的自然条件，奠定了湖南人自强不息、面对恶劣的自然社会环境从不屈服的奋斗精神。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湖湘文化具有"独立不羁，坚忍不息"的特殊品格。钱基博先生曾说："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艰苦，故强。"历史业已证明，历代湖湘学者和志士仁人，都有一种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精神。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壮怀，千百年来始终萦绕在湖湘精英的心头。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子弟孕育并积淀着湖湘文化的精神。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胡宏父子看到宋室半壁江山风雨飘摇，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社会危机丛生，"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国忧君之心，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①]他们心忧天下，期望以自强不息的品格，通过变革图强来收复中原，保国安民。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当清兵南下之际，他亦力主抗清，并曾亲自举兵狙击清兵于衡山，失败后"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隐匿湘西山区，砥砺气节，含辛茹苦，埋头著书四十年，确实做到了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则不为世所颠倒而可与立矣"。左宗棠在幼年时代就刻苦读书，"稍长，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他一生研求"中国自强之策"，"日夜思所以自强"。年近古稀，仍"舆榇以行"，远征新疆，誓与沙俄侵略者血战到底。谭嗣同迎

① 儒林传五·胡安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295.

难而上，一往无前，为维新变法而赴汤蹈火。他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进愈阻，永无止息。然反而观之，向使不进，乃并此阻而不可得。是阻者进之验，弊者治之效也。"他认为，社会就是在不断地克服各种阻力和弊端中获得前进的。

近代以来，湖湘精英慨然"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前赴后继，登上历史舞台，使三湘四水的仁人志士得以彪炳千秋。梁启超曾深有感触地说："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①]

1840年，英国人凭借其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打破了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华民族至此进入了多灾多难的年头。面对西方列强，中国的少数士绅阶级主张模仿西方技艺，发起了洋务运动与自强运动。但在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后，这部分人认识到，不仅西方人技艺胜我一筹，文化制度、政治制度也同样较中国先进。在这一思潮下，许多湖南人以开放的眼界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积极倡导并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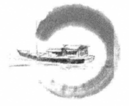
1897年，在湖南总督陈宝箴的支持下，湖南建立了时务学堂，成为湖南新政的一个核心机关。此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又在陈宝箴的支持下创办南学会、《湘报》和浏阳群萌学会。陈宝箴、黄遵宪等人还在湖南推行兴办矿业、电报、轮船，仿造西方警察制度创办保卫局，开办新式学堂等其他一些改革，使得新政渐具规模。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私立学府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开展解放了湖南人的思想，激发了湖南青年才俊投身到救国的实践中去。

曾国藩是自强运动的实际倡导者。为了民族的自强，他模仿西洋的军事技艺，特创设江南制造局；为了使军事技艺在中国生根，特主张派遣幼童出洋攻读学艺。他认为"师夷制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②]当时西方列强夸耀他们的船坚炮利，曾氏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我们也有了同样的东西，洋人便就无所夸耀，也是没有了侵略别国的资本。他在奏折中说道："凡恃己之所有，夸人以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①]曾氏的求变卓见于此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66.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70.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471.



可见一斑。他计划“招致智巧洋人”，在湖南常德、澧州设立工厂，制造火柴、铜帽。

湖南历代知识分子这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湖南刚健质朴、吃苦耐劳的民风相结合，使湖南在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咸同军兴”时期，还是戊戌变法时期，不论是自立军运动，还是辛亥革命前的多次革命武装起义，湖南人总是敢于牺牲，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一大批革命家和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所表现的伟大革命气概与英勇献身精神，更是惊天地而泣鬼神，亘古今而塞天地。

特殊的社会环境，养成了湖南人自强不息的品格。这种精神不仅在拯救民族危难，推动近代革命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在今天更加复杂艰巨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仍然起着积极的现实作用，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二节 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而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心忧天下”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先忧后乐”的人文情怀在湖南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自古以来，众多的湖南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心忧天下”，与国家民族休戚相关，这种对祖国、民族和人民极其深厚的感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它是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给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进步以重大影响。

最早在湖湘大地彰显爱国精神的是屈原。他虽不是湖湘本土人士，但他来到湖南后所表现出来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精

神品质则深刻地融入了湖湘文化之中，成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屈原遭谗被逐，心里仍然时刻想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在《离骚》、《哀郢》等作品中反复咏叹，抒发了炽烈的爱国情感和无法排遣的家国之思。“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明知楚国的现实黑暗险恶，自己仍坚持“正道直行”而屡受打击，却始终没有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哪怕在幻想中也不忍离去。当楚国被秦军攻破不久，他幽愤难抑，自沉汨罗江。后世湘人在反抗强暴，匡扶正义，维护祖国利益和尊严的斗争中总是以他为榜样，从他那里获得鼓舞和力量。

湖湘学者多留心治国安民之道，关心国家大事，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认为，治学的着眼点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主要是研究国家治乱、兴亡之道。胡宏总结千百年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极为推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民主张，他认为“养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败亡也”。张栻则进一步强调要得“吾民之心”，关键在于“不尽其力，不伤其财”，关心和维护民众利益。到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的爱国精神集中体现在王夫之身上。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提出“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把那些祸国殃民之辈斥之为“罪人”。王夫之早年也举兵抗清，后兵败返乡，遁迹乡里，陋居山洞。他坚贞的民族气节感人至深，为后人不屈不挠地抗击外敌入侵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王夫之对自己的民族国家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抗清复明的斗争。他的崇高的爱国精神是他全部学术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他后半生一系列著作中，特别是《读通鉴论》和《宋论》中，全面地论述了他的爱国精神。正如他所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他的爱国精神，有很多是别开生面的，在对一系列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评价上，一反以往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王夫之升华、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湖湘文化中的爱国意识。同时，王夫之还提出了“扶长中夏”的口号，对传统的爱国精神做出了创造性的发挥。王夫之的爱国观念已超越了传统的忠君范畴，他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危置于最高地位，并认为，为了国家利益，是完全可以不论忠不忠君的。为此，王夫之提出了“古今之通义”，主张人民的利益大于“一姓之兴亡”。王夫之的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为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学子所继



承，王夫之成为湖湘文化由古代向近代转换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在古代湖湘文化的影响下，近代湖南大地产生了众多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相标榜，表现了“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的强烈政治追求，他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同样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自勉，表现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气魄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张明圆在《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中指出：“湖南人的敏锐警觉性，有救中国当从湖南始之见识。”这种见识在杨度早年写的《湖南少年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杨度吟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将做普鲁士。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救中国必从湖南始”。不同时期，湖南人分别喊出了不同的时代强音，却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湖南人对国家和民族有一种责任感。“湖南人像中国的大儿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长子精神已经灌注到了湖南人的血脉里。”[①]

近代以来，湖南人民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爱国洪流，力挽狂澜，拯救中华民族于将倾，不断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黄兴创建华兴会，而后指挥广州起义，他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们，都是中华民国创建的先驱。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给世人以深刻的警醒。武昌起义的爆发，又是湖南人率先闹起了革命，焦达峰、陈作新等是战斗的先锋，腐朽的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而在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企图独裁称帝时，又是湖南人挺身而出，为中华民国正名。宋教仁面对袁世凯的软硬兼施，毅然南下，组织政党内阁，为中华民国的民主与生存而战。孙中山曾在悼词中这样称道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后，蔡锷打响护国战争，迫使袁世凯退位，从而彻底铲断了封建帝制的根系。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湖南涌现出来的以毛泽东、刘少奇、贺龙、罗荣桓、彭德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将“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将之提升到新的高度。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团组织，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党团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只有五十多名党员，湖南籍的党员就有近三十名。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①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50．

时期，湖南是革命运动最发达的省份，1927年年初湖南有组织的工人已发展到四十万人，1927年6月湖南农会会员已达六百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人数的一半。《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一书列举的495名党史人物中，湖南就有89人，占18%，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48%。在199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将帅中，湖南有73人。湖南在政治、思想、军事和其他领域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湖南与粤闽、江浙、四川一样，成为近代史上对中国全局影响至深至巨的四个地区之一。[①] 这种“救中国自湖南始、济天下自我始”的强烈参政意识，是湖湘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遗传基因。

① 郭辉东．大融合中崛起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源流和特征[J]．湖湘论坛，1996(2)．



第三节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核心，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经世致用”原意为“尽其所学用于治理国家、治理天下”。[②] 经世致用指理论与实践结合以治邦济世，注重实践，讲究务实的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于启动和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经世致用思想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在三千多年前，西周统治者就已意识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明确提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即希望从夏商灭亡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并引以为戒，以避免重蹈前朝的覆辙。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儒家的一种优良学风，更是湖湘文化的突出特征。经世致用传统为南宋湖湘学派奠定，他们自创立之初就反对“儒腐”学风，注重经世务实，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的理想抱负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张“通晓时务”，强调实践，认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从胡宏、张栻等人创立“湖湘学派”起，就主

② 田中阳．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文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0：16．



张不尚空谈，讲求实用，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表现了早期湖湘文化重经世致用的鲜明特点。船山哲学更是“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创立起一个“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使“即事穷理”的实学思潮更加励行于湖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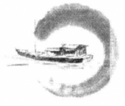
到了近代，魏源以经世致用的眼光，力主扭转那种“不关军国要务，无视民族危亡”、“泥古不切时务”的学风，提出把学术导向干预政治和革故鼎新的轨道。魏源即认为：“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知庖丁之一啜。”他遵循经世致用的原则，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主张，广泛介绍世界各国史地政情，倡学西方先进的科技、军事，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设想了一整套富国强兵的经世方略。自此以后，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等名臣以务实、主动、重行、思变的思想，将经世致用推向新的理论高度。这种思想对于近代湖南的崛起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使近代湖南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使湖湘文化对中国影响非常深刻。

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相联系，历代湖湘学者大都重视实践，提倡力行。早期湖湘学者胡宏就大力提倡“行之行之而又行之”，张栻则提出了“致知力行，互相发也”的思想。王夫之在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辩证知行统一观，对近代湖南学者的知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同样主张“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左宗棠则提出“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经世之学，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地理学，其中包括历史地理。他在道光十九年（1839）尝作《舆地图说》，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条列历代兵事，可惜此书后来散佚。其二是农学。道光二十三年（1843），左氏买田湘阴东乡柳庄。此后几年，他不仅精研近人有关著述，而且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还在湘阴首倡种茶之风。他还以其所得，著之为书，名曰《朴存阅农书》。对此书，他自己颇为得意。在其致友人的信中说：“近人著书，多简择易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仆近阅新书，殆不啻万卷，赏心者不过数种已耳。学问之敝，人才之衰，此可概见。仆近因

农家为人生第一要务，而古近颇少传书，思有所述，以诏农圃。志此者数年矣，因尚未得成，卷帙不过十数篇，精力想尚可及，晤时当详告之，亦人世不可少之书也。”[①] 正是由于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经世之学，所以才奠定了他日后的经世事功。这一时期，湖南学人都是以通经致用、身体力行而著称。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曾对这种现象作过概括。他说："罗泽南、李续宾、王鑫则以醇儒笃躬行"、"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一代名臣，声施四海；王闿运、阎镇珩，老儒暗修，独抱遗经。遭际不同，出处攸异。然学不仅占毕，志在于匡俗；通经欲以致用，文章蕲于经国，则固不同而同"。

①罗正钧：左宗棠年谱[M]. 长沙：岳麓书社，1983：8.

乾嘉时期，湖湘学人在史学研究领域提倡"求真"，即史学家要忠于历史事实，力求如实直书，精于史事的考证。这种把问题弄清楚的精神，实际上就是超然物外、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的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历史变更的进程中，史学研究中"经世致用"的原则逐渐明晰化为社会实践中的实事求是原则。实事求是是湖湘文化务实精神的明显特征。"实事求是"一词源于一千九百多年前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班固褒赞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注"实事求是"四字，谓"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务得事实"，指务必得到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每求真是"，指不断追求事物内在的本质和特点。因此，实事求是的本意是指严谨好学、务求真谛的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在岳麓书院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题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在湖湘文化的传统中，实事求是不仅体现为一种学风，更重要的是，它还与严谨笃实、注重实践的务实精神结合起来，成为湖南人求学问道、经邦济世的自觉追求，这不仅成为湖湘学人的哲学观念，并且成为他们的生活准则。湖湘文化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为了建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和人民解放与富裕而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毛泽东在求学阶段就特别重视"实用之学"、"有用之学"，《讲堂录》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实意做事，真心求学"，"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练达世情皆学问"。为了真正了解社会，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利用假期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



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农民生活，并称之为“读无字书”，用以弥补书本知识之不足。毛泽东曾在《伦理学》一书的批语中写道：“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毛泽东青年时期形成的这种重力行、重践履的学风，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以后，他又提出“认清中国形势，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根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原则。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既是对重力行、重践履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它的超越。1930 年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毛泽东就在党内积极倡导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认为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 为了在党内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1941 年 12 月，他为延安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1945 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对理论联系实际即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同时也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①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474.



第四节　兼收并蓄的博采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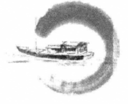
“兼收并蓄”是对湖湘文化开放意识的集中概括。湖南虽然北有大江相阻，其他三方均是群山环绕，号为“四塞之地”，但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东连西进之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各种文化交相汇合、相互激荡之地。湖湘文化在这三湘四水之间撷南北文化之长，促进南北文化相互生发，从而既拥有

中原文化的顽强坚毅和现实价值取向，又有南方文化的灵性飘逸与浪漫激情的双重品性。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能创新。比如屈原，他的诗歌创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和一座高峰，而他最出色的作品则是在湖南完成的，当屈原从江北来到湖湘大地时，面对的是一种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几乎全新的异质地域（民族）文化，他的作品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由此看来，屈原诗歌的伟大成就正是湖湘文化中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沟通融合的成果。又如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他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能开创一个新的学派，与他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分不开的。周敦颐在其思想学术的创建过程中，立足儒学而又大量吸收、融合佛教与道教的思想与理论思维成果，其思想体系从理论构架到范畴和命题，都有对佛道之学的改造与利用。

湖湘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学风特点也是兼收并蓄。岳麓诸儒也往往能够不囿于学派门户之见，择师而从，力求兼取众家之长。如胡宏季子、张栻高徒胡大时在继承家学及师说的基础之上，又求学于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象山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及永熹经制之学的代表人物陈傅良。当时，在岳麓书院讲坛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能够放言高论，传播其学说。朱熹及陈傅良等都曾登岳麓书院讲席，为湖湘士子所拥戴。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也是在集千古之智的基础之上，将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推进到新的高度。王夫之不仅对传统儒学进行了颇为全面的梳理与总结，而且还对佛道之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中吸纳了大量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湖湘文化的博采众长来自多个方面，既有不同民族文化，如上古时代以舜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与三苗文化、先秦时越文化与楚文化以及后来湖南境内汉、苗、瑶、回、土家等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也有湖南内部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以及湖南与其他省区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还有不同学派，如法家、道家、儒家以及佛教与道教、宋学与汉学之间的沟通与融合。甚至还包括与外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明末清初，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传授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这一点，与当时其他一些地域文化之间互相排斥、壁垒森严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了湖湘文化的博采品格。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近现代湖湘文化之所以流光溢彩、绚烂夺目，固然可以从多方面找到原因，但其中一大批优秀的



湖湘士人审时度势，以兼容开放的态度不断地吸纳中外优秀文化成果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近代以来，随着湖湘文化向近代的转型，其兼容会通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救亡图存的人才也不断涌现。在太平天国尚未败亡的1863年，时人已多有看出湖南人能力之强。张集馨在日记中写道："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人，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总体言之，近现代以来湖南涌现了五个主要人才群体：第一个人才群体是以陶澍、魏源等为代表。陶澍、魏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封疆大吏，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都生长于湖南的资江之畔，既有深厚的友谊，又以幕主和僚属的关系长期共事。第二个人才群体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主要代表人物还有郭嵩焘、曾纪泽、彭玉麟等。无论从思想层面的近代意识，还是实践层面的近代趋势，或从人才规模及其凝聚力来看，颇能代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初期人才群体的组成情况。第三个人才群体是以谭嗣同和王先谦为代表。学术分野、政治属性和最终归宿不同的两种文化人曾长期和平共处。谭嗣同为"改良"及君主而献身，激进仍有君国倾向；而王先谦也积极参与湘省小火轮公司近代实业的创建。第四个人才群体是以黄兴为代表，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集团。他们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使近代民生、共和、法制观念，开始成长在湖湘大地上。第五个人才群体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湖湘文化现代化的新时代。他们以全新的中学西学交流模式，带给全中国以翻天覆地的变化。

具体观之，以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湖湘士人，面对传统社会危机四伏、外国殖民主义入侵的局势，试图走出传统的狭小天地，拓宽文化视野。他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超越传统、积极向西方学习，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到了近代，湖湘学人有了接受外来文明的自觉，如"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突破"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为洋务运动作了思想铺垫。曾国藩主张博采众长，曰："故生平于友谊兢兢焉，尝自息虑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来天下之善，

故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度薄善，敬其有裨于吾，未尝不博焉，以自资益。”[①]他将“师夷”的主张付诸实施，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利用出使英、法的便利条件，对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不顾个人毁誉，大力传播西学，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物。维新志士谭嗣同则以“通”显其思想学术宗旨，熔铸古今，萃取中西，全方位地吸纳中国传统的儒、墨、道各学派及佛学、西学的思想，建构了《仁学》思想体系。在其思想体系中，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性海”、“慈悲”及西方近代物理学的“以太”、“电”等概念、范畴是相互沟通的，联融会通的特色表现得相当明显。

①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4717.

值得注意的是，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是湖南人与世界文化体系对接的重要时期，湖南人的足迹遍及日本和欧美各国。20世纪初，湖南人走向世界数量之多、之频繁，不仅为史所罕见，而且成为全国留学人数最多的省份。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3395人，湘籍学生即达373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谭人凤、禹之谟、范源濂、蔡锷、章士钊、杨度、李达、杨树达、林伯渠等人，都先后到日本或留过学或避过难或学过工。杨昌济1903年至1913年曾在日本、英国、德国留学9年。我国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是1914年官费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近代妇女活动家张默君1918年曾遍历欧美各国考察。从1919年到193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者约一千六百人，湖南达346人，是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徐特立、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向警予、李富春、蔡畅、何长工等人，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参加者或组织者。1930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介绍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赴俄学习。[②]

② 郭辉东．大融合中崛起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源流和特征[J]．湖湘论坛，1996(2).

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现代湖湘伟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实践融会贯通，创立了中国革命理论并最终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些无一不是湖湘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精神的最好体现和伟大成果。





第五节　百折不挠的霸蛮精神

钱基博说：湖南“顽石赫土，地质刚强，而民性流于倔强，……周不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川”。[①]杨毓麟说：“湖南，山国也，交通绝不便利。自长江接洞庭而上泝，行浅水汽船者五百里，自秋末迄冬初，率阻浅不得上驶。南隔岭峤，接两粤，皆山险也。其民朴陋贫瘠，而于外事特甚，以排外闻天下，野蛮暴动贻外人口实数数然也，而奴性亦未甚深固。”[②]“倔”、“蛮”便是外界对湘人的普遍评价，在文献中满布诸如“劲直任气”、“好勇尚俭”、“悍直醇朴”[③]等词语，它和朴质、忠勇联系在一起，尚勇、倔强之气贯穿了湖湘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成为流传久远的文化心理。

有人认为，“湖湘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实际上，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强悍”、“不畏艰苦”、“不怕死”、“尚武任侠”等精神风气之外，这个“蛮”字主要指湖南人所具有的独立不羁、不肯调和、不肯轻易服人、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特征。“百折不挠”是湖湘文化作用于文化个体的集中体现。用“百折不挠”来概括湖南人独特的群体性格，是对湖南人这种中国独无仅有的“霸蛮、血性”等特征的提升。

历代湖湘学者和志士仁人，都有一种斗争意志和吃苦耐劳的“霸蛮”精神。“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④]。“长沙子弟”中的零陵人黄盖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行苦肉计成全了火烧赤壁，保障了江东平安，忠义毅勇之心可昭日月。曾国藩一生坚守“硬字诀”。在曾国藩统率下，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于世。左宗棠在幼年时代就刻苦读书，“稍长，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忠勇倔强充塞于各个阶层，较多地保留了先民的活力与悍性，是湖湘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湖南历代知识分子这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湖

① 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M]. 长沙：岳麓书社，1985：1.

② 杨毓麟. 新湖南[J]. 载：湖南历史资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3).

③ 张朋园. 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0：338～339.

④ 陈谷嘉. 岳麓书院名人传[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3.

南刚健质朴、吃苦耐劳的民风相结合，使湖南在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民性民风孕育下，各类引领时代潮流、改变民族命运的人物层出不穷。不论是“咸同军兴”时期，还是戊戌变法时期，不论是自立军运动，还是辛亥革命前的多次革命武装起义，湖南人总能够舍身殉国，前仆后继。

维新运动的首倡者是广东人康有为，而激进派代表谭嗣同、唐才常都是湖南人。1898 年 6 月，光绪皇帝载湉“下诏定国是”，召谭嗣同进京任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事宜。及慈禧发动政变，有人劝谭嗣同逃往日本，谭不从，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他从容就义以后，唐才常继之因组建自立军而殉难。他们无私无畏、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谱写了维新运动的不朽篇章，对辛亥革命和五四时代的革命者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一大批革命家和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所表现的伟大革命气概与英勇献身精神，更是惊天地而泣鬼神，亘古今而塞天地。毛泽东非常重视意志的磨炼，认为“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而“体育之大效”，则“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故其“十分重视锻炼身体，依季节的变化，进行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和体操、拳术等各种体育活动。”认为这些方法，既锻炼身体，也锻炼意志。在长沙时，有段时间他每天到图书馆看书，总是第一个进馆，最后一个离开，中午只在门口买两个烧饼，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功底。蔡和森“每日四时半起”,“冷水浴两次，早起一次，临睡前一次。又于雷风雨烈之时，冒风雨而行，已练习数次毫无风寒之感”。学习特别勤奋，整天手不释卷，“有时宿哮发作，眠食都废，总是坚持抄看下去”。蔡和森到法国后，生活艰苦，却“猛看猛译”，“旧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在极短时间内就过了语音关和文字关。从而了解了世界共产主义大势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任弼时从小有大志，认为“世上无难事，只畏有心人。有心之人，即立志之坚者也，志坚则不畏事之不成”。[①]

随着湖南工农群众运动的空前高涨，湖南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一批又一批地参加了革命队伍，在战斗中茁壮成长。

① 郑涛．论湖湘文化孕育的近代湖南人精神[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1949年建国时，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籍隶湖南者10人。1955年颁定军衔，元帅10人中，湖南籍3人，大将10人中，湖南籍6人，上将57人中，湖南籍19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些出将入相的英豪，正是艰苦斗争中磨炼出来的，体现了湖湘英雄群体一往无前、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湖南人这种百折不挠的品质，既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式的使命感和“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般直冲云霄的豪气，又是湖湘文化筚路蓝缕、奋发图强的深刻写照，是湖湘文化在湖南人身上打下的文化烙印。



第六节　慷慨赴义的牺牲精神

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写道：“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以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底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大问题。OhverShreiner夫人的小说有几句话：‘你见过蝗虫，他们怎么过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永远纪念的价值。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湖南人疾恶如仇，尚义任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好打抱不平，极富反抗精神，湖南人有着勇于追求真理、匡扶正义的大无畏精神，为了寻找救国救民之途，为了追求真善美，上

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一种慷慨赴义的牺牲精神，近代湖南志士以身殉国的事屡见迭出，十分引人注目。明清以来，湖湘文化横空出世，孕育了一大批为追求理想信念而坚忍执著，严守民族气节而舍生取义，战胜困难而刚烈雄健的湖湘精英。

为了收复被俄侵占的边防重镇伊犁，年近七十高龄的左宗棠舆榇出征，收复伊犁，被梁启超誉为“五百年来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湖湘子弟满天山，壮士高唱凯歌还”的气势，足以令世人对湖南人钦佩有加。谭嗣同舍身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劝谭嗣同出逃，谭谢曰：“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其为救国强国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甲辰长沙起义事泄，马福益被捕，临刑前，他慷慨陈词：“我一人杀头，有四万万同胞接踵而起，只要冤仇得报，死而无怨。”20 世纪初的十余年间，蹈海投江以身殉国的湖南人就有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易白沙等人。以陈天华为例，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青年革命宣传家，他的著作最激情洋溢、悲壮感人的正是坚决而彻底的反帝爱国思想，他以血泪斑斑的文字揭露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惨祸，号召人民勇于斗争，奋起反抗，坚信“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之理”。正是基于反帝爱国思想，陈天华认为清政府丧权辱国，已成为“洋人的守土长官”，所以要拒洋人、要爱国，“只有讲革命独立”。与当时一些革命党人从种族观念出发倡言排满革命不同，陈天华是从反帝爱国出发引出要反清革命的结论。正是具有极其强烈的爱国思想，陈天华既由爱国而革命，又由近代湖南人的精神国而自杀。陈天华为警醒同胞力除“放纵卑劣”之迹，以实际行动回答日本报章的蔑视。他是为真诚救国而献身的，蹈海自杀虽然不足为取，但他炽烈的勇于奉献和牺牲精神却可与日月同辉。[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湖南死难烈士数以千万计。中国共产党创立与土地革命时期，湖南英烈如林。例如，出席中共一大的何叔衡，1935 年在突围战斗中牺牲。红军师长陈树湘被敌人逮捕后，自己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牺牲，“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罗亦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还有就义前写下诗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以及毛泽覃、王尔琢、邓中夏、何孟雄、向警予、寻淮洲、杨开慧、陈毅安、段德昌、贺英、曾中生、

① 郑涛. 论湖湘文化孕育的近代湖南人精神[D].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蒋先云、黄公略、蔡申熙、蔡和森等，均为了革命事业英年献身。抗日战争年代，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在日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时壮烈牺牲，是抗日战争中我党牺牲的最高将领。毛泽民被党派往新疆做统战工作时，死于敌人屠刀下。

“为有牺牲多壮志”，在湖南人心中，总是毫无畏惧用鲜血、身躯去换取信仰与自由。以开国元勋贺龙家族为例，贺龙从投身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其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贺龙认为满门宗烈都是为国家献身，那是战争和革命事业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贺龙宗烈舍家纾难、英勇献身。在大革命年代，贺龙的弟弟贺文掌，因参加武装斗争遭敌人逮捕，敌人要贺龙送5万大洋便可放人，但送信人遭到贺龙的一顿怒斥，敌人随即将其年仅15岁的弟弟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贺龙的妹妹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义后，在一次作战中被敌人包围，弹尽粮绝时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时被捕，敌人对年仅30岁的她用尽极刑，她至死都顽强不屈，最后被敌人以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杀害。1927年，贺龙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便开始拉拢他，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但这些诱惑丝毫没有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他脱下皮鞋穿上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开赴南昌举行起义。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起义之后，敌人对贺龙家乡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仅这一次贺氏族人就被残酷杀害八十多人。



第七节 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钱钟书先生曾漫谈道：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

似乎更深远些。与广东、江浙、山东的经济地位相比，湖南可能不值一提，而湖南之所以赫然鼎立于优秀中国人的行列，“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就是其中的重要缘由。正是这种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使得湖湘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而浩然独立，也使得“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

最早注意到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精神，并将它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的，是近代湖南著名的革命家、长沙人杨毓麟。杨毓麟在1903年发表的《新湖南》中，提出“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即“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这种“特别独立之根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

王夫之隐居深山刻苦钻研学术四十年，他的著作藏于深山直到康熙年间才由次子王吾交刊刻了十余种。他大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正统”观，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他在《读通鉴论》一书中，对历史循环论、复古论、宿命论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类文明是向前演进的思想。谭嗣同、唐才常都从船山学说中吸取力量，成为维新运动激进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他把船山学说当作维新运动的理论源泉。后来的辛亥革命志士也大都好读《船山遗书》，从弘扬民族大义出发而走上革命道路。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毛泽东，青年时就在老师杨昌济的启发下研读过船山遗著。建党以后，又以“船山学社”为基地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代新人。

魏源也是湖南人创新精神的典型代表，他最突出的功绩就是提倡向西方学习。魏源在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时，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在于不了解西方情况，没有坚船利炮，于是他广泛收集西方资料，编成《海国图志》，并在此书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魏源认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并明确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正是魏源以“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创新精神，写出了《海国图志》这样“开眼看世界”的不朽名著，全面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则把魏源的主张首次付诸实践，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曾国藩说：“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



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左宗棠一生追求中国的“自强不息”，认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指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促进国“日新而有月异”地发展，赶上并超过西方。谭嗣同更是直接继承和发挥了船山的“日新”哲学，指出：“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

从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到第一次提出要把人才送到国外培养的曾国藩；从首开出使欧洲先声，实地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诸方面成就，并提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郭嵩焘，到第一个喊出“冲决一切罗网”、“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谭嗣同，无一不体现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从陶澍改革盐政、开创海运，到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从黄兴、宋教仁等集会建党，以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亲手创建新中国，无一不闪耀着“敢为人先”创新精神的光辉。

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中国 17 个省的性格特点。他在中国进行了 7 次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早涉足也是接触最频繁的地区是中国的东南部。他对部分省人的性格特点作出了描述和比较，认为湖南省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此地，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是该省居民的精神及性格特征。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认为江西省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江西和广东人一样善于算计，但仅限于做小商人，开杂货店。金融业属于山西人，大商业属广东人，江西人在做小买卖方面才能卓越，他们没有湖南人的那种刚健。湖南与湖北虽然原都属楚国，但湘楚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差异较大，两湖人的性格特点差异也比较大。罗福惠曾撰文比较两湖：湖北与湖南相比，多了一些“灵活”，少了一些“朴实”，多了一些“变易”，少了一些“坚守”。长沙在近代被称为“铁门之城”，既顶住了太平军的进攻，又长期拒绝了西方势力的“开放”要求，直到 1904 年长沙才开埠。而四战之地的武汉难以设防，19 世纪 50 年代太平军三四次出入该城，1861 年武汉又被迫



开埠。湖南在唐鉴、曾国藩的倡导下理学极盛，直到杨昌济仍高举理学大旗，但湖北在鸦片战争前后，即有秦笃辉公开肆力批判理学，自此以后直到熊十力，半个多世纪湖北未见有理学家。近代以来，湖南的士人和知识分子为学“讲大体”，“求大效”，以其识见、勇气和毅力，在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百年左右时间里，造成了性质不同，褒贬不一，但毕竟是轰轰烈烈、令人瞩目的“事功”。从成就这些事功的湖南人士身上，人们不难发现湖湘文化的影响，这就是进取精神和活力强弱的区别。通过上述历史人物、外国学者和当代学者的比较和研究，我们可以窥见近代湖南人异于他省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特质。

在湖湘文化精神演进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数不清的先哲前贤作出贡献。在他们中，既有生长于湖南，并在湖南境内把湖湘文化发扬光大者，也有发祥于湖南，而后在省外、甚至世界范围内传播湖湘文化者，他们是湖湘精神的创设者、积淀者、传承者和光大者。

第五章

湖湘杰出人物

毛泽东曾说“湖南大国也，南阻五岭，北极洞庭，三湘七泽，惟楚有材”[①]。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涌现了众多的精英人物。这些精英人物在政治、军事、学术、教育、科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不同历史时期引领着社会进步的潮流，同时也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使湖湘文化逐步走出地域的限制，辐射全国，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485.









第一节　湖湘名人概述

随着湖湘地域特征的凸显及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湖湘人才逐渐增多，功业日益炽盛。从湖湘人才的影响看，它大体上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唐以前湖湘本土人才见诸史籍的较少，主要以屈原、贾谊等外来贬谪文人给湖湘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二是唐代以后，随着各类教育的兴盛以及外来流寓文人的参与，本土人才群体开始出现，形成独特的学术流派与文化价值取向，在全国的影响逐步加大；三是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特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厚积薄发，乘势而起。湖湘杰出人物先后以经学经世群体、理学经世群体、维新改良群体、资产阶级革命群体、无产阶级革命群体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踔厉进取，各逞风流，直接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

唐以前湖湘本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政治家、文学家，虽然都以个体出现，也饶有建树，烛照千古。[①]

① 参见萧艾《关于〈论近代湖湘文化〉一文的商榷》。

东汉时期湖南耒阳人蔡伦改良造纸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三国时期零陵人蒋琬是蜀国后期的杰出政治家，被诸葛亮誉为"死节之臣"、"社稷之器"。零陵蒸阳人刘巴亦是当时有名文士，为刘表、曹操、刘备争相罗致，蜀汉的文诰策命多出其手。此外还有在赤壁之战中青史留名的黄盖，祖籍亦属零陵。这一时期还有著名学者宋衷、潘浚等。宋衷著《周易注》十卷、《太玄经注》九卷、《法言注》十三卷、《世本》等，对汉魏之际的学术变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自湖湘的历史名人数量渐多。在《晋书》中有记载的就有桓雄、虞悝、韩阶、易雄、潘京、罗含、伍朝、龚玄之、邓粲等。尤其是史学家邓粲，其代表作《晋纪》编写体例颇具开创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



纪》，始立条例。”这一时期还有坚持无神论的南齐良吏顾宪之，以写景锻字见长的南朝文学家阴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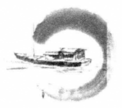
唐代以前对湖湘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外来的贬谪文人。战国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贬流放沅湘。他以满腔政治热情，结合楚地民间音乐，开创了楚辞之体，创作了《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宏词博文，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它体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岸的人格和穷究宇宙的探索精神，流传后世，成为湖湘文化的内在特质。此后，西汉著名政论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长沙四年，写下了《吊屈原赋》、《鹏鸟赋》等骚体赋的典范之作，他还曾两次上疏文帝，陈治国之策。屈原、贾谊是中国古代文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代表，从他们开始，湖湘文化中形成了贬谪文化的地域传统。

唐代以前，还有一些流寓湖湘的名人也为湖湘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著有16卷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在建安年间他担任长沙太守，以医术救民济世。同时他的医学理论、药方医术得以在长沙和湖南地区广泛施行与传播，影响深远，历代湖湘医家笺疏、阐述其书者，多达数十种。

唐代至明清时期，是湖湘人才群体的发展期。随着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交流日益密切，湖湘地域在中国文化版图中的地位逐步上升，文化名人也开始增多，人才群体开始展现，同时也出现了地域个性鲜明的学术流派——湖湘学派。

唐代的湖湘相对于中原而言还是蛮荒之地，“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①]，宋代湖湘的经济文化虽有长足发展，但部分地区仍是不够发达，也经常成为官员贬谪流放之所。贬谪官员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创造者。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谪居永州九年。作为文学家，他写下大量的诗文，其中《永州八记》成为山水游记的典范之作；作为政治家，他继承先秦以来的民本主义、无神论和元气自然论思想，撰文著书，批判谬说，《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在永州完成。刘禹锡被贬为郎州（今常德）司马十年，“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他学习民歌体，作竹枝词《插田歌》、《畬田歌》、《竞渡曲》、《采菱行》等诗作尽写民间生活。“诗家天子”王昌龄贬为龙标（今黔阳县）尉时写下《送魏二》、《芙蓉楼送辛渐》等著名的送别诗作。唐代诗人元结任道州刺史期间，

① 《全唐文》卷578柳宗元《送李渭赴京师序》。



写下著名的讽喻诗《舂陵行》，而这一批贬谪文人所独有的悲愤的文化精神，也深植到湖湘文化品格之中。

唐代还有很多流寓文人在湖湘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杜甫漂泊至岳阳，写下著名五律《登岳阳楼》。辗转潭州、衡阳、岳阳途中，写下《遣遇》、《宿花石戍》、《岁晏行》、《逃难》等众多伤时怀民的诗篇。此外还有唐代大诗人李白、张九龄、韦超、韩愈、元稹、李商隐、刘长卿和宋代大词人黄庭坚、秦观、张孝祥、辛弃疾等人，都在湖湘有过游历或为官的经历。他们或是友朋酬唱，或是独自行吟，或是讴歌山水，或是关心民瘼，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篇。宋代文豪范仲淹虽未亲至岳阳楼，但他为被贬谪友人滕子京所撰写的《岳阳楼记》，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洁情怀，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元典。

与此同时，湖湘本土人才群体也开始出现。在文学上，唐代的李群玉、胡曾、僧齐己被称为唐代湖南三诗人。其中胡曾的咏史诗在晚唐文学史上极负盛名，李群玉“诗笔妍丽，才力遒健”，后人誉之为“诗名冠李唐”。在艺术上，怀素、欧阳询都是独辟蹊径、自成一家的大书法家。此外，还有隐居衡山的唐代思想家李泌面对唐德宗直言“主相造命”之说，而“破天荒”中进士的刘蜕则代表着湖湘教育的逐步兴盛。

由于宋以后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湖湘文化得到长足发展，仅从科举来看，据清光绪《湖南通志》记载，两宋湘籍进士为 179 人，这个数字远超唐代。明代湖南籍进士题名的举子多至 541 人。在清代（鸦片战争前），湘籍学者中进士的也有 44 人。可以说，唐代以后，湖湘地区人才辈出，蔚为大观。

在思想上，首先是出现了湖湘本土第一位大思想家、哲学家周敦颐，他依据《易传》、《中庸》，融通道佛，以诚立说，在儒学心性义理上有“破暗”之功，成为理学宗主。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胡安国携子胡宏在湖南定居讲学数十年，逐步形成了在儒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湖湘学派。胡安国著有《春秋传》，以义理的方式阐明春秋大义，强调正人伦、恤民固本、尊君抑臣、尊王攘夷，体现了将儒家义理同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治学风格，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学术风格。在哲学上胡安国推崇二程的理学，提出以心为本、心与理一的本体论思想以及格物穷理的方法论，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胡宏著有《知言》、《皇王大纪》，他以振兴理学为己任，提出了“性本论”的观点，他认为

"性"是天下之大本，"万物皆性所有"，天地由性而立，主张性体心用。他还广为讲学授徒，在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上完全奠定了湖湘学派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础，因此他的学说被认为有开湖湘学统之功。湖湘学派的又一个重要人物张栻，曾主讲岳麓书院8年，造就弟子甚众。南宋乾道三年，理学大家朱熹应邀来湘访学，与张栻会讲岳麓书院，传播理学思想，对湖南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湖湘学者蒋信与冀元亨在湖湘积极传播王守仁心学。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王夫之，举兵抗清失败后隐居深山，著述终老，使六经别开生面。他提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物质实体的唯物观点，提出"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也"的辩证观点。在认识论上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合一观。在历史观上他主张进化论。王夫之的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全面总结与发展，同时兼具近代启蒙意义，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在史学研究上，除了胡安国、胡宏、王夫之等大学者的撰述外，还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史学专家，著述颇丰，蔚为大观。宋代有路振著《九国志》、《楚青》，陶岳著《五代史补》，郑向著《五代开皇纪》，王绘著《绍兴甲寅通和录》，王容编《光宗日历》和《宁宗日历》，等等。在宋代还出现了一批从事湖南地方史志撰述的史家，如衡阳李甫、南岳释文政、武陵柳拱辰、衡阳宋刚仲等。元代有欧阳玄主持修撰辽、宋、金三史。明代湖湘学人多奉敕修撰官史，衡山人茹瑺、湘阴人夏原吉修撰《太祖实录》，李东阳修撰《宪宗实录》和《孝宗实录》，茶陵人刘三吾修撰《省躬录》，杨一清修撰《明伦大典》，数量之多，难以枚举。

在文学上，宋代宁远人乐雷发诗作风骨遒劲，情致豪迈，誉为楚南第一人。元代攸州（今攸县）人冯子振，以散曲驰名当时，他流传后世的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鹦鹉曲》42首。在明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茶陵诗派"和"公安派"都与湖湘文人有关。"茶陵诗派"因湖湘茶陵人李东阳而得名，他开法盛唐、宗杜甫的诗歌复古运动的先河，杨一清、刘大厦、彭泽等湘人追随其后。湖南桃源人江盈科则是明代"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公安派"主将，他以"元神活泼"之说，进一步发挥了"性灵说"的要旨。清代湖湘则出现了以何绍基为首的



宋诗派，以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诗派，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引领文坛风骚。清代新化人邓显鹤编选的湖南诗歌总集《沅湘耆旧集》，收录了湖湘自古以来1699位诗人的15681首诗歌，反映了湖湘文学发展之盛况。

在艺术领域，湖湘名家众多，宋代有钱希白、刘次庄、易元吉、武洞清、释仲仁等书画大家。元代湖湘画家冷谦以山水、人物画闻名当世。明代有被誉为"楚陶三绝"的陶汝鼐，诗、文、书法都出类拔萃。清代有髡残、易祖栻、何绍基等继踵其后。

有宋以来，湖湘教育发达，有著名的教育家周式、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陈傅良、王阳明、高世泰、王文清等先后在湖湘讲学，其中北宋周式出任岳麓书院山长时，生徒众多，为此后湖湘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到了近代，湖湘文化发展至巅峰，湖湘俊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气势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这一时期湖湘文化在思想、教育、政治、军事、科技、艺术等领域都出现了引领时代的人物，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精英群体接连出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出现了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经世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洋务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这些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一阶段的第一个政治精英群体是晚清时期的经学经世派。在这个群体里，最先映入世人眼帘的是陶澍，这位任两江总督达9年之久的安化人，高举经世致用的思想旗帜，大举推行经济改革，苦苦探索中国富强之路，同时培养了一大批经世人才，陶澍本人也因之被称为"晚清第一人才"。陶澍推行的改革漕政、整顿盐政、改革币制等一系列轰动朝野的举措，开始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樊篱，为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而努力，无愧为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伟大先驱。晚清张佩纶曾评价陶澍为道光以来人物"第一","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泯也"。曾在陶澍幕中长达14年的魏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他在其宏著《海国图志》中第一个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中国近代史上卓尔不凡的经世思想家和改革理论家。贺长龄倡



导经世，呼唤改革，委托魏源编纂鸿篇巨制《皇朝经世文编》，“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①

①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200．

第二个政治精英群体是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洋务派，他们以理学经世，又积极接纳西方科学技术，成为传统士大夫在历史大变动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价值观的先驱。被誉为一代“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兼具文坛宗师、理学大家与军事统帅数种身份。他以礼修身，以理治军，于咸丰二年（1852）创建湘军。1861 年他还在安庆建第一家近代军工厂——内军械所，稍后在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在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引进国外人才，1873 年选拔第一批留学生出国。他还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堪称中国近代化和“洋务运动”的创始人。这一时期湖湘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是爱国将领左宗棠，他于 1862 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船舰制造机构——马尾船政局。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兵攻占越南重镇谅山，夺取抗法战争胜利。晚年收复新疆，被称为民族英雄。晚清郭嵩焘，担任首任驻英公使、兵部侍郎、驻法公使等要职，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外交家，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先行者。

第三个政治精英群体是维新派人士。维新派中坚谭嗣同，1898 年写成《仁学》一书，抨击封建制度，倡导变法维新。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他力推变法维新。9 月 12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虽然“百日维新”失败，但谭嗣同新锐的思想与勇敢的行动和他的英名长存。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坚分子唐才常，先后创办《湘学新报》、《湘报》，参与创办时务学堂，宣传新政。湖南派新运动的又一扛鼎人物熊希龄，1897 年出任时务学堂总理，参与创办《新报》，组织南学会，先后创办湘省近代航运、沅州务实学堂、醴陵瓷业。1913 年 9 月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为民国第一任总理。

第四个政治精英群体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与功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与孙中山一道革命的主将一大批是湖湘儿女，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蒋翊武、刘道一、姚宏业、禹之谟是其优秀代表。黄兴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1904 年与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1905 年与孙中山筹划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 年 4 月组织广州起义，同年 10 月领导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建立



中华民国，1912 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蔡锷，1911 年在云南发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总指挥。1915 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举兵护法，通电讨袁，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宋教仁，1903 年参与筹备成立华兴会，1905 年参与筹备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任司法部检事长，1912 年 1 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局局长。陈天华撰写《猛回头》、《警世钟》等文章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参与创立华兴会和同盟会。湖南民主革命党人群体的形成，大大地提高了湖南在全国的影响。

第五个政治精英群体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精英群体。毛泽东、蔡和森等 1918 年组织新民学会，1921 年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这场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于 1949 年取得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身这场伟大革命的最大的精英群体非湖湘儿女莫属，领导这场伟大革命的领袖和主将也是湖南人比例最大：在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五大常委中有 3 名湖南人，1955 年授衔，十大元帅中有 3 名湖南人，10 名大将中有 6 名湖南人，55 名上将中有 19 名湖南人，175 名中将中有 45 名湖南人。人们永远地铭记着这些伟人的名字：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胡耀邦，陶铸，何长工，黄克诚，李富春，蔡和森、邓中夏，向警予，何叔衡，谢觉哉，林伯渠。正是这些优秀的湖湘儿女，像一颗颗耀眼的星星，装点着现代中国美丽的星空，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除了政治精英外，还有一大批文学家精英、教育家精英。著名戏剧家浏阳人欧阳予倩，著有话剧、京剧、桂剧和电影剧本数十本，代表作有《黛玉葬花》、《桃花扇》等。我国杰出的革命戏剧家、长沙人田汉，一生创作了六十多部话剧剧本，二十多部戏曲剧本、十多部电影剧本、一百多首诗歌以及不少散文和翻译剧本。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现代诗人、沅陵人朱湘是新月派的代表作家，诗集《草莽集》名噪一时。益阳人叶紫的《丰收》是短篇小说佳作。益阳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湘乡人萧三是从事新诗创作的著名诗人。现代著名作家、湘乡人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是短篇小说名篇。临澧人丁玲一生创作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凤凰人沈从文的《边城》是极其优美的小说。

湘阴人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为时人所称。湖湘现代作家以其辉煌的成就，写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灿烂的篇章。在教育界，有长沙人张百熙，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1903 与荣庆、张之洞厘定《奏定学堂章程》，提出建立新学制。现代教育家、宁乡人朱剑凡，1905 年创办周南女校，开湖南女学之先河。现代医学教育家、长沙人张孝骞，1943 年后历任湘雅医学院教授、教务长、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代教育家、长沙人杨昌济，先后任教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其思想对毛泽东、蔡和森影响很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长沙人徐特立，1913 年以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萧三等均是其学生，其教育思想对解放区教育和新中国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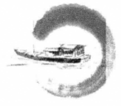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周敦颐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县（今道县）人。因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书堂讲学，世称濂溪先生。又因谥号元，被后世称为元公。周敦颐是湖湘本土第一位大思想家，也是中国传统儒学由政治儒学演变为心性儒学的关键人物。他以儒学为基，融合儒道，创建了一个沟通天、人、自然的宇宙论体系，为儒学心性之说提供了本体论依据，对湖湘学派以致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视为宋明理学的鼻祖。

一、周敦颐的学说

作为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太极图说》和《通书》中。这两部哲学著作以《易传》和《中庸》



为核心，又汲取道教和佛教心性之说而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太极图说》主要谈宇宙的本源、万物的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问题，而《通书》主要谈人的修养，以“主静”而达至诚，从而契合天理。

在《太极图说》中，他把宇宙万物的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太极生阴阳。在周敦颐看来，宇宙的基本是“太极”（又叫做“无极”），宇宙万物演化都基于太极，太极就是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阴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太极运动变化而产生出阳，阳的属性是动，动到极点就转为静，静后生阴。静到极点又动，一动一静，互相交替，分化出阴阳二气。二是阴阳生五行。周敦颐借用汉代儒学的五行观来解释天道运转，形成四季：“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即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出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之间发生作用，而形成春、夏、秋、冬四季，即在五行阶段同时出现了四季的变化。三是五行化生万物：“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周敦颐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儒家道德具有终极意义，契合宇宙之道。所以他在此基础上进行阐发：人在由太极而化生的万物之中最为可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人不仅具有形体，而且具有精神、知觉以及善恶品行。圣人制定为人之道，教人为善去恶。其途径一是主静，二是遵守圣人定的中正仁义的规范。“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太极图说》构建了“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一方面是由天而及人，从无极太极到中正仁义的序列，以宇宙自然的化生过程来论述儒家伦理的必然性；一方面是由人而及天，即是从“立人极”再回归到太极无极的序列，希望从“立人极”、“主静”的道德生活感悟到其中的宇宙意义。[①] 正因如此，朱熹评价《太极图说》说：“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

① 详见朱汉民《湘学原道录》第三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篇》(《孟子》)之所传也。"

周敦颐的《通书》则偏重于"人道"的阐发,将《太极图说》中所讲的宇宙化生原理与儒家伦理政治相结合,使宇宙论最终通过现实中人的道德修养来获得确定的意义和内容,也让人的道德修养通过宇宙论获得了终极本体意义。为此,周敦颐在《通书》中提出了一个以"诚"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诚"是一个道德概念,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圣人之本"、"五常之本,百行之原"。《通书》说:"无妄则诚"、"诚,无为"、"寂然不动者,诚也"。在《通书》中,"诚"是道德的极致,所以"圣,诚而已矣"、"君子,乾乾不息于诚"。

"诚"又是宇宙本体。《通书》中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诚"既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又是"圣人之本"的道德人格本体,从而把"天人合一"奠定在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为儒家伦理建立起一个终极存在的本体依据。

与吸收、借鉴了道佛学说的《太极图说》相比,《通书》主要是阐发儒家的政治伦理,因此《通书》比《太极图说》得到更为广泛的肯定,湖湘学派宗师胡宏甚至将此书与儒家经典并列:"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诸子,直以《诗》、《书》、《易》、《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①]

周敦颐的学说虽然还不完备,但他为宋代儒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周敦颐之前的儒学主要是政治儒学,其理论的着眼点在政治领域,在于以"仁"为价值准则,以"礼"为外在度量,以宗法血缘为基石,构造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早期儒学虽然也谈安身立命之事,但与心性理论日益完备的佛道二教相比较,儒学对于人们的精神领域,尤其是对于涉及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始终缺乏足够的深度。从周敦颐开始,儒学才具有本体论的根据,其发展形态也从政治儒学转变为心性儒学。因此在《宋元学案》中,学者黄百家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②]

① 张立文. 宋明理学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57.

② 黄宗羲. 宋元学案卷十一 濂溪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1986:482.



二、周敦颐的影响

周敦颐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作为思想家，周敦颐的学说影响了此后湖湘学术的价值取向，其穷究天人为学宗旨、原道的学术精神成为湖湘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作为入仕的文人，他清廉自守、经世致用的作风得到了湖湘后人的景仰，强化了湖湘文化尊德重道的传统。

周敦颐因为未居高位，在世时其学说影响有限，但在南宋时得到了朱熹、胡宏、张栻等学者的推崇与弘扬。胡宏将周敦颐誉为“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①]朱熹称之为“上接洙泗千岁之统，下启河洛百世之传”,“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②]并为《太极图说》和《通书》作注。张栻高度评价周敦颐的学说：“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指于残编断简中，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为至灵而性之为至善，万理有其宗，万物循其则。举而措之，可见先王之所以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复明。”魏了翁认为，“不有先生发太极本然之体，则异端小道将诬民惑世于无所终极”。[③]从此，周敦颐的学术地位大大提高。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赐谥元公；理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以祀孔子庙庭，正式确立了周敦颐理学奠基人的地位。

周敦颐的学术对后世理学家具有引领之功。胡宏受到周敦颐的影响，将“性”看做既是宇宙本体，又是人格本体，从而建立起以“性为大体”的“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这和周敦颐《通书》中的理论模式十分相似。张栻不仅重视周敦颐的《通书》，也十分重视《太极图说》，他特别吸收了周子的太极之说，将周子的太极论和胡宏的性论统一起来，提出了“太极即性”的本体论学说。

另一方面，作为入仕文人，周敦颐绝非皓首穷经不知世务的腐儒。相反，在《宋史》本传中，他是以有“修齐治平”能力的真儒面貌出现的。

周敦颐为官刚毅果敢，精明干练，敢于任事，颇有政绩。他在洪州分宁县任主簿时，有积案久不能决，周敦颐到任，一

① 胡宏．胡宏集·周子通书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②《隆兴府学先生祠记》，《周敦颐全书》卷8.

③ 魏了翁《道州宁远县先生祠记》.

审而明。乡人都惊叹说："老吏不如也!"在担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转运使王逵执法严酷，有囚犯按法不当死，王逵欲加重惩罚。众人不敢与之争辩，唯独周敦颐进言，并表示要弃官而去，"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①]后来，王逵被他诚心感动，免去该犯死刑，并向朝廷推荐了周敦颐。任南昌知县时，"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

① 《宋史·周敦颐传》.

周敦颐关心民瘼，以仁牧民。他担任广南东路刑狱提点（监督狱讼之职）到任不到一年，就踏遍了广东的山山水水。《年谱》载："先生尽心职事，务在矜恕，以洗冤释物为己任，虽荒涯绝岛，瘴疠之乡，皆必缓视徐按，不惮劳瘁。"在巡按到端州（今广东高要）时，他了解到当地官吏滥用职权开采端砚，与民争利，于是上报朝廷，说明利害，定下禁令："凡仕端者，取砚石毋得过二枚!"连自己使用尚且不得超过两枚，从中牟利自然就更不允许了。禁令既出，"贪风顿息"。

周敦颐为官能清贫自守。他曾自述道："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题濂溪书堂》）。他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记载了很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②]至于周敦颐的薪俸，《墓志》中说："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

② 李申，郭彧. 周易图说总汇[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08.

周敦颐还是优秀的文学家，他的文学作品虽然存世不多，据《周元公集》载，周敦颐存诗二十八首，赋一篇，文四篇。诗作虽不多，但诗如其人，均反映了这位儒家先贤的政治理想、人格追求和审美情趣，有相当鲜明的艺术特色，并与宋初诗风相呼应，成为理学诗派的开风气者。[③]他的散文《爱莲说》典雅精致，作者着意刻画莲的高尚、正直、纯洁、尊严，以"独爱莲花"表白了自己的胸怀志趣。文章短得出奇，却令人百诵不厌。

③ 同上.

周敦颐以其品行学问深得时人的敬重。黄庭坚在《濂溪词并序》中称其"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周敦颐以高尚的人品、卓越才的华、深邃的思想被世人称为“周子”，他的学术思想被称为“濂溪学”，是湖湘文化的宝贵财富。他本人在淳祐元年，被追封为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享受到了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至高荣誉。



第三节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是湖南衡阳人，名夫之，字而农，别号姜斋，曾自署一瓠道人、双髻外史等，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又称船山先生。王夫之是明清交替之际出现的伟大思想家。在抗清失败后，他隐居深山，以著述为业，凭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精神，以一己之力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在古代哲学、史学、经学、文学等领域里成绩卓然，“他上承南宋湖湘学派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建立了一个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规模宏大的思想体系，下启近代湖湘文化，对近代湖南的各个人才群众、思想家、学者、政治家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①]

① 陈谷嘉，朱汉民．湖湘学派源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345.

一、王夫之的学术思想

王夫之著作规模宏大，内容浩瀚，影响深远。岳麓书社在1988年至1996年出版了《船山全书》，共16册，收录了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船山全部著作，近八百万字。其代表作有《周易稗疏》、《书经稗疏》、《尚书引义》、《诗经稗疏》、《春秋稗疏》、《春秋家说》、《叶韵辩》、《读通鉴论》、《宋论》等。在王夫之的学术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在哲学上，他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总结，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在政治上，他反对绝对

君权，强调夷夏之辨，具有近代启蒙意义。

王夫之哲学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四点。

（一）气一元论与“实有”的唯物观

在宇宙构成论上，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等人的气一元论，认为宇宙是由“气”所构成。他在《张子正蒙注》中说：“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①] 而气通过“聚散”、“絪缊”、“太和”化生万物，“凡物，皆太和絪缊之气所成”。也就是说，阴阳二气的变化，是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终极原因。王夫之后来又以“实有”来表达“气”最本质的属性，这无疑具有唯物因素，发展了我国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

王夫之接受并发展了周敦颐“诚”为宇宙本原的观点，但扬弃了“诚”的纯道德含义，赋予“诚”以崭新的内涵，这就是“实有”和“实理”。他说：“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借此以说明宇宙的本原是实有。他又以水有“固润固下”、火有“固炎固上”的本性为例，来说明事物存在最本质的属性（即“实有”），是可以感知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无有弗然，而非他有耀也。若夫水之固润固下，火之固炎固上也。无所待而然，无不然者以相杂，尽其所可致，而莫之能御也。”[②] 相对于道家以“无”为体，佛教以“空”为体，程朱理学以“理”为体，陆王心学以“心”为体，王夫之则将“实”与“有”相结合，发明“实有”范畴，以“实有”为宇宙万物的一般本质，对整个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作了更高的哲学抽象。

① 《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

② 《尚书引义》卷四。

（二）“天下惟器”的道器观

道器是古代哲学关注的一个重点，关系到精神与物质、规律与事物的第一性问题。王夫之之前的理学家主张“理在气先”、“理生气”的唯心论，而王夫之主张“器”是“道”的具体化，“道”的现存样态就是“器”，用“道”和“器”来阐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他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君子之所不知，而圣人知之。圣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妇就之。人或昧于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



无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在这里，王夫之明确指出，世界只能是“器”的世界，天地之间没有抽象的“道”存在，存在的是具体的事物。道是器之道，有事物才有事物的规律。这就纠正了朱熹等人的“无其道则无其器”的错误观点。王夫之还举例说，没有弓箭，也就没有射箭之道；没有马车，就没有驾车之道；没有礼器和乐器，就没有礼乐之道。总而言之，具体的器物皆由阴阳二气凝聚而成，而“道”则存在于器物之中，因此“道”与“器”相互依存，没有虚无孤立的“道”。

王夫之的道器说将理学家专注于内心世界体验的治学倾向转为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探索，这对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关注现实的学风的形成是有所裨益的。

（三）“变化日新”的发展观

和老庄之学与佛教的发展观接近，宋代理学也立旨主静。如南宋朱熹就强调“静者为主，而动者为客”。王夫之则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反对主静说。他说：“虚空即气，气则动者也。”[①]“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人动，不息不滞。”[②]他认为，既然整个宇宙充满物质的气，而气是运动的，那么整个物质世界也是永恒运动的。从这一论点出发，他得出了天地万物“变化日新”的观点：“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思问录·外篇》）自然是如此，社会进化亦是如此，王夫之认为社会进化的总体趋势是“世益降，物益备”，他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进化观予以了抨击：“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③]这是他对远古社会的看法。对于儒家士人推崇的三代，他评论说：“国小而君多，而暴君横取，无异于今川广之土司，吸龁其部民，使鹄面鸠形，衣百结而食草木。”[④]因此，他强调：“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这种发展观也促使他赞成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进行社会改革。

① 《张子正蒙注》卷一《参两篇》.

② 《周易外传》卷六.

③ 《读通鉴论》卷二十.

④ 《读通鉴论》卷二十.

（四）“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观

王夫之建立了以行为基础的知行统一学说。王夫之认为，知行关系应该是“行先知后”。他认为“知也者，固以行为功”（《尚书引义》卷三），即认识必须来源于“行”，世界上没有

“不行而知”的事情。他批判程朱“知先行后”的观点是“先行以废知”(《尚书引义》卷三)，批判陆王的“知行合一”实际是“以知为行”。王夫之认为，程朱、陆王两派都是“离行以为知”。他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统一观。他说：“行焉可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得行之效也。”(《动物篇》)又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尚书引义·说命中二》认为行中包含知，但知却不能代替行。王夫之在肯定行可兼知的前提下，主张知与行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而立先后之序，有时行先于知，有时知先于行。

王夫之政治思想的基本观点有以下三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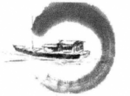
(一)“天下之公”的君权论

王夫之维护君主制度和传统伦理纲常。他说：“原于天之仁，则不可无父子；原于天之义，则不可无君臣。”认为君臣父子，天经地义。这显然与他的父亲王朝聘崇尚程朱理学尤重践行以及后来求学岳麓书院的经历有关。但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对绝对君权，他说：“生民之生死，公也；一姓之兴亡，私也”、“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在他看来，合格的君主不是亡国之君，而是大一统之君，是国家统一、民族生存的象征。与“不以天下私一人”相一致，就是要求“公天下”。王夫之明确提出：“王者以公天下为心。”此外，他还谈到了公私之别：“义利公私之别，存亡得失之机，施之一家，而一家之成败在焉；施之一国，而一国之成败在焉；施之天下，天下之安危存亡在焉，岂有二理哉?”这种对君权的思考具有启蒙意义，此后湖湘后学谭嗣同等人都深受影响。

(二)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

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的王夫之，在其著作中，渗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反复阐明保卫民族利益为“古今之通义”，他虽然认为“夷狄非我族类”，但他也反对压迫和侵夺其他民族的观点，他认为，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应该“彼无我侵，我无彼虞”、“各安其所”。

在明辨华夷的同时，他也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在《读通鉴论》的《秦始皇》篇中，王夫之充分肯定了秦始里完成中国统一的历史功绩，认为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是“势之所趋”。



（三）“理势统一”的历史观

他运用“理势统一”的历史进化思想研究和分析历史，认为“理在势中”，国家的治乱存亡，制度的迁移更举，皆“理势之必然”，从而得出人们必须善于审时度势、及时变法的结论。王夫之分析了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北宋的覆亡等历史现象，认为这些现象都存在一个必然之“势”，在“势”的必然处，也就表现为当然之“理”。历史之势，是历史运动之客观过程，历史之理，即是历史过程所表现的规律性。他说：“顺逆者，理也。理所制者，道也。可否者，事也。事所成者，势也。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势者也。循其可，则顺，用其否，则逆；势成理者也。”[①] 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又说：“可以行千年而不易，人也，即天也。……天不可知，知之以理，拂于理则违于天，必革之而后安。……以理律天，而不知在天者即为理；以理制人，而不知人之所同然者即为天。”可见在王夫之的认识中，“天”不是神秘不可知的，而是人心向背，“理”是势的必然性，是历史潮流的代名词，这也体现了王夫之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① 《诗广传》，《船山全书》第三册．

二、王夫之的影响

王夫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学术思想对湖湘文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近代湖湘的政治运动都与船山学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夫之是湖湘学术的继承者与开拓者。清初学者刘献廷高度评价王夫之的学术成就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广阳杂记》卷二）。其实，王夫之不仅仅是“圣贤学脉”的延续，他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和评判中国思想史上的诸子百家，囊括哲学、史学、经学、文学、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对前人之说进行了诸多的继承与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对 19 世纪末的戊戌变法运动和 20 世纪初的辛亥革命都发生过重大的积极影响。

王夫之生前交代子孙藏匿其书，言二百年后乃可出，从王船山潜心著述的 17 世纪下半叶到其学说大为盛行的 19 世纪下半

叶，恰好是两个世纪。这种自信绝非巧合，乃是其学术思想的启蒙性。谭嗣同在政治思想上接受了王夫之的“竞以养民”的思想，在哲学上则接受了王夫之的道器观。他说：“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1]，同时又以“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来赞美王船山的开启后学之功。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说：“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

①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十[M]．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王夫之的思想对于民国创建也大有影响。民国革命派经常援引王夫之“攘夷之说”用作革命理论。如章太炎在《重刊船山遗书序》中说：“明末三大儒，曰顾宁人、黄太冲、王而农，皆以遗献自树其学。宁人书自初刻已被删改，近世真本始见于世，太冲议论不甚系民族废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矣。”其后自述其革命经历时说：“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光复军志》）、“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演说录》），孙中山 1911 年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也说：“有明之世，遭家不造，觏此闵凶。蕞尔建虏，包藏祸心，乘间窥隙，盗窃神器。……盖吾族之不获见天日者二百六十余年。故老遗民如史可法、黄道周、倪元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人，严《春秋》夷夏之防。”

此外，王夫之以明代遗民自守，在艰苦的环境下发愤著书，这种崇高的品行被后人推崇，一直激励着湖湘后人。



第四节 魏源

魏源（1794—1857），字汉士，号默深，湖南邵阳人，近代湖湘经学经世派的代表。他秉承湖湘学术经世致用的传统，以



经学入政治，积极参与社会改造。在鸦片战争后，他率先打量海外诸国，试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经世的途径，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为后来洋务派确立了理论基础。尽管他的思想有诸多局限，但已经开启了传统士人接触西学、变法求新的序幕，他因此也被称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一、魏源的今文经学成就

魏源自幼就喜读经史，青年时期就开始研究经学。嘉庆十九年，他随父至北京，得到了向硕学大儒请益求教的大好机会。“遂留从胡墨庄先生问汉儒家法。……是时，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学塽，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古文辞则与董小槎太史桂敷、龚定庵礼部自珍诸公切磋焉。”[①]这一时期，魏源接受了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的影响，成为与龚自珍齐名的今文经学大师，时称“龚魏”。

①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见：魏源全集（第20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4.

魏源的经学代表作是《诗古微》、《书古微》和《公羊春秋》上下篇。

公羊学是西汉今文经学的重要学派。在历史观上认为社会的发展遵循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交替变换的规律，对应着“黑统、白统、赤统”的朝代更替。作为今文经学家，魏源首先强调今文经学的口传微言大义的传统远胜《春秋》的章句之学，高举以西汉为宗的旗帜。魏源坚持《春秋》为孔子托古改制之作的观点，认为《春秋》一经有孔子的理想抱负和微言大义，“张三世”、“通三统”是解释《春秋》微言大义的统贯，因此治经必治《春秋》，治《春秋》必通《公羊》。

在《诗经》研究上，魏源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力图恢复《诗经》的本来面貌，认为齐、鲁、韩三家诗说的地位应与毛诗地位平齐。他深信“诗教原则”，认为四始之例是孔子重定礼乐之表现，称之为“全《诗》之袭领，礼乐之纲纪”。他撰著《诗古微》的目的在于彰明古人制礼作乐的目的以施行于当世：“《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义，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

魏源倡言今文经学，与龚自珍一样，表面是为了学术上复西汉今文经学之古，而实质是将经学作为治术而引向现实的“经世致用”。

魏源借经文的援经议政，为经世致用寻找理论依据。在研究中，他高举改革旗帜，展露了迫切的改革愿望。他认为，“上古之风必不可复”，“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1]“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2]“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同时他又从实际出发主张缓变：“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骤，听言太轻，处已太峻，亦有能发不能收之者矣。”[3]同时，魏源贯经术、故事、文章为一体，“以经术为治术”，扩大了传统的经世致用范畴，把今文经学引向政治维新。在他看来，治经、明道、政事三者密切相关，政事需要经学的指导，才不会迷失方向。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就会“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为此他大力提倡事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以此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他还关注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留心社会弊政的改革和史地边防之学，为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向西方追求真理和从政治上改制维新准备了思想条件。在大变动的历史契机中，魏源不但在湖南而且在全国起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成为具有近代因素启蒙思想的先驱。

二、魏源的经世思想与实践

在鸦片战争前，魏源以经学入政治，将传统学术与实际问题相结合。鸦片战争之后，魏源的思想开始转变，关注的角度、内容都超出了传统经世学的界限。其经世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以及他的实践上。

《皇朝经世文编》近三百万字，收录道光以前清代254位作者的两千余篇经世文章，“凡文字足备经济、有关治世者，无不搜采”，是一部反映清代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典章制度和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书，是借助传统经验解决税收、漕运、盐法、币制、荒政、水利、河工等经世实务的探索，这部书问世后得到了士人的推崇，晚清汉学大师俞樾在《皇朝经世文续编序》中说：“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魏源编纂此书的目的在于治世。他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序言中说：“格其心、身、家、国、天下之物，

① 魏源．治篇五．魏源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4．

② 魏源．筹鹾篇．魏源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4．

③ 魏源．治篇三．魏源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4．



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齐且治平者也”，强调在“格物”过程中治世，他强调实际效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魏源自然不会满足于书斋中的坐而论道，而热衷于接触、研究实际问题，积极投身于当时经世派的改革活动。如协助陶澍、贺长龄参与江苏漕粮、水利等问题的筹议与改革。

在漕运改革上，魏源支持包世臣漕粮海运的主张。其主张主要有二：一是更改路线，变漕运为海运，减少疏通运河水道的费用，同时可以避免沿途的盘剥。二是更换运粮方式，改官运为商运，借助民间海商之力加大运力。在改革中，魏源本着“及之而后知”的指导思想，深入调查研究，为证明可以借助海商进行漕运，他统计了海商货运能力：“今上海沙船及浙江蛋船、三不像船，并天津卫船，自千石以至三千石者，不下二千号，皆坚完可用。通算每船载米千余石，一运即可二百余万石，两运而全漕可毕”，[①]他用事实驳斥了反对海运的人们的谬误。魏源的筹划对于陶澍与贺长龄等经世派官员在改行漕粮海运过程中的实际操作，是大有指导和参考作用的。据史料记载：1826年（道光六年）春，江南四府一州漕粮实行了海运，整个过程极为顺利，漕米损失仅为千分之一，运到津仓的漕米根本没有发生霉变问题，“视河运之粟，莹洁过倍”。陶澍等官员因筹划组织之功，而受到了朝廷的奖励。魏源在为其成功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及时进行总结，为此代人写了《海运全案序》、《海运全案跋》、《道光丙戌海运记》。在这些文章中，魏源用事实进一步证明海运较之于河运的优越性，那就是大大降低了运输费用，从而做到了利国、利民、利商。

① 魏源．魏源全集（第12册）．古微堂外集（卷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4：396.

在黄河治理上，魏源在吸收前人见解的基础上，深入实地调查和研究，提出促使黄河改道北流以彻底解决治河问题的主张，如他在《筹河篇》中说：“今日视康熙时之河，又不可道里计，海口旧深七八丈者，今不二三丈，河堤内外滩地相平者，今淤高三、四、五丈，而堤外平地亦屡漫屡淤，如徐州、开封城外地，今皆与雉堞等，则河底较国初必淤至数丈以外，洪泽湖水，在康熙时止有中泓一河，宽十余丈，深一丈外，即能畅出刷黄，今则汪洋数百里，蓄深至二丈余，尚不出口，何怪湖岁淹，河岁决。”

在盐政改革上，魏源提议废除纲盐制，以一般商人领票纳税，自由运销的“票盐”制代替“纲盐”制，废除盐纲世袭垄断权，唯凭商人纳税，取票买盐。魏源参与筹划的票盐制于

1832年在淮北试行，盐政改革的结果，使盐价大减，走私现象渐绝，国家盐税收入也随之大增。魏源在《淮北票盐记》里记载了此事的巨大成效："不四月请运三十余万引，场盐埽积一空。是岁海州大饥，饥民转移佣值，全活无算。而口岸盐净价贱，其贩芦私者皆转而贩票盐。…利国利民，利商利灶，为数百年所未有。"[1]事后，魏源分析说："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而纲商岸悬课绌，票商云趋鹜赴者，何哉？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2]在魏源看来，以盐票的方式可以减少运输销售的费用，而低价销售可以增大销量，利于民生，销量加大又可以增加财税收入。

《海国图志》凡一百卷，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海防、海图海志、各国史地知识、各国宗教、西方历法等。

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而师之之法，首先就是设厂自造，他提出"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驭攻击"。[3]养兵练兵之法，就是不在多而在精。他指出："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每出兵，以银二十元安家。上卒月饷银十元，下卒月饷银六元。赡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而清朝兵备的情况却是："闽广水师，每省三万有奇；江浙水师，每省二万有奇。虚冒半之，老弱半之，未必有数千之可用。"因此"诚能汰虚冒冗滥之缺，并两兵以养一兵，广东约万五千，福建约万五千，专选惠、潮、漳、泉四府，精训练而严节制之，以此推诸浙东江北。岂但国家增无数之精兵"。[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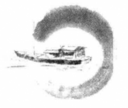
《海国图志》反映了魏源强烈的爱国思想。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富商大贾是侵略者，"专以鸦片之烟，耶稣之教，毒华民而耗银币"。他倡导国家之间在外交上要自主，在贸易上应"互市"，反对非法的鸦片贸易。他揭露英国殖民者到处扩张势力，"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他也告诫中国人不要放松对沙皇俄国的警惕。

① 魏源．筹鹾篇．魏源全集（第12册）．古微堂外集（卷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4．

② 魏源．淮北票盐志叙．魏源全集（第12册），古微堂外集（卷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4．

③《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④《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三、魏源的影响

魏源的学说对此后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起到了启蒙和号召作用。

首先是对洋务运动的重大影响。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培养和孕育了一代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此后的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张之洞等人，都受到魏源思想的影响。洋务运动就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和曾、左等人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它开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的先河。曾国藩、左宗棠都认真仔细阅读过魏源的著作，而他们兴办洋务如设轮船局、造枪炮等，都是受到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启发。近代第一位外交使臣郭嵩焘充分肯定魏源思想的历史价值，说《海国图志》“以互市议款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历十余年而其言皆验”。张之洞更是高度评价《海国图志》，认为它“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

其次是对戊戌维新运动的重大影响。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内容，如政治变革，学习西方文化，重视经邦治国之才等，启迪了冯桂芳、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早期维新运动思想家，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领袖。对湖南维新运动的推动者陈宝箴、江标、皮锡瑞等人也有直接影响。康有为早年就曾读过《海国图志》，后经旅游香港，接触并阅读了更多西方书籍，“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也称之为“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1923）犹未脱离净尽”，亦足以说明魏源的前驱先导之功。谭嗣同也深受魏源致力于探求救国之路思想的感染，积极发扬魏源“援经议政”的精神，鼓吹“素王改制”和三世说，形成19世纪末的改制维新思潮。今文经学家皮锡瑞也举公羊改制之义，以“推尊孔教而引申变法之说”。在此影响下，湖南的维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陈宝箴、江标等人推崇魏源经世之学，积极支持谭嗣同、唐才常等办时务学堂，创《湘学报》、南学会，宣传维新思想。

这种影响甚至漂洋过海，波及日本。19世纪中叶《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日本的维新派人物“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



演尊攘维新之活剧”。日本盐谷世弘在《翻刊海国图志序》中说：“自古国家积衰之际，非无勇智之士，筹策之臣也．不胜其孤愤，则或入山林，或隐于居钓，或慷慨赴死，或诡激买祸，而最下为敌国之用。今清方有朱氏、凌氏之乱，而社稷殆将墟，则默深之进退存亡亦未可知也。……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



第五节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清末湘军领袖，兼具文坛宗师、理学家、湘军统帅、洋务运动倡导者等多种历史身份，对于近代湖湘历史文化以及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曾国藩是争议极大的历史人物。“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检论》）。褒扬他的人视之为国之柱石，如梁启超认为他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历史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饮冰室文集》）；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的读书笔记中坦承：“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批判曾国藩的也大有人在，孙中山说：“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为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因藩、左宗棠以为厉。”萍浏醴起义军发布的《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则痛责曾国藩、胡林翼为逆贼。之所以有如此复杂而对立的评论，是因为曾国藩这个历史变局中的人物的复杂性。正如毛泽东后来评说的：“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复杂



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很多方面都留下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专制阶级最后一尊政治偶像。”[1]

一、曾国藩与湘军

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一生功业与他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挽救了清王朝的统治密切关联。他以儒家学说作为建军、治军之本的军事思想对晚清及以后的军事活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51年，洪秀全以拜上帝教召集信徒在金田起事，一时席卷全国。咸丰皇帝命曾国藩督办湖南团练，曾国藩认识到绿营的腐败与无能，“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2]因此在组建团练时另辟蹊径，在选择兵勇、将佐时，招募农民为营勇，“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3]任用“忠义血性”的儒生为将佐，同时由上级挑选下级，即由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招募勇丁，使上下一心，利于指挥。“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叶，皆一气贯通”。[4]

曾国藩在治军中注重向士卒灌输儒家学说，进行意识形态的教化。他认为治理军队重在让兵勇知礼、守礼，“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5]为此，他编写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军歌，如《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等。以咸丰八年所作《爱民歌》为例，歌词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石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饭。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材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以这种精神治军，能够取得道义上的优势，从而得到民众的支持，其手段是十分高明的，这对于后来的革命军都具有启示意义。

湘军初战并不顺利，先后于岳州、靖港大败，曾国藩曾为此痛不欲生，投水自杀，被其左右救起。但凭借着坚定的卫道信念与独特的治军之术，这支由儒生与农夫组成的湘军逐渐成

① 王开林．敢为天下先——纵横中国湖南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12.

②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21卷[M]．长沙：岳麓书社，1994：186.

③《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

④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0卷[M]．长沙：岳麓书社，1994：6323.

⑤《曾文正公全集·全集》卷三.

熟，先后收复岳州、武汉等地。1861 年年 9 月，曾国藩麾下曾国荃部攻陷安庆。1862 年，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直逼天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1864 年 7 月，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

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理学治军的曾国藩也暴露了冷酷嗜杀的一面。湘军在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曾有过三次屠城暴行：一是咸丰八年，湘军李继宾部攻破九江，屠杀城中二万余军民；二是咸丰十一年曾国荃部攻破安庆，屠杀城中军民四万余人；第三次是曾国荃部攻破天京，死伤不可计数。这些屠城暴行固然有消灭太平天国中坚力量、夺取财物的原因，但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曾国藩视附从太平军的民众为叛逆，必杀之而后快。湘军攻破九江时，曾国藩闻讯写信给吉安前线的曾国荃说："接手书，知九江克复，喜慰无量。屠戮净尽，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九江克复，闻抚州亦已收复，建昌想日内可复，吉贼无路可走，收功当在秋间，虽迟至冬间克复，亦可无碍，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虽迟亦无后患。愿弟忍耐谨慎，勉卒此功，至要至要。"在咸丰十一年曾国荃攻打安庆时，曾国藩写信说："目前收投诚之人，似不甚妥善，如挤疖子不可令出零脓，如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假义而误大事，弟意如何?"这种冷酷嗜杀的卫道之心让曾国藩获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但曾国藩自己却坦然以对，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二、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曾国藩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事业是躬身实践，推动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引进西方科技教育、军工制造，争取国家强盛的一种手段，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曾国藩本人是洋务运动最早的倡导人和实践者。他在自己创建的内军械所尝试引进西方的机械化生产，制造出了"洋枪洋炮"的近代武器，成功制造出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轮船。这些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开始。



早期洋务运动，是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与军事技术为目的，主要是训练新式军队和兴办近代军工企业。曾国藩洋务活动的重点是建设机器制造局。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曾国藩在总结湘潭、岳州两个战役湘军取胜的原因时认为“实赖洋炮之力”，并要求清朝廷“尤须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此后，他又提出购买船炮，1861 年 8 月 23 日上奏清朝廷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认为“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两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①] 为此，1861 年曾国藩创办了国内最早的官办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子弹、火药、枪炮，并在徐寿等人的主持下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1862 年，内军械所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蒸汽机。在实践中，曾国藩意识到技术之不足，尽管集合了一批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科技人员，如徐寿、华蘅芳、龚芸棠、徐建寅、张斯桂、李善兰、吴嘉廉等，但“全用汉人，未雇洋匠”，所造炮、船全用土法，产品低劣，处于初级的摸索阶段。于是在 1863 年 12 月，曾国藩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洋务运动因此进入正轨。1865 年，他又和李鸿章共同倡导在上海设置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译书局，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1868 年，又提出由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学馆，“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于洋人，亦可引申另勒成书”(《轮船工竣并陈机器局情形疏》)。

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四.

曾国藩还是近代中国官费外派留学生的倡导者。1872 年，他和李鸿章联衔会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他在《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说：“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今中国欲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则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留美教育方案在遣送四批学员后，因为受到诸多非议与阻力而过早夭折，但其教育思想先导功不可没，成为日后大规模留学运动的先声与基础。另外，在曾国藩选派的 120 名留美幼童中，涌现出了铁路专家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民国总理唐绍仪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各种



专业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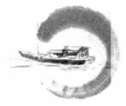
应该注意的是，曾国藩作为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积极倡导、推动洋务运动，仍然是以捍卫道统、扶持名教为宗旨。所以，他在推行洋务运动的同时，也大力倡导“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学”，自觉继承孔孟的仁学与礼教，执著地坚守程朱的义理之学。可见他所兴办洋务、吸收西学，其目的是维护中国文化固有的道统。这一思想，在洋务派群体中，是一个十分明确而一致的观念。如他的弟子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一文中明确提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这确切地表达出曾国藩的思想，并终于形成了洋务派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应该说，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为洋务派的这一思想奠定了基础。

三、曾国藩与理学

曾国藩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早在道光年间就曾拜理学大师唐鉴为师。他也曾撰文讨论过天道心性等理学问题，譬如他说过“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等。但和宋明理学大师相比，他并不像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那样为儒家文化重新建构了一整套“性与天道”的理论体系。他对儒学的贡献在于将儒家之道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在于他个人躬行实践儒家之道，高举义理经世之旗。

与以前的道学家不同，曾国藩并不热衷于理气有无的抽象思辨，他力图将“道”落实于治国安邦、经世济民之中。一方面将儒家之道落实于治国、治军、洋务等现实的经世活动之中，并以卓越的政治事功而名重当世。另一方面，他也能在碌碌的日常行政、军务之中，孜孜不倦躬行儒家之道，注重自我人格修养。

他坚持以儒家的仁与礼作为治世的根本。他说：“昔孔子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理，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他认为，“圣王”的经世理念就是仁与礼。具体来说，“仁”就是要在内心中保持诚心和恕道，这样才能使在下位的人能够心悦而诚服。譬如，在治军驭将方面，曾国藩主张只要统领军队的将帅能够对



部下待之以“诚”，则能使全军团结一心，“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他又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之效与?”另外，曾国藩也将恕道作为修身为仁的根本之道。他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须从‘恕’字痛下工夫。”他认为，“恕”不仅是“立德之基”，也是“临时应事之道”；不仅是修养之道的“性功”，也是经世之道的“事功”。他坚持认为：“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因此，他在经世活动中，能坚持以恕道处理各种社会政治关系，使自己在复杂、险恶的政治处境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他又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①]曾国藩在经世活动中坚持这种“待人以恕”之道，这是他能够取得政治功业、军事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

①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435．

曾国藩将礼作为经世之术。他说：“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在他看来，“礼”是“经世之术”之本源，因此他在治学时十分重视《仪礼》、《通典》等书，在治军、治世时一以贯之地贯彻他的“以礼治人”的主张。譬如他倡导以礼治人的带兵法：“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用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②]正如他的同僚郭嵩焘所评价的：“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

②《曾国藩日记・上册》．

曾国藩是虔诚的理学信徒，他将理学落实到修身齐家之中。他把修身养性作为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曾经为自己设立了十二项功课：“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作字，夜不出门。”与这十二项功课对应的是强烈的“慎独”、“改过”意识。他一生中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认真检讨，如实地记录下来。综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自艾自责的语句。譬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之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等。于是，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仅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天，他就连续一个多星期，写下了诸如

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日总是口过多，何以不改?”等。对于友人的忠告，曾国藩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邵蕙西曾当面责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诗文多执己见”、“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并决心“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修身之外，曾国藩还把理学贯彻到“齐家”上。他把为人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之方，直接地教导、告诫子弟，明确要求子弟为或不为，循循善诱。提倡“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娇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①]为了防止子弟骄奢淫逸，他晚年甚至为家中的男子和妇女订下如下的“功课表”：“吾家男子于‘看书定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多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顺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②]在曾国藩的教育下，他的长子曾纪泽精通诗文书画，后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清代末年，在处理西北边境危机中，从沙俄口中夺回了伊犁城，从而取得清末外交史上唯一的胜利。次子纪鸿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等也都成为教育家和学者。

容闳在《东学西渐记》中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学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当时七八个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皆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若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权威，财政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自肥其亲属。以视后来彼所举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而语矣。文忠绝命时，私产四千万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曾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谓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①]这种评价固然包含

① 《曾国藩治家严苛》，凤凰网专稿，2009年2月3日.

② 曾宝荪.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M]. 长沙：岳麓书社，1986：15.

① 戴逸. 中国近代史通鉴：洋务运动与边疆危机[M].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312.



了作者与曾国藩的私交情分，但也说明了曾国藩在理学修养上的成就。

四、曾国藩与晚清文学

曾国藩以名臣和战功著称，其实他在文学上也享有盛誉。钱基博说："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曾国藩，后称张之洞。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创之功。"曾国藩是晚清宋诗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桐城派古文中兴的关键人物。作为理学信徒，他提倡"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借诗文来传播阐释儒家之道，因此崇尚以理为诗的宋诗，作诗效法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

曾国藩论诗文注重"气"与"体"。"气"指的是气势神韵，是作者学识修养与雅正的情感的体现。他在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谕纪泽》的家书中云："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日记》云："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体"指的是诗文的立意布局。他曾说："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原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偏匀，乃始成章矣。"他论诗文也注重才情，讲求变化，标举"机神"。他认为凡作诗文，必须"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强调诗文中真挚、纯正的情感表达。在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谕纪泽》中又提出："凡诗文欲求雄奇矫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蹊。"他论诗文还有"机神"之说，所谓"机神"，就是创作中的灵感，这在中国诗学史上应占据一定地位。钱仲联先生评价说："王渔洋论诗标神韵，张广雅易以神味。余谓皆不如曾求阙机神之说也。"曾国藩论诗的"机神"说，初步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成为"后来同光体之导源"。

曾国藩一生著述不断，还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的影响。



第六节 谭嗣同

面对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涛恶浪，晚清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湖南人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不仅是维新政治运动的领袖，亦是晚清一位著名学者，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被称为“晚清思想界一彗星”而列有专章。

一、谭嗣同与维新变法

谭嗣同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少年时期即“薄视时文，不屑为教”，喜“为驰骋不羁之文，讲霸王经世之略”，曾自题八股课本曰“岂有此理”。他师从湖南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刘人熙，向往经世致用学问，接受了王夫之、黄宗羲、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学说，逐步形成了唯物主义观点与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树立了救世济民、改造中国的宏伟抱负。

谭嗣同具有卓拔不群、慷慨任侠的品性，他善剑术，好骑马，曾经游历天下，足迹遍及直隶、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等地。在游历途中，他结交同志，访求民情，目睹流民，“遂复发大心：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

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谭嗣同受到很大刺激。他写下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并痛感考据辞章无补



世事，决然抛弃旧学，探求新学，投身变法活动。

1897年，谭嗣同到湖南长沙，倡内河小轮船、商办矿务、湘粤铁路，筹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主持南学会，并任会长。每登台演说，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极受感动。湖南全省风气大开，与谭嗣同鼓吹新政思想是分不开的。

1898 年 6 月，光绪皇帝因感于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决心实行变法，起用一批改良主义的人才到中央政府担任官职。在改良派主将康有为、梁启超的推荐下，谭嗣同被授予四品军机章京职务，参与新政。但是，变法维新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极端仇视。他们经过密谋策划，决定要对变法人士进行镇压。在此情况下，谭嗣同只身会见正在编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劝说他发动政变，包围颐和园，以武力解决慈禧等顽固派。然而消息走漏，慈禧太后于 9 月 21 日发动政变，对维新派残酷镇压。变法失败，康、梁逃走，谭嗣同事先知道难免被捕，有人劝他逃走，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被捕后，他在狱中写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现了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临终时，他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的英勇牺牲引起了当时社会很大的震动，许多革命志士因此觉醒，奋起救亡，踏上了推翻清朝的革命道路。

二、谭嗣同的《仁学》

谭嗣同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学》一书中。

《仁学》的思想内容庞杂，包含了儒学、佛学和西学，其中西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中有政治学说，进化论原理，康有为的三世说和大同思想，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梁启超在为其所作的《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一文中写道："《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此书表明，谭嗣同面对世界巨变，试图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寻找一条新路，试图在综合各家的基础上寻找发展之道。

《仁学》的思想体系以"以太"与"仁"为核心。"仁"是

中国古代儒学的核心观念。谭嗣同以“仁学”命名这部重要著作，并非意在复兴儒学传统，而是以“平等”、“通”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来重新阐释仁的内涵，使得“仁”成为一个具有近代人文意义的观念。他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像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同时，他又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故而有“仁”可能使天地万物、人伦社会不至于产生“隔”和“塞”，并能够“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这样一来，一方面，“仁”由于具有“通”的根本要义而具有宇宙本体意义；另一方面，“仁”由于具有“通”、“平等”的含义而具有提倡平等、破除等级制度与封建专制的意味。

《仁学》的思想体系中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以太”，这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欧洲物理学界广泛使用的名词，当时科学家认为“以太”是一种传导电、光、热、磁的媒质，以此说明物质的相互联系与物质运动的连续性。为了说明宇宙的本原，谭嗣同汲取了“以太”这个概念并加以发挥，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的身体和耳目感官，以及日月星辰、声光电热等一切自然现象，均可以归之于“以太”，并且可以还原为“以太”。他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①]

①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293．

谭嗣同是封建罗网的冲决者，他在《仁学》的自叙中说：“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罗网，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纲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罗网。”

《仁学》重新评估了君权、父权、夫权。谭嗣同首先批判的就是君为臣纲的理论，质疑君主至尊的合理性。在他看来：“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根据国家起源否定了君主至尊。既然君主是因为需要管理公共事物才选出来的，君本身便没有什么神秘，君本人也是个



"民"，"君亦一民也，……民之子民，无相为死之理"。[1]谭嗣同还认为只有死事的道理，决没有死君的道理。为人臣者不要愚忠，根本没有必要为君效死。君如果残暴，人人可以杀掉他，无所谓叛逆。他说，如果君主象桀、纣那么暴虐，那么人臣也去辅助君王，实际的效果是辅桀助纣为虐，帮着做坏事而已。"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呜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为辅桀助纣者几希！"[2]那么，助纣为虐的人能叫他"忠义"吗？他认为后世曲解了孔子的学说，抬高了君主独裁，贬低了人民的地位，因此他说："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盗。"他认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强盗政治，儒家学说是为强盗政治效劳的奴婢文化。他指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这是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说："有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他所提倡的民主，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代替封建社会的君主独裁。

①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39.

②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40.

谭嗣同反君权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指向满族贵族的统治。他说："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野蛮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从容靦颜，挟持素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而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谭嗣同认为满族贵族一方面以野蛮凶杀的手段压制汉族，另一方面又用孔教君权至上来控制百姓，百姓还把满族贵族最高统治者奉之为天，这是一种极大的谬误。他还说："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其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兽，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验矣。"他列举清朝的腐败，追源于满族是一落后民族入主中原，其祸害更加惨烈。他并以清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纵焚屠杀等事煽起汉族人民对满族贵族的仇恨。

谭嗣同还探索了父权问题。有人认为父子关系这是天命，卷舌不敢议论，不敢提出异议。谭嗣同认为，这是"泥于体魄之言也"，是一种误解。他认为父子同是天生，同是天之子，应当是平等的关系，不能以父压子。

谭嗣同反对夫权，说："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

盛德大业，平等相均。”他反对重男轻女，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认为“残毁其支体，为缠足之酷毒，尤杀机之暴著者也”。他还要求妇女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封建婚姻极为不满，认为在封建社会，妇女出嫁，“本非两情相愿，而强合漠不相关之人，絷之终身，以为夫妇”。他还强调“于古有下堂求去者，尚不失自主之权也。”“孔氏不讳出妻，夫妇朋友也。”[1] 主张夫妇要两相情愿，视为朋友，是平等关系；主张婚姻自由，夫妇不相和可以自由离开。

谭嗣同借用佛法平等、耶稣教天国之下人人平等、儒家大同思想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思想来反对三纲五常，但对于如何争取人的独立、平等、自由还缺乏具体方略。

与他少时任侠倜傥的性格相映照，谭嗣同一面期待着有作为的皇帝推行新政，另一方面他也期望着任侠。“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2] 他说日本也是如此，“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他的这种思想对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影响很大，革命派提倡暗杀手段直接继承了谭嗣同的思想。此外，谭嗣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思想，不仅在戊戌变法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也起了前驱作用。1903年革命派出版的《黄帝魂》，将《仁学》中的反满言论整段辑录，题为《君祸》，广为散发，成为革命派的理论武器。

①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50.

②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44.



第七节 毛泽东

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



创立者，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浴血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使一个蒙受百年屈辱的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一、毛泽东的思想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就在老师杨昌济的引导下，积极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进步学说，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化，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革命历程中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建设的指导理论。

毛泽东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它包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等。毛泽东思想的这些理论来自于中国各阶段的革命实践，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25年至1927年，面对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奠定了党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的理论基础，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及时总结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切体会到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通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对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对土地革命路线，对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农村与战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科学阐述，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引导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开

展解放思想的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他先后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光辉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夺取全国政权作了理论指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和策略、人民军队作战的军事原则和战略战术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

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观点始终贯穿其中，它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历来反对脱离实际去讨论问题，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重实际、重调查，曾多次与蔡和森等好友以“游学”方式深入湖南农村了解民间疾苦，还远游北京、上海等地向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学者求教。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他从实际出发，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20世纪40年代，他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即从“实际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将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相信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非常重视群众在革命建设中的作用。1927年2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群众路线”的科学概念。1943年，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



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毛泽东本人是紧密联系群众的代表，他在重大会议或重大决定之前，只要条件允许，都要到基层、到群众中去做一番调查研究工作，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符合实际。

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搞好本国的革命事业。早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党内一些人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致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就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独立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庄严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苏联试图干涉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时，毛泽东就逐渐与苏联拉开了距离，放弃了建国初期的对苏结盟的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苏矛盾上升，中国受到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中国与美国改善了关系，但仍然坚持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方针，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二、毛泽东的军事成就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他在革命实践中对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规律进行阐析写成的一系列著作，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纲领。

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毛泽东早在1928年至1930年年初就有深刻揭示。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中，他针对当时武装暴动、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方式，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此后，毛泽东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民族抗日战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他对战争有着透彻、全面的认识，他说："战争是从私有制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为此，他分析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从一切方面的努力中不断增加革命的战争力量，减少反革命的战争力量，使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面逐步变化，最后达到获得力量优势、战胜敌人的目的。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军队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中的作用，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为了确保有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早在1927年三湾改编和1929年古田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党指挥枪"，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后来又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人民军队建军的根本原则。

在军事战略上，毛泽东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提出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加强国防力量、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科学技术的重要思想。在军事战术上，毛泽东创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战术：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作战的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实现歼灭战，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力求全歼，不使漏网；采取恰当的作战形式，实行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力求主动，力避被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把对敌军的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结合起来，利用多种方式打击和消灭敌人。

毛泽东同时又是伟大的军事统帅，他凭着对中国革命战争性质的深刻认识以及天才的智慧，直接指挥了多次战役，善于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世界军事史上写下了令人瞩目的篇章。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反击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进行的重兵"围剿"，按照他亲自制定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的方式，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取得重大胜利。长征时期，蒋介石调集 40 万军队追击红军，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地区。毛泽东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避实就虚，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打乱敌军部署，寻机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 2 个师又 8 个团，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部 34 个旅 25 万军队进攻陕北，毛泽东审时度势，主动放弃延安，授命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采取"蘑菇"战术，在延安东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地区连续进行 3 次歼灭战，取得三战三捷，彻底粉碎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先后在辽沈、淮海、平津展开三次大的战略决战，他运筹帷幄，及时调整战略战术，制定了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消灭敌军力量 173 个师 154 万余人，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的军事成就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军事思想在当代世界具有重大影响。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第三世界广泛传播，成为许多国家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历史经验证明，越南、柬埔寨、莫桑比克都是通过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

三、毛泽东的诗词文章

毛泽东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古体诗词充满革命豪情，豪放壮美，他的政论散文纵横开阖，鞭辟入里。他的诗词以其撼人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为国内亿万群众广为传诵，而且被译成多种外文，介绍到了亚、非、欧、美的许多国家。他的文章收集在《毛泽东选集》中，为亿万中国人所熟读，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建设的指南。

青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曾熟读《韩昌黎文集》、《昭明文选》、《离骚》、《九歌》、汉赋、乐府、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学典籍，手抄过屈原的《离骚》和《九歌》。他好写诗词，虽不常作，“偶一下笔，却不同凡响：雄壮、豪放、气象万千，朋友们争相传诵”[①]，同学称赞他“鹜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概”，“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②]。在投身革命后，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挥毫遣兴，记事抒怀，以古体诗词抒写革命斗争生活，为后人留下六十余首诗词，为旧体诗词注入新的活力。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② 罗章龙．椿园载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7．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史诗，是中国人民当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反映，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毛泽东壮志豪情的写照。他新中国成立前创作的诗篇，是反映革命生活、歌颂革命军队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不畏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宽广胸怀的佳作。如《西江月·井冈山》描述了黄洋界保卫战中红军英勇作战，敌人仓皇逃窜的场景；《如梦令·元旦》反映红军行军的艰难以及战胜一切困难的豪情；《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抒写了红军进军中的豪迈心情；《七律·长征》概括了伟大长征的全过程，雄浑博大，张弛有致，是文学史上的壮丽史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诗词转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讴歌。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七律·送瘟神》、《七律·到韶山》、《七律·答友人》等诗篇中，诗人或是为人民革命的胜利而欣喜，为各族人民的团结而欢悦；或是借缅怀曾经建功立业的古人来赞颂社会主义建设；或是通过新旧对比，反映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赞颂中国人民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干劲和忘我劳动精神。这些作品突出地反映了新中国的现实生活，是对时代风貌的真实而形象的写照，也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限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品质和坚强信念。

毛泽东的诗词具有一种境界壮阔、气势磅礴的雄浑之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这些诗句以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者气魄、纵横寰宇的胸怀、奇特豪迈的想象，产生一种震人



心魄的内在力量。他的《沁园春·雪》寓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于北国雪景的描绘之中，在历史人物的评点中抒发无产阶级雄视百代、创造崭新历史的伟大抱负。此词发表之后引起轰动，诗人柳亚子高度评价这首词的美学价值，认为“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苏东坡、幼安，犹瞠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毛泽东历来强调文艺为大众服务，因此在他的诗词中，选用的词语往往是那些现代人的大众化的语言，这些语言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内涵深意但普通老百姓也能一看就懂。他的诗词善于用典、化用古语，同时又能别出新意，如“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赋予传统神话传说以新的意义。又如《卜算子·咏梅》一改前人格调，赋予传统的咏梅词以高远而独特的意境。

毛泽东也是20世纪的散文大家，他的散文尤其是政论文，是规范、典雅白话文的代表。早年毛泽东的散文创作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又学习了韩愈古文的写法。如《商鞅徙木立信论》等，笔力挺拔，激情昂扬，针砭时弊，议论风生。在延安时期，在完成《实践论》、《矛盾论》、《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华民族气派的政论文章，“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第一次为我们统一了新社会的口径，约定了口气和表达情感的方式”，[①]影响了此后中国政论散文的写法。

毛泽东在散文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的“言之有物”、“新鲜活泼”以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散文特征。毛泽东认为，“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纵观毛泽东的散文，有鲜明的针对性，或是针砭时弊，或是阐明道理，或是抒写真挚的感情，绝无应景无聊的文字。他的作品如《反对党八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自由主义》等，都是指导全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散文的外在表现方式极富生命力，其文章标题直接有力，形象可感，如《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这些文章，标题直接表明了文章的主题与作者的态度。毛泽东行文笔法多变，或是比喻说理，或是直指本质，或是言简意赅，或是形象生动。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一文中，他由近及远概括了人民英雄的奋斗历程，在《反对自

① 任敖霜．毛泽东散文作品赏析[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由主义》中则以轻松诙谐的笔触，刻画了自由主义者的各种表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则借用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来批评主观主义者。毛泽东的散文具有独特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语言风格上是典范的白话文。一方面他的文章语言质朴自然，普通群众也能够读懂。他还喜欢用典，将那些文言词句化入质朴自然的口语之中，使文章更加耐人寻味。另一方面，他的散文在用字造句之间有着传统文言文的功底，在语言结构上注意音节停顿，体现出古典庄重的韵味。“四言结构的密集化，是毛泽东政论白话文的一大特色，一尊长处”[1]，同时，“四言结构的整饬、密集化和理性教导的增长使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常常气势滔滔，形成不可抗拒的言说力量”。毛泽东的散文特别注重修辞，常常根据表达主题的需要，或用比喻化抽象为具体，或以对比道明本质，或是形象说理，手法多样，运用自如。

① 文贵良.政论白话文：毛泽东的话语形式[N].湖南大学学报.2008(4).

四、毛泽东的书法

毛泽东是书法巨匠，被公认为20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他的行草法前人而开新风，创造了极具个性魅力的书法艺术风格，被誉为“毛体”。

毛泽东早年在私塾读书时就对书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曾广泛地研习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人的法帖，并在游历中留意考察古代碑石、佛家写经和民间书法。从现存毛泽东手书《离骚经》、《夜学日志》题字以及《致萧子升》来看，这一时期的书法是以晋唐楷书为规范，涉猎魏碑等各家书风，形成了严谨、开张、强健、瘦劲的风骨。

从领导中国革命到建国后，毛泽东一直不忘披览碑帖，挥笔习书。从江西根据地万里长征到延安，毛泽东身边别无长物，却一直把晋唐小楷等他阅读临写过的法帖带在身边。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陈秉忱回忆道：“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看，毛泽东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常阅读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带在身边）。新中国成立后，更多地阅读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余年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约有六



百多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泽东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①]

毛泽东对于书法艺术的见解，目前未见系统记载，但他在与工作人员交谈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他主张字要骨神兼备。“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他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就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他主张既广采博取，又独具风格。“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②]

和他的见解相应，毛泽东书法也是出于古人但不拘成法，得其神韵而别有创新。他的狂草来源于张旭、怀素。田家英认为，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大；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自肆的写法；四是在“神”上很相似。[③]但是，毛泽东又不完全同于怀素，在笔画、结构上有所变化：怀素《自叙贴》的笔画细圆遒劲，毛泽东的笔画细圆柔韧；怀素《自叙贴》的结字较长，毛泽东的结字长中多攲侧。[④]毛泽东的书法，在师法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毛泽东一生没有评价过自己的字。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字“与诗相称，似乎适宜”。和他的诗词一样，毛泽东的书法充满了浪漫豪情，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与强烈的视觉美感：既充满激情，又法度严谨，根植传统，博大精深；结字神奇，俏俊飘逸，行笔如神，不物成规，是中国书法史上一座巍峨耸立的丰碑。

① 李青．形而上下——艺术实验与美术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17.

② 参见周宏让主编：《跟毛泽东学文》以及李敏、高风、叶利亚主编《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③ 盛巽昌．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④ 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第八节 齐白石

齐白石（1864—1957），名璜，字萍生，号白石，别号借山馆主者、寄萍老人、老萍、杏子坞老民、木人、木居士等，湖南湘潭人，我国20世纪著名画家和书法篆刻家。曾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1949年7月、1953年9月两次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连续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1954年8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毛泽东主席交谊甚深并受到接见。1953年1月文化部授予其“人民艺术家”称号。1955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授予其通讯院士荣誉状。1956年4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其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1963年诞辰100周年之际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是我国唯一一个获得中国20世纪十大书法家之一和20世纪十大中国画家之一称号的艺术家。他作有画作三万余幅、诗词三千余首、自述及其他文稿并手迹多卷。有《白石诗草》、《白石印草》、《齐白石作品选集》、《齐白石作品集》等传世。他自认为篆刻第一，诗词第二，书法第三，绘画第四，实属诗、书、印、画全入神品的千古伟人。

一、齐白石的画风

齐白石1877年13岁时跟随叔祖父学木匠，次年改学雕花木工，从民间画工入手，曾习古人真迹，摹《芥子园画传》并据以作雕花新样。1888年起始学画。1890年26岁时转从萧芗陔、文少可学画像，27岁始从胡沁园、陈少蕃习诗文书画。衰年变法，师法陈师曾、徐渭、朱耷、石涛、吴昌硕等，形成独特的



大写意国画风格，开红花墨叶一派，与吴昌硕共享“南吴北齐”之誉。

齐白石花鸟虫鱼、山水、人物无一不精，无一不新，尤以花鸟画见长。他的花鸟画作笔酣墨饱，力健有锋。但画虫则一丝不苟，极为精细，尤工虾蟹、蝉、蝶、鱼、鸟，水墨淋漓。齐白石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想，经常注意花、鸟、虫、鱼的特点，揣摩它们的精神。他曾说：为万虫写照，为百鸟张神，要自己画出自己的面目。因此他所画草虫妙趣横生，一派天机，充满天真的童心和淳朴的乡情。他是中国绘画史上为草虫写照种类最多的画家，所绘草虫多达百余种，几乎没有什么草虫不可入画。在他的草虫世界里，纳须弥于芥子，以小寓大，寄托着对众生平等的博大挚情，充溢着炽热的生命意识，人们从中看到了春意盎然的生命景色，感受到一种祥和平静的生活乐趣。

齐白石的画作至“简”至“朴”、至“拙”至“厚”的风格在他的山水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山水画构图出奇出新，无常法而又合法，貌似平淡的笔调，大气磅礴、纯净明丽，每一笔似乎都饱含着家乡的泥土气息，每一根线条似乎都凝结着大自然的露珠，清新而华滋，深厚而通俗。在似与不似之间，或轻或重、或明或暗地表现出山水灵性的本质，在大开大合中见出细腻、朴素的善良与乐观的坚强。

齐白石的画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题句颇有意蕴。他画两只小鸡争夺一条小虫，题曰：“他日相呼”，一幅《棉花图》题曰：“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其题句诙谐而巧妙。《不倒翁图》题曰“秋扇摇摇两面白，官袍楚楚通身黑”，对腐败官场和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卢沟桥事变后，他画《鸬鹚舟》并题诗曰：“大好江山破碎时，鸬鹚一饱别无知，渔人不识兴亡事，醉把扁舟系柳枝”，影射了那些贪官大亨宰割临头却依然麻木不仁的丑态。

齐白石画作继承融汇了元明以来中国传统文人绘画与民间艺术的精华，发展了20世纪中国画的表现力度与生命情趣，树奇帜于现代艺苑，别开生面，大俗大雅，雅俗共赏。因而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绘画史上，没有哪位艺术家像齐白石那样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即使在当前艺术流派异彩纷呈，观众审美趣味也日益多元化的现状下，齐白石的画作品总是让人百看不厌，从中感受到经典作品的永恒魅力，从而赢得了人们普遍的敬意和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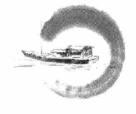
二、齐白石的篆刻

齐白石是中国篆刻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中国篆刻史上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个是秦汉，一个是明清。秦汉是中国篆刻的繁荣时期，秦印苍秀灵动，汉印宽博沉雄，显示出古朴典雅的风格。至明清时期，篆刻作为一门艺术被文人所推崇，成为文人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出现了以丁敬、黄易为代表的浙派和以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为代表的皖派。浙派印人尊法秦汉，喜用切刀，颇露锋颖，具阳刚之气。皖派印人讲究篆势，善于变化，运刀如笔，流利清新，有阴柔之美。吴熙载、赵之谦等以书入印并在秦汉印、封泥上寻找自己的篆刻语言，吴昌硕以石鼓文入印且将封泥、瓦当融进了自己的篆刻。齐白石则将《天发神谶碑》、《秦权》和《三公山》等碑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自己风格独特的艺术语言，为后世设立了一个无法超越的高度。元明清三代至近代名家以不同的表现风格弘扬了印章独具的艺术价值，其中属于开宗立派的人物当数吴昌硕和齐白石。

齐白石篆刻起步较晚，他初学丁敬、黄易，后仿赵之谦、黄牧甫，并取法汉印。最后发现《三公山》及《天发神谶碑》最符合自己的性情，尤其是“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天然，又一大变”。找到了适合自己性情的碑刻之后，他便试图营造自己的篆刻语言。随着篆书风格的不断形成，他的篆刻也在不断地走向成熟。继秦汉印风而独树一帜，将大写意印风推向极致，最终成就了他在中国篆刻史上的地位。

齐白石篆刻艺术的特点，一是开拓性。其篆刻对刀法和章法的拓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将绘画中大写意的性格、构图带进了他的篆刻，章法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极富情感。二是不可重复性。齐印用刀独特，风格强烈，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无法复制的高度，令后人无法复制它的味道和图式，即使学齐白石的风格创作，也很难达到他的精神高度。

齐白石印章的意境来源于诗，刀法来源于书法，章法来源于绘画，篆刻艺术和诗、书、画共同提高发展。齐白石篆刻刀法、篆法、章法均堪称独树一帜。其刀法，单刀侧锋直入，尤其大印更有雷霆万钧之势，呈现出纵横雄健之气。正刀与侧刀



配合使用，线条千变万化。其篆法在继承《三公山》与《天发神谶碑》风格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其章法则追求变化纵横参差，敢为人所不敢为，形成了极具个性特征的齐白石印风。阴文代表作“大匠之门”、“八砚楼”、“借山吟馆主者”等勇猛精进，大气磅礴，参差之美俨然，令人击节叹服。阳文代表作“三余”、“江南布衣”、“人长寿”、“我自作我家画”等则奇崛纵横，盘纡回荡，跌宕有致，意味深长。这些印章精品，与老人的书艺相似，完全是“自家须眉”，不见古人痕迹，正体现出老人不平常的创造力与革新精神。正如刘海粟在《齐白石印汇·小引》中对齐白石篆刻艺术的评价：“翁治印具大艺人胆识心胸，了无匠气，老而弥壮。方寸之内，天地宽宏。出入诸家，收放自如。”老人的印艺无愧色地实践了他“扫除凡格总难能”的印学主张，衡诸印史，足可睥睨凡格，别树大纛。

三、齐白石的书法

齐白石的书法与他的画、印一样，饱满酣畅，意气纵横，捭阖之中别具大美深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欣赏他的书作，总会有一种阳刚之气扑面而来，让人领略到书作者对于生活、对于生命的积极态度与热情礼赞。如果说齐白石的绘画表现了明确的平民意识与朴实健康的审美情调的话，他的书法也同样如此，只是表现得更抽象更隐晦些。齐白石书法个性极其鲜明，一是笔墨功夫极深，非一般人所能。李可染先生曾评论：“笔墨……讲得最好的是黄宾虹，实践最好的是齐白石……齐白石的字写得很好，力能扛鼎。”二是书写特点突出，一些字不守常规笔顺，常以新的面貌出现。三是行笔滞涩，拖笔较长，但滞涩而有韵，拖长而增奇。

齐白石书法艺术的成就主要在行书和篆书两个方面。行草多用于画跋或书名、题识等，舒展大气，与画中形象相映生辉。而自由书写的日记、便笺等最见性情。他的篆书多用于以擘窠大字写楹联、中堂、横披。其篆书字体不是规范的小篆，也未上溯到金文甲骨，而是在篆隶相间中抒发豪迈、放逸、自由创造的精神意趣。齐白石的篆书时时处处方方面面都是“一以贯之”地独开生面，把视点定在鲜为人取法的奇古、奇肆、凌厉、险绝的篆书系统，向篆中的寂寞角地采撷属于他自己的美感表

现。《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开通褒斜道刻石》、《曹子建碑》等"奇趣"型的作品成了他的灵感宝库。在这偏僻的角地老人硬是"化臭腐为神奇"，苦耕细作，开辟出奇崛生辣、开合吞吐的审美新世界。其作品夸张疏密对比，收放有致，结体颇见匠心独运的奇险与大胆，而用笔却凝重沉厚，如折钗股，如锥划沙，如印印泥，具有震撼力和表现力，一种夭矫不凡之意跃然卷楮之上。至于晚年，行书篆书愈加成熟，书作达于随心所欲而中矩的境地，卓然不群，妙化无端。

齐白石的书法是从学习临摹前人书法开始的。他自述"书法得力于李北海、何绍基、金冬心、郑板桥与《天发神谶碑》，写何体容易有肉无骨，写李体容易有骨无肉，写金冬心的古拙，学《天发神谶碑》的苍劲。"齐白石早年学书，启蒙于清代流行的"馆阁体"，26 岁时专临何绍基，书体酷似，沿用十多年。40 岁写《爨龙颜碑》，43 岁左右学金农，也是深得其髓，此书体沿用二十多年。此外还专攻过郑板桥、吴昌硕、魏碑等。其所学各家均用心体悟，不辍临池，深得其法，写得极像。如果把齐白石书法艺术的发展划成两大阶段，大概可以 60 岁为界，在此之前，书法风格基本徘徊在何绍基、金冬心、郑板桥、李北海、吴昌硕诸家之间。60 岁之后，齐白石的书法和绘画一样，走的是"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的实践。正如齐白石自己所说"苦临碑帖至死不变者，为死于碑下"。他对各家融会贯通，创新发展。其行书追求中宫收紧，左势坚守，右上开张，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其篆书则笔画纵横，简洁老辣，内实外展，结体自然。到七八十岁，齐白石书法经过数次升华，行笔雄健，精致苍劲，风格独特，大气磅礴，成为最典型的"白石书体"。

四、齐白石的人品

齐白石是一位始终守望真、追求善、热爱美的天才的艺术家。在勤勉自励和追求真善美的艺术探索之中，他始终保持着艺术家可贵的良心和作为一个有性情的画师那种大爱大恶的"是非"之感。烂漫天真、体物入微、礼赞生命几乎是他一生艺术的永恒主题，也是他的天生性格。没有"爱"，便没有齐白石；没有执著的个性之"爱"，也没有齐白石。齐白石是用"爱心"自如地歌吟他的诗、书、画、印的。如果我们不能以童稚



般的“天心”与“真眼”去贴近这位艺术家的心灵，我们就很难理解齐白石，也很难读懂齐白石的作品。

齐白石是一位在创作上十分刻苦勤奋的艺术家。他每日挥毫不止，砚耕不辍。据资料记载，老人如遇疾病等要事未能作画，康复后一定要补上所误。一生抱着“天道酬勤”信条的白石老人，坚信艺术创造离不开刻苦的实践。有印曰“痴思长绳系日”，其情可掬，其志可勉，其意可感。

齐白石是一位处事十分认真的艺术家。李可染在《谈齐白石老师和他的画》一文中回忆，老师写字和作画一样，从不会“信笔草草，一挥而就”。“比如有人请他随便写几个字，他总是把纸叠了又叠，前后打量斟酌，有时字写了一半，还要抽出笔筒里的竹尺在纸上横量竖量，使我在旁按纸的人都有点着急，甚至感到老师做事有点笨拙，可是等这些字画悬了起来，写上又会使你惊叹，你会在那厚实拙重之中，感到最大的智慧和神奇。”

齐白石是一位十分谦逊诚实的艺术家。老人 70 多岁的时候还常对人说：我才知道，自己不会画画。人们称赞老人的谦逊。老画家仍然坚持说：我真的不会画。老人对自己的画也有不满意的，曾经，白石老人还与毛泽东、郭沫若争夺过一张“废画”。在书画作品中出现笔误或漏字时，他一定会在文末注明，绝不欺衍欺世。齐白石 82 岁书王安石诗，误将“水”字写错，特在题记中说明：“‘水’字篆成‘川’字，殊堪一笑。”

齐白石是一位有骨气的艺术家。在他 40 多岁时，就有人推荐他当慈禧太后的“内廷供奉”，被齐白石婉拒；后来又有朋友愿意为他捐个“县丞”，亦被拒绝。对上层人物的提拔，齐白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抱定主意，誓不为官。他在《钵中花》一诗中说：“数亩香粳满院麻，老农身世未应嗟。受人恩即多拘束，笼鸟朝官钵里花。”他还为此刻闲章“独耻事干谒”以铭记，可见他对旧社会官场的疏离和对自由的渴望。

齐白石还是一位爱憎分明的艺术家，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强邀齐白石赴宴作画。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纸挥毫。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众人赞不绝口，宣铁吾喜形于色。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题了一行字：“看你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仰头拂袖而去。有个汉奸求画，齐白石画了一个涂



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还题诗“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妆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予以讽刺与抨击。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齐白石闭门不出，还在大门上张贴出条子：“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在严寒无火的冬天，他把学校配给他的煤球退了回去，宁可全家受冻，也决不受敌伪政权的施舍。

第六章

湖湘民俗风情

民俗风情是民族性格、心理习惯和精神的表征，是最显地域特色的元素。湖湘自古就是多民族集中的地区，除汉族外，湖南境内至今已经居住着五十余个少数民族，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居住时间最长、历史最为悠久。湖南境内人口较多的几个少数民族大都分布在湘西、湘南和湘东地区。在不同的地理和社会环境、经济和生活条件、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的作用下，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成体系、特色鲜明、风格各异的民俗文化，并孕育了具有深厚社会历史底蕴和浓郁地域特征的湖湘民俗风情。









第一节 湖湘民俗的主要特征

风俗习惯，民情风尚，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生命意识、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民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往往以最初始、最广泛的形态，具体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精神心理状况。世界如此，中国如此，湖南亦如此。但是，湖南特定的自然环境、特定的历史文化又决定了湖湘民俗独具的特征。

一、丰富多样

湖湘不同的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与民情风俗，表现出其民族独有的特征与个性。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演化，从而使湖湘民俗风情呈现出多元共构、相互融合又差异明显的丰富多样性特征。

最能够反映出湖湘民间习俗丰富多样的是民间的宗教与世俗信仰。在湖湘汉民族聚居区，人们崇拜各种自然神和社会神。佛家的菩萨、儒家的孔子、道教的土地、城隍、仙人等都是人们所崇信的对象。在南岳，儒释道三家同处一山，一同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这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湖湘少数民族则崇奉本民族的英雄或者部族首领、自然神。在民间信仰方面，东部湘资流域有朝岳的习惯。但在西部沅澧流域，没有像南岳这样区域性的民祀对象，许愿还愿比较分散。信仰的民间神祇，也有比较大的差异。西部沅澧流域，对马援非常崇拜，伏波庙遍布各地。竹王崇拜也很普遍，而且还发展为天



王神。但东部湘资流域就没有对马援和竹王的崇拜。

湖湘大地东南西三面皆山地，中部和北部多为低矮的丘陵、盆地和河谷冲积平原，整体地势呈向北开口的马蹄形。各区域地理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对湖湘民俗的多样性特征发生影响。早在汉代杨雄编著《方言》时，就已指出湖南地区文化存在着“江湘之间”与“江沅之间”、“沅澧之间”的明显差异，也就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别。相应的，湖南民俗亦存在着以湘资流域为区域的东部地区和以沅澧流域为区域的西部地区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饮食习俗、岁时节日文化、礼俗文化等多个方面。例如：在婚姻礼仪方面，东部湘资流域许多地方歌堂风俗非常盛行，西部沅澧流域哭嫁习俗比较突出。湘资流域送亲客一般都是男性，长沙地区甚至有“姐送妹，送绝代”的说法。沅澧流域多是女性，尤其是娘家嫂子必往。湘资流域新婚夫妇多在婚后两三天回门，沅澧流域很多地方在第九天或者一个月后回门。有些民俗甚至还存在一县之区别，有的风俗，其细枝末节的差别，可以存在于一乡一村之中。

二、和洽乐群

湖湘人热情乐观，热爱生活，生活中实用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但骨子里亦不乏浪漫的诗性气质。因此，湖湘日常礼俗、人情交往、甚至宗教信仰，在注重实用的同时也洋溢着和洽乐群的愉悦，散发出浓厚的生活气息与人间温情。

在湖南，人们非常讲究睦邻友好，互信互助，团结协作。邻里有困难或有需要，多自动热情相助。比如以前农村建房屋，左邻右舍和周边村子里的人都来帮忙，不但不需要付工钱，有的还带来豆腐、鱼肉等礼物，叫“助工”、“对工”。遇红白喜事亦是如此，大家都不计报酬地来“帮忙”。“对工”所出的力不一定完全对等，但绝不会有人计较。遇其他大事，乔迁、中考、荣升、远出、荣归、寿诞、三朝、满月等，亲友邻里都会上门道贺，馈赠钱物。当然也有因鸡鸭蝇头小事而闹得老死不相往来者，故有“若要邻里和，少养鸡鸭鹅”之说。

湖湘农家的房屋大都是开放式的俗称“一担柴”的结构，对外人毫不设防。厨房内一般设有“火塘”，既是煮饭、烧水的地方，也是烤火和接待客人的地方。特别是冬天，客人来访，



递上一杯热茶，烧旺一炉柴火，让来访之人顿时寒意全消。冬季一家人常围炉夜话，闲话家常，沟通感情，呈现出一种和睦安闲的温馨气氛。长沙地区乡村人还喜欢坐人家，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总有说不完的话，有的一个晚上连坐几家，深夜才归。

湖南人也爱热闹，在农村，平时喜欢三五成群凑一块嘻嘻哈哈。在生产劳动的时候，喜欢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追逐打闹。结婚办喜事，不把新郎脸涂得跟李逵似的绝不罢休。大年三十做年糕，如有人来访，必奉上一块年糕，吃得客人打嗝，心里才舒坦。准备过年时最为热闹，家家户户捞鱼杀猪，吃“杀猪菜”，热热闹闹，一派喜气洋洋，表现出和洽乐群的生活情调。

三、尊礼重情

湖南人尊礼重情，讲究情义。在汉族地区，因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多重伦理君权、师道德行，崇奉孔子。过去，很多民居堂屋都立有“天地君亲师”牌位，教书先生备受尊敬。如徐特立 1904 年在宁乡师范学习 4 个月，当时朱剑凡任教。日后几十年，徐一直以“受业徐特立”敬侍朱先生，尽管徐位尊且长朱 6 岁，拜师学艺，对师父师娘毕恭毕敬。无论城里还是乡下，男女老少接人待物都注重礼节。有“三代不忘媒，九代不忘师”之说。坐席要将长辈安排在尊位；出行年轻人要为老年人让路；婚丧喜庆，也有一整套礼仪。

湖湘少数民族在情礼文明上比汉民族有过之而无不及，土家族、苗族、瑶族等民族在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中都很注重礼仪。不仅亲族往来，有优良的礼俗风尚，就是与一般人往来，也很讲究道德规范。一切都讲究文明礼貌，维系民族传统美德。

四、信鬼好祀

楚人入湘后，与原住各少数民族文化交融。楚人崇巫，南方地区信鬼神，两相融合，形成了湖湘“信鬼神，好淫祀”的民俗特征。而在崇巫这一点上，又区别于其他地区：秦人和宋



人崇巫，多妖邪气；越人和淮人崇巫，多鬼魅气；而楚人崇巫，却是多人情味。如屈原作品中的神——湘君、湘夫人、山鬼等等，或者美丽绝伦，或者天生多情，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的形象。湖南各地的傩戏、目连戏、花灯戏等，都是既娱神又娱人，至今湖南人心目中的神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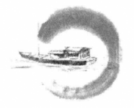
湖湘民俗受楚地巫风文化的影响异常深刻，人们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习俗、社会生活习俗、信仰与禁忌，无不深深打上楚巫文化的印记。楚巫文化渗透到社会及人们思想、行为的各个方面，赋予了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湖湘民俗风情以十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丰富多彩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使时至今日，在一些偏远地区，人们还可经常见到一些地方迎神降巫的祭祀活动。在怀化、常德，甚至像较为发达的株洲东部一些地区，每到年关，许多地方都会把当地的一些带有神异色彩的名公异人、奇怪物件抬将出来，四乡游走享受人间烟火，接受百姓的供奉祭拜，给人们带去吉祥平安的祝福。而在具体的迎神过程中，不仅有器乐的演奏，同样也伴有各种各样的念词与舞蹈，是歌、乐、舞的综合。沈从文笔下的《神巫之爱》就展现了这种情景。



第二节 巫文化与湖湘民俗

巫风，是指以歌舞礼神事神、祈求鬼神消灾降福的风俗。湘楚巫风文化盛行，对湖湘精神生活、思维方式、民俗风情、文学艺术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巫风是南楚独特的一种风俗文化。但凡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所形成的，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从自然环境来看，湖南的地理位置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纯属“四塞之地”。就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王国”，原来居住着越人和蛮、濮等民族。湖南最初的本土文化就是这些原住民创造的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巫傩文化。



湖南封闭的自然环境无法禁锢其社会环境变化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征湘，楚人、巴人等楚国境内的民族相继进入湖南并逐渐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使楚文化成为后来湖湘文化的源头。到秦灭楚统一六国后，中原文化南下入主湖湘，湖南原有的本土文化——巫傩文化因为汉文化进入被迫退却到了湘西与湘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即今天苗、侗、瑶、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由于这些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几乎与外界隔绝，所以这些地方通过代代传承，得以保留着远古湖湘巫傩文化的一些内容和形式。即使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儒家的人本主义和道家的自然主义的思想的冲洗，北方人的神鬼信仰已经淡薄，理性精神确立起来。而位于中国南部的楚地仍流行巫术迷信，反映在民俗文化里就是巫风巫仪的盛行以及一些与巫鬼迷信密切关联的风俗习惯。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论及湖楚民俗时说："其俗信鬼而好祠。"《隋书·地理志》也认为荆楚之地"率敬鬼，重祠祀之事"。巫俗以楚为盛，楚文化保留了较多的远古传统，是信鬼神、重祭祀的文化。元稹曾在《赛神》中感叹："楚俗不事事，巫风事鬼神。"

迄今为止，湖湘民间仍有些老人用掐数打卦来卜吉凶；在外面张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的符咒来给晚上哭闹的孩子招魂；用"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表示对神灵的膜拜；死了人以后做道场、唱夜歌；生病后求菩萨、喝符水，等等，无一不是巫文化的遗存。集楚巫文化之大成的梅山文化，在今天的新化、安化及雪峰山区一带仍很常见。从古至今，巫文化以各种形式顽强地生存于湖湘民俗风情之中，深深地影响着湖湘人民的民间信仰与禁忌、祭祀活动、文学艺术以及湘人的日常生产生活。

一、巫文化与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就是说，是非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比佛教信仰和道教信仰更具有民间的特色。中国民间俗神信仰的典型特征，就是把传统信仰的神灵和各种宗教的神灵进行反复筛选、淘汰、组合，构成一个杂乱的神灵信仰体系。不问各路神灵的出身来

历，有灵就香火旺。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世俗信仰的多元性和功利性。所以说，中国民间信仰具有多教合一，多神崇拜的特点。

湖湘民间信仰神主要有雷神、土地神、水母娘娘、仙娘等。信神活动则主要有求神茶、收吓、告阴状、中元祭祖、送灶神、还傩愿等。

雷神是汉族民间自然信仰神之一，湖湘各地均信仰此神。在湖湘民间，特别是农村的老百姓心目中，雷神是惩恶扬善的正义之神。凡忤逆父母、偷鸡摸狗、淫人妻女、糟蹋粮食者，或做了严重损人利己、伤天害理事情的人，便认为有朝一日必遭雷打火烧。谚云："雷打十世恶，蛇咬三世冤"、"忤逆不孝，雷打火烧。"如某人被雷火、闪电击死、烧死或烧伤，旁人定会疑其做了亏心事，因而受到雷神的惩罚，得到了报应。其家人还得备三牲、焚香点烛烧纸钱祭雷神，请求雷神息怒和宽恕。农村邻里起争执，如果一方认为自己吃了很大的亏，受了莫大的气，已到了刻骨仇恨又无法在现实层面赢得对方时，便会使用一招"阿 Q"式的法子，咒骂对方将遭雷打。到了这个程度，梁子就永远结下了，这争斗的双方估计永世都不可能和解。现在生活在都市的一些人，如果自己或父辈曾是农民，也许不乏体验。每当饭菜掉落地上，父母会提醒不要踩到，以免遭雷打；吃剩的饭菜不能倒入茅坑或下水道，否则会遭雷击。诸如此类，与雷神有关的生活规矩，不胜枚举。

土地神也是汉族民间崇拜的自然神，信奉土地神的习俗流行于湖湘各地各民族中。民间敬奉土地神，既为祈求保佑，亦为感谢土生万物的功德。据传每一个人都有管辖他的土地神，从生到死。人生在世时，稍有不如意，特别是有小的病痛，家里的长辈首先想到的必是敬土地。人死之后，主持仪式的司公道士也会询问死者出生的土地辖神。土地神仿佛是人们身边触手可及、有求必应的万应之灵。旧时平民百姓生儿育女，为求易养，常常拜寄于土地神，以"土"字命名，求土地神庇佑。每逢初一、十五和二月初二土地生日时，有求于土地神送子、送财、送福者必诣土地庙焚香点烛烧纸宰雄鸡祭拜。有灵验者必请泥木师傅重修土地庙宇，有的请绘画师重新装饰土地菩萨，谓"敬奉新服装"，以求土地神庇佑。湖湘民间随处可见土地庙。土地神虽为小神，俗谓"土地土地，只管五里"，但所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俗云："土地不开口，老虎不拖狗；土地不吭



声，野猫不咬鸡。”“千里的来龙，斗不过土地神。”

水母娘娘是湖湘民间信仰习俗中的水神，其信仰风习流行于全省、尤其是洞庭湖区船民之中。旧时，船民为保航行顺利，生命财产安全，多在船上立有神龛，供敬奉水神，其中有一位被崇拜敬称为“水母娘娘”。传说水母娘娘是鲁班的妹妹，曾经鲁班所造之船下河后，船总是在河中打转，不能前行，坐在船尾的鲁班妹妹贪玩，将一只脚伸入水中戏水摆动，船就不打转了。鲁班受到启发，在船后加了一只木脚，即船舵，船就能按船夫的意愿平稳顺利地航行了。因此无心插柳之功，鲁班的妹妹受到船民的崇敬。船民在敬奉水上保护神时，亦敬奉这位对造船有过贡献的当年的小女子、日后的“水母娘娘”，祈求“水母娘娘”神力保佑航行一路顺风，安全驶达。

仙娘是巫文化的一部分，指的是能言善辩的妇人，先发狂病，后成女巫。行巫不必学习，无从传授，只设一神坛，放一平斗，斗内装满谷子，插上一把剪刀。有的什么也不用，就可正式营业。执行巫术的方式，是在神前设一座位，行巫者坐定，用青丝绸巾覆盖脸上，用半哼半唱方式，假托亡魂说话，谈别人家事长短，儿女疾病，远行人情形。谈到伤心处，谈者涕泗横溢，听者自然欷歔不已。

求神茶是湖湘传统社会习俗。一直以来，湖南民间每当有人患病时，其亲人除求医问药外，往往还要去庙中祈祷，携带茶叶供奉于神祇前，即所谓“求神茶”。也有的是携带茶叶至有梅山法术的人家，让其在茶叶上作法。将神茶带回家冲泡，让患者连同茶叶一并服下，据传可以驱邪祛病。神茶对治疗那些因心理作用产生的病症有时确实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在民间很有些市场，“求神茶”的习俗历久不衰，茶因此与巫师、神庙、菩萨、信徒结下了不解之缘。20 世纪 60 年代，宁乡沩山密印寺大佛殿中，在佛像体内发现茶叶 30 余斤，揭开时满殿盈香，令人惊叹。“文革”期间，红卫兵打破衡山寺院中佛像时，也发现腹内藏有茶叶，因年代久远，已成灰土。

收吓是湖湘旧时巫术信仰习俗，流行于全省许多地区。但凡小孩夜间啼哭不止，或精神萎靡，或食欲不振、黄皮寡瘦，民间就认为是孩子受了惊吓，魂不附体，须进行喊魂收吓。长沙地区一般是置一盛满水的水缸，由长辈对着水缸喊孩子的名字，孩子大声答应就行。湘南地区是手持一张渔网，到失魂（孩子回忆出的受吓之地）的三岔路口喊魂，一般由孩子的母亲

或祖母、伯母执行。焚香点烛烧纸钱后，用渔网捞三次，喊三声："某某（小孩名字）回来哟!"喊的人自喊自答"回来了!"或另外的人回答："回来了!"直至喊到家中，在小孩身上轻轻敲三下为止，一连喊三个下午。湘西地区则请仙娘或巫师收吓。仙娘或巫师先作法确定孩子受吓方位，家长即根据所指方向，于夜里烧纸钱，泼水饭供鬼，祈求将小孩游魂放回。有的端着筛子，内放筷子、鸡蛋和三杯水酒，由两个人到土地堂压纸钱喊吓，回家时走前者喊："某某回来哟!"后者答："回来了!"直喊到家门口，在门槛上蹬三脚，把蛋煮给小孩吃，以为如此便能收回小孩之游魂。

告阴状是民间神判习俗。流行于全省许多地区。旧时人们对阳世间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往往求助于神力，认为冥冥中有神主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神的力量是广大无边、无所不能的。一切恶事，在神力面前定得报应；一切恶人，在神力面前都得屈服。故蒙冤受屈备受欺凌又无能对抗、无处申辩时，便将自己受害的事实经过与作恶人的姓名、年龄、性别、罪状写在纸上，焚烧于神前，或于神前下跪倾诉冤情，告知恶人姓名，请法力无比的神伸张正义，惩罚恶人，称"告阴状"。"告阴状"是旧时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表现，现在称暗中告状为"告阴状"，是一种极不好的行为，应当摒弃。

中元祭祖是一种祖先信仰习俗，流行于湖湘各地。农历七月十五，是汉族最隆重的传统鬼神祭祀节日，佛教称"盂兰盆节"，道教称"中元节"。湖湘一般称为"七月半"、"鬼节"。"鬼节"源于人类的鬼魂崇拜。"七月半"是鬼怪们欢乐的日子，据传阎王老爷会命令打开鬼门关，放阴间鬼魂回到阳间子孙处享受祭祀，阳间没有子孙的孤魂野鬼则到三岔路口享受祭祀。湖湘习俗，每逢"七月半"，家家都要祭祖和祭野鬼。接祖先回家享受祭礼，俗称"接客"。"接客"时间一天、三天、五天不等，以三天者居多。祖先接回家后，每顿要在神龛的祖先牌位前摆设三牲、时鲜果品、糖果点心，或于饭桌上多摆几付碗筷，斟几杯薄酒，让祖先享用。"接客"以后还要"送客"，"送客"不能迟于14日晚，因为15日阎王即命令关闭鬼门关，去迟了进不去，会成野鬼。送客时要烧纸钱或衣箱、纸扎的房屋，谓之"烧包"，还要点香烛，放鞭炮。此外，要在三岔路口另烧一些冥钱，给那些孤魂野鬼领用，以免其与祖先争抢财物。此俗今日在农村仍十分盛行，也蔓延到了城镇。



送灶神既是一个古老的年节习俗，也是湖湘古老的信仰习俗。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神，也有二十四日送的，到三十日晚再迎接回来。灶神又称“司命”，一男一女，形象风流，故忌女人敬灶。传说灶神从十二月二十三日晚起到玉帝那里汇报主人一年的好歹，所以在司命画像的左右写上“上天言好事，下凡降吉祥”，也有写成“人间好事要多说。明年下界降吉祥”的。人们怕他们上玉皇那里“打小报告”，常在这天沐浴斋戒，以斋粑、甜酒、甜果饯行。平日灶忌甚多：女人烧火时不能正对灶门，更不能以脚踩灶；牛肉、狗肉、蛇肉不能放灶上烹煮；女裤不能放灶上烘烤。在灶神离开期间，主人免去对灶的许多禁忌，并趁机扫扬尘，搞厨房清洁卫生，拆灶修灶。

还傩愿在湖湘民间也十分常见。旧时人们碰到三灾八难，便认为是鬼神作怪，于是到傩愿菩萨面前乞求庇佑，并许愿，以后遇到好日子时就应诺还愿，称“还傩愿”。还傩愿有一整套程序，非常复杂。整个还傩愿过程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极富观赏性，也充分体现了承载巫文化的湖湘民俗既娱神又娱人的特色。

二、巫文化与民间祭祀

湖湘民间盛行祭祀。祭典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神灵祭祀，所祭对象多为传说中的天神地祇，山精鬼魅，充满了浪漫的想象；第二类是祖先祭祀，所祭对象主要为家族祖先、民族祖先，如炎帝、舜帝；第三类为贤良忠德之士祭祀，所祭对象为公认的民族英雄、知名人士或对国家对社会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如蔡锷、黄兴。湖湘民间传统祭祀活动往往歌舞相伴，仪式盛大，其所体现的巫文化特征在战国时期的《楚辞》中即有较充分的描述。《东君》所描述的楚地巫风巫仪中那种人神共处、繁华热烈的祭祀场面就充分展示了当时民间祭祀中的巫文化特征。

湖南有多处留下远古帝王的足迹。尝百草、制耒耜、教民稼穑的炎帝神农氏葬于酃县（今炎陵县）。舜帝南巡，崩于九嶷山。自古以来，炎帝、舜帝香火不断，执政当局还经常举行公祭。

南岳衡山远在轩辕黄帝时期就被确定为华夏四岳之一，受到君王、民众的崇拜与祭祀。尧、舜、禹都多次巡狩南岳，祭



祀南岳之神。以后历代帝王都把祭祀南岳作为祀之大典，非常隆重，其规格与祭拜天神、前朝帝王相等。据南岳宗教文化研究所统计，自唐迄清朝廷派遣官员来南岳举行的大型祭祀就有一百二十多次。南岳又被认为是“主寿之山”，宋徽宗和康熙帝都曾亲笔题写“寿岳”相赐。湖湘民间认为，南岳神乃湖湘地方保护神，善男信女遇有疾病灾难，或求其庇佑时，则前往烧香或许愿。因此，黎民百姓到南岳进香朝拜、祈寿祈福，比官方祭祀更加广泛而普遍。尤其是每年农历七月到九月的香期旺季，来自四面八方的朝圣者，每日成千上万，蜂拥于途，络绎不绝。许多“行香”者出发前斋戒沐浴，头扎红巾，身穿青衣，胸前佩戴写有“南岳进香”的香兜，一路唱着由“南岳司天大圣帝，安邦护国大王尊”起首的进香歌，前往进香。有的为表示虔诚，往往徒步上山，从山脚下就开始“三步一跪，五步一叩”，直到山顶。有的一村一寨男女老幼全部出动，用箩筐挑着香烛供品，在旗幡伞幛的引导下，列队而行，队伍庞大，盛况空前。据传在南岳许愿朝香人不管所求应验与否，都得还愿，即使人死了，子孙也得替其还愿，谓之“还阴愿”。此俗沿袭至今。除此之外，湖湘较为普遍的民间祭祀还有祀财神、祀城隍、祀土地神、祀关公、祀灶神等。

傩祭是湖湘民间最富巫文化特色的祭祀活动之一。传说上古时期，黄帝、炎帝部落联合与九黎部落在涿鹿打了一场大战，结果九黎战败，部落首领蚩尤在战斗中被杀。九黎的一部分加入了炎帝、黄帝的两个部落联盟，另一部分南下与苗蛮部落居住在一起，与以女娲为人祖的三苗族结成“九黎——三苗”集团。九黎三苗奉行巫教，祀女娲、伏羲、蚩尤、盘王，杂拜鬼神，人皆为巫。黄帝命颛顼对苗黎巫觋进行镇压，激起苗黎巫觋对颛顼的仇恨。颛顼有三个死后变成了疫鬼的儿子，苗黎巫觋以驱除颛顼这三个儿子的巫术活动，表示对颛顼的反抗。这些巫术活动后来演化为“驱傩”的巫俗，巫觋的“傩祭”便成为巫文化的重大特征。傩是巫的衍生体。傩祭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其内容和性质尽管因朝代的更迭而变化，但其巫文化的特征却始终未变。至今，“傩祭”仍是湖湘民间经常举行的封建迷信活动之一。傩祭有很多种类，如三清傩、五通傩、云霄傩、求子傩、保安傩、癫傩等。

民国元年《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第七章“宗教”言：“自三苗国于洞庭始创巫教，颛顼正而不息”，说明洞庭湖是延绵几



千年的巫文化的渊薮。在湖南民间，至今尚存诸多铭刻巫文化印记、与巫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俗民风，特别是湘西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更是保存了众多原生态的巫风民俗文化，湘西民间祭祀活动是其表现之一。

湘西苗族受巫文化影响，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受地域环境与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湘西苗族形成了不少既神秘又特殊的习俗。其中以椎牛、打猪、接龙三者的规模最大，最隆重。这些大型的祭祀活动，形式非常古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椎牛”是苗族规模最大最古老的祭祀活动，其主要目的是祭祖，即苗族的列祖列宗，要从近祖请起，一直上溯到远祖，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历代祖先都要请到，此外还要请一些小鬼神。在祭祀过程中，除巫师唱祭歌外，还用“赶边边场”的形式进行娱神，男女青年对歌，通宵达旦，既娱神又娱人，也体现了早期人类人神不分的巫风。椎牛一般为三天，热闹非凡。由于是大型的祭祀祖宗的祭奠活动，因此十分庄严和隆重。

“打猪”是苗族祭祀本家祖先的活动，目的是为了取悦近祖，求得本家祖先保佑、宽恕活人罪过。“打猪”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如：客人回家时主人不能送，客人也不能谢，以免惊动祖灵。客人背肉回家途中遇人要高喊“背忌肉来了”，通告对方。对方若与背忌肉者异姓，则要老远避开。背肉的人回到家，当晚要请族人将忌肉吃完，吃不完的，要包好埋入氽洞里，碗筷要拿到河里或井边洗净，不能在家洗，不能将油汤喂牲畜，否则，认为要被虎伤蛇咬。等等。

“接龙”是求家道兴旺，四季平安的一种民间祭祀活动。在苗族人的传统观念里，龙是丁财福寿的化身。苗族人还视龙神为祖神，视龙神为福神。人们一旦对丁或财产生欲望的时候，就要祭龙，俗称接龙。“接龙”一般在秋后择定良辰吉日举行，请龙到家。道士在家中设置好祭龙的坛场之后，便与主家的房族人结队吹着唢呐、长号，打起锣鼓，穿戴华丽艳服、披戴金银，戴上接龙帽，打着花伞去村寨东边的水井或池塘溪河把龙神接回户主家中，然后燃放鞭炮，撒粑赏众，热闹一番。法事以接龙、交牲（龙猪）、上供通呈、安龙祈福为主体，前后共需两天一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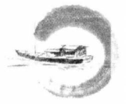
盘王祭是主要分布于湘西、湘西南的瑶族最重要的祭祀仪式。瑶族人普遍祭祀盘王，凡有瑶人的存在，就有盘王祭祀的

存在，这种存在体现在历史典籍、民间传说和习俗风情之中。东晋干宝《搜神记》、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宋郦道元《水经注》、清陆次云《峒溪纤志》、《辰州府志·古迹考》均有关于盘瓠的记载。在湘南民间，关于盘瓠的传说流传甚广。在湖南沅陵、泸溪、辰溪、麻阳等县至今尚有盘瓠洞、辛女宫、辛女岩、辛女潭等与盘瓠有关的遗迹和地名。在麻阳，与盘瓠相关联的生活习俗十分浓厚，如喜欢给幼儿做“狗头帽”，借盘瓠图腾以镇邪恶而赐福赐寿。喜欢以“狗”为孩子命名。在生活饮食方面，相当一部分人保留着不吃狗肉的古俗，有“狗肉不上灶，狗肉不入席，狗肉不敬神”之说。

湖南的五溪地区，是盘王文化十分发达的地区。从湖南现存的傩文化来看，真正与盘王有关的祭祀仪式，就是流布沅陵、辰溪一带的“跳香”，和在湘南一带瑶人中还存在着的“还盘王愿”。“跳香”是一种丰产祭祀仪典，主祭神是傩公傩母。“还盘王愿”主要是祭祀祖先神灵，庆贺五谷丰登。但不管祭祀的目的如何，其仪式过程，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禁忌，都有着浓厚的巫文化色彩，与巫文化密不可分。

三、巫文化与文学艺术

楚人入湘之前，湖南的土著居民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崇拜各种自然神与社会神。楚人入湘后，湖南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与楚人的宗教信仰、神话传统相互影响、融合，构成了春秋战国时独具湖湘特色的宗教与神话。这些宗教与神话成为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原料与养分，同时，湘楚巫觋降神、人神杂糅的民俗活动也催生、孕育了伟大绝伦的文学艺术成就。后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託之以风谏。”文学史上一种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新诗体——楚辞由此产生。《九歌》、《招魂》、《离骚》等作品中丰富的想象和大胆夸张，驭众神驱风云，歌灵异赞美景，合人间神界于一体，熔现实理想于一炉，“笔有化工，思入玄妙”，这些都是受巫文化影响所致。特别是其中所体现的爱憎分明的情感，以及“上下求索”、“九



死未悔”的精神，对陶铸湘人的性格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湘楚巫风文化也衣被、浸润着绘画、音乐、歌舞、戏剧等其他艺术形式，使其显示出特殊的风貌、神韵与创造，这从湖湘地区陆续出土的帛画、壁画和各种雕刻作品中，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古乐、歌舞状况中，从遗留至今的湘曲湘调中，可以分明感受得到。

随着历史的变迁，湘楚巫文化在更为强势的外来释道等多元文化的冲击下被淡化了，同样，承载巫文化传统的一些艺术形式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只有在湘西，因封闭的自然环境、贫困的经济环境和宽松的人文环境所致，巫文化在当地的浸染流布相当深刻，并不因楚亡而消失。在底层百姓那里，因为穷，因为目不识丁而于释道隔膜，将世代相传的楚巫宗教和艺术较完整地保留着。湘西的傩戏、土家茅古斯就是其典型代表，在今天已经成为湘楚巫文化以及原始戏剧、舞蹈的“活化石”，是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受到广泛关注和抢救性发掘。

傩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文化，是远古人类为了消除灾难、危难而“发明”的一种巫术活动。傩的活动导致了戏剧艺术的发生，傩与傩戏，是我们探究湖湘戏剧艺术的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傩戏是古老傩文化的载体，是在巫文化大背景下，伴随人们的祭祀活动，由傩祭、舞蹈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它既有驱疫纳吉的祭祀功能，又有歌舞戏曲的娱神娱人功能。从傩戏的产生和功能特征上可以判断，它是人类处于原始宗教信仰阶段所推崇的文化艺术形式。湘西苗族地区的傩戏，就属于典型的“娱神”而“娱人”的巫术艺术，融戏剧文化和宗教文化于一体，内容幽默诙谐，情节风趣滑稽，具有鲜明的喜剧特色，在“娱神”的过程中充分达到“娱人”的目的。

茅古斯是湘西土家族民间古老的原生态艺术表演形式，土家语叫“古斯拔铺”，大意是浑身长毛的人。茅古斯以融歌、舞、剧为一体的形式，表现了土家族先民开荒拓野，从事原始渔猎农耕的创世业绩。土家人每逢“舍把节”（跳摆手）、还愿、祭祖等活动时，都要表演茅古斯。这一古老的祭祀仪式，经过千百年的传承，至今仍鲜活地存在于土家民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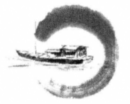
茅古斯深深植根于土家族文化艺术的土壤，与土家人古老而神秘的原始耕猎文化、原始生殖崇拜文化、原始艺术文化以

及巫风文化息息相关。

土家族先民在远古时代，曾经过着渔猎为主的生活，对于猎神的崇拜，是土家族人在渔猎生活中形成的原始信仰。即使在进入农耕时代后，渔猎经济在土家人的生活中地位有所下降，但作为农耕生产的重要补充，渔猎经济一直存在。因而，猎神崇拜习俗一直相传至今。土家“茅古斯”所跳“食姐”的主要情节就是围猎前祭祀猎神梅嫦的。农耕经济也是土家族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当农耕生产进入土家族地区后，最早的生产方式就是刀耕火种。在土家“茅古斯”的表演中，就有“砍火畬”一场，对土家族祖先“砍”、“烧”、“挖”的劳动过程和动作作了逼真的再现。茅古斯中再现农耕活动内容的场景还有吃棕树籽、穿棕树叶、烧山挖土、打火、扯草、打粑粑等，折射出土家族先民多彩的农耕文化。可以认定，土家族先民原始的耕猎生活是茅古斯产生的文化本源之一。

土家茅古斯还保留了大量土家人生殖崇拜的内容。生殖崇拜是伴随着原始宗教产生的。土家人的茅古斯，将这种原始宗教与生殖崇拜体现于萌芽状态的戏剧艺术中，茅古斯演出时，每个茅古斯的扮演者，除周身上下裹满茅草、棕毛或稻草以外，下身还置有一根称为“粗鲁棍”的阳具——男性性器官。阳具为木棒所制，形象极夸张，短则尺余，长者竟达1米。在茅古斯的装扮中，“粗鲁棍”显得最为引人注目。茅古斯中很多重要的节目，如《扫除瘟疫邪三气》、《甩火把》、《接亲》、《打粑粑》等，都有舞动“粗鲁棍”的动作。《甩火把》对于生殖崇拜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茅古斯“甩火把”时，有“示雄”、“撬天”、“搭肩”、“转臀”、“甩摆”、“打露水”、“挺腹送胯”、“左右抖摆”等舞蹈动作，充分显示出其力量和神威。有趣的是，在极其庄严、肃穆的神堂之上，怀着对天地神明极度虔诚和崇敬之情演出的土家茅古斯，并没有因这些舞蹈动作而流于粗俗，相反呈现出一种神圣、和谐的氛围。这种情形，今人似乎难以理解，但它确实是有着生殖崇拜信仰的古代土家人表达感情最诚挚的方式。纵观茅古斯中的种种生殖崇拜遗存，我们可以看到茅古斯这一古老表演形式所蕴涵的关于生殖崇拜的深厚传统文化根基。

巫文化与原始歌舞表演关系极大。在茅古斯的表演中，有祭祀猎神的情节，有巫师参加演出，其场景也是众人参加祭祀的反映。可见茅古斯受巫文化影响之深刻。当然，随着茅古斯



的不断发展，不再以巫术仪式的形式进行，驱邪纳福的心理要求通过歌舞的表演得到实现和满足，但其根源还是受巫术文化的影响。

四、巫文化与生产生活

巫文化不光对湖湘的历史发展、文化进步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浸润到湖湘人民日常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当中，给人们以全方位的影响。

起春是湖湘重要的生产习俗之一。立春为一年之始，是汉族自古以来在农事上的一个重要节日，因而有“起春”、“报春”或“打春牛”的风俗习惯。举行起春仪式时，在牛角上和赶牛鞭上系上红布或红绸，把牛牵到田边，烧香敬神，按东南西北方向作揖或跪拜，口中念道：“今日起春，祈祷苍天，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然后赶牛下田，驾上犁，翻地几圈，并在牛的身上轻打三鞭。打第一鞭时说：“风调雨顺”；打第二鞭时说：“物阜民安”；打第三鞭时说：“天下太平”。也有的驾牛犁一圆圈，圆圈内再犁十字，犁成一个“田”字，然后撒一把谷种，并于“田”字中心插香，叩头祷告，以求是年农事吉祥如意。起春之时，一些很关心农事的地方官员也往往亲自举行迎春、起春仪式。仪式很隆重，地方官员洗澡沐浴，穿上素衣，不坐轿子不骑马，步行到郊外，聚集乡民，摆上供品，烧香跪拜，以求一年的农业生产丰收。到清末民初，由地方官员举行迎春、起春仪式逐渐减少，但“起春”、“报春”、“打春牛”的农业生产习俗却一直传承下来。现在这一生产习俗已不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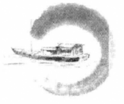
湖湘自古是有名的鱼米之乡，稻作业非常发达。因此，湖南人对插秧十分重视。插秧是农家的重大事情，解放以前，农民插秧还必须选择吉日开始，称“开秧门”。开秧门这天，家家屋里飘散着米酒、糯米饭的芳香，人人穿着干净的衣服或者新衣，带上最好的酒、糯米饭和其他祭品，来到田边。先由户主或村中老人或者有名望的老农烧香敬神后，再下田先扯好第一把秧苗，预祝丰收，然后人们兴高采烈地下田扯秧插秧。扯第一手秧，谓之“开秧田门”。开秧田门忌朝太白星方向，免发“秧风”，以避“邪气”。插田时，遇到面积大点的田块，往往先由有经验的插田能手“破域”。其他人跟着域田分插。插田是件

累活，也是件乐活，整个过程常常充满着欢乐。一方面，是对丰收的祈盼；另一方面，插田时，人们往往互相比赛，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不服插田能手，想把插田能手“关”起来，让插田能手“坐轿”，这种时候，就会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大家笑的笑、唱的唱、起哄的起哄，有时泼水或用泥巴打架为戏，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因此，流行有“小孩盼过年，大人喜莳田”的谚语。1956 年，农业生产集体化，“开秧田门”之俗逐渐淡化；20 世纪 70 年代推行密植，会“破域”的农民甚少，改用绳索划行插田。现在，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推广，湖南农村早稻一般使用抛秧技术，插秧早已不复从前的热闹隆重。

赶山是湖湘一个重要的狩猎习俗。湖南境内山区、山岭甚多，野生动物也很多，打猎之风相应亦浓。打猎有群体打猎与个体打猎之分。群体打猎时，分工比较明确，有“跟脚印”的、有“赶山”的、有“守堂口”的。“跟脚印”的猎人，往往是有经验的猎人或铳手，能根据脚印识别鸟兽等野生动物的类别、隐藏地点与距离，跟着脚印寻觅驱赶或用鸟铳击毙之；“赶山”的猎人往往是一些体质好而打猎技术尚不精的青壮年，其职责是在被困野兽的山上漫山呐喊，以胁迫野兽从“堂口”中出来；“守堂口”的铳手枪法要比较准，当野兽经过“堂口”时要能将野兽迅速击毙。集体狩猎时，猎人对猎物的分配是友善的且基本上是固定的。开铳毙兽者，得兽头及一条“糜肉”；“跟脚印”者得一条“糜肉”；猎狗得全部内脏；余下部分按人头点数，每人一份，即使是猎物已获取之后才赶到，或在路上遇到打猎队伍的人也可分得一份，谓之“和睦肉”。此俗沿袭至今。个体打猎以“打鸟”、“放铗”、“放吊”为主。“打鸟”是用鸟铳击毙较大的鸟类；“放铗”、“放吊”是将“铁铗”或“吊”放在堂口上，或放在山中猎人选中的任何一处。野兽踩上“铗”或“吊”，叫“发铗”、“发吊”。所获猎物，一般独得，也有分给同行者，但不能将获得的野兽肉送给传授技术给自己的师傅。没有放铗、放吊者，不能起早去收取猎物，否则收取“不义之物”，既遭谴责，也不吉利。所以，不放铗、放吊者去私取猎物者甚少。此俗也沿袭至今。

造屋习俗既关乎生产，亦关乎生活。其中，选择屋向、上梁撒粑、去煞等最能反映巫文化对湖湘民间居住习俗的影响。

选择屋向是湖湘民间建房习俗之一，流行于全省多民族中。建房是人生的大事，必先选择好地基。择地基首推选择方位、



朝向，俗称“选择屋向”。湖湘汉族建房，一般都先请地生看地定朝向，再择吉日动工。朝向一般喜坐北朝南，谚云：“坐北朝南屋，住着享大福。”同时讲求屋前屋后有风水树，使屋场深藏不露。土家族多选择依山傍水，背风向阳的地方建屋，方向亦多坐北朝南，忌东西向。屋址最忌对面有白色山拗，认为白岩即“白虎”坐的地方，而“白虎”是凶神，有“白虎当堂坐，无灾也有祸”之谚。瑶族选择屋向看重“对家山”和“后龙山”。“对家山”即房屋或村子正前方面对之山，“后龙山”即一个村子或屋场背靠之山，认为“对家山”和“后龙山”的好坏关系一个村子或一户人的兴衰。如正前方的“对家山”是一个圆形石山，便认为会出做官的人。如对面是一座尖峰笔立的山，便认为会出有文才的人。如对家山距村子或屋场越远，便认为有出息的人才会出得越多。而“后龙山”的形状如何（如龙形、虎形、狮形、象形、牛形），树木是否繁茂，水流是否畅通，均关系全村和家人是否兴旺，都是选择建房地基屋向的根据和准绳。

屋向择好后，再择吉日动工。树大门框或上梁时，要宴客。特别是上梁，须举行仪式。设香桌于新屋正中，摆上各种祭品。上梁时，先燃放“高升”、“百子”鞭炮，然后，宰雄鸡，燃烛焚香祭天地、神仙和祖宗。祭毕，由众人将挂有红色彩绸，写有“紫微高照”或“上梁大吉”的大梁抬上去。待大梁架上屋脊后，木匠师傅手捧酒壶往梁上浇酒，一边唱道：“手擎银壶亮堂堂，今日浇酒到四方。男女老少都欢喜，添财添喜添福气。”梁木最好用梓木，谐音“子”，寓意子孙发达。湘南民间和湘西土家族还盛行上梁撒粑，讲梁人或赞梁人在屋架上边赞边撒，主人则扯起衣衫或拉起红布在下面跪接。围观的人也来争抢，抢得越热闹，便认为主人会兴旺发达。湘南地区在撒糍粑时，同时撒花生，认为发子发孙。湘中地区汉族上梁时，只赞不撒糍粑。在整个上梁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主人都要给工匠赠红包，以求吉利。此俗传承至今，但赞词赋予了现代内容。

“去煞”也是湖湘重要的建房习俗之一，流行于全省多地区。房子建成后，最后一道程序是去煞，以求吉利、平安。由掌墨师傅开脸挂须，烧纸、点香、点烛、打碗、烧花船、宰雄鸡送走煞神。房主宴请和送礼酬谢掌墨师傅等有关人员。此俗纯属迷信，却延续至今而未清除。

行船习俗是湖湘交通运输民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湖南的几大水系大都滩多流急，极易发生危险，因此，船民出行时非常讲究。开船前要在船头摆酒插香敬龙王，祈求一路平安，途中遇庙即拜。有“行船不敬神，路上冒得魂”之谚。船夫的口风禁忌更多：龙、虎、鬼、梦、翻、滚、倒、沉、岸、浸十个字忌说出口，一般都用反义词或吉利词代替，另外还有一些字也不能说，如“打”、“浅”、“漏”、“撞”等。口风以外，还忌上船走船头、吃鱼时翻边、进餐时调羹匐放等。洞庭湖是一片水乡，水乡人们离不开船，劳作、出门、祭祀、娱乐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船关联，千百年来，水乡人们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许多的船俗。

湖湘民间还有一种神秘的匠俗。在湘潭一带，做上门工夫的木匠，朝出暮归，常常随身携带一把木尺，三尺长，叫“三尺子”，作为“护身符”，“避凶祛邪”。“三尺子”除了作“护身符”外，还是木匠师傅使“吉凶”的器械。若是主家招待不周，木匠师傅量尺码时，故意定在不吉利的尺寸上，据说能使门响屋摇床发颤，人们很害怕这种“木匠作孽”，请木匠做工夫，往往好酒好饭招待。



第三节 湖湘岁时节日文化

岁时节日民俗是由岁时民俗和节日民俗两个部分组成的。所谓岁时民俗，指的是一年中伴随着季节和时序的变化而相继出现的一些风俗。所谓节日民俗，是指人们约定在某些具体的日期进行某种活动或者仪式的民俗。岁时民俗与节日民俗有一定的联系也有一定的区别。其联系是，两者不仅都多以一年的时间为周期，周而复始地出现，而且有些节日民俗是由岁时民俗发展变化而来。两者的区别在于，岁时民俗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发展而来，节日民俗则带有明显的人为因素，文化色彩更为浓厚，是一种带有政治的、经济的、艺术的、宗教的、民族心



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民俗文化现象。

在湖湘民俗文化中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而又最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是岁时节日民俗。湖湘岁时节日众多，除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以及现代的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元旦等较大型节日外，还有立春节、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上巳节、四月八姑娘节、四月十八牛王节、立夏节、尝新节、六月六（“过半年”、晒龙袍）、六月十六倒稿节、十月初二“啪嘎节”、腊八节、辞灶节、过“赶年”，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与巫风祭祀文化密切相关的节日，如南岳圣帝爷生日、土地菩萨生日、观音生日、还盘王愿等。近年来，湖南公祭炎帝、舜帝的庆典活动也大有演变成湖湘固定节日之势。湖湘岁时节日可以说名目繁多，从节日的起源看，有的节日是从湖湘之地兴起，尔后以湖湘为中心向中原乃至全国各地传播，如端午节；有的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生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等；有的是只有湖湘本土才有的岁时节日。从其具体特征来看，湖湘的岁时节日习俗同样表现出丰富多样、巫风文化等特征。如与汉民族同样过春节的湖湘少数民族，在过年的时候除了祭祖、祈愿、吃团年饭等外，土家族还有“抢贡鸡”、跳“摆手舞”的习俗，侗族有“抢花炮”的习俗。“端午节”是为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而设，食粽子、喝雄黄酒、赛龙舟等，都是古老的巫文化流传下来的习俗。即使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一些节日，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湖湘文化的印记，具备了独特的地域色彩与湖湘民族风情。岁时节日习俗一方面蕴涵着浓浓的湖湘文化气息，另一方面，也承载着深厚的湖湘文化内涵，反映出湖湘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湘人的精神特质，是湖湘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湖湘汉民族传统节日文化

与全国各地一样，湖湘汉民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春节、端午节、中秋节。

（一）春节

春节又称“过年”，是中国最大的节日，有“百节年为首”

的说法。春节不仅是汉民族最为重要的一个节日，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最为重要的节日。从其起源来看，年应该与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密切相关。与节日相关的“年”字，就是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而逐步确定的。在《说文解字》中“年”的最初解释就是“谷熟也”。《穀梁传》记载：“五谷皆熟为幼年，五谷皆大熟为大有年”。从时间来看，狭义的“春节”应该是指新年到来之际（大年初一凌晨）及之后（正月十五日之前）的一段时间。事实上，在人们的心目中，春节的节期包括年前年后两个连为一体的时间段，即新旧年交替之际辞旧迎新的整个时间过程。一般而言，即向年前追溯到腊月二十四日过小年之日，向后延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在民间，春节是最受重视的传统节日，与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三大节日。

在湖湘大地，“过年”有小年和大年之分，“小年”一般指腊月二十四，大年则是三十。“小年”在一般意义上是为小孩过的，大年则是全员的。俗谚中有“小孩过年一个蛋，大人过年一顿饭”的说法。从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开始，过年的序幕就拉开了。大年之前，人们多对家里家外进行一场彻底的清扫，疏浚阳沟、打扫扬尘、蒸年糕、打糍粑、做豆腐、备点心、写春联、扎灯笼，大部分的家庭成员都要添置新衣，有的家庭还宰杀年猪。小年要“辞灶”，民谣曰：“辞了灶，年来到，妹子要花，伢子要炮，始助要新衣，爹爹要新帽。”从此日起，长工下工，匠师不再上门，家家筹办年货，忙得不亦乐乎。

年关将近，小孩子们多喜欢放鞭炮，在时断时续的鞭炮声中，年味便一日浓似一日。过去，人们流行家家贴年画，邵阳滩头的年画就非常有名，远销国内数十省份，甚至还远销海外，无论质地用料，还是色彩图案，都堪与杨柳青的年画并称。现在人们多用挂历。大年三十，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准备丰盛的饭菜，出门在外的家庭成员也都要在除夕夜之前赶回家团聚。除夕夜，旧俗有“吃团年饭”、“辞年”、“守岁”等活动。掌灯时分，吃团年饭之前，焚香鸣炮，拜祖先家神，叫辞年。年三十夜，长沙一带农村家家火塘中燃着一个俗称“年财佬”的枫树蔸（或松、栗等树蔸），铁炉锅里炖着猪脚萝卜，所谓“有钱无钱，萝卜过年”，男女老幼围炉共话，长辈给小孩压岁钱（如果小孩子熬不住睡了，就放在孩子的枕头边或底下，孩子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枕头边或下面是否有钱物），彼此忌说不吉利之



语，一晚上其乐融融，欢坐待旦，叫“守岁”。大年初一，家家于鸡鸣时分即起，男女老幼换上新衣，由辈分最高的男主人燃香开大门，鸣放鞭炮，叫“出天行”，或说开财门。然后进入厅堂，秉烛敬拜祖宗，再向外拜天地神明，择吉时向吉方三揖，或向四方揖拜，祈求新年方方得利。接着儿孙依次向长辈拜年。正月初一早餐吃剩饭，叫吃隔年粮，寓意衣食有余。菜肴往往有青菜、芋头、豆腐等，寓意人丁清吉，万事遇头，清白传家。饭后晚辈向家族长辈拜年。小孩子们精力旺盛，往往成群结队打着灯笼依次去邻里人家“请辞岁”。这时，家家户户都热情迎接，早茶零食塞满孩子们的口袋，很多孩子回家卸完口袋后，又迅速加入辞岁队伍，有时一个晚上可得一两瓷坛的美食，这对那些家境不太富裕的孩子来说是难得的不小收获，个个乐得合不拢嘴，难怪谚云：“小孩望过年。”除孩子外，正月初一一般不外出拜年，有所谓“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干娘，初五初六拜四方”的说法。特别是家族中辈分高者，一般初七之前是不到其他人家去的，地方习俗叫做“上七不出门”。春节期间，亲戚们都会互相走动，请“吃春饭”或回请。互相拜年的时候，遇有新人或贵人来家，还应燃放鞭炮，以示对来客的重视。

春节期间，湖湘民间的讲究、禁忌颇多。有的于除夕在大门合缝处贴红纸“财”字，在当眼处贴“开门大吉”、“对我生财”之类的吉利语，初一开门时高声诵之，叫开门见喜、开门见财。出天行时，观风向天色，卜来年收成，认为“北（风）主丰，南（风）主歉”；阴多晴，暗多雨。在阶基和柴湾堆很多柴，谐多财。初一抱柴进门，意“进财”。初一不倒垃圾不扫地，非扫不可时，扫帚不向外而向柴湾扫。有的读书人则书写“人寿年丰”、“五谷丰登”之类的吉利语，叫“新年发笔，大吉大利”。初一特忌粗俗不雅之言，大人总要事先叮嘱小孩：初一要说好话！万一小孩说漏了嘴，大人马上解说：“童言无忌。”如不小心摔破了东西，要说“打发打发”；若酒杯倒了，要说“酒泼红地”。土家族大年三十不能吵嘴、不能打小孩、不能熄灯火。苗族大年初一忌动刀、挑水、扫地、敲板壁、赤足、食粑粑，忌倒垃圾，洗脸水不得倒于屋外，妇女不能去别人家里；腊月三十晚上忌断火种；初一至初三不可在寨内晾晒衣物，妇女不能在家中拿针线。

湖湘民间春节的文娱活动非常多，各地区各民族都有一些



独特的民俗节庆活动，例如舞狮、舞龙灯、迎神、灯会和猜灯谜等，有的地方文艺人员还会“赞土地”、“打花鼓”。在春节各种娱乐活动中最热闹的莫过舞龙灯和舞狮。

长沙作为省城，年关的娱乐活动，往往是最热闹的。旧时舞龙灯一般是“初七”之后开始出灯，正月十五收灯。“开灯”与“收灯”都有非常隆重的仪式，长沙俗语说：“三十夜的火，元宵夜的灯”，这里所说的“灯”当包括龙灯，可见其重视程度。届时，四周乡民组建龙灯队应商贾之邀麇集省城。龙灯队伍由执事擎“火神庙”大纛前导，旗牌手提长方形灯笼，执掌灯笼者必定是当地见多识广，非常有人脉的长者或者头面人物。进门时道声“恭喜发财”，于是金鼓唢呐齐鸣，龙身蜿蜒翻腾进入到主家客厅。主家撒果品、放鞭炮，为舞龙灯者助兴。舞龙者迎着节拍与先前所练习的动作，舞出各种图案，小孩子跟着吆喝，主家更是喜笑颜开。临走时，主家为舞龙者准备一份礼金，并用鞭炮相送。如果哪人气度不凡，衣服华贵，舞龙灯者还会围绕着此人不去，并要出种种花样，直到该人拿出彩头来，他们才欢闹着离去。位于长沙城内的定湘王和郎公元帅等神庙，每岁新年时都要扎一纸龙，沿街行走，鸣锣击鼓，热闹非常；家家户户烧香顶礼，就像迎接真神一样。如有妇女多年不生育者，每当龙灯游行至其家时，必加封红包，舞龙者以龙身围绕妇人一次，再将龙身缩小，上骑一小孩，在堂前绕行一周，这就是“麒麟送子”。《长沙新年纪俗诗》中所记：“纸扎龙灯奉作神，香花处处表欢迎。堂前一度兜圈子，步步龙行百草生。”“妇女围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及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正月十五，舞龙灯者彻夜狂欢后，便将纸灯烧毁，龙头放庙归位，名曰“完灯”，至此，新春舞龙活动结束。舞狮活动同样热闹，除道具及动作外，舞狮与舞龙最大的不同是：舞龙时执掌灯笼者主要作用是前导接洽，接收礼金红包，充当主事，看头都在舞龙人身上。舞狮时提灯人不光起上述作用，还需充当“唱赞词”角色。提灯人按所到家户家境应景赞颂，幽默生动，舞狮者随之动作，不光有看头，而且有听头。

正月十五日是传统的元宵节，在这一天夜里，龙灯、狮子都会终止。家家户户都要吃上元宵，燃放鞭炮，但在湖南一些地方还有一种独有的活动——烧元宵。在烧元宵的晚上，人们多将晒干的稻草、收集的木柴等堆积在田塍上或者地头边点燃，有时还可能在屋檐下，水井边，甚或是在狗窝、鸡窝边点燃。



这种做法有两层意义：一是能将动物圈栏中的寄生虫、病菌烧死；二是寄望着来年家人红火、六畜兴旺。同时，在湖南一些偏僻的平原山村，人们还有一种极富意味的“偷青”的习俗。正月十五夜，女人们成群结队地去菜园子里“偷青”。这一习俗是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孟姜女丈夫被秦始皇拉夫征走，她千里迢迢地去寻夫。一路上风尘仆仆，忍饥挨饿。万般无奈之下，她为了活命只能在菜地里趁着夜色偷些青菜充饥。后世之人为其坚贞与执著所感动，也就形成了“偷青”的习俗，对其进行缅怀。当然这其中也表现出民间文化中妇女对自我命运的同情之感与身世之叹。

（二）端午节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端午源于农耕文化，最初充其量也就是个古老的疾病防控日。只是在屈原投江自尽之后，这一节日的文化内涵才得以提升，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各地区、各民族共同的节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积淀，至今已形成蔚为壮观的端午文化，端午甚至一度在中韩两国之间引发一场“端午申遗之争”。日本虽未参与申遗，但日本的端午节与中国的端午节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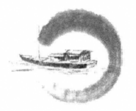
但凡一种习俗，随着历史的积淀，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须，以至影响人们的生活、思想、乃至社会发展时，这种习俗也就形成了一项独有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又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①] 端午文化对人们生活、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正在日益扩大和深化。并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不同的时代，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和功能。

①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关于端午文化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后来逐步普遍认同为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唐代诗人文秀《端午》诗中说：“节分端午至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相传人们得知屈大夫投水后，大家自发争先划船去寻找他的遗体，并在河流中投入“角粟”，避免他的遗体被鱼吃

掉。后来，屈原投水的这天就被定为端午节，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被进一步固定下来。之所以如此，也许与屈原的爱国精神为全国各民族所接受不无关系，因为爱国是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论时间先后的。屈原与端午节关系的固化提升了端午文化的内涵，端午文化反过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与效果，在提升全民爱国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拓展诗歌题材、影响文学艺术风格等方面，其作用均不可小视。随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端午节与屈原之间的关系虽然被进一步巩固，祭祀的意味却大大的淡化，逐渐转向到民众文化娱乐活动的方向去了。这实际上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端午节的习俗在全国各地有着十分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存在着普遍性与地方特异性并存的现象。端午吃粽子、吃咸鸭蛋、喝雄黄酒、门窗上悬挂菖蒲艾蒿、用特别配置的中草药煮水沐浴、身上戴香囊、儿童戴五毒兜兜等都是最常见的习俗。民谣曰“荒坡艾叶喷喷香，溪边菖蒲伴石长。青烟剑叶能驱疫，岁岁端午站门岗”。但最有特色、大众参与性最强的传统民间娱乐活动应数龙舟竞渡，自古至今盛行不衰。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五月初五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唐代诗人张说的《岳州观竞渡》描绘了当时端午节的赛龙舟场面：“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浮华。”描绘龙舟竞渡最为生动的诗作，当推唐代诗人张建封的《竞渡歌》：“五月五日天晴朗，杨花绕红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以被红旗引。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催车折楫时。”将龙舟竞渡的场景描绘得具体逼真，其热烈的竞渡气氛扣人心弦。船上岸上，紧张热烈，锣声、鼓声、吆喝声、水波声，此起彼伏，一派热闹，组合成一幅动人的民俗风情图画。古代描绘端午节的诗歌还有很多，如宋代梅尧臣《五月五日》、欧阳修《端午帖子》，现代著名汨罗籍作家康濯《咏故园端午节》，等等，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端午诗词。



端午这天，湖湘民间除了赛龙舟、吃粽子外，还有踏百草、斗百草的习俗。《荆楚岁时记》中写到：“五月五日，四民并蹋一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踏百草是在初五的早晨进行。人们或赤足或穿上新做的布鞋，在有露水的草丛中行走。大人斗草，或以花草之名相对，以较个人的文化修养之高低，或以各人采集花草的品种多少为胜负；儿童斗草，则比斗草茎的韧性强弱，以屡斗不败者为胜，胜则欢欣雀跃。

（三）中秋节

中秋节俗称“团圆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湖湘之地，人们早就对此节日情有独钟，家家户户多赏月和吃月饼、桂花糖、花生等食品。在湖区等地，人们还经常吃菱角、莲子或者喝藕粉。一家人吃罢晚饭，在院子里摆上几案，备好茶点，边闲话家常，边等待玉兔东升，全家人一起赏月。中秋之夜因秋高气爽，空气清新，明月也往往分外皎洁。在这样一个月明风清的节日夜晚，民间还演绎着许多极富人间趣味的习俗。其中衡阳等地有一种“偷瓜送子”的习俗就是在这一美好的节日晚上演。中秋之夜，那些家中妇女未曾生育者，她的亲友会从附近的瓜棚菜园中避开园主，偷一个冬瓜回来，然后精心将冬瓜描绘成一个婴儿的样子，还给它穿上小孩子的衣服，装扮成一个小孩子，由一位年龄比较大的长辈在一阵锣鼓鞭炮的热闹声中将这个“婴儿”送到妇女的家中，并一径放到床上，口里还小声地默念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意图给这家送来子女。有的习俗稍微有些不同，是在一些热心肠的亲戚的帮助下，要自己的儿女在中秋之夜偷瓜送到某一自己熟悉或关系密切未孕妇女家里，以期盼她家早日会有后人。与此有些相似，新晃侗族妇女们在中秋之夜也有结伴外出去“偷月亮菜”的习俗。在这一习俗中，人们多钟情于“偷”南瓜、豆角等，如“偷”到的南瓜和毛豆比较大，就满心欢喜，因为这预示着她们家的孩子会长得非常的强壮健康。如果“偷”到成双生长的豆角或并蒂的瓜果，便认为是喜兆。姑娘们往往爱到自己心上人家的菜地去偷，偷摘完后，并不就此作罢，还要在人家菜园里故意高声地叫喊。于是随行的那些女伴就会给对方以提示，有时还说出女孩子的名字，有时还说：“××哥哎，你的瓜菜被×××偷走了，到她家去吃油茶吧！”被偷的小伙子如果有意，就会去姑娘家做客，这样男女双方就在这样一种活动中建立了情感，尔

后随着关系的深入就能男婚女嫁，组成家庭。

在湖南湘潭，过中秋的时候有“游宝塔”、“烧宝塔”的习俗。在湘潭市河东宝塔岭上有一个七层的宝塔，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中秋节之日，宝塔岭上到处张灯结彩，塔旁搭有戏台演戏，玩龙灯、耍狮子、打地花鼓、踩高跷者聚集于此。男女老幼倾城而出，去游宝塔；至贫衣衫褴褛者，也会前去一游。故当地留下了“一身如鸟（音 diao）啄（音 za），还有闲心游宝塔”的谚语。夜晚来临，小孩子在宝塔下聚集些木材、树叶或者其他燃料，再在这些上面浇一些油料或者其他燃料，在空地上用瓦石搭成一个下大上尖、外圆内空的塔状物，点燃燃料，然后进行焚烧。如果宝塔烧不红，便认为一家将不会安宁，所以大人往往都会向小孩供给木材和油料。宝塔烧红后，孩子们一边唱着“八月十五烧宝塔，保佑癞子生头发”等歌谣，一边用乱砖将宝塔打倒以取乐。

湖湘汉民族除了上述三大传统岁时节日外，还有一些节日：如立春之日的立春节，民间有打“春牛”、喝春酒、吃春饼的习俗。清明之日，民间有踏春和扫墓的习俗。九月初九日重阳节，民间有酿造重阳酒、蒸米糕、携酒登高望远的习俗。一些具有雅趣的人，还会邀请好友一起欣赏菊花。十月初一至初十的“十月朝节”，民间也有在这一天来到先人坟墓之前，放一串鞭炮，斟两杯酒，进行祭奠的习惯，称为“挂十月朝”；大姓家族，多备酒肴于宗族的支祠，祭祀家族的支系祖先，称为“朝祭”，朝祭过后，人们多是开始进入冬闲的日子。在这些日子中，人们进行嫁娶的多。至于其他赛神、还愿的活动也比先前多了许多。农历十二月（腊月）初八日的腊八节，民间常在此日以糯米、腊肉、红枣、核桃等做“腊八饭”；湖湘最有特色的菜肴“腊八豆”，也是以此日所做最佳；湖湘农家甚至连一些城市居民，也于此日开始熏制腊肉。

二、湖湘少数民族岁时节日文化

不同的民族因其文化传统不同，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独特性，往往各自有着属于本民族的节日。湖湘少数民族岁时节日主要有六月六日“过半年”、吃新节、还盘王愿、过赶年、冬节、古尔邦节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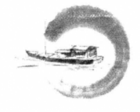


在湘西南、湘中等地，瑶族、土家族同胞有六月六日“过半年”的习俗。每年六月初六，瑶胞们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备齐了丰盛的食品，接来亲戚特别是外戚一起过节。在瑶族聚居的地方，人们有时还会举行盛大的集会。但不同民族对于这个节日有着不同的说法，民俗活动也不尽相同。瑶族相传古时有专管疟疾和发痧的两个瘟神下界传染疾病，不少瑶民染上瘟疫，死伤惨重。当人们知道瘟神要在过年之后才会回到天庭，于是人们就开始改变先前的过年要到腊月三十的习俗，而是改为六月六日过年，这样也就能够让瘟神早点离去，从而为人间减少许多的病痛与灾难。于是他们在六月这样的大热天赶着杀猪宰羊，用葫芦当成萝卜，刮去青皮，代替冬天才有的萝卜，又在田间遍撒石灰，如同下雪，瘟神以为过年了，便离开人间返回天庭。六月六日为“过半年”，亦称“半年节”、“小年节”。湘西土家族的“过半年”之来源有三种传说：其一，相传其祖先于此日从外地迁徙而来，定居湘西；其二，传说土王覃垕于此日被皇帝杀害；其三，说此日为麻麻（姑妈）节，要把出嫁了的姑妈接回来歇伏。湘西苗族相传远古神犬盘瓠与高辛帝之女结婚，生下六男六女，自相婚配，繁衍后代，成为苗族祖先，故于此日进行纪念。

吃新节又称“吃新”、“尝新节”，是农家每年举行的一种庆丰收活动。各地区、各民族吃新因历史文化与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原因，在吃新日子的选择上有所不同。具体来看前后不一，整体来看则是大致在农历六七月间新谷刚刚成熟或即将登场之际。其用意是感谢收成好，上天与神仙的保佑以及对于先人的虔敬与追思。在吃新这天，人们多用苞谷或新米煮饭以敬“谷娘（谷神）”，并以鸡、鸭、鱼、酒等祭供土地和祖先。瑶族除了过尝新节外，还有更为隆重的“丰收节”，江华县一带的瑶家人称为“倒稿节”。这一节日的时间是在阴历六月十六。邵阳洞口的瑶族人家也过类似的节日，不过他们称之为“啪嘎节”，时间不是在六月十六，而是在农历十月初二举行。两者的名称虽然不同，但意思都为“丰收”。在过节的那天，人们忙着杀鸡、宰猪、做粑粑、酿米酒，准备各样丰盛的食物，并且把这些食物都染成红色。过节日的那天早晨，寨子里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少聚集一堂，由长者主持给每户分一块猪肉和一条染红的鲜鱼，既庆贺当年的丰收，又预祝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后，老年人便走村串寨，探亲访友，男女青年则唱歌跳舞，尽情玩

乐。江华县在过“倒稿节”的那天，还有一项最为重要的活动——斗牛。瑶胞们吃过早饭后，便汇集到一处空旷的赛场。斗牛前，寨中长辈给斗牛者头上扎上“英雄结”，并对其祝福，然后斗牛者手持棍棒与牛角斗，直至牛被斗败为止。晚上，男女青年集聚一起唱《倒稿歌》（丰收歌），有的集合在一块坪地，围着篝火唱歌；有的小伙子在心仪的姑娘门前唱“引歌”，姑娘在屋里唱“迎歌”，将小伙子迎进屋内，以瓜斟满酒和土特产款待，边吃边唱暗传着情意，通宵达旦，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美好的祝福。

土家族还有一个特殊的习俗，那就是过“赶年”。在湖南、湖北、贵州、重庆等地聚族而居的土家人有时要过三个年，他们分别是：农历腊月二十九日（或二十八日）“过赶年”，六月二十五日过“六月年”，十月初一日过“十月年”。在这三个年中最有特色的是“过赶年”，即在腊月三十这一传统的过年之日前的一日过年。对于这样一个节日，有三种说法：其一，嘉靖年间倭寇常年骚扰我国东南沿海，为了抗击这些侵略者，湖南永顺土家族人听命朝廷前去征讨。出发时是一年将尽之时，为了及时赶赴战场，人们提前一天过年。这样，不仅赶到了战场，而且沉重地打击了入侵的倭寇，大振了土家人的英名。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人们就将其作为习俗而沿用下来，以表现土家人的卓越与英勇。其二，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土家部落因遭到异族的攻击与侵略，为了抢得时间，并出其不意地向敌人进行攻击，土家人提前一天过了年。而这时，敌人却毫无防范，并没有料到攻击会在大年三十降临，结果大败而逃。其三，在民族压迫的日子中，土家族人多被迫在一些汉族地主家打工。但是东家在过年之时也需要许多人来操办，也就不愿意土家人回去，于是，为了既能与家人团聚，又能按照主家的要求在年节期间照常帮工，他们就提前一天回家过年。这一习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土家族人在旧的时代和社会中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这种“过赶年”的习俗至今已经持续了数百年的历史。由于这三种说法都是将“过赶年”设定在一种严峻的情境，故旧时土家人过年呈现一种严肃紧张的气氛：例如，家中杀了年猪要藏在屋角里面用蓑衣盖住，牛羊等牲口要往山洞里赶，家门外要插上削尖的硬木标枪，将大块肉、萝卜、白菜、粉条、豆腐、猪杂等煮成一锅“合菜”当年饭，等等；天黑后，由一人手持梭镖站立门口，发现有人路过，立即上前“抓住”，请进



屋内一同过年；祭祖和吃年饭每于深夜进行，用竹簟或帐子遮住，表示在营幕之中。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先前的现实性都退居为形式上的东西，先前的苦难性的内涵都向娱乐性的方式演变，欢乐与愉快是所有节日的整体追求。如今，土家族“过赶年”之夜，土家儿女们还会在聚会的禾坪上烧起一团熊熊的篝火，男男女女围着篝火跳摆手舞，唱调年歌，跳起神秘而粗犷的“茅古斯”，甚至通宵达旦；守候在家里的土家人则在火塘中烧着枫木树兜，围炉聊天或静坐。

在怀化通道侗族聚居的地方，还有一个传统节日，叫做冬节。这一节日一般是农历十月入冬至十一月底，具体日期不一，由各姓氏宗族、屯团村寨自己决定。有的过十月十二、十三日，有的过十月初一、初四日。届时，人们放鞭炮、玩龙灯、耍狮子，尽情欢乐；不分生人熟人，都可以去别人家“吃冬”，主人家必杀鸡宰鸭、备办酸鱼腌肉款待来客。

湖湘少数民族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色节日，如湖南江永一带瑶族于农历四月初八日还过一个特殊的节日——“姑娘斗牛节”。此一活动有一个特殊的规则，那就是只有未曾出嫁的姑娘才能参加，因此又称“阿妹节”、“女儿节”。所谓“斗牛”与一般的斗牛不同，不是牛与牛相斗，也不是西班牙那样人与牛相斗，没有任何血腥和暴力的场面，而是一种竞赛性的游戏活动。每逢节日来临，瑶家姑娘身着最为艳丽的民族服装，三五成群结队，找一处风景生动的地方举行野餐。参加者均自带自制食物，其中三种必不可少，即在蛋壳上描绘了花纹图案的花蛋、用小刀刻画出各种花样的花糍粑、用蜂蜜熬干加熟米粉压块以黑白芝麻镶出各种图案的花糖。参加这个节日的姑娘们将各自带来的东西悉数拿出，让大家一起品尝，评价，并互相交流各自的技艺与经验，然后举行各种竞赛性的游艺活动。姑娘们的“斗牛”是不让男青年加入的，并且还不让他们旁观或者窥视。但小伙子们往往忍不住好奇，同时也有些小伙子想见见美丽的姑娘，就躲在附近窥探，但一旦被姑娘们发现，姑娘们就会对其进行惩罚。这种惩罚也是娱乐性的，让小伙子们捡柴、烧火、烤食品、采山花等，彼此打打闹闹，好不热闹。有的小伙子与姑娘在这一活动中可能互生爱慕，产生美好恋情，甚至喜结良缘。

第四节 湖湘饮食文化

古语云："民以食为天。"又云"食色性也"。孔子在《礼记》里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见饮食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没有饮食，人类就不能生存，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饮食方式由最初的"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逐步过渡到对食物进行采集加工后再食用，再逐步过渡到讲求食材、讲求烹饪方法、讲求美食与精神享受相结合。食物的种类、食物加工的方法也不断推陈出新。今天，饮食已不再仅仅为生存的需要，而是为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饮食，已经成为一种最直接的文化符号，成为人们品尝文化的精神享受，具有其他文化形态所不能及的扩散力与影响力。湖湘饮食也不例外。

一个地方、一个民族饮食特色的形成，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背景等分不开的。湖湘饮食呈现的主要特色就与湖南的自然环境、气候、物产以及湖湘人文传统、湘人性格、民风民俗密切相关。湖南地处中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适中。东、南、西三面山地丘陵环绕，中部多为丘陵，北部为平原湖泊，有素有"八百里洞庭"之称的全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业文明很发达，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多样的物产为饮食的多样化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物质条件，打造了独具个性的湖湘饮食主线。加上湖湘人杰地灵，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湖湘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意识，湘人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勤于进取，勇于开拓，还能不断吸收外来饮食的精华，为我所用，使得湖湘饮食体系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湖湘饮食文化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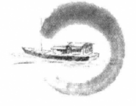
湖湘饮食文化历史悠久。考古发现，在湘西北的澧县、津市、石门和湘西的慈利、新晃、怀化以及湘江流域的长沙、永安等地发现的一百余处旧石器文化遗存中，有不少打制石器，有证据证明，在不晚于 20 万年以前，这些地方的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开始了熟食生活。湖南道县玉蟾岩发掘出的距今 12000 年的人工培植稻谷，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稻作文明遗物，说明湖南在新石器早期便已脱离“茹毛饮血”，进入到“饭稻羹鱼”。在玉蟾岩发现的陶片，是迄今为止中华大地上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炊具，证明湖湘先祖至少在 12000 年前便从烧烤、石烹进入到陶烹，而陶器、陶烹意味着人类科技的一次巨大飞跃。澧县城头山遗址、彭头山遗址，发现了 7000～9000 年前的古稻田，是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作农业遗存，号称“天下第一田”。中华民族被称为“炎黄子孙”，而炎黄二帝中，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开创者和传播者的炎帝就葬在湖南。湖南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的“宴席菜单”，屈原在《招魂》中，对筵席上的美食、美酒做了详尽而生动的描述，记载了当地的许多菜肴。西汉时期，湖南的菜肴品种就达 109 个，烹调方法也有九大类，这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可以得到印证。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粮食种类非常丰富，还有不少用稻米制成的糕点，说明当时的粮食加工已很精细。墓中不但有大量残留食品，还有食简、筷子、食器等，简直就是一个汉代饮食博物馆。湖南还发掘出了南方最多的青铜器，展示了铜烹时代“美食不如美器”的古风。在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中发现的饮食遣册，详细记录了随葬的食物，主食、副食、调味品、食材处理过程、烹调方法一应俱全，有关方面据此将之称为《美食方》，堪称湘菜第一谱，是中国烹饪史上难得的文字记载。长沙窑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与饮食有关的器皿，有碗、壶、盘、杯、碟等，其独特的釉下彩装饰工艺、模印贴花及造型，体现了饮食器具在唐代讲究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原则。窑中发现的大量瓷杯，说明唐代盛行饮酒、喝茶，折射出唐代饮食文化的高度成熟，也证实了当时湖湘饮食文明的发达。南宋以后，湘菜自成体系已初见

端倪，一些菜肴和烹艺由官府衙门逐渐步入民间。六朝以后，湖南的饮食文化丰富活跃。明、清两代，是湘菜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海禁解除，门户开放，商旅云集，市场繁荣，烹饪技艺得到广泛的拓展和交流，其显著特征是茶楼酒馆遍及全省各地，湘菜的独特风格基本定局。晚清以来湘军的崛起，进一步带动了湘菜的发展，不但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而且促使湖湘饮食文化走向全国，湘菜一跃而成为中国的重要菜系之一。

二、湖湘饮食特色及其成因

湖湘饮食特色鲜明。受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湖湘饮食一方面有着汉民族聚居地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明显区别；另一方面，湖湘大地存在湘江流域、洞庭湖区、湘西山区三大具有鲜明特征的饮食流派。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湖湘地势复杂，兼有了平原、山区与湖区多样的地貌。湘江流域地势较为平坦，交通便利，经济发达，能够多方采集原料，有条件品尝天下美味，因此在食物制作方面要求精细，追求口味，注重刀工火候，所烹制的菜肴强调色香味形等，品味多以酸辣、软嫩、香鲜、清淡为主。其中较为有名的菜肴有“麻辣子鸡”、“鸭掌汤泡肚”、“清炖牛肉”等。与湘江流域不同，洞庭湖湖区的人们则多以洞庭湖的水产为主要的菜肴原料。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洞庭鱼》中有过“洞庭鱼可拾，不假更垂罾。闹若雨前蚁，多如秋后蝇”的诗句。水产资源丰富，拿鱼待客也就成了一大风俗，民间也素有“无鱼不成席”的俗谚。除开水产品，水禽与湖泊中的野味，也是人们用来款待客人的上品。其菜肴多色重、芡大、油厚，口感则以咸辣香软为主。代表性菜肴有“潇湘五元龟”、“武陵水鱼裙腿”、“洞庭野鸭”等。湘西吉首、怀化等地区，地少山多，食材主要为山上所产，又因人们在储藏食物时多采用腌制熏烤的方法，故熏腊与腌制食品是这些地方的美味。在口味上他们注重辣香咸味、口味较重。其中有名的菜肴有“腊味合蒸”、“重阳寒菌炖肉”、“焦炸泥鳅”等。可以说，不同的区域，人们在饮食上的取材、用料、口味等都有着鲜明的不同。

虽然如此，但上述饮食流派作为湘菜的分支，其中所体现出的湖湘饮食共同的特色也是比较突出的。如重酸辣，喜熏腊，



讲究色香味，主味突出，即使引进外来菜品，也不会完全照搬，而是根据本地口味予以改进，使湖南菜始终保持了浓厚的传统风味。湖南人还善于根据四季物产的不同，使烹制的菜肴富于变化。

湖湘饮食重酸辣、喜熏腊，是与湖湘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黄帝内经·素问》："南方者，天地之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霾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胕"通"腐"，意指经过微生物作用腌制而成的食物。湖南气候湿热，食物容易腐败，勤劳而聪明的湖南人变不利为有益，用湖湘特殊的方式加工贮藏菜肴。普通家庭都会熏腊肉、卤蛋、做霉豆腐等。至于小菜腌制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家家户户都有酸坛，泡豆角、黄瓜、萝卜等可随时取用，经济方便。

空气潮湿，温差较大，以及冬日奇寒、夏日酷热的气候，使人体容易风寒湿热内蕴，抒发不畅，导致人体种种不适。而食用辣椒则可除风散寒，改善身体的状况。酸辣还可以增进食欲。《楚辞·招魂》有"大苦咸酸，辛甘行些"，酸辣成为湖湘饮食调味的一大特色。特别是辛辣，发汗、祛湿、开郁的辛辣食物俨然成了湖湘这块"卑湿之地"的必然选择。湖南人"五味喜辛，每食不离辣子，盖丛崖邃谷中，水泉冷冽，岚雾熏蒸，非辛不足而温胃脾，故群然资之"。这正是湖南菜酸辣风味的科学阐释，味觉艺术和食养科学的辩证统一，就是湖南烹饪文化的内涵所在。湖南人爱吃辣椒的饮食习惯，甚至在人们的性情心理上也有影响。著名歌星宋祖英《辣妹子》所唱"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辣"、"辣妹子从来辣不怕，辣妹子生性不怕辣，辣妹子出门怕不辣，抓一把辣椒会说话"、"辣妹子说话泼辣辣，辣妹子做事泼辣辣，辣妹子待人热辣辣，辣椒帮她走天下"、"辣出汗来汗也辣，辣出泪来泪也辣，辣出火来火也辣，辣出歌来歌也辣"等歌词，形象地体现了湖南人某些因辣而起的性格特质。

湖南菜的个性，通常被认为是辣。实际上，湖南肴馔并不都是辣，特别是市肆与筵宴的名菜名点，而比较贴近大众的百姓家常菜，则是不可一日无辣的。湖南人嗜辣，全国知名，甚至超过同样嗜辣的四川人。但湖南菜只说辣并不全对，因为辣通行于中国西南地区，他们的辣又不尽相同：四川是麻辣，贵州是香辣，云南是鲜辣，陕西是咸辣，湖南则是酸辣。这酸不

同于醋，酸而不酷，醇厚柔和，与辣组合，形成一种独特的风味。湖南的烹调师擅长于驾驭酸辣，能使酸辣分出情浓、轻重层次，使它们恰到好处。湖南的烹调师善于掌握辣椒“盖味而不抢味”的特性，在辣味的掩盖下调和百味，使人们从辣中品味百味，包括湖鲜、海鲜、鲜笋、鲜菌，乃至湖南特产的豆豉、腊味、茶油、菌油等等风味，都能从辣中透溢出来。这种功夫，唯在三湘表现尽致。

三、丰富多彩的湖湘饮食习俗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说明湖南方言复杂多样，同样，植根于历史与自然环境的饮食习俗也有相应的区别。湖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远古时代即有“三苗”、“九黎”、“百越”等诸多民族成分；秦汉以后，境内居住除汉族外，尚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回族、壮族、白族等，这些民族人口总数并不算多，但居住地区相当广阔，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饮食习俗，这一复杂的构成丰富了湖湘饮食文化内涵，构成了湖湘饮食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

（一）以长沙为代表的汉民族聚居地饮食习俗

长沙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记载“吴越家饮食多粥少饭，而长沙饔飧独厚，至宴宾则穷其极品，不则便以陋啬笑之”。可见长沙不光重吃，吃的时候还很讲究面子。

长沙人自古以米饭为主食，烹调菜讲究色和味，所用佐料多。最常用的作料是豆豉和辣椒，几乎无菜不辣。除辣椒外，豆豉、芫荽、葱、姜、蒜、胡椒、茴香、肉桂等也是长沙人喜欢的作料，不但能助其味，而且有提神发表、祛湿抗寒之功能。

长沙还有三月三吃地菜煮鸡蛋、端午节吃鳝鱼、立夏吃笋吃汤团、伏日吃老姜炒子雄鸡、大年三十晚上吃猪脚等等饮食习惯。农历三月三，古称上巳节。这天，城乡居民用地米菜、生姜、红枣合鸡蛋煮食，有的还放枫球，谓可去风湿，护肝明目。立夏和夏历四月八吃笋子炒肉，名为“助力”，又叫“接力”。据说可以健腿，像竹笋一样节节拔高，坚韧有力。有“立夏不吃笋，瘦得光梗梗”、“吃了立夏羹（将米磨成粉，加水加热而成的糊状食物），麻石踩成坑”、“立夏吃个团（音 tuó），一



脚跨过河”等民谚。伏日吃姜姜要多放，有人吃时还要将门窗关闭，吃得大汗淋漓，意在散发体内蕴寒，防止秋发寒病。

（二）苗族饮食习俗

苗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在湖南则主要居住在湘西自治州的花垣、凤凰、吉首、泸溪、保靖、古丈、龙山等县市和邵阳的城步苗族自治县、怀化的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以及麻阳、绥宁等县。苗族饮食习俗总的来说是“嗜酸辣咸，好烟酒茶”，特别是酸，有“苗不离酸”的俗语。

苗族以大米为主食，辅以玉米、红薯、小麦，再杂以荞麦、大麦、燕麦、高粱等。民间尤以糯米为贵，将糯米饭作为丰收和吉祥的象征。常将糯米打成糍粑或做成粑粑，吃时烧、烤、炸均可，如再加一些鲜肉和酸菜做馅，味道非常鲜美。

苗族的菜肴种类繁多，常见的蔬菜有豆类、瓜类和青菜、萝卜等，肉食多来自家畜、家禽饲养。苗族喜吃狗肉，有“苗族的狗，彝族的酒”之说。调味品主要是辣椒。苗族大部分都善作豆制品，例如用黄豆浆不滤渣，煮成“连渣汤”；将豆浆与嫩白菜同煮，然后点石膏水做成“菜豆腐”，都是下饭的日常菜。

苗家饮食独特的民族风俗是普遍喜食酸味菜肴，以酸汤最为著名，家家必备。苗族吃酸菜的历史悠久，跟他们深居高山缺少食盐有关，平时很难买到蔬菜和肉类，所以每家都备有酸坛，用以腌制各种酸味食品。在制作酸味食品上，苗家人有整套工艺和吃法。除酸汤外，其他酸味食品主要有酸菜、腌酸鱼、牛肉酸、猪肉酸、酸辣子、酸萝卜、青菜酸、豆类酸等。

在食物的保存上，苗族也善于加工贮藏菜肴，尤善腌制食品。此外，苗族也善用熏腊方法保存各种家畜、家禽肉。蔬菜、鸡、鸭、鱼、肉都喜欢腌成酸味的。湖南的苗族把这腌制食品的方法称为“鲊”。苗族几乎家家都有腌制食品的坛子，统称酸坛。

苗族人普遍喜欢喝酒，“无酒不成礼”已是他们遵守的礼仪，酒是待客议事、婚丧嫁娶、起房建屋、逢年过节的必备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生活实践中，苗族人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酒文化。所饮之酒名目繁多，如“拦路酒”、“进门酒”等。咂酒是苗族别具一格的饮酒习俗，饮时用竹管插入瓮内，饮者沿酒瓮围成一圈，由长者先饮，然后再由左而右，依次轮转。酒

汁吸完后可再冲入饮用水，直至淡而无味时止。咂酒一经开坛，剩酒无论浓淡，均不复再用。逢年过节，家家还都做糯米甜酒。苗族人不光喜欢喝酒，在喝酒时还极为讲究待客的礼节。

（三）土家族饮食习俗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湖南、湖北、四川三省，在我省主要居住在湘西自治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吉首、凤凰、古丈以及张家界的桑植等县市。

土家人的主粮为包谷、大米、高粱、红薯、土豆、荞麦、粟及各种豆类，日常主食除米饭外，以包谷饭最为常见。有时也吃豆饭，即将绿豆、豌豆等与大米合煮成饭食用。粑粑和团馓也是土家族季节性的主食，有的甚至一直吃到栽秧时，过去红苕在许多地区一直被当成主食，现仍是一些地区入冬后的常备食品。

土家族菜肴以酸辣为其主要特点，几乎餐餐不离酸菜。普通人家都有酸菜缸，用以腌泡酸菜。辣椒也是每餐不离的调味品。豆制品也很常见，如豆腐、豆豉、豆叶皮、豆腐乳等。尤其喜食合渣。土家妇女还喜将四季鲜菜、野菜或畜禽肉类加工成干菜、腊菜、辣菜、酸菜等诸多系列，如腌制泡辣子、糯米酸辣子、包谷酸辣子等。腊肉是土家族的上等大菜。逢年过节或亲朋临门，满桌的菜肴中，正上方必摆腊肉。

土家族民间十分注重传统节日，尤其以过年最为隆重。猪肉合菜是土家族民间过年、过节必不可少的大菜。每年农历二月二日称为社日，届时要吃社饭。端阳节吃粽子。糯米粑粑是土家族民间最受欢迎的食品之一。重阳节打粑粑，女儿“坐月”送粑粑，修房上梁抛粑粑。节日里馈赠亲友，一般也都是互送粑粑。除糯米粑粑外，还有高粱粑粑、小米粑粑、包谷粑粑等。团馓是土家族风味小吃，用糯米饭加工后炸制而成，常用来泡水当茶为客人洗尘。

古代巴人豪饮成习，土家人继承了这一传统。土家酿酒工艺精道，种类繁多，如五谷杂粮酒、葛根酒、药材酒等。土家族的饮酒，特别是在节日或待客时，酒必不可少。其中常见的是用糯米、高粱酿制的甜酒和咂酒，度数不高，味道纯正。

（四）侗族饮食习俗

侗族主要居住在贵州、湖南、广西等省区的毗连地区，以



贵州省最为集中，湖南则集中在怀化的芷江、新晃、通道、靖州等民族自治县。

侗族以稻米为主食，好饮米酒和茶，口味嗜酸辣，与苗族同样有“侗不离酸”的俗语，民间还有“三日不食酸和辣，心里就像猫儿抓，走路脚软心也花”之说。侗家酸食有素酸（泡酸、腌酸）、荤酸（鱼肉）、煮酸多种，最为流行的酸食当推荤酸，举凡鱼虾、鸡鸭、牛肉、猪肉等均可腌制。侗寨每家都有多个这样的腌坛腌桶，分别腌有鱼肉鸡鸭等，其中以酸草鱼最为珍贵。每逢贵客临门、双亲去世、祭祖、办酒宴等场合，均要有酸鱼，待客无酸食，主家会感到不周，脸上无光彩。平时多用酸汤煮菜，即所谓煮酸。侗家爱吃黏软糍糯的糯米饭，多吃酸食，有助于消化。在空气潮湿的自然环境中，酸辣结合的饮食习惯也有助于散发体内的风寒湿热。

侗族传统习俗以鱼为贵，对鱼特殊偏爱，在清朝道光年间腌鱼拌蒸糯米饭已成为侗族待客的美味佳肴。吃饭时很讲究礼节，凡新鲜好菜必先让长者品尝。开宴前端水给老人洗手，请长者先上座；开宴时，如是男客，主家小孩和妇女一般不拢桌，候在一旁添饭菜。席上，必由长辈或主人先动筷子，客人方可饮酒动筷。侗族民间用鸡、鸭待客时，首先主人要把鸡头、鸭头或鸡爪、鸭蹼敬给客人。客人应双手接过，或转敬给席上的长者，以表示主客之间互相尊重，以诚相待。到侗族家里做客，食用腌鱼时，主人将一堆腌鱼块放在客人碗中，但客人最好不要吃光，留一两块，以表示“有吃有余”。

侗族成年男子，普遍喜爱饮酒，所饮酒类大都是自家酿制的米酒，度数不高，淡而醇香。侗族有“歌声不断酒不断，有酒无歌礼不全，有酒无歌宴不丰”之说。与饮酒有关的歌十分丰富，如敬酒歌、劝酒歌、拦路敬酒歌、赞酒歌，以及酒宴上唱的赞团寨、赞老人、赞青年、赞妇女等酒歌。

（五）瑶族饮食习俗

瑶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几个省区的山区，是中国南方比较典型的山地民族。在湖南主要分布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和江永、蓝山、宁远、道县、新田、郴县、桂阳、宜章、资兴、常宁、隆回、新宁、城步、辰溪、溆浦等县市。

瑶族以大米、玉米、红薯、粟、麦为主食，此外尚有木薯、芋头、马蹄、棕衣苞、芭蕉心、飞花菜等为辅助食物，既当粮，

亦做菜。旧时主要以杂粮为主食，常将玉米、红薯等杂粮掺杂大米做成“三夹饭”、“四夹饭”。清明节吃一种染色的“五色花糯米饭”。因为自然条件的关系，山区的瑶族，有冷食习惯，食品的制作，都考虑便于携带和储存，故主食、副食兼备的粽粑、竹筒饭都是他们喜爱制作的食品。

瑶族常将蔬菜制成干菜或腌菜，肉类也常加工成腊肉和“鲊”肉。湖南的瑶族特别喜爱风味佳肴“鲊”。“鸟酢”是瑶族独具风味的著名食品，用鸟肉腌制而成。瑶家人常用“鸟酢”来招待贵客。冬天喜将野兽肉或猪肉进行腊、熏、酢，制作的腊肉、熏肉及酢肉等均很有特色。糍粑是瑶家传统风味小吃，是节日必备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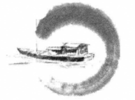
瑶族人大都喜欢喝酒，并由此产生出很多与酒相关的食俗，如瑶家宴客有号称“瑶家三礼”的“敬茶洗澡接风酒”；全寨公宴贵宾有“碗酒串肉”；求婚带一包肉和两葫芦米酒，女方同意便收肉，不同意则刺破葫芦；离婚仪式为“破竹筒”，离婚双方各提一筒酒，交换饮毕砍破竹筒后就此和气分手。此外，还有调解民事纠纷的“上门挂红酒”，等等。

打油茶是瑶族一种特殊的饮食风俗。每天清早起来，烧开水后，架上茶锅，放入一小撮茶叶，加油盐小炒，待茶叶香味扑鼻，冲上开水煮滚，即制成香气扑鼻之油茶。瑶族喜欢打油茶，不仅自己天天饮食，而且用油茶招待宾客，以示敬意。瑶族还喜用桂皮、山姜等煎茶，认为这种茶有提神、清除疲劳的作用。



第五节 湖湘礼俗文化

中国历来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界。所谓礼仪，就是人们在生活、生产、社会交际等各种活动中所遵循的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以及表现这些规范的外在形式。这些礼节仪式累月经年，日益扩散，渐渐相沿成习，成为人们普遍认可并依照实



行的社会风俗，又称之为礼俗。

传统中国是礼俗社会。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从乡土社会的视角提出“礼治秩序”的概念，与此同时，柳诒徵先生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也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所谓礼俗社会，即以民间生活习俗为基础，以礼治为主导，实施秩序管理的社会。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从礼的源头来看，它应当是起源于民间祭祀，最早应当是祭祀之礼，也就是指祭祀之时所用的物品。后来，这种礼的范围不断扩大，自然就超越了一般祭祀活动而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发展与蔓延。后来，知识分子与社会统治者见到了礼所具有的功用，从而不断地将其纳入到社会管理的法规之中来，甚至赋予其意识形态的特性。于是，依靠民间习惯势力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并进一步将其系统化、规范化，也就逐渐出现了作为儒家经典的《礼记》，后来也就成了儒家推行礼教的理论根基。儒家所推行的礼治，为历代圣贤所推崇，表现了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

礼和俗并不是一回事，礼是典章制度，俗为风俗习惯。但在中国，“礼俗之界，至难划分”。这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覆盖面最广，传承力最顽强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华民族“以史迹较之，成绩特殊，由果推因，其亦有循共同之轨而自致其优越之端欤”。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体系，世世代代传沿不绝，这是举世公认的特征。这与中华民族礼俗文化也许不无关系。

礼俗本于生活，生活是礼俗之源，也是礼俗赖以产生和传承的土壤。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与生活鱼水相依的礼俗文化，植根于生活的良田沃土，得以产生、发展与传承。湖湘丰富多样的礼俗文化是中华礼俗文化宝库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湖湘日常礼俗

湖湘礼俗甚多，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吃饭，有所谓“坐上席”的说法；客人进屋必须奉茶；对赠送了礼物的客人要“回篮”（或称“打发”）；邻里有困难或遇大事如起屋、婚丧等红白喜事，多自动热情相助，或馈赠钱物，或免费出工出力，俗称“帮忙”，等等。在日常礼俗中，惯常见的是人伦礼节和社交礼仪。

（一）人伦礼节

重人伦，讲礼节，是湖湘人民的传统美德，也是湖湘民风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长沙为例：在长沙的家庭生活中，幼对长要用尊称，不能直呼其名，曾祖父叫太公，祖父叫公公；曾祖母叫太婆，祖母叫阿婆；父亲叫爸爸、爷老倌、爷老子；母亲叫妈妈、娘老子。媳妇称公婆为家爷、家娘。夫妻称两公婆，夫叫妻为婆婆子、堂客，或直呼其名；妻称夫为当家的、老倌子、他（你）爸爸，或直呼其名。兄妹之间，长称幼可直呼其名，也可叫某伢子、某妹子、老弟、老妹；幼称长为老姐、老兄，或在哥、姐之前冠以排行次序，如大姐、二哥等。姑嫂之间，幼称长为嫂，前冠以排行次序；长称幼为婶，如“三婶”、“四婶”，或直呼其名。对儿孙辈，叫某伢子、某妹子或直呼其名。

长沙人的家庭通常以辈分最高的成年男子为长，同辈之间，以兄为长。父母不在，“长兄当父，长嫂当母”，凡事长房位尊，以嫡为长。旧时推崇兄弟多而不分家的家庭，对于五世同堂的给予旌表。晚辈对长辈要孝顺，否则受谴责。无论年龄大小，凡有忤逆行为，均应受杖斥。有时鲜美食，必先送父母尝新。晚辈每天须向长辈请安，晚上到最高长辈处聚集，冬日围炉共话，有的还尽温席之孝。夏日则为长辈驱蚊打扇，与之共炎凉。晚辈外出，要禀告父母；归家时，先到长辈房中问安，然后再回自己居处。

在长沙，联姻叫结亲家，双方父母互称亲家公、亲家母、亲家婆。婿呼岳父为丈人公、岳老子，呼岳母为丈人婆、丈母娘。连襟称姨夫。岳父母对女婿一般直呼其名，或称为郎、郎



崽子。俗语“郎顶半子”。各种亲戚以外家最重，所谓“娘亲舅大”。

谚云：“远亲不如近邻。”长沙一带，邻里称谓，多在辈分前冠以姓氏或排行次序，如张三爹、李四娭、刘满爹等。很多女性喜欢以儿女辈称呼长辈或同辈，即把自己降低一辈。

（二）社交礼仪

人与人的交往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交礼仪。长沙人热情好客，喜欢串门，俗称“耍下子”。熟人见面必问“贵体好”，答曰：“托福”。遇见长者，说“您老健旺”。生人见面，先问“贵姓”、“尊住”。客人进屋，主人必起立迎坐，递烟泡茶招待，有的还会待以旱茶等。留客吃饭，必让客人坐上席。客人若留宿，晚上以甜酒蛋、糯米糖油粑粑、糍巴等作夜宵待客。睡觉时，主人会把“客人被”拿出来给客人宿用。假若没有“客人被”，则让客人与同性主人或子女共被，俗称“搭脚”。客人告辞，必说“少陪”，主人起立相送，说“慢走”。有的还要根据客人的身份、社会地位及与主人家的关系，分别馈赠各种土特产或其他财物。

居住在湖湘大地的少数民族在社交活动中也都很注重礼仪。土家族平时粗茶淡饭，若有客至，必盛情款待。夏天先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就先吃一碗开水泡团馓，然后再以美酒佳肴待客。土家族人无论婚丧嫁娶、修房造屋等红白喜事都要置办酒席，一般习惯于每桌九碗菜、七碗或十一碗菜，但无八碗桌、十碗桌。因为八碗桌被称匄吃花子席，十碗的十与石同音，都被视为对客人不尊，故回避八和十。土家族人亲戚来往非常密切，礼仪不少，且不问贫富，不论亲疏。土家族有句谚语，“亲戚像把梭，往来脚跟脚”。

苗族对人非常热情，讲究真情实意，最忌浮华与虚伪。主人路遇客人不抢走第一步，不走在前面；交谈中用敬语称呼；迎客要穿节日服装；对贵客要到寨外摆酒迎候；客人到家门，男主人要叫门，告知在家的女主人，女主人要唱歌开门迎客；在客人面前，女主人不登高上楼；宴会上以鸡、鸭待客为佳肴，尤以心、肝最贵重，要先敬给客人或长者，客人则分给众人享用，次序是先长后幼。到苗族人家里做客，要注意不能坐苗家祖先神位的地方，吃饭时忌吃主人家的锅巴，火坑上三脚架忌用脚踩，妇女与长辈忌坐一条长凳。

瑶族以泡茶待客体现瑶族人民热情好客的美德。客人走进瑶寨时，瑶家主人会送上一大碗泡茶。在大瑶山，喝泡茶谈心是人们传统的生活乐趣。瑶民们常在饭后或劳动后，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喝泡茶"，并佐之以酸菜、苞谷或其他点心。有的晚上踏着月光或点着火把相邀数里之外的朋友欢聚"喝泡茶"。边喝边谈，畅叙友情，其乐融融，往往一坐就是半夜，一喝就是数碗。

茶食作为一种精美食物，既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同时在人们的礼仪性往来活动中充当了一种重要的交流工具，周作人先生曾形象地称其为"包含历史的精炼"的"吃不求饱的点心"，说明茶食的存在已远远超过了一般美食的意义，具备了多种文化功能。湖湘人爱喝茶，离不开茶，其重要性不亚于吃饭，故每将茶饮与饭菜并称，问一家有几口人，边常说"有几个人吃茶饭"。

湖湘最闻名的茶饮是油茶，主要居住在湘西及湘西南的苗族、侗族、瑶族、土家族同胞，都有喝油茶的习俗。油茶具有香、咸、苦、辣、甘等味，并有提精养神、祛湿散寒、驱瘴除病的作用。既是饭前必食的饮料，又是迎宾待客的风味食品。但同为油茶，不同民族的做法与喝法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湘北与湘中的一些地区，则有喝擂茶或芝麻豆子茶的习俗。湖湘其他有名的茶饮还有浏阳的茴香茶、汨罗的甜蛋茶、绥宁的万花茶、城步的虫茶等。

茶也好，饭也罢，其中还有些礼俗不能不遵守。客来奉茶，浅茶满酒，就是说泡茶不能太满，湖湘有"酒满敬人，茶满欺人"的俗语。向客人献茶时，应用双手把茶杯递给客人，说一声"请"或"请喝茶"。客人亦应起立，以双手接过茶杯，道以"谢谢"，单手奉茶或坐着不动都会被认为失礼。

在举行宴会时，座位要分尊卑主次，敬酒也要依照宾客的身份地位区别先后。如厅中仅摆一桌，则上方为正席，下方为陪席；若并排两席，则以东西两方为首席。筛酒时，以先左后右、先东后西为敬。在湖南农村，特别是婚丧等大场面座次的安排尤其马虎不得。遇红喜事，舅家人必坐首席，由主家毕恭毕敬陪酒。办白喜事，舅家亦地位至尊。如果位子坐得不对，往往会惹出事端，即使当场不发作，梁子也就此结下，心中的疙瘩很难解得开。因此，每逢红白喜事等大事摆宴，各家都异常重视，常委派一位年龄稍长或稔熟主家社会关系的人专门负



责“清位子”。

二、湖湘婚姻礼俗

婚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婚姻习俗，它以有规律性的活动约束人们的婚姻行为与婚姻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具体来看，湖湘汉族人的婚姻习俗与中原人没有大的区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媒、相亲、换庚、定庚、过门、拜堂、闹房、回门等构成一整套礼俗仪式。不同的是，在湘西、湘南一带，特别是土家或苗家聚居地，女孩在出嫁之时，流行哭嫁之风。在湘南嘉禾县，甚至发展成一整套“伴嫁歌舞”，有安席歌、哭嫁歌、怨娘歌、骂媒歌、分离歌、送别歌、射歌（历歌）、耍歌、媒婆苦歌、童养媳歌等，采取坐唱、轮唱、合唱、长歌等形式，还有的跳起《伴嫁舞》（包括把盏、香火、走马、划船、卖酒、推磨、娘喊女等多种样式），甚是复杂。现在多已从简，即使有也多是为了开发旅游资源的需要，作为表演节目而出现。

湖湘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择偶、定亲和婚礼比汉族要丰富多彩，有许多还保持着原始古朴的特色。少数民族青年互相结识、物色对象常在喜庆节日或赶集赴会的途中。苗族的四月八、六月六、“边边场”、赶秋的歌会活动，侗族的“玩山赶坳”，都是青年男女聚会交友的极好机会。湘西苗族还有跳月之风，童男处女于清风月夜，到林中山巅，对歌跳舞。情投意合者，虽不相识，亦可相约订婚。

湖湘一些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定亲也别有风味。隆回瑶族订婚的信物是一把油纸伞，女家有意则将用各色花布和丝线扎好的12个三角形的丝线布坨，缠吊在纸伞的撑骨上；怀化侗族则是刺鸡定情，在月色皎洁的夜晚，青年男女均由伙伴陪同相会，男方将带来的大公鸡鸡冠刺破，把鸡血滴入酒中，双方饮酒盟誓，永结同心。

湖湘少数民族的婚礼各有一套礼仪，欢快热烈，极富情趣。湘西苗族婚礼中，要举行洗“和气脸”的仪式。新娘到达夫家时，男方的长辈端来一盆清水，清水中放一只银手镯，新娘和夫家人共用这盆清水洗脸。据说，洗了“和气脸”，全家可以清



泰平安，和睦相处。

土家族婚礼别具一格，姑娘在出嫁时要唱“哭嫁歌”，送亲时姑娘和母亲唱“发轿歌”，新婚夫妇进了洞房，歌手就唱“贺喜歌”和“拜客歌”。

湘西南瑶族有“抢亲”风俗，新郎去迎亲时，新娘避之，新郎追赶，如此往复3次，才算成婚。据说这样结成的夫妻，能够互敬互爱，白头到老。

招郎是瑶、苗、侗、汉族共有的一种婚姻形式，流行于全省多地区，以江华瑶族和城步苗族最盛。大山区瑶族妇女享有较高的地位，一般不外嫁，留在家中“讨丈夫”，没有女儿的人家，也往往要“接”一个女儿，长大后，“招郎上门”，延续家族，而让男子出嫁，称为“招郎”。“招郎”入门后，女家长辈称其为子、为侄，忌称女婿、侄郎；同辈称兄道弟，忌称姐夫、妹夫；小辈称伯伯、叔叔，忌称姑爹。上门郎在女家享有财产支配权和继承权。“招郎”有“两不辟宗”和“男从女姓”之分。“两不辟宗”又称“两边走”、“半招郎”。即婚后男女双方家庭的生产和生活都要照顾。生下孩子第一个随母姓，第二个随父姓，余类推。“男从女姓”即男子到女家后，生产、生活于女家，改随女姓，所生子女全随母姓。汉族“招郎”婚姻，男子“招郎”女家后，改不改女姓，所生子女随不随母姓，不甚严格。有改随女姓，子女随母姓的，也有不改随女姓，子女不随母姓的。

三、湖湘生育礼俗

（一）长沙生子风俗

妇女怀孕，长沙地区俗称为“有喜”。婴儿出世，婴儿父亲要带着鞭炮和一只鸡到岳父家报喜，生男孩带公鸡，生女孩带母鸡，岳家无需问便知生男生女。分娩后胎衣要用陶罐盛着埋在附近山上，绝不可随意丢弃，而且送胞衣时不能回头，否则倒奶。

小孩降生时，如有不速之客进屋，称“逢生”。来客就是婴儿的干爹或干娘，但有“男逢男生，背时三年，踏了血地，必有灾祸”之说。为解脱，主人便暗中在客人衣上穿上红线，以



"刺破灾祸"。男逢女生，则认为是好事，要"逢时三年"。

生后第三天，女婿接丈人婆去"做三朝"，古称"汤饼之会"。外公外婆带去早已准备好的婴儿摇窝、坐栏等，一般还备有婴儿棉袄、夹袄、单衣、棉抱裙、夹抱裙、鞋、帽等各一对。三朝日，长辈妇女将艾叶、枫球、鸡蛋等熬汤为婴儿洗澡，叫"洗三朝"。洗毕，用鸡蛋滚擦婴儿全身，以祛风，祝福健康。

三朝日亲友赐红纸包封祝贺，赴汤饼会，叫"打三朝"。主家煮熟鸡蛋，上红，分赠众人，叫吃红蛋，又叫吃滚屁股蛋。河西有的地方还往婴儿父亲脸上擦红，祝贺他做了"大人"。

妇女产后一个月内不能外出见风受凉，并且要大量补充营养，不能吃咸的东西和青菜水果，更不能吃生冷及饮用冷水，这就是所谓的"坐月子"。浏阳时兴产妇吃姜。婴儿在出生几个小时开始喂奶，在还未喂奶前，先喂糖水，正式吃奶时，要先用葱来清洗奶头。在长沙地区，婴儿满月那天一般回外婆家，叫"出窝"，外婆家没人的，往往找一个与产妇关系密切且人品、家庭条件好的女性亲戚或朋友家"出窝"，以让孩子讨个吉利。

（二）湘南湘西育儿习俗

湘南一带保存下来的较为古朴的育儿习俗比较多，主要有：报喜、"送祝米"、"洗三"、"做月满"、周岁（"抓周"）、拜干妈、"度戒"（瑶族）等。

在湘南、湘西等地，传承着一种古老朴素的育儿风习：送祝米，也称"送粥米"或"送鸡米"。小孩出生以后，其父亲或家人赶紧带上礼物去岳父母家报喜；岳父母家再约定日子，邀集一些亲友挑着喜物前来女婿家祝贺，称为"送祝米"。所谓"男家不报喜，女家无祝米。"

送祝米的喜物和礼仪，往往因地（民族）而异，各具独特的风采。

湘南的一些地方，去岳父母家报喜用的多半是鸡。岳父母只要看看来人带来报喜的是公鸡或者母鸡，就知道女儿生的是男孩或女孩。回礼的时候，恰好相反，带来公鸡则回送母鸡，带来母鸡则回公鸡，不过，有时也不一概而论，较多回送母鸡（当地俗称"鸡婆"）。因为鸡婆好吃，营养价值高，对坐月子的人恢复健康、多发奶水都有好处。

湘西花垣一带苗族地区，送祝米的礼物有蛋、鸡、银饰、

摇篮背裙等，有的给产妇补养身体，有的则供抚育婴儿。更为有趣的是，送祝米的人以女客为主，大半是产妇的姐妹、婶姨、细伢（姻侄子女）；成年男客只能充当“挑夫”。

“洗三”是国内流传甚广的一种育儿习俗，但湘南衡阳地区“三朝”礼仪及其口传歌谣却极具湖南地方特色与传统意味。旧时，湖南的衡东、常宁、祁东等地，孩子生下后的第三天，在举行“洗三”仪式后，紧接着要举行一个“出天行”的仪式。由“接生婆”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先到大堂拜过祖宗，后拜天地。然后走出堂屋，旁人撑一把油纸伞，站在大门口的屋基上，婴儿的姑姑、姨姨、（或伯母、婶母）二人，各拿一个擂杵，一把蒲扇，一边在廊柱上拍打着，一边唱着《胆大歌》：“毛毛抱怀中，三朝出天行，撑起遮天清油伞，擂杵敲门壮大胆。唆岩鸾，岩鹰唆，唱起胆大歌。男儿胆大好进学堂，女儿胆大好遇家（gā）娘（即婆婆），天不怕，地不怕，能同雷公打得架……”这种歌谣泼辣粗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湖湘文化的特色。首先，这种歌谣纯粹运用地方口语，除了质朴之外，更多地表现出了其源自楚地的那种不受一般礼法约束、追求平等，敢于反抗的个性特征。同时，与中原文化那种重男轻女不同，这种做法不是男孩才有的专利，女孩同样也可举行，其仪式的热闹和隆重没有男女的区别，一家人欢欢喜喜，亲戚朋友也赶来祝贺，这反映出民间文化中面对新生命所焕发出来的源自内心深处的认同与喜爱之情。同时，父母的这种做法也更多地表现出湖湘文化中父母对儿女培养的宽容和自由的态度，当然，这种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湖湘文化在底层状态中未曾受到中原封建礼教的钳制和束缚，保存了南楚古俗和原始遗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源于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民性士气、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社会因素的汇合交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则反映出了民间文化的多样广博。

新生命的降生，往往让一个家庭充满了活力与喜庆。孩子生下后一个月，家里人和亲友们又要庆贺一番，称为“做月满”（或“满月”）。这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第一件事是“庆典”祝贺；第二件事是剃胎发；第三件事是命名。孩子满月，举行庆典，亲友（尤其是外婆家、舅家）们送贺礼，主家设酒宴款待，这不但是人之常情，也是古已有之礼仪。唐代诗人张谔写的《岐王府满月》一诗中说：“社金流茂祉，庭玉表奇才，竹似因谈植，兰疑人梦栽，鸟将几子去，凤逐九雏来，今



夜明珠色，当随满月开。”办“满月酒”，欢宴宾客时，还要抱出婴儿来给亲友们看，亲友们除赞美一番外，还要给孩子“红包”。湘南衡东等县的“参见”仪式，是在筵席上上第五碗正菜（一般为十碗菜）时，家庭主妇抱着婴儿与宾客见面。孩子的外公、舅爷、姑爷、姨爷等则拿出红包相送。

除上述“月满”活动外，在湘西侗族地区还有一种极富民族地域特色的“撵麻雀”。在婴儿满月这天，奶奶抱着小孙子（女），边亲脸蛋边念着：“宝宝乖，宝宝‘确’（聪明），去跟婆婆撵麻雀。二天长大有胆量，不怕虎，不怕狼！”接着，婆婆把小家伙背在背上，只露出个小脑袋在外，拖起一根响竹篙，走出屋门，煞有介事地边敲竹篙边发出撵麻雀的吼声。先围着屋前屋后走，再转过左邻右舍，出屋场，上山坡，在一阵阵吆喝声和响篙声的惊动下，屋檐场角的那些贪嘴、淘气的小麻雀早都振翅高飞了。不难看出，侗家世代承袭的这一古老习俗的主旨在于：让孩子们从小习惯并慢慢懂得，山里的飞禽走兽虽然多，但并不可怕；只要人勤劳、勇敢，完全可以把它们撵跑（或擒拿）。这是多么别致的“庆典”。

在湘南郴县、湘西新晃等地，婴儿满月，还要敬祖先，供菩萨，给孩子头次剃发，俗称“剃胎发”。剃下的胎发要保存起来，有些地方把它搓成一团，像桂圆核一般，装在用红绿丝线做络结成的网兜里，挂在小孩睡觉的床前。有些地方将它与猫毛、狗毛（临时从猫、狗身上剪下）放在一起，用红纸包好，丝线扎住，收藏起来。有些地方干脆在婴儿的后颈窝或者前额留下一团胎发不剃。为什么要给孩子保存胎发呢？各个地方说法也不一样。有的地方是把它作为小孩最初的“纪念品”珍藏起来；有的则期望婴儿安全无事并且快些长大成人（旧时小孩多病且易夭折，故取其文义，愿孩子像猫狗一样——贱生易长）；还有的寓意孩子（女孩）将来善于纺织，做针线活等。

湘西侗族对此理解得较为特殊，别有情趣。侗家儿女“留胎发”，表示不忘母舅。当外甥忘记礼数，或者没有做妥当的时候，舅辈就会理所当然地进行指责：“摸摸看，你后脑壳的头发是从哪里来的？”娘舅为大的礼俗极为鲜明。



四、湖湘寿诞礼俗

古语云："百岁曰上寿，八十曰中寿，六十曰下寿"，可见古人称"寿"的最低限度是60岁，即六十岁以上老人整生（逢十）贺生日才能称为"寿"。长沙也有50岁以前就庆寿的，但有"男不做三，女不做四"之说，即男满29岁，女满40岁不做寿。有的生日外出避客，叫躲生。有的人依"母在堂，不做寿"的古训，即使是60岁或70岁，只要高堂健在，就不做寿，自己生日看成母亲的难日，只给母亲添菜，以感谢母亲的生育之苦和养育之恩。

长沙人做寿讲"男进女满"，即男做虚岁，女做实岁，做60大寿被认为是重开花甲，特别隆重，称为寿星公、寿星婆。有的搭寿台、陈寿桃、点寿烛，有的亲友送寿匾、寿屏。寿星端坐寿台，接受儿孙跪拜，此时鞭炮燃放时间越长越好。开筵时，先吃寿面，面条细长，象征长寿，故长沙人叫生日饭为吃面。

现在很少看见搭寿台的现象，多在厅中悬巨幅"寿"字代替，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流行在电视台点歌、请电影队放电影、请戏班唱戏祝寿。虽然不提倡为做寿大摆宴席，但寿年越高总是越受人尊重，对高寿的"寿星"，不但晚辈殷勤侍奉，逢上大寿，乡镇政府甚至市级有关部门都会登门祝寿。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庆寿习俗已大有改变，繁文缛节的古代礼仪渐渐销声匿迹，现在的庆寿的形式已越来越简单。不过，虽然是简单的送礼恭贺、作揖拜寿、就席喝酒书、横幅、贴对联，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晚辈的孝心与场面的热闹都是有增无减的。

五、湖湘丧葬习俗

湖南人讲孝道，重丧葬，诸多丧葬习俗，可以说是巫文化的直接载体。湖湘民间风俗，从人死到葬礼结束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过程：死者咽气前，子女须守护"送终"。一旦咽气，要马上撤帐，并立即在床边烧纸钱，谓之"落地钱"。随后，给死者净身。净身后为死者穿寿衣，寿衣男单女双，即男穿三、五、



七层奇数，女穿二、四、六层偶数。然后移尸地席上，以黄表纸盖脸，白线系脚，孝子披麻戴孝致哀。接着派人向亲友报丧，待主要亲友到齐瞻仰遗容后入殓。入殓时，棺内四周填塞孝者旧衣，说可暖死者筋骨，然后封棺。封棺时，若死者是男的，则孝子须全部到齐；若死者是女的，还须女方外家亲人察看无异议后方可封棺。封棺后，一般停柩于厅堂左侧。柩前竖灵牌，设灵堂，点青油灯。早晚供奉祭祀，孝子柩前守灵。停柩时间长短不一，一般死后第三天出殡。但也有为择吉日而停柩时间较长者。家庭富裕者，出殡前两天，请僧人做“道场”。一般家庭从简，但亲友邻居备礼咸集吊唁则相同。出殡时，停柩祠堂或堂屋门口，举行祭祀仪式，然后送葬。长沙一带的习俗，送葬仪式一般在吃过“早撒”后进行。送葬时，孝子披麻戴孝或着白色孝服，手捧遗照，领柩前行。其余送葬亲友则手捧花圈、挽联、祭幛随柩送行。到达墓地，先宰杀雄鸡“跳坑赶杀”，而后下葬。入葬前往往要看风水、择坟地，谓“择吉地”。掩土前，要用罗盘核准朝向，以利风水。下葬后的第三天，孝子身着孝服，到坟地祭祀，将坟土堆高，谓之“复三魂”。至此，葬礼结束。旧时孝子头三天不准洗脸，七天不脱孝服；百天内不理发、夫妻不同床、不去掉鞋上的白布。若夫亡，妻三年内不准改嫁。葬礼以后，有做七、断七、百日、周年等追悼仪式，并将牌位送归祠堂，这已从葬礼时对人的仪礼转为对“鬼灵”、“祖灵”的仪礼。

在丧葬活动中，民俗特征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送终、装殓、做法事、出殡等几个环节。

死者临终，在外子孙要火速归家守候，听其遗嘱，给其送终。送终无论对于死者还是生者，都是一种莫大的慰藉。有些没有送到终的人，一辈子都觉得遗憾和愧疚。一旦落气，屋内号啕大哭，屋外鸣铳报丧，同时要烧纸轿“送行”，名曰“起轿”。并烧“倒头纸”作“路上盘缠”，将病榻上的枕席、稻草等送至村边路口焚烧。

民间对死者的装殓是极为重视的。殓，就是给尸体穿衣下棺。殓分小殓和大殓两步，小殓是给尸体裹衣衾，大殓是把尸体装进棺材。人初死入殓前要给死者招魂、沐浴。沐浴的水由师公或长者鸣锣开道，领孝子到附近井畔汲取，俗称“打水”。孝子跪地舀水，亡者多少岁，便舀多少杯。每舀一杯，敲一下锣。打水归，加贡香煮沸，凉后洗浴，更衣装殓。小殓时还要

把米或饭团放在死者口中，富庶人家含璧、珠等，皇族含玉，近代则含一银元，均称之为“饭含”。大殓时往往随殓一些物品，一般人有衣、被及日常用品等物，还要置一桃木棍。长沙一带的风俗，死在家门外的人的尸体和灵柩是不能放入屋内的，只能在屋外扎灵堂进行祭奠和做法事。大殓时，子孙献被必须置于最里一层，紧贴死者遗体。

法事，又名做道场，将音乐与开坛、念咒、诵经、请水、告庙、开方、破狱、解结、安神等过程相结合。民国以前，道场做5～7天，需道士9～11人，后多做3天，所谓“三日四夜道场”。做佛事即念经，边念边敲木鱼。古人迷信这些活动可超度亡魂，使之免受地狱之苦，降福子孙。行儒教即请礼生喊礼开祭，有朝奠、午奠、夕奠、家祭、客祭之分，读祭文时抑扬顿挫，如泣如诉，催人泪下。有的地方每晚家祭之后，有绕棺习俗，所有在堂男宾各持一根香，由人带领，围着灵柩转圈，口诵《正气歌》等。

丧葬活动一般在出殡前一天达到高潮，吊唁宾客络绎不绝，丧酒有多达几十席甚至百余席的。此日一般有封殡、告祖、成服、烧灵屋、打八封灯、开路灯等活动。封殡，与亡者永别，是丧葬中最悲痛的时刻，亲人们把亡者生前最喜爱的东西悉数堆入柩内，除衣物外，还有金银玉器等珍品，但忌眼泪流入。

出殡前夕，孝子通宵守灵，俗称坐夜。宾客多拥聚孝堂听夜歌。夜歌是一种民间挽歌，来源已久，周朝时即有“子夜之歌”。有人认为源于“庄子鼓盆歌，是夫妇之死别”。长沙人多请歌师或亡者生前好友唱，连唱几晚，有一定的曲调，内容主要是“二十四孝”、“十月怀胎”等，也有些挑逗俚俗之语。至出殡前夕，唱“辞别歌”，唱逝者生平，感人泪泣不止。

出葬时，灵柩所经之地，一路上每隔几步丢纸钱一张，为向阴间买道之资，避免阴间路鬼拦道，死者不得安宁，称“买路钱”。此俗纯属迷信，却延续至今。此外，沿路的邻里乡亲都要燃放鞭炮。此俗也沿袭至今。

湖湘礼俗文化，不仅是湖湘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现代社会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湖湘逐步形成了学礼、讲礼、尊礼、行礼的社会风气，在建立人际间的和睦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道德风貌。

第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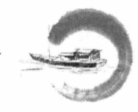
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当今时代，包括思想、观念、知识和科技、信息、人才在内的各种文化因素，正超越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的重要力量。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①] 发展区域经济，必须推进区域文化发展，加快湖南"四化两型"社会建设，必须学习、研究湖湘文化。坚持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学术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理性审视湖湘文化传统，挖掘湖湘文化的当代价值，传承湖湘文化精神，推动湖湘文化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其新的内涵，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是实现湖南富民强省的必然要求。

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2.









第一节　湖湘文化的当代价值

湖湘文化，是勤劳智慧的湖南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不懈奋斗中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结构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湖湘文化的价值追求，集中反映了湖湘儿女生生不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湖湘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构造着我们的过去，并且正在构造着我们的现在和将来”。[①]在21世纪的历史维度中，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和环境，湖湘文化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湖湘文化的当代价值何在？这是传承和创新湖湘文化首先要加以了解和明确的。

①朱汉民．湖湘文化与中国文化[J]．湖南社会科学，2001(1)：3.

一、“心忧天下”的爱国传统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宝贵资源

爱国主义是人类最伟大、最深厚的情感，它表现为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和深切眷恋，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期盼，对祖国繁荣的坚定信念，对祖国主权的坚决捍卫，对祖国尊严的自觉维护，对卖国求荣的切齿痛恨，对爱国志士的无比崇敬等。

任凭时代风云变幻，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的爱国传统历久常新，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奋发图强，报效祖国。湖湘大地是无数仁人志士忧国忧民情怀的产生之地，也是他们心系天下苍生、探索国家民族前途之地。战国时期楚国著名诗人屈原以三闾大夫遭贬，但他始终关注国家命运与民生疾苦，上下求索于湘楚大地。西汉政治家贾谊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之时，写下《吊屈原赋》，表达了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北宋政治家范仲淹

虽然未曾到过岳阳，却在其千古名文《岳阳楼记》中抒发了“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志，而宋代的许多湖湘士人则直接投身到抗金、抗元的第一线。

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湖湘大地成长起一批又一批以挽救天下危亡、抵御外侮、振兴国家为己任的仁人志士。在“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精神激励之下，左宗棠兴办洋务、抗击法军侵略，抬棺西征、收复经略新疆，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新志士谭嗣同立志报国，以“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唤醒国人。辛亥革命以来，湖南人一直处在挽救国家危亡的最前列。熊希龄在《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中说：“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①] 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唱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②] 表现出湖湘儿女对天下国家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更是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品格升华到了新的境界。1915 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卖国的“二十一条”，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毛泽东在师生们编辑的《明耻篇》封面上愤激地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③] 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④] 的强音。毛泽东以胸怀天下、立志打破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远大抱负与强烈使命感，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伟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世情国情也在深刻变化着，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尤其是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和平演变战略，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进行“西化”、“分化”、“腐化”、“丑化”和“溶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责任和义务培育、弘扬民族精神，这是我们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支柱。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内化在一个民族主体中的，经由历史凝聚而延传着的稳定的、特殊的精神

① 湖南时务学堂缘起，新知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

② 杨度. 杨度集[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95.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11.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390.



气质或总体精神风貌,[①]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灵魂,而爱国主义则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毋庸置疑,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爱国传统可以为民族精神的培育注入不竭的价值资源。

①田丰.论文化创新的基本内涵及实现途径[J],学术研究,2004(2).

在当代,弘扬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首先应当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统一。当代爱国主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坚持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内涵的核心。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离开了社会主义,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都是不可能的,离开社会主义谈爱国主义也只能是一句空话。爱国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社会主义为爱国主义提供正确的政治发展方向。其次,弘扬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要与集体主义相联系。爱国主义既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种道德规范。作为道德规范的爱国主义,是用集体主义原则处理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必须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同时,弘扬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既要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又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把弘扬爱国主义真正落到实处。

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是建设务实作风的思想武器

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直面社会矛盾,求真实干,不尚空谈,以求达到国治民安之实效。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务实、求实的特点和“入世”、“救世”的情怀,其思想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不遗余力地整理典籍、推行社会教育、周游列国宣传其政见,都是为了改变当时社会动乱的局面。儒家文化不尚思辨,而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吸收了这种经世思想,并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治天下”,就是对经世致用的最好注脚。

湖湘文化深受儒家“经世致用”学风的熏染,继承了“经

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早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宏，就坚决反对那种“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空洞学问，坚持研究国家治乱兴亡之道。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夫之，曾提出“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想，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唯实”思想路线。在近代史上，魏源更是经世致用的主要提倡者，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就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这部探究经世致用之学的著作。鸦片战争后，他撰成的《海国图志》，详细介绍了当时世界5大洲90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知识，从思想上揭开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序幕。魏源主张创办军事工业，学习制造新式武器技术，最终制服列强，这就是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近代湖南人不光有“经世致用”的思想，而且积极入世，发扬光大。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是典型代表。曾国藩创建并领导的湘军，为湖湘学子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在湘军内部，形成了书生领兵的特色，高级将领中八成以上是书生。一时间“湖湘弟子满天下”，“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而曾国藩及其随从都是王夫之学说的继承者，都极力推崇经世致用之学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军务、政务最为烦累之时，还鼎力支持、资助《船山遗书》的刊刻出版。[①]其余湘军名将多有宣传经世致用的诗文问世，并且自己亲身实践，产生了感召天下的效应。有了湘军这样一个政治优势，湖湘文化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播。许多湖湘学子投奔湘军，通过残酷的战争，创造和积累了运筹决胜的军政经验，涌现出了一大批军政人才，使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得到了最好印证。

① 陈潭，易丹妮．湖湘文化与湖南区域政治传统论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经过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建设，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就湖南而言，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改革建设的政策支持，为加快湖南发展提供了重大而难得的历史机遇。“十一五”时期的快速发展，改善了基础设施，加快了经济结构转型，提升了产业实力和科技、教育整体水平，增强了体制机制活力。“四化两型”建设与富民强省目标的确立，“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也为我们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描绘了发展的蓝图，使我们完全有条件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伟大的成就只能代表过去，任何鼓舞人心的目标和振奋人



心的规划，都必须实在、实用，都要靠人去实干、实现。然而，我们的工作作风与发展的要求之间还存在诸多的不适应。基层调研时走马观花、为了升迁搞政绩工程、一有成绩就宣传庆祝、遇到问题则坐而论道等形式主义的东西大量存在。在现实生活与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假、浮、庸、懒”等突出问题。有的人弄虚作假、阳奉阴违；有的人浮在面上，不抓落实；有的人甘于平庸，得过且过；有的人懒得学习，懒得去做等。这些，对我们事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奋斗目标，完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必须建设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克服形式主义、治理“假浮庸懒”，通过治假树公信，治浮求实效，治庸强能力，治懒增效益。湖湘文化重视实践、提倡力行的“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是我们在新时代建设务实作风重要的理论借鉴。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湖湘学派、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积极实践，勇于实践。

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是参与社会竞争的精神力量

“百折不挠”是湖湘文化作用于个体的集中体现，是湖南人独特的性格特征。湖湘人无论受到多少挫折都不退缩，认定方向就永不回头。这种特别的执著，用湖南话说就是“霸蛮”，可见其意志之坚强。

湖南人“百折不挠”的性格特征，是由其独有的生存生活环境造就的。湖南古称“三苗”，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气候变化无常，冬季潮湿低温，夏季酷暑高温。春秋两季，三湘大地受西北的寒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交替影响，时晴时雨，骤冷骤热。这种恶劣的气候，培养了湖南人坚韧、抗争和不屈的顽强意志。

这种“百折不挠”的性格特征，还与湖南历史上的战争与移民有关。湖南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了多次战火的蹂躏。为避兵祸，加上朝廷安排，大规模的移民来到湖南，使湖南有“移民省”之称。移民最根本的特点是有耐劳的心理意志和拼搏精神。“能从四面八方跋山涉水，来到异乡进行繁衍生息，开拓生产，不但要求有健壮的

体魄，而且要有顽强的意志”。[①]用“百折不挠”来概括湖湘文化精髓，既能恰当地反映湖湘文化的传统特色，又有深厚的历史依据。

① 张军.移民与湖湘文化[J].湖南城市学院，2007(2)：14.

湖南人自己常用“霸蛮”来概括这种独无仅有的“百折不挠”的血性。楚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迈气概，是霸蛮；曾国藩一介书生从戎，“屡败屡战”、以“打落牙齿和血吞”的信念打出“无湘不成军”的威名，是霸蛮；左宗棠抬棺进疆，横扫阿古柏军，不让寸土是霸蛮；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变法洒热血，是霸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更是霸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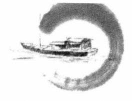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竞争异常激烈，特别是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是如此。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推进湖南“四化两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困难和问题不少，挫折不可避免。我们需要“百折不挠”，敢挑重担；我们需要义无反顾，永不懈怠；我们需要努力向上，自强不息。只要真正做到上述这些，我们就不会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与达不到的目标。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湖湘先辈。[②]

② 周秋光.湖湘历史文化与当代湖南文化产业[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3)：1～4.

四、“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推进社会发展的传家之宝

“艰苦奋斗”是指在艰难困苦条件下的奋发努力、昂扬斗志。新形势下的“艰苦奋斗”，远远超出了外在的口号和形式。在思想开放、理念更新、生活多样化的时代，坚持艰苦奋斗的本色，意味着保持一种生活准则，一种工作作风，一种利益观念，一种精神状态，追求一种高尚的奋斗目标。

与湖南人“百折不挠”的倔强性格相统一的，是湖南人特别能吃苦和敢于拼搏的刚健气质，形成了湖湘文化坚忍的特征。最早最明显表现出艰苦创业精神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他避居山野，甘于清贫，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在艰险的环境下，深究儒学的治学与做人之道，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一生著述达 100 种，400 余卷，800 多万字，教人进取、激人奋发；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等将领，在带领湘军征战过程



中，扎硬寨，打硬仗，屡败屡战，表现出忘我的奋斗精神；辛亥革命的主将黄兴，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每每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最终成为开创中华民国的一代元勋；蔡锷在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甚一日之时，抱病潜赴云南，发动护国讨袁，在万分艰难、特别危险中带领官兵为国家而战。在他们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湖南人特有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气概。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带领人民奋斗，经过"井冈山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和"三年解放战争"，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十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在建国前夕，他针对党执政后可能出现的问题，郑重地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根据当时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阐述了艰苦奋斗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激励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投身我国的建设事业，克服困难、不懈奋斗。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M]．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438～1439.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作大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在新时期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理论内涵，多次强调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意义。2002 年年末，胡锦涛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重温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长期艰苦奋斗的重要论述。向全党、全社会继续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努力方向。

今天，尽管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但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环境约束强，发展不平衡，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巨大竞争压力，我们仍需坚持艰苦奋斗。就湖南而言，正在进行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业，唯有艰苦创业，才能圆满完成。在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征程上，湖湘文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对广大干部群众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不良影响，树立厉行节约、反对铺张的社会风气，形成积极向上、奋发有为

的心理品质，培植创业不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具有强大的激励、引导作用，是推进社会发展的传家之宝。

五、“兼收并蓄”的开放思想是进行文化创新的重要方法

“兼收并蓄”，出自韩愈《进学解》：“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①]原意是把各种东西一并收罗藏蓄，后指把性质不同的东西都吸收、包罗进来。“兼收并蓄”是对湖湘文化开放思想特征的集中概括。

① 徐中玉．大学语文[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21.

湖南虽古为“四塞之地”，但地处南北交通之要冲，东连西进之枢纽，是各种文化交相汇合、相互激荡之地。从历史上看，湖湘文化的融会经历了如下过程：一是春秋至战国时期楚文化与越文化等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二是国内及湖南内部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三是湖湘文化与其他不同学派文化之间的交流；四是湖湘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②]

② 刘峰，陈艳红．湖湘文化及其对湖南经济发展的影响[J]．船山学刊，2005(2)：26.

湖湘文化兴起之初，便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周敦颐是湖湘文化兴起的标志性人物，在其思想学术的创建过程中，他立足儒学而又大量吸收、融合佛教与道教的思想与理论思维成果，其思想体系从理论架构到范畴、命题，都有对佛道之学的改造与利用。[③]到近代，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面对西学纷至沓来、中西文化激烈对撞的现实，以开放的姿态接受西方文化的长处，接受挑战，充分汲取外来文明的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反映了这种开放思想，展现出“有容乃大”的兼容并包特性。

③ 肖永明．湖湘文化的会通精神[J]．载蔡栋．湖湘文化访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22.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与区域发展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创新也越发受到重视。在文化发展和创新过程中，开放、兼容是一种重要的、根本的方法。文化兼容，是所有民族文化、区域文化提升水平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在今天由信息技术带来的互联网、物联网上，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使任何国家、民族和区域都难以将自身文化隔绝于他种文化和信息大潮之外。自觉吸收他种文化，决定了自身文化更新发展的能力和最终的命运。在文



化的创新过程中，我们要睁眼看世界、睁眼看外界。坚持兼收并蓄的思路和方法，一方面要克服那种故步自封、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心态，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湖南经济建设与社会全面进步的步伐；另一方面又要注重识别和抵制西方资产阶级的不良思想与腐朽的生活方式对人们灵魂的侵蚀，自觉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保证我国我省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健康稳步地向前推进。

六、“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是激励奋勇前行的强大动力

纵观湖湘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湖湘学派和湖湘学人在迎接社会挑战、改造社会面貌上颇有建树。“敢为人先”、自创新路，不失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命脉。国学家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称湖南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①]这句话，就是对湖南人所具有的创新传统的一种概括。

古代湖南人敢为人先、敢于创新的最突出代表是周敦颐、王夫之。周敦颐作《太极图说》，以“图”和“说”的形式，论证了宇宙的演化过程，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和范畴体系；王夫之对“理先气后”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阳明学说”的主观唯心主义展开批判，创立了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体系。到近代，魏源开风气之先河，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突破“夷夏之大防”，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大力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谭嗣同直接继承了王夫之的精神，不模仿任何现成模式，“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如此等等，都说明湖南人有一种独立开拓的创新传统。这种传统使湖南人在近现代设计了一个个革新图强方案，积极探索了救国救民道路。

毛泽东受湖湘文化影响，成为创新的典范，他探索并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了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如果毛泽东缺乏创新意

①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第1版）[M]．长沙：岳麓书社，2010.

识，不能“敢为人先”，不能自创新路，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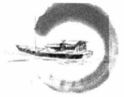
历史上的湖湘人士正是依靠“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使湖南成为风云际会之地，整体上推进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伟大进程，也为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当前，湖南人又面临现代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实现“富民强省”目标和实施“四化两型”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湖湘人士应强化“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想、敢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湖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再创新的业绩。



第二节 湖湘文化的现代传承

任何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传承积累和变革创新。离开传统、割断历史血脉，就会丧失根本，就会迷失发展方向。亨廷顿就曾对一些东方国家和后发国家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发展和文化模式，反而陷入停滞，导致内乱，发展缓慢，付出极大的代价而评价道：“有些国家领导人有时企图抛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①]历史发展到今天，湖湘文化的当代价值，更多地要在传承与弘扬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去体现，也只有在湖湘文化的现代传承中，我们才能真正全面地认识其价值，并在这个新的时代中，更好地施展其所长。如何有效地传承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发展和创新湖湘文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湖南地方振兴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①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353.



一、全面认识传承湖湘文化的重大意义

要实现湖湘文化的自觉传承，首先必须深刻认识传承湖湘文化的重大意义。

（一）传承湖湘文化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属性。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以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是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各要素的共同作用，文化在受生产力决定的同时，又能够给生产力发展以能动的反作用。文化发展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转化形成新的生产力；通过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提高人的素质，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通过对社会制度建构的指导作用，实现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优化，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力。

由此可见，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关联，密不可分。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已成为产品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下，已经找不到没有文化标记的产品，找不到不借助文化去销售的商品，也找不到不体现文化意义的消费。二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或曰信息社会、生态文明社会，文化资源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所谓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生态文明，其实质就是文化经济。在新时代和新阶段，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特质和内涵、文化底蕴和环境，都将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质量与水平。三是文化素质已经成为管理者和劳动者必备的首要的素质。对企业而言，企业家的文化视野、文化胸怀、文化内涵等综合文化素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发展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企业员工的文化素质，也对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和企业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对一个地方的领导干部而言也是如此，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无法以先进的思想理念和工作思路去谋划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也无法自觉运用先进文化和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四是文化优势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地区

的文化发达程度和特质内涵，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制度选择、政策取向以及各种资源开发和生产要素组合水平，从而也就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水平。[①]

当文化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总体趋势，文化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作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就没有思想动力和后劲。传承湖湘文化，弘扬湖湘文化优秀传统，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发展资源，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传承湖湘文化是构建湖南人文精神的必然选择

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人，而人是要有一点思想，要有一点精神的。思想、精神对于人的行为总是起着一种引领作用。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全球性的资源、环境和能源危机，必须构建和培育一种健康、良性的人文精神。

湖南，作为一个经济仍欠发达的省份，正处于负重爬坡、后发赶超、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实施“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发展战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攻坚时期。面对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自主创新、推进节能环保、保障民生改善、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任务，面临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竞争激烈化的发展环境，必然要承受大调整、大转型、大改革、大开放所带来的震荡与不适，而这些又必然会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困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培育湖南人文精神，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一般说来，人文精神是一个包含科学层面、道德层面、价值原则层面、人本主义层面、终极关怀层面等的复杂结构系统，[②]而一地的文化传统往往交织着这些层面的内容。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教授，曾就长沙人文精神的构建和培育提出了“三个必须”的基本原则：一是必须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二是必须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现代先进的市场理性的内涵；三是必须依据长沙的优良历史人文传统。[③]这三项基本原则，也就是我们构建和培育当代湖南人文精神的一

① 于幼军. 鼎新湖湘文化，振兴湖南经济[J]. 求索，2004（2）：56.

② 人民日报，1997年10月11日.

③ 唐凯麟. 关于建构和培育长沙文化精神的几点思考，见：周秋光主编. 湖湘文化的宏观研究[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27～443.



般原则。

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构建和培育人文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从湖湘文化的优秀历史传统的角度来建构和培育当代湖南人文精神，最主要的是要将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的爱国传统、“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思想、“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等与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将其合理内核与人文精神的道德、价值原则相结合，通过多种途径，把它们内置于人们的精神家园，内化到人们的灵魂深处，并将其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三）传承湖湘文化是构建湖南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中蕴藏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它始终贯穿于湖湘文化的发展演化中，无论是其历史传承性、哲学思考、传统的经世致用学风还是敢于破旧立新的革命精神，都体现了湖湘文化既遵从传统文化的和谐内核，又别有发展的独特风貌。[①]包容是和谐的前提，湖湘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倡导兼收并蓄，立足于传统的儒家文化而形成了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注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使多种文化形态“多元互补”，充分显示出了其内在的和谐性。

① 陈宇翔，薛光远．论湖湘文化传统中的和谐文化精神[J]．湖湘论坛，2008(1)：36～38.

湖湘文化依托于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主张“心性”与外物和谐相处，由心灵和谐进而谋求社会和谐。积极的经世意识和躬行思想，则是在对“人性—社会”和谐的理想追求中所体现出的特有的文化精神。湖湘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学风，追求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和谐，是通过心灵和谐来影响社会和谐。“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既敢于变革社会制度和体制中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更敢于破旧立新、推陈翻新，是积极建设、积极向上的和谐思想的逻辑发展。

在湖南的民俗文化与山水文化积淀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和谐元素。湖南民俗有的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感恩之心，有的体现了由人及物的兼爱思想，有的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观。在湖湘民间宗教中，具有对社会和谐的期盼。如在“梅山教”的教义中，“和”的观念正是其首要观念。此外，湖南自然山水积淀的和谐文化也很突出。例如，岳麓山山脚有岳麓书院，山腰有佛教名寺——麓山寺，山顶有巍峨道观——云麓宫。儒释道长期并处一山，千百年来共生共荣，和

睦为邻，这正是湖湘和谐文化的突出表现。[①]

① 周行易. 论湖湘文化的和谐魅力[J]. 企业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论版），2001(2)：178～180.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湖南地方的全面振兴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经济要包容增长，政治要民主文明，社会要和谐稳定，生态要绿色持续。当作为发展动力的改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时，各种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凸显，处理得好，能够顺利发展，经济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处理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或倒退。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湖南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首先要构建和谐湖南。"和谐社会重在建设，建设和谐社会，一刻也离不开和谐文化的支撑"。[②]构建和谐湖南，需要传承湖湘文化。激活湖湘文化的和谐魅力，就能激发湖南人民建设和谐湖南的热情，凝心聚力，团结一致，推动湖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承湖湘文化是构建和谐湖南的必由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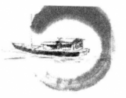
② 郑倡华. 发掘与弘扬湖湘和谐文化[J]. 新湘评论，2007(1)：36.

二、正确处理湖湘文化传承中的辩证关系

文化的传承总是通过一定的人群在一定的时空条件，即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生产生活条件和外部文化环境下实现的。文化传承形成文化传统，但传统不是静止的，具有运动和发展的含义。湖湘文化的传承，和所有事物的发展一样，在传承过程中存在着若干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正确处理这些辩证关系，才能实现湖湘文化在传承中的新的发展。

（一）正确处理传承与批判的关系

文化的传承必须有文化的批判，这是由文化存在的状态和文化传承的目的决定的。从文化存在的状态看，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是一个整体，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精华与糟粕往往是共生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文化传承的目的看，文化传承是为了发挥优秀文化传统的精神作用，以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当代社会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因此，要将唯物辩证法的扬弃观应用到文化传承的实践中去，正确处理传承与批判



的关系。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唯物辩证法的扬弃观要求对任何事物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能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为此，我们在传承湖湘文化的过程中，首先要弘扬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挖掘湖湘文化中有意义、有价值的成分，提炼出现实所需要的积极部分，用来推进改革、稳定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湖南的现代化建设增光添彩。同时，采取历史的、理性的、批判的态度，注意克服并抛弃那些不可取的弱点、缺点，去其糟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8.

正确处理传承与批判的关系，有一个以什么标准对历史形态的文化传统作出当代适应性的价值评判问题。湖湘文化传统中哪些是封建性糟粕，哪些是民主性精华，哪些要予以批判，哪些值得继承和弘扬，这要求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审视、分析和鉴别。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利于国家团结统一和民族振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符合科学原理、反映人民群众利益并为之所接受所喜爱的优秀品格与特质，则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而对那些宣扬专制统治、等级观念和封建迷信等愚昧落后的思想和意识，就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具有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优秀传统，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也是良莠互见、长短并存的。不仅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甚至其积极的方面也包含着某种消极的因素。湖湘文化根植于小农经济，在长期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在历史上与宗法等级制度及专制政治相联系，具有浓厚的“重农轻商”的倾向，呈现出偏重政治、伦理和“官本位”、“重义轻利”、“重仕途、轻工商”等特征。而且，近代湖湘文化中有些是优点和长处的地方同时又是缺陷与短处。比如：湖湘文化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但其“致用”主要又是“学而优则仕”，把做官当作读书人的正途，看不起经商办实业；湖湘文化具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但同时又有虚骄、所谓“霸蛮”而认死理不拐弯的犟性格；湖湘文化具有“敢为人先”

的创新精神并有像魏源那样力主对外开放、变革图强的代表人物，但也有保守落后思想和由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四塞之地”而形成的内陆封闭意识，等等。这些，正是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传承湖湘文化所要批判和扬弃的。

（二）正确处理传承与借鉴的关系

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传承和借鉴都是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着非凡的包容汇通精神，海纳百川，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而在吸纳过程中又始终以本土自创的文化为主体，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特点。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互动与整合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在这一人类文化变革的大局中，我们应重新确认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①] 所以，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我们必须把传承和借鉴有机地统一起来。一方面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下，贯彻“洋为中用”的方针，有分析、有批判、有鉴别地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更好地面向世界，保持文化发展的旺盛活力。

① 蔡栋.湖湘文化访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57～64.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湖湘文化就是构成这棵大树的一枝。在继承和弘扬湖湘文化的历史大潮中，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湖湘文化传承与借鉴的关系。首先，传承湖湘文化，必然强调和凸现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但不能无视它与中华文化本质上的相通与相同之处，湖湘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在传承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同时，不仅要放眼全国，还要放眼世界，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广泛汲取世界有益文明成果，全面促进湖湘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发展。

（三）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这个民族的精神记忆，它是从这个民族古老祖先传承下来的，始终保存着祖



先的基因和特征，但又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创新。离开创新，文化就难以延续传承，更难以繁荣发展。历史上一些曾经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之所以走向衰落以至于消失，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缺乏创新或创新能力不强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华文化具有求变趋新、吐故纳新的精神和能力，故能绵延五千年而不衰。这充分证明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高度关联、密不可分的。

事实上，文化传承与创新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是一种耦合关系，这种耦合关系不是静态的交叉重叠，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化创新的实现，必然以继承优秀文化成果为前提，同时创新又是对传承的超越，是一种在反思基础上的构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发扬传统和开拓创新是统一的，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①]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M]. 2002: 387.

文化传承贵在稳定，重在积累，要在稳定中发展，在积累中创新。需要适应时代的要求，需要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活力。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流激荡、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丢弃传统必然丧失自我，故步自封必然落后于时代。传承湖湘文化优秀传统，目的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古为今用"，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仅有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广泛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文化成果，必须与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充实许多新的、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经过整合创新，使之不仅在形态上，而且在内涵和核心价值体系上，产生一种"质"的飞跃，使其不断丰富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做好传承湖湘文化的各项工作

全面认识传承湖湘文化的重大意义，正确处理湖湘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关系，代替不了传承湖湘文化的各项具体工作。只有认真做好传承湖湘文化的各项工作，才能把湖湘文化发扬光大，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施湖南"四化两型"的发展战略提供精神动力。

（一）发掘整理湖湘文化典籍

文化典籍是任何一种文化得以保存传承的重要载体。2006年8月，湖南省委、省政府正式启动了《湖湘文库》这一特大典籍的编辑出版。《湖湘文库》既是湖南省“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也是全国“十一五”出版重点项目。《湖湘文库》是一套以整理出版湖湘文献为主，对湖湘人物、湖湘历史、湖湘风物等进行广泛发掘，深入研究，以供人们全面了解湖湘文化、深入认识湖南的大型丛书，是在政府主导下为更好地建设湖南、发展湖南、宣传湖南服务的一项文化工程。《湖湘文库》暂定出版规模六百种，约一千册，将对继承和发扬湖湘文化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切实保护湖湘文物古迹

文物古迹是一种文化的物化载体。湖南在保护湖湘文物古迹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在具体项目上。一是韶山“一号工程”建设。200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设韶山、井冈山和延安三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并命名为“一号工程”。2005年12月26日，毛泽东文物馆在韶山奠基，标志着“一号工程”正式启动。这无疑是湖湘文化的一座丰碑。[①]二是曾国藩墓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有关部门的关注下，从2006年开始，曾国藩墓复原修缮工程开始实施，一期工程已完成，二期复原修缮工作也已展开。[②]三是《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太平街街区为历史文化街区。太平街至今还保存有较多文物古迹、近现代史迹和历史建筑，如贾谊故居、辛亥革命共进会、四正社旧址等，素有“屈贾之乡”，“湖湘文化的发源地”之称。[③]随着改造工程的完成，太平街被打造成充满湖湘文化魅力的历史文化名街。今天的太平街及街内贾谊故居正生动地向世人诠释着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要保护好湖湘文物古迹，还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做。一是要在全省范围内加强文物古迹的保护规划工作。目前还缺乏全省范围内的规划。在城市化过程中，各地建设项目繁多，如果没有很好的文物古迹保护规划与建设发展规划对接，就可能导致一些湖湘文物古迹在各地的建设中被遗弃。因此，要切实做好基本建设中抢救性文物保护和考古挖掘工作，高度重视三湘大地红色文物的收集和革命历史遗迹的保护。二

① 文海．李长春十分关心湖南韶山“一号工程”寓意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12月3日．

② 曾国藩墓拟打造成文化园，一期修复工程已经完成[N]．长沙晚报，2010-2-3．

③ 张柏等．历史老街，古韵犹存——长沙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及实施[J]．中外建筑，2008(1)：55～69．



是要健全文物古迹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尽管已出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但整体上力度还不大，政策法规不配套、不完善。三是要加大湖湘文物古迹保护的经费投入，特别是在一些文物古迹之地免费向民众开放后，损耗加大、维护费用上升，如果不增加投入，保护工作就不可持续。因此，增加投入是湖湘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保障；四是要加大政府对文物古迹保护的工作力度。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文物古迹的保护要有意识地介入、引导和扶持，将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与政府主导的文化传承和文化教育事业有机结合，给文物古迹的保护以巨大的动力。

（三）加强湖湘文化宣传教育

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需要加强宣传教育与文化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湖湘文化，关心湖湘文化的发展。一是要加强学校教育。现代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湖湘文化得以书面传承的重要环节。要在学校开设湖湘文化课程，将其作为中小学生文化通识课程。在各高校中，也要把它作为一门重要的提升文化素质的课程，让所有专业的学生来选修。二是要大力开展媒体宣传。充分利用湖南影视传媒业的优势，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育和打造一批能实现湖湘文化传承功能，深受群众喜爱的影视节目或栏目，以湖南卫视、湖南经视为传媒平台，实现湖湘文化广泛而有效的宣传。要推动湖湘文化的丰富资源与数字网络技术结合，在移动信息服务、远程网络教育和数字娱乐产品中融入湘湖文化优秀传统的宣传教育内容。三是要搞好民间节庆活动，充分发挥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利用民间节庆搭台，由湖湘文化来唱戏，使民众在节日的欢庆之中，接受湖湘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从而达到传承的目的；四是发展文化旅游。要充分挖掘、整合湖南的历史文物、历史名人故居的资源，将湖湘传统文化与山水旅游有机结合，有效串连，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文化旅游基地，做响文化旅游品牌，让旅客在愉快的旅游经历中学习并传承湖湘文化。通过这些宣传途径，对民众产生舆论影响，在浓厚的湖湘文化氛围中，培养每一个人的湖湘文化精神与强烈责任感、使命感，从而形成以湖湘文化精髓为核心的文化风尚。



第三节 湖湘文化的综合创新

文化具有传承性，但更是一种时代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不断创新、激活，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并为时代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也是湖湘文化生存与发展之道。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这既给湖湘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只有坚持分析、批判、借鉴、创新，并与时代精神不断融合，才能使湖湘文化散发出历久弥新的光辉。

一、湖湘文化创新的基本原则

在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文化该如何创新？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创新湖湘文化，"为我所用"？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历史课题。湖湘文化创新，首先要坚持和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一）统放结合原则

所谓"统"，就是指统一，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思想，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所谓"放"，就是指"开放"，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引领多样化文化的发展，是我们党关于文化建设的一贯思想，有其贯彻始终的连续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照搬照抄马列的教条，更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理解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指导思想"，而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各种文化活动，用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结合中国实际、不断解放思想，以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指导文化建设与创新实践。①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能有效推动生动活泼的文化局面和繁荣兴旺的文化土壤的形成。坚持统放结合原则，要求我们在湖湘文化的创新过程中，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二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充分挖掘和鼓励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中积极向上的文化元素，更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湖湘文化的建设与创新。

① 蔡武．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1)：1～4.

（二）与时俱进原则

与时俱进，就是指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开拓进取，在努力探索中发展创新湖湘文化。坚持与时俱进，就要在湖湘文化创新中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前沿，用“宽广的眼界”来观察文化问题，将湖湘文化置于中华文化一体之中，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把握时代脉搏，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来思考中华文化的新发展和湖湘文化的再发展。

坚持与时俱进，就要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湖南地方振兴发展的实践，准确把握国家层面经济社会发展与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与创新的新要求，发现并准确分析文化建设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的新问题、新经验甚至新教训，将湖湘文化的创新立足于解决这些实践中所产生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并从文化理论的层面上予以总结、概括与提升。坚持与时俱进，就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文化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创新文化的样式与形态。

（三）兼收并蓄原则

兼收并蓄，原指把各种东西一并收罗藏蓄，或指把性质不同的东西都吸收、包罗进来，以开放的意识和态度博采各家之长。文化包容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丰富自己的文化、提高文化水平的必由之路。正是通过以共性和个性为矛盾核心的交融、兼容和整合过程，每一种文化逐渐克服它自己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而日益走向自觉、全面和厚重。这是文化共性在对种

种特殊性的扬弃、差异性的消除中不断拓展和丰富自身的过程，也是文化与时俱进、高扬个性的过程。

湖湘文化是在吸收各种文化优秀之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实现和推进其创新，要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学习各民族文化创新与实践的经验。只有这样，湖湘文化才能在各种文化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创新湖湘文化，可以实行转换性创造，通过对文化本体的诠释，兼容并蓄非湖湘文化传统，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注入适合现代社会的内涵，以契合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切实承担起历史和时代的责任。

（四）雅俗共赏原则

雅俗共赏，就是既要坚持湖湘文化创新的高雅品位，又要广泛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所谓雅文化，即高雅、优雅的文化。往往指存在于典籍中的思想理论和文学艺术。它意在强调一种韵味和内涵，是通过时间、历史的沉淀而日益形成的。所谓俗文化，又称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与雅文化相对，往往体现在民风民俗和老百姓的精神心态、行为习惯之中。在文化创新发展的实践中，雅文化与俗文化不再作为互相对立的两种概念而出现，相反，它们可以是相辅相成或互相转化的关系。

坚持雅俗共赏原则，首先要做好文化鉴别与区分的工作，把握湖湘文化创新的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不良文化。坚持雅俗共赏原则，要正确对待人民群众在文化需求上的“雅与俗”，让湖湘文化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实现文化品种、载体、风格的极大丰富，促进文化的大众化、通俗化，使湖湘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湖湘文化的创新，也只有这样，湖湘文化才能真正做到既贴近生活、出于群众，又高于生活，引领群众。

二、湖湘文化创新过程中应防止的几种倾向

在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折中主义等诸多社会思潮，这些思潮无疑会对中国的文化建设与创新产生深远影响。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虚无主



义和文化折中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巨大思想障碍，也是湖湘文化创新发展的思想障碍，应引起特别重视，并在湖湘文化创新过程中注意防止这些思潮的不良倾向影响。

（一）防止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文化保守主义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的全球性现象，其基本特点是力图以价值理性来批判来源于现代化的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①] 从国际上看，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受全球一体化的催生、“文明冲突论”的刺激和西方后现代主义传入的影响。

文化保守主义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一是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出现了人文精神失落、社会道德失范、个人主义膨胀、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负面现象。这促使思想文化界反思西方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五四”以来激烈反传统主义的非难，以儒学为内核的传统文化饱经磨难，在“文革”期间甚至被等同于封建文化。改革开放后，学术界以理性态度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于是对激进主义的文化批判进行反拨；三是改革开放带来了文化大交流，大交流激活了潜伏已久的保守主义情绪。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一个特征是回归传统，第二特征是精英文化让位于民间俗文化，第三个特征是反思和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当代文化保守主义对湖湘文化的创新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是由于其强调传统的基础作用，对文化虚无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有利于形成批判性继承湖湘文化优秀传统的社会氛围。二是以其价值理性批判防止工具理性过分膨胀带来的恶果，主张科学技术与心性人伦的共同进化，有利于激活湖湘和谐文化。三是其反对“西方中心论”，这对弘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是有益的。

但是，文化保守主义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错误。一是其立足于政治层面来进行文化反省，或通过重建儒家意识形态来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这和湖湘文化创新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相违背的；二是文化保守主义缺乏自我批评意识，容易使人妄自尊大、过分自负，从而无限夸大传统文化的价值，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以及不顾现实条件而滥用传统文化资源。

① 吴雨欣.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J]. 武汉：湖北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35.

湖湘文化中，自负的因子流淌其中。在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它充分体现了湖南人自信中的自负。这种自负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下，是完全有可能强化的，它不利于湖湘文化的创新和现代转型。因此，在湖湘文化的创新中，要充分注意防止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不良影响。

（二）防止文化虚无主义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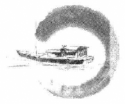
文化虚无主义，又称文化激进主义，是一种以全盘肯定西方价值取向为特征的文化思潮。它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一种选择模式，其代表性理论为胡适、陈序经等全盘西化派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全盘西化论"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承性，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显然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全盘西化论"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笼统地抽象地肯定某一种文化的价值，从根本上忽略了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现实需要的文化创新能力、对外来文化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1]

文化创新是建立在对优秀传统文化基础的传承上的。没有传统就没有现在，更没有未来。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伸，有上下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成为中华民族得以连绵不断的精神支柱。湖湘文化也同样如此，已成为我们湖湘人精神气质的一部分。

湖湘文化的创新一定要注意继承和保护好湖湘文化优秀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具有其合理性，同时既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亦是如此。时代发展到今天，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随之而来的是人员、文化和信息的频繁流动，西方文化的精华会被我们吸收，但糟粕特别是腐朽文化是不能引进的。

在湖湘文化的创新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深入批判文化虚无主义，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克服文化虚无主义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努力提高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性，让湖湘文化的智慧照亮我们的生活世界。同时，要高度重视文化安全问题。西方国家一刻也没

① 熊吕茂．中国近代文化思潮述评[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18.



有放弃对我“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这一图谋如果和文化虚无主义结合，就会严重威胁国家和区域的文化安全。在“文化安全”的问题上，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性与严重性，认为“文化无以亡国”是十分错误、十分危险的。事实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无一不是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应该吸取，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在湖湘文化创新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止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产生的不良影响。

（三）防止文化折中主义倾向

文化折中主义，又称文化调和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后期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在近代中国盛行一时，且影响深远，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从闭拒到融合汇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反映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轨迹。[①]

“中体西用论”否定了“文化自我中心论”，承认西方也有先进的东西，进而主张可以并且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中体西用”只是近代中西文化整合过程中最初的形式，并不是中西文化融合与汇通的科学选择，“中体西用”论割裂了文化的整体性，又违背了文化整合的规律。实际上，文化整合是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不同源流、不同性质以及不同目标取向、价值取向的文化，会在整合过程中渐渐融合，适应新的社会需要而组成新的文化体系。[②]

认清文化折中主义的实质，防止不良倾向的影响，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在湖湘文化创新中坚持兼容汇通的精神，整合博采各种文化的优长。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继续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而现代化又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动态性的过程，其具体内容、主要任务和阶段性目标以及实现方式等，都会因不同的生态地理环境、经济基础、政治制度而发生各种变化。由此，区域文化的交流和交融的增多，可能呈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局面，但也可能出现“杂交”的文化趋势，弱化区域文化的一些特质和特色。这在哲学的层面上来说，就是“和合”的思想方法。按照这一思想方法的要求，在湖湘文化的创新中，要和其他地域文化做到和而不同，转生合一，并依据“和合”思想所传达的“和生”、“和处”、

① 王继平．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折衷主义[J]．贵阳：贵州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②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384～386.

“和立”、“和达”、“和爱”的哲学理念以及开放宽容、独立和谐、共生共赢的原则，展开文化创新的实践和行动。

三、湖湘文化创新的路径选择

湖湘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像一只虽然无形但却有力的手，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我们湖南产业乃至整个湖南经济的思维模式、决策方式、运行机制、发展速度乃至前途命运”。[①]正是由于湖湘文化对我们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湖湘文化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才更有依据和时代意义。

① 朱有志.超越文本 更新观念——湖湘文化创新应当实现八大转换[J].求索，2004(12):5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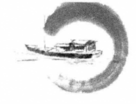
（一）创新文化观念，健全文化心态

创新湖湘文化首要的是创新文化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不更新，就不会有创新的精神，行动则更难以实现。创新湖湘文化观念，要瞄准世界文化发展前沿，准确把握中华文化的发展定位和历史趋势，充分吸纳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转变观念贯穿于湖湘文化创新的全过程。

创新湖湘文化观念，必须调整湖湘文化的取向。有学者认为，“湖湘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②]的确，近代湖湘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政治本位，近代政治文化关注更多的是动乱、权力和斗争，而当代经济文化关注更多的则是稳定、建设和发展。当历史过渡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建设年代时，“任何游离于经济中心之外的角色是可怕的，即使再出色，也只能算一个边缘角色”。所以，崇尚政治的文化观念必须由崇尚经济的文化观念所取代，赋予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新的内涵，建设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文化，否则，我们的言行就会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观念不相适应，与时代发展相悖甚至发生冲突，逐步边缘化，最后只能退出历史舞台。

② 朱有志，刘云波等.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10大转换[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2.

与此同时，要大胆实现从崇官文化向崇商文化的过渡。大力弘扬崇商文化，营造新型商业观，形成一种重在市场而不是官场展露才华、实现价值的观念。“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使命感不能丢，舍我其谁的冲天豪气不能丢，



但这些必须转移到发展湖南产业、振兴湖南经济的平台上，培育一批企业家，锻造经济湘军、产业湘军。如果这样，则“无湘不成军，无湖南人不成衙门”的传统美名必将为“无湘不成商，无湖南人不成实业”的现代美名所取代。

作为传统文化，湖湘文化有一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需要健全的文化心态引领文化建设。湖湘文化适应机制的建立及其现代化的进程，决不是用传统文化的思想、概念和范畴去解释现代社会，也不是用现代的思想内涵去注释传统文化。要做到这一点，湖南人必须彻底告别湖湘文化的傲慢与偏见，克服文化自负，甩掉严重影响湖湘文化创新的沉重包袱，进行文化自省，克服湖湘文化的历史局限和自身缺陷，走向文化自觉，从而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①]

① 万里．湖南形象塑造与湖湘文化创新[J]．企业家天地，2009(8)：17～19.

（二）利用现代技术，创新文化业态

新的文化业态不断涌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是文化生产和传播领域革命的重要表现。文化业态创新既给我们扩大文化阵地、加快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各种文化形态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日益加深，现代科技在文化领域的运用必将更加广泛。因此，不断创新文化业态，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②]

② 盛和泰．大力推进文化创新［J］．http://www.sina.com.cn，2004年1月14日，光明网.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文化产品及其传播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在湖湘文化的创新过程中，要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电视、数字电影、网络出版、文化创意、文化博览、网络游戏和动漫制作等新型文化产业，运用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等现代技术与手段，催生数字媒体、框架媒体、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购物、媒体零售等新兴文化业态；要注重培育新的文化产业生长点，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文化创新聚集区，大幅度提高湖湘文化产业的科技水平，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方面，取得新进展、新突破；还要鼓励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研发，开发文化数据处理、移动文化信息服务、数字远程教育及数字娱乐产品等增值业务，从而推动湖湘文化产业不断升级。[③]

③ 盛和泰．大力推进文化创新［J］．http://www.sina.com.cn，2004年1月14日，光明网.

同时，在湖湘文化的创新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发挥政府投入的导向作用，加大社会资金的投入力度，使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创新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同时，也要看到现代科技渗入文化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高度警惕文化垃圾甚至腐朽文化

借助高新技术大力制造和广为流传，应有效打击各种手段的盗版和侵权行为，切实保护文化知识产权。

（三）重塑文化形象，打造文化品牌

纵观历史，湖南的文化形象有一个显晦反复的过程。虽然目前的考古发掘证明湖南的史前文化十分发达，但因文字记载少而沉晦至今。在文献记载中，晚清以前的湖南，尽管有许多史前神话传说，但相对中原而言，属荒远之地，四面交通阻塞，非地势之当冲，方圆凿枘于正统文化价值，因而湖湘灵气并未发扬，“人才”寥若晨星，碌碌无轻重于中国，士人也多以“獠蛮”目之。自楚国征服洞庭湖一带以来，湖南是古代宦海失意者的迁谪之地与南下或经之处，以其地气候变化无常、猛兽毒蛇遍布、瘴气瘟疫横生等印象出现在文人骚客诗文中。虽然在刘蜕中进士之前，湖南人早在唐代就已打破中进士的零纪录，但仍然被当做“破天荒”神话广为流传，并载入文献而成为一种文人之间的“常识”，足可见湖南在晚清之前的历史形象并不那么多姿多彩。[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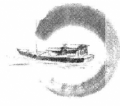
如果将湖湘文化置于与时俱进的问题意识和现代性观照之下，创新湖湘文化就需要重塑湖南文化形象，要在湖湘文化中发现具有超越时代性的普适性元素，通过改造和提升并融入现代的文化元素，将一些由于社会历史局限而不能适应甚至阻碍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过时元素予以剔除，寻觅湖湘文化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普适性元素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和融合点，以促进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对湖湘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共生的文化元素进行分析，探讨对其进行改造与创新后，为当今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开辟可行性途径。对湖湘文化历史资源中所缺少的文化元素进行考察，放宽视野，从其他地域文化乃至世界其他国别文化中借鉴有利于促进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元素，对其内涵进行补充和更新，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湖湘文化的时代适应性和社会实用性。

在上述发掘、提升、改造、发扬和借鉴的基础上，整合出具有时代风貌的湖湘文化精神内涵，融入当代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的大潮中，以求在促进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重塑湖南形象，并通过全新的湖南形象促进湖湘文化以及精神面貌的不断创新与提升。[②]

湖湘文化的创新依赖于湖南文化形象的改变和文化软实力

① 万里．湖南形象塑造与湖湘文化创新[J]．企业家天地，2009(8)：17～18.

② 万里．湖南形象塑造与湖湘文化创新[J]．企业家天地，2009(8)：18～19.



的提升，提升湖湘文化软实力又依赖于文化品牌的建构。湖南文化资源丰富，是打造文化品牌、提升湖南整体实力和对外辐射力的比较优势。湖南可以充分利用独有的伟人和名人文化资源优势，全力打造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伟人故居红色文化品牌，并充分利用名人效应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同时，政府应加大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开发和新建文化景观、文化基础设施，定期举办高水平的文化艺术活动，以此培育和积聚湖湘文化人气，提升湖湘文化活力，增强湖湘文化的对外影响力和辐射力。

构建湖湘文化品牌，要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直接推动我们参与全球文化产业竞争。我们要在现有“电视湘军”、“出版湘军”、“报业湘军”、“演艺湘军”、“动漫湘军”等在国内有影响的文化品牌的基础上，加强引导，重点扶持，让这些品牌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四）发展教育事业，培育创新人才

湖湘文化历来重视教育。湖南人喜好读书，视读书为至上，耕读继世，孝友传家，为众多士子宗族追慕景从，湖湘大地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英才。“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在这种文化精神的熏陶之下，湖南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强烈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把积贫积弱的中国逐步引上了近现代化的进程，使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独领风骚。从历史源流看，岳麓书院作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标志着湖南地区文化教育落后局面的打破。湖湘文化成就的最显著标志，就是涌现出了一代代彪炳史册的知识群体，岳麓书院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湖湘文化成就的最好注脚，湖湘文化的最大特色也正是拥有大批既有文化知识、又有经邦济世志向的知识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崛起，文化产业的发达，人才资源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湖南人才发展却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大地受制于人才发展的落后状况。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看，我省一直处于全国各省区市中的中等偏下水平。2010年，我省经济总量居全国第10位，与面积和人口所占比例极不相称。近年来，湖南财政总收入虽增幅不小，但总量不大，人均财力

在全国省区市中排位较为靠后。工业方面，我国总体上已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级阶段，但我省尚处在中期的起始阶段，和沿海发达省份相比，还较为落后。[①]

面临着这种人才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局，时代需要一批既有湖湘文化优秀品格又有现代市场经济意识、法制观念、企业家精神、环境保护意识等时代先进文化意识的“新湖南人”，需要从这块革命英雄、政治英雄和战争英雄辈出的神奇土地上，生长出灿若繁星的财富英雄、知识英雄和经济英雄。湖湘文化发展创新的主体还是出生于湖南、生活工作奋斗于湖湘的知识群体，在文化发展、教育普及的大前提下，这个群体的规模、身份、知识结构前所未有地扩展。一切具备现代知识结构，从事各种文化行业，具有某种文化使命的科技、教育、文艺、体育、新闻、出版、娱乐和旅游等专业人员、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均属于这个庞大群体，这就需要增强忧患意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造就一批适应新形势的人才群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湖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蓝图。

① 马贵舫. 湖湘文化视角下的湖南人才新政[N]. 长沙大学学报，2007(7)：14.

（五）坚持开放兼容，实施整合超越

从文化创新发展本质而言，兼容开放是整合超越的前提。文化的开放首先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开放，面对国内外许多其他的优秀文化，应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吸收其积极因素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坚持兼容开放，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但是湖南自古以来与外界的接触有限，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的内陆省份，“风气闭塞，人才寥落”。虽然湘军的崛起使得湖南风气大开，并催生出了一批放眼世界、锐意改革的开放先锋，但是湖湘先民们闭塞保守的特性也在近现代得以遗传和彰显，使得近现代湖南历史上的排外保守势力与开放进步势力同样声名显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对于湖湘文化传统，我们应该立足现今时代高度，坚持批判地继承借鉴和创造性地发展的原则，对旧的文化及其传统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坚持兼容开放，最终实现湖湘文化在内容、形式及体制机制上的整合与超越。

在内容上超越，就是要使湖湘文化更具鲜明的实践特色，讴歌湖南人民长期伟大实践和现实生活，要使湖湘文化更具民族特色，充分反映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展示湖湘人士的特点、风格和气派，要使湖湘文化更具时代特色，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展示时代风貌。

在形式上超越，就是要不断适应群众的接受能力，总结群众的丰富创造，运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文化的有益经验，广泛进行实践探索，不断推出湖湘文化的新形式，不断创造社会广泛接收的文化新方法。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大力推进现代科技在文化领域的广泛运用，改进和提高文化表现形式。

在体制机制上超越，就是要求湖南应进一步增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产业群建设，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并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推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制，打造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增强文化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湖湘文化创新，不断开创湖湘文化创新发展的新局面，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

经过整合超越，最终要实现湖湘文化的现代转型。转“宗守理学”为宗守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宗守现代先进科技知识为当代湖南的学风，以立足国家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充实“经世致用”的现代内涵，充分吸收非传统但符合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经过中国化、湖南化后为我所用，真正实现学以致用、用而促学，达到“富湘”、“强湘”和“富国”、“强国”的践履目标。超越“终极关怀”的传统内容，将演变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承担社会责任，关心国家命运、社会发展，并做好准备，随时挺身而出。重构湖湘文化伦理精神，真正冲出自己的思想禁区，于理性中释放长久以来被压抑的闯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大显身手，完成桑梓情结下的文化反哺，使湖南人“湘音无改，乡音不改”，无论理想的风筝放飞多远，但风筝线总会绕在湖湘情结上，并随时准备为家乡建设作贡献。[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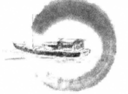
“天变，道亦变”。新时代中市场经济的大潮浩浩荡荡，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坚持兼容开放，调整湖湘文化取向，实现整合超越，给源远流长、恢弘大气的湖湘文化注入现代理念，才能使古老的湖湘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才能重振湖南雄风，再造属于湖南的历史荣光。

① 皮学军．试论湖湘文化的现代转型[J]．船山学刊，2004(1)：38～39.



主要参考文献

[1]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元)脱脱等.宋史·周敦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4)
[3]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长沙:岳麓书社,1985
[4] 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1)
[5]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J].历史研究,1988(4)
[6] 王之春撰,汪茂和点校.王夫之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马林若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4
[8]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
[9] 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
[10] 梁绍辉.周敦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
[11]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5
[12] 王兴国,聂荣华.湖湘文化纵横谈[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13] 张伟然.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J].中国史研究,1996(2)
[14] 郑佳明,郑焱.湖湘文化之都[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1):84
[15] 安宇,刘旭.魏源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16] 韩强.儒家心性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1)
[17]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353
[18] 齐良迟.齐白石艺术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9] 唐志明.湘西苗族傩戏发展简述[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20] 胡发贵.王夫之与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21] 刘旭.湖湘文化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22] 章启辉.旷世大儒——王夫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3] 游俊,李汉林.湖南少数民族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24] 殷义祥,丹枫.楚文化的特点及影响[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
[25] 周秋光.湖湘文化宏观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6] 李瑚.魏源研究[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2
[27] 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8] 庾建设. 湖湘文化论坛[C].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
[29] 张楚廷,张传燧. 湖南教育史[M]. 长沙:岳麓书社,2002
[30] 张学军. 湖南教育大事记[M]. 长沙:岳麓书社,2002
[31] 朱汉民. 湘学原道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2] 齐自来,马泉. 齐白石[M].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
[33] 王驰,刘鸣泰. 湖湘文化大观[M]. 长沙:岳麓书社,2003
[34] 朱汉民. 湖湘学派史论[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35] 刘铁峰. 论梅山道教文化中的巫觋崇信现象[J]. 长沙: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4(4)
[36] 朱有志. 超越文本,更新观念——湖湘文化创新应当实现八大转换[J]. 求索,2004(12)
[37] 林浩基. 齐白石传[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38] 蔡栋编. 湖湘文化访谈[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39] 聂荣华,万里. 湖湘文化通论[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
[40] 廖静仁. 天下湖南之旅[M]. 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2005
[41] 彭大成,韩秀珍. 魏源与西学东渐: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2] 曾维良,林艳. 三峡巫文化初探[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
[43] 李跃龙. 湖南民俗的特征、分区及其对社会进程的影响[J]. 求索,2005(5)
[44] 陈廷亮,姚赛红. 土家族"茅古斯"文化本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民间文化论坛,2005(6)
[45] 万里. 湖湘文化大辞典[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46] 朱有志,刘云波. 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10大转换[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2
[47] 周秋光. 湖湘历史文化与当代湖南文化产业[J].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3)
[48] 方克立,陈代湘. 湘学史[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49] 萧萐父,许苏民. 王夫之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0] 马贵舫. 湖湘文化视角下的湖南人才新政[J]. 长沙大学学报,2007(7)
[51] 郑焱. 近代湖湘文化概论[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2] 郑佳明. 湖湘文化之都[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
[53] 赵蓓. 近现代湖湘文化特色自主创新的历史地位[J]. 求索,2008,(11):115
[54] 周秋光. 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历史演变[J]. 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
[55] 朱汉民. 湖湘文化与中国文化[J]. 湖南社会科学,2010
[56] 肖谦. 论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文化特质与价值取向[J]. 船山学刊,2010

后　记

我国方兴未艾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无疑包括了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年青一代大学生义不容辞应当承担起继承和发扬中华优良文化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中华文化的光荣使命，这是民族的嘱托，更是历史赋予的重任。为了承担起这一光荣使命，青年一代大学生首先应当了解中华文化，在了解的基础上领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唤起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如此就难以继承和发扬中华优良文化传统。学习中华文化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了解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形式和基本元素。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渊源。作为湖湘儿女，理应首先认识湖湘文化。为了给青年大学生学习湖湘文化提供一个读本，我们编写了这本《湖湘文化要略》。

文化类教科书有不同的编写方式。有的以史为纲，依次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有的按内容分类，分别介绍各类型文化现象。我们编写《湖湘文化要略》则采用了综合方式，力图以概括的笔调与精简的文字描述出湖湘文化的整体形象，揭示出湖湘文化的精髓与独特个性。我们认为，采用这样一种方式编写的湖湘文化读本，可能更具普遍适应性，更适合各个学科各个专业的学生学习。本书是否实现了这一编写意图，有待广大学习者和教师来评判。

湖南省原副省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湖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唐之享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亲切指教并欣然作序，在此谨致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本书的编写还得到了湖南省委组织部黄爱华、湖南省委宣传部李小平、湖南省委机关党委黎池、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陈建民等湖湘文化研究同仁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谢忱。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不少文化研究尤其是湖湘文



化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对于前辈和同行们的研究成果给予的深刻启迪，我们深表谢意。我们已把参考书目一一列出，如有遗漏，谨请指出，以便于我们订正。

本书由杜纯梓教授提出编写大纲、负责总纂并撰写绪论，彭思毛教授撰写第一章，高宁教授撰写第二章，帅建华博士撰写第三章，周宇教授撰写第四章，曾永胜讲师撰写第五章，唐旭君教授撰写第六章，刘建军教授撰写第七章。全书由杜纯梓教授负责统稿，彭思毛教授、刘演林教授协助统稿。

编　者

2011 年 3 月 20 日于岳麓山下